

目 录

-
-
- 1 兴中会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意义……………松本武彦
周泮池译 白子明校
- 22 回忆秋瑾女士……………服部繁子
郑云山译 李廷善校
- 41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
进步理论……………Л.Н. 鲍罗赫
吴根梁译 董进泉校
- 61 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B. A. 克里夫佐夫
B. A. 克拉斯诺娃
郑厚安 刘佐汉译
- 118 华莱士使华前后……………罗伯特·菲斯
林海译
- 158 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史蒂文 I. 莱文
肖健宁译 王应一校
- 188 四十年代末期美国对华外交策略……………A. 马鲁欣
丁如筠译 郑厚安校
- 203 耶稣会士在中国……………A. 布鲁
顾裕禄译
- 215 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
的孔教复兴运动……………颜清湟
粟明鲜译 马宁校
- 247 马来西亚华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李国卿
柳平译

282	在印垄断与在华开放（1839—1933年）·····	黄宇和 区拱译
302	苏联与新疆省的贸易（1913—1926年）···	奥·布克施泰因 吴永清译 林荫成校
321	关于日本纺织业打入中国·····	杨天溢 唐宝林译 宓汝成校
342	奉天军阀的经济基础、经济特征 及其崩溃的过程·····	小林英夫 熊达云译
356	读者来信·····	

兴中会在孙中山革命 活动中的意义

——着重与华侨相关的问题

松本武彦

一 前 言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综观他的年谱，在笔者看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革命运动的筹划，大多是在国外进行的。从1895年到1911年先后发动的十次起义中，孙中山在国内直接领导的只有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而三民主义的原型，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追述的那样，是在伦敦被清政府公使馆监禁以后，通过对欧洲的考察和研究而形成的^①。

如果可以把古今堪称革命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概括为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从而试图推翻它；或进一步讲，这一行动是由于对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的处境与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引起的话，那么，孙中山又是如何认识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状况的呢？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终身奋斗目标是变革中国的现实，而他的活动却主要是在国外进行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满清王朝被推翻后，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虽时日短暂，但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件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可以说，这正是他在对中国民众生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付诸革命实践的。那么，他身居国外，究竟是怎样了解中国民众生活的呢？

^① 见《孙中山选集》1956年版，第171—172页；《国父全集》1973年版，第1册，第494页。

拙稿之所以把副标题写为“着重与华侨^①相关的问题”，其理由就在于针对上述疑问，试从广义上提出笔者的见解。具体地说，孙中山对中国民众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讲，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集中地承受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重压而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即与华侨的接触而来的。或者至少可以考虑华侨的存在是他认识民众的一个重要途径。依据这条线索来探讨近代中国的华侨问题，做为必须弄清的一个重要课题——辛亥革命与华侨的关系问题，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华侨的关系，已有不少论述^②。从这些论述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大致可归纳如下：第一是华侨对辛亥革命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以什么方式为革命做出贡献。铃江言一氏的文章，在强调华侨是革命运动资金的赞助者的同时，还列举了华侨在直接参加起义和对革命思想的宣传、普及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二个问题是，华侨为什么参加革命运动。关于这个问题，黄福鑫在阐述华侨出国的原因和当时清政府对华侨的态度的同时，把华侨参加革命运动的理由视为：华侨期望中国出现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政府，能够使自己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第三个问题是，在华侨当中，究竟有哪些人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

① 本稿用了“华侨”一词，但深究“侨”的字义，本该用“华人”为宜。但是，王赓武在《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史》（载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1978年，第27—32页）中所述的“华侨”一词，特别强调革命运动高潮中“侨”的意思，考虑到具有在中国本土与海外中国人坚强团结的意思，在此用“华侨”一词，从本稿内容来看是比较妥当的。

② 见铃江言一，《孙文传》，1921年，第4节第2项；成田节男，《增补华侨史》，1943年，总论第9章；黄福鑫，《华侨与中国革命》，1954年版；菊池贵晴，《华侨与革命事业的变迁》，载《历史教育》四——二，1956年2月；Wang Cung 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载《东洋学报》一五——二，1959年12月；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1963年；北山康夫，《辛亥革命与华侨》，载桑原武夫编，《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1964年；市川健二郎，《陈嘉庚与华侨的政治捐款》，载《东洋学报》五一——二，1966年9月；永积昭，《中华民国成立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动态》，载河部利夫编，《论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1972年；内田直作，《东洋经济史研究》Ⅱ，1976年，第10章第9节；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1976；孙健，《华侨与辛亥革命》，载《历史研究》1978年——四。

。孙健氏在论文中把华侨划分为工人、中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三个部分。他认为，工人是革命最坚强的支持者，大资本家对革命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第四个问题是，保皇派和革命派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而形成的对立形势。对此，菊池贵晴做了明确阐述，他与第三个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保皇派与华侨资本家阶层结合紧密，而对下层华侨却表示了冷漠、疏远的态度。与此相反，革命派是全力争取包括工人在内的华侨大众的支持的。

在阐述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个问题时，笔者认为，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具体说来，是在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去考察华侨的作用呢，还是相反，从华侨本身的自发活动中去了解革命运动。笔者认为应从后者的立场去探求，才能对这个问题找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必须弄清楚的是，并非革命派把华侨作为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力量去对他们进行组织工作的，而是世界各地的华侨出于自己的某一种想法，采取某一种形式去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的。革命思想的普及与传播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理论上的完美无缺，而是决定于这种理论是否能够鼓舞人心。孙中山等革命派想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就必须使自己的活动与各地华侨社会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因此，笔者冒昧地认为，革命运动的开展，在许多方面是受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华侨社会状况所制约的。

基于上述立场，笔者试将阐明日本，特别是横滨华侨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活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拙稿的标题和副标题的全部含义，目的就在于揭示兴中会时期，旅居横滨的华侨对革命所持的态度。为此，不仅要从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而且要尽量从华侨本身加以探讨。换言之，就是从华侨对待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来阐明兴中会时期横滨华侨的活动。

此外，关于本文的结构。为了说明兴中会时期横滨华侨社会的状况，可以提供的一条线索是当时华侨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那么，在这一时期横滨的华侨社会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分

化。假如存在，必须进一步弄明白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关于当时旅居横滨的华侨社会中这种阶层的分化问题，笔者将留待后叙。为此，首先要阐明的是有关横滨华侨的沿革，进而着重讲一下以华侨中下层劳动者为核心成立的社团中和堂，并通过这个社团与横滨兴中会的关系来探讨华侨对革命运动所持的态度。

二 横滨华侨沿革

1859年（安政六年）6月神奈川港口的开放，是横滨华侨社会形成的开始。开港之初在那里的中国人的数目已经不详。可是不难想象，随着欧美商行的设立，有些人业已充当了买办的零工。有人估计，当时中国人大约有40至50人^①。另外，他们在当地因属无条约关系国民，所以来往、居住都比较自由^②。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无条约关系的国民，都应遵守日本当局的法律。据1867年（庆应三年）11月颁布的《横滨外国人侨居地管理规则》第四条规定，无条约关系侨民一律进行登记^③，并在民事、刑事上受神奈川知县的管辖。按照规定，在登记时划分为上等（买办、商人）、中等（佣人、手工业者）、下等（劳工）三个阶层，依此对他们分别征收15美元、7美元、3.5美元的户籍税^④。在同一年出现了中国人建立自己组织的端倪，侨居横滨的华人张灏堂、陈玉池等数人，为组建中华会议所向幕府提出了申请^⑤。这是侨居横滨华人的互助组织以及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的机构^⑥。有关明治初年横滨华侨的职业、阶级分化状态，史料阙如。仅据前述侨居地管理规则，从明治二年到明治三年，登记在册的中国人，有上等36人、中等63人，下等903人，共计1002人^⑦，1871

① 见《横滨市史稿》产业编，1932年，第8页。

② 见《横滨市史》，第3卷下，1963年，第860页。

③ 见《横滨市史》，第3卷上，1962年，第367、373页。

④ 同上，第373页。

⑤ 见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1949年，第319页。

⑥ 同上，第165页。

⑦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62页。

年（明治四年）7月签订了日中复交条约，1873年（明治六年）3月批准生效。在这中间，1872年（明治五年）7月，发生了停泊在横滨的秘鲁轮船“玛利亚-露丝”号中国劳工逃亡、向神奈川县要求庇护的事件，即所谓的玛利亚-露丝号事件^①。在日中复交的前两年（即1871年），中华会议所已改名为中华会馆，同时会馆建筑物落成^②，且确定了中国公墓的地界（中华义庄）^③。1874年（明治七年）4月，制定了《旅日华人户籍条例》。当时虽然缔结并批准了《日中复交条约》，但鉴于中国驻日公使、领事缺任，条约未能生效。于是日本方面重新制定了一个处理华人事务的统一条例，规定上等人须纳户籍税2日元、下等人缴纳10分钱^④。那么，在旅日华人的生活稍微稳定之后，正式构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始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大约是从1874年左右开始的。上一年（即1873年）做为自治机构核心的中华会馆落成，并确定了墓地，而且所谓的“唐人街”（南京街）也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⑤。

根据前述条约规定，中国公使（驻日钦差大臣）于1877年（明治十年）12月上任。公使是何如璋、副使（知府）是张斯桂^⑥。而首任驻横滨领事（理事官）范锡明是在翌年，即1878年（明治十一年）1月抵达日本，并受到日方的正式接待。至此，旅居横滨的华人始同其它缔约国民一样，才享有治外法权。横滨华侨社会形成于1874年左右，这一判断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明治初年的十年，便可以说是它的成长、发展时期了。如图表所示，从明治十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为止，除个别年份略有变动外，华侨人口一直在增长着。这一点，可以认为是由于明治

① 见《横滨市史稿》，政治编3，1932年，第1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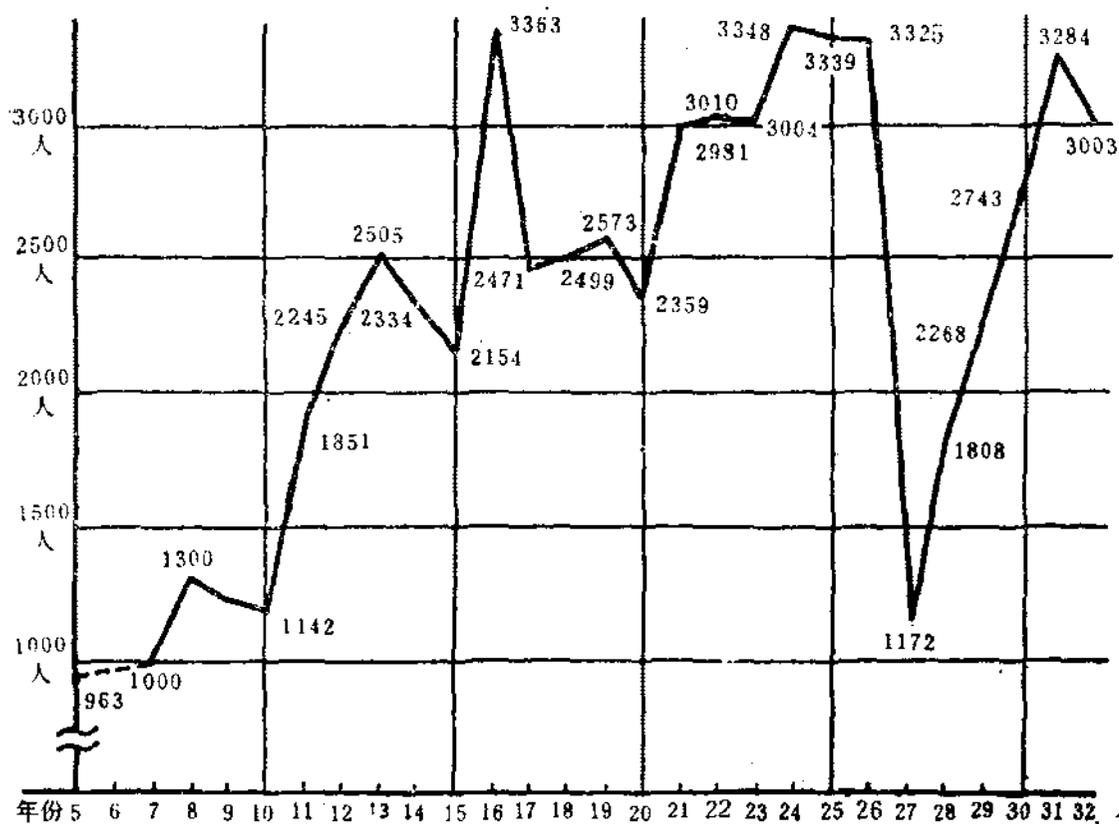
② 见前引内田书，第165页。

③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97页。

④ 同上，第885—886页。

⑤ 见《横滨市史稿》，风俗编，1932年，第577页。

⑥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89页。



侨居横滨的中国人数
(明治五年——三十二年)①。

十年驻日公使赴任，继之翌年领事的到任，从而不再受日本政府法律约束的结果。事实上，从明治十年以后（即1877年——1886年间）不仅在人口增长方面，而且华侨社会的机能也在不断扩大，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如1878年（明治十一年），侨居横滨的华人，因山西省发生饥荒，曾集资约12000日元寄回本国，以为援助②。1885年（明治十八年）前，出生于广东、福建、三江的侨民分别成立了同乡会。这里，必须弄清侨居横滨华人的籍贯问题③。正如几个研究资料④所一致指出的：在横滨的华人，出生

① 此表根据《神奈川县史》资料编15近代、现代（五），1973年，第1057—1063页，以及《时事新报》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一日的的数据制成。

②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903页。

③ 同上，第889——890页。

④ 见前引《横滨市史稿》，产业编，第137页；前引内田书，第165页。

于广东者占优势，而在广东籍中，尤以广州府香山县出生者居多数^①，据此而联想到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孙中山亦属香山县人这一事实，将有重要意义。

在横滨华侨社会的发展时期，关于他们的职业状况，根据1887年（明治二十年）对华人在横滨开业情况的调查，可知其概况。在总数149户中，经营杂货的（兼营点心、酒）25户、钱铺14户、鞋铺11户、饮食业10户、理发业7户、糖业5户、装订印刷业4户、药铺4户、当铺3户、裁缝3户、陶瓷漆器业3户，其它还有浴池、编织等行业^②。职业种类虽然繁多，但并不表明侨民在职业上可以自由选择，因为当局对他们在经营上是有种种限制的，如禁止到侨居地以外去经商，禁止在侨居地内从事烟、酒的制造等等^③。随着华侨人口的不断增长，犯罪率也相应增加，诸如赌博、卖淫、吸食鸦片，即是三种有代表性的犯罪活动。这些活动常是与日本人有牵连的^④。在鸦片问题上，华侨内部也曾有人试图加以制止^⑤。

如图所示，明治二十年代前半期，侨居横滨的华人已达3000人之多，但由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人口骤减三分之二，降低到明治十年以前的数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三分之一的中国侨民留在横滨，已不是临时离开本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侨居地内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生活基础。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横滨华侨社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中日战争结束后，华人又开始增多，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4月，又成立了亲仁会这样一个社团。该会是侨居横滨华人中的广东籍商人，特别是属于上层人士的一个亲睦组织，其成员只限贸

① 见前引《横滨市史》，第3卷下，第864页。

② 同上，第907页。

③ 同上，第905—912页。

④ 同上，第891—894页。

⑤ 见《横滨贸易新报》，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易商、钱铺、饮食业主中的头面人物参加^①。亲仁会的成立表明，在横滨华侨社会中，大体已出现了上、下两个阶层，这种阶层的分化连华侨自己也意识到了。

第二年，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7月修改的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本文忆述的横滨华侨沿革亦到此为止。这是因为，由于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人同外国人开始杂居相处，华侨沿革有重新讨论与考证的必要。依据这种杂居状况来考察，华侨社会势将以一种新的方式维持与发展。在日华侨社会的这种变化，将待另文叙述。修改条约给侨居地内的华人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再次对他们在职业上的限制。具体言之，就是根据勅令与外务省令，阻止那些所谓不熟练劳动者入境^②。而这种禁令所产生的后果，内田直作氏指出，正是家族团体或秘密结社未能在日本华侨社会内部形成的原因^③。

三 横滨兴中会与中和堂

（一） 横滨兴中会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895年11月经香港、神户抵达横滨。在日本停留约两个月，在此期间横滨兴中会成立^④。参加该会的横滨华侨有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梁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余人。由冯镜如任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等为干事。而后又有温芬（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自由）等相继参加^⑤。以后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几乎大部分革命活动都是以日本为直接舞台，

① 见内田直作：《东洋经济史研究》I，1970年，第82页。

② 见勅令第352号，内务省令第42号。

③ 见前引内田《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171页。

④ 见《国父年谱》上册，1965年，第72—73页。

⑤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1965年，第4集，第15页。

或革命策源地而进行的。

横滨兴中会的创立，是革命派对华侨鼓动宣传的结果，还是由于华侨积极主动地支持了孙中山等革命派呢？如果是后者，即把推翻现存制度作为革命宗旨，那么，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而决定参加兴中会的呢？

考虑这个问题时，有两点重要事实须注意：第一，是孙中山与横滨华侨最初接触的经过。1895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以后，在回国途中轮船停泊横滨时，有一位横滨华侨陈清，在船上曾亲聆孙中山宣传反满救国言论，并将其所闻转告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等。冯等乃邀请孙中山登陆共商国事，未果，孙授陈以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等^①。第二，是加入横滨兴中会的华侨对该会活动持怎样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冯自由有如下的记述：

旅日华侨多视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故会员咸有戒心，每次开会通知书皆不欲假手于日本女仆，概由小会员冯懋龙分别派送。^②

从以上这两点可以看出，在革命派与横滨华侨接触过程中，从华侨方面来看是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性的。但是，他们参加兴中会实际上又是带有一定戒心的，因为他们认为参加革命是大逆不道的事。所以，概括地说，以冯镜如为首的一部分横滨华侨，由于不满中国当时的现状，产生了参加某种政治活动的要求，他们对孙中山等革命派所提出的排满主张，虽视为过激，但在想改变中国现状这一点上却相同。因而他们一面对这种过激主张怀着戒备心理，一面开始了与革命派的接触。这就是横滨兴中会成立的背景。

^①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4—15页。

^② 同上，第15页。

1895年兴中会在横滨创立时，17名会员的职业、籍贯分别整理为表I^①。从职业看，商人占压倒多数。从籍贯看，则以南海县为最多，新会、香山两县次之。由此可见，南海县出生的商人，在总数17名会员中就有9名，占半数以上。这一事实表明，初创时期的横滨兴中会，可以说是以南海县出生的商人为核心而组成的。对比之下，南海县是9名，香山县只有2名。但在革命派核心人物中，孙中山的籍贯是香山，还有当时在日本的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并非出身南海。笔者认为，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横滨兴中会的活动是由华侨积极推动着的。而且，由于作为会长的南海县人冯镜如对同乡们的积极工作，兴中会才得以发展，而他也因此成为这一行动的中心人物。

职业 \ 出身地	南海	新会	香山	三水	职业别小计
商人	9	2	2	1	14
洋行职员	1	—	—	—	1
工人	1	—	—	—	1
学生	1	—	—	—	1
出身地别小计	12	2	2	1	17

表I 乙未(1895)年横滨兴中会
人会者的职业及出身地

如上所述，在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作为领导机关发挥作用的始于横滨兴中会，它经历了第二次惠州起义，以及和保皇派的对立与联合等多次曲折，直到同盟会的成立，才形成了一个大的革命高潮。在此过程中，兴中会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在横滨，而且整个兴中会组织，从它的性质、会员的成分上考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②，简言之，就是由初期以华侨商人和工人为核心，逐渐转向以所谓知识分子，最终导致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

①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43—47页。

② 见手代木公助：《从戊戌到庚子革命派与变法派的交涉》，载《近代中国研究》，七，1966年12月，第188—189页。

盟会的成立。应当着重指出，兴中会是在和留日学生的密切接触中，才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的^①。那么，在成分上，从商人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过程中，横滨兴中会初创时期那些商人的动态如何呢？具体地说，革命派之所以重视留学生，是否因为他们的出版物或宣传鼓动引起的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占多数的华侨商人逐渐脱离横滨兴中会的活动，革命派才使留学生走上革命运动的舞台。但是这里又有了新的问题，在会员成分上，从华侨商人向留学生的转变，是否那样天衣无缝、一帆风顺呢？这是个疑问。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商人要脱离革命运动，其原因何在？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搞清这些问题显然是必要的。

以上述问题为思考的前提，拙稿拟在下一节，阐述横滨华侨商人以外的人，即华侨工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 中和堂

在横滨华侨工人中，特别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是中和堂这个组织。这是一个船舶工人的俱乐部^②，开始并无名称，只不过是来往船员的息宿所^③。该所中供有关羽神象，每逢神诞及节日，船员均在此相聚饮宴^④，歌唱粤曲^⑤。其发起人为鲍唐，杨少佳、陈泽景、温炳臣、陈和等数十人^⑥，它是一个连名称都没有的，由广东工人集合起来亲睦相处的俱乐部。它与革命派取得联系是在1898年夏，兴中会会员尤列与其接触后，才开始定名为忠和堂^⑦。尤列建议订阅上海、香港的报纸，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但并未要求他们直接参加革命活动^⑧。（关于尤列，请

① 见野沢丰：《孙文》，1962年，第79—80页。

②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30页。

③ 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48年，第34页。

④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⑤ 见前引《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4页。

⑥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⑦ 见前引《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5页。

⑧ 同上，第35页。

参照后面补注。)

但是，同年冬，由于横滨华侨子弟学校——大同学校的董事改选问题，引起了戊戌改变后亡命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谓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对立。当时，反对保皇派的那批人，是以忠和堂这样一个团体的名义出现的。忠和堂会员温炳臣、陈和，推荐陈少白为该会顾问，这样，忠和堂与革命派便开始发生了关系^①。保皇派攻击忠和堂是迷信神权的下等社会。针对这一攻击，在陈少白的建议下，改忠和堂为中和堂，同时撤去关羽象^②。后来，基督教徒翟美徒等十余人加入中和堂^③，第二年，即1899年，翟美徒主持中和堂事务，1900年，尤列担任会长^④。

至于中和堂与革命派的关系，该堂自成立到民国初年，只是一个普通俱乐部，不过中和堂的办事人与革命党人接触频繁^⑤。堂内也有象温炳臣、陈和者加入了中兴会。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和堂随之消亡^⑥。

把以上过程简单地归纳如下。1896——1897年间，在横滨的唐人街，有个由广东籍船舶工人组成的俱乐部，1898年夏，革命党人尤列与其接触后，定会名为忠和堂，并严订了规章。同年冬，忠和堂采取了反对保皇派的行动，结果使中和堂出现了两种新的情况：一是聘请陈少白为顾问，与革命派建立了正式的关系；一是中和堂内撤去关羽象后，会员成分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徒参加进来。翟美徒、尤列先后担任会长，直到日本大地震消亡为止，该会始终作为工人团体而存在着。在此期间这个团体的干部与革命派常有接触，有些人则成为兴中会会员^⑦。

① 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② 见前引《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5页。

③ 同上。

④ 同注①。

⑤ 见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1954年，第14页。

⑥ 同上。

⑦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载《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主编，1956年，第80页），与冯自由关于中和堂的记述有若干不同。

以上所述是中和堂的活动。那么它与革命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是：横滨兴中会创立初期是由华侨商人组成的，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行动，这些行动对整个革命运动又有什么意义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以作出明确的回答。

（三） 围绕大同学校的革命派与保皇派

兴中会最初是以华侨商人为核心而建立的，后来由于商人脱离该会而逐渐转向以留学生为核心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这种变化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那么，在兴中会初创时期，华侨商人有无具体的积极行动呢，结论是否定的。横滨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为了东山再起，决定出走檀香山，为此曾在横滨募集资金，但鲜有响应者，时赵明乐辞去司库一职，甚至以后连会费亦难筹集，设在山下町175号的兴中会会所因此而被迫关闭，会务主要由冯镜如的文经商店经管^①。（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译者）何以导致如此景状？前面已经提及，主要是华侨商人认为革命是大逆不道之举。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因中日战争而一度中断的中日邦交恢复后，领事的重新赴任去寻找原因^②。横滨兴中会是以少数华侨，特别是以会长冯镜如与孙中山的密切联系而存在的。但是，这种状况由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的到来而恶化。围绕着大同学校而出现的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对立已公开化。

如前所述，大同学校是1897年以教育旅日华侨子弟为目的而设立的。孙中山应邀参加了筹建学校事宜，提议定校名为中西学校，并推荐梁启超为校长。与此同时，学校的发起者之一邝汝磐携带孙中山介绍函，到上海去会晤康有为，而康氏又推徐勤为校

①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4集，第15—16页。

②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1975年，第32页。

长^①，并决定改校名为大同学校。于是，徐勤和两名教员林奎、陈荫农一起抵达横滨^②。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孙中山亲自迎接，并准备就双方的合作问题进行商谈，但是，保皇派认为革命是大逆不道^③，且拒绝孙中山来大同学校。与此同时，还在横滨设立了保皇派分会，而华侨中的兴中会会员大都参加进去了^④。记述革命派与保皇派围绕着大同学校展开斗争的最详细的材料，是神奈川县知事向外务大臣所做的报告^⑤，现摘录如下（原文中没有标点，是笔者酌情添加的）：

秘甲第32号 关于华人的报告

当旅居横滨的华人所办之大同学校的总管及其它董事，因任期届满需进行改造之时，却因人选问题而产生了两派。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持派，该派主张连选现任董事，试图在人选上原封不动地保持现状；另一派，是比康有为一派更激进的以孙逸仙为首的改革派，该派是想趁改选之机，推举自己的同志为董事，试图对该校进行改革。15日，维持派的志士同仁聚会于中华会馆，将有董事选举资格者限定在华人买办和大商人范围之内。照此，约二百余人获有选举权。而反对者改革派认为，应有更多民众享有选举权，他们暗中筹划选举同一派人为董事。竟于昨天（17日）以151号忠和堂之名义，用红纸书写出告示，其内容是对大前天维持派在中华会馆所决定的选举办法予以否定并不准投票等等，分两处张贴在侨居地内。针对这种情况，维持派于昨天，17日晚7点30分再次紧急集会，决定对15日所作的决议照旧执行。我

① 见前引《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41页。

② 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主编，1956年，第46页。

③ 同上，第41页。

④ 同上，第42页。

⑤ 见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 支那之部 革命党关系（包括亡命者）》。

们估计事态发展下去会酿成两派之间的冲突，决定调动警察加以戒备。果不出所料，昨天17日晚，聚集在中华会馆者二百余人，首先有属于改革派、经营杂业、居住在50号的温芬发问：有谁赞同对大同学校维持现状。56号的冯紫珊（冯镜如之弟）起而答曰：吾为第一个赞成者。温芬乃云：今日乃吾中国人之集会，有英国人出席此会极不适宜，应速退出会场（指冯镜如已加入英国籍，英名字为金赛尔）。冯紫珊亦反唇相讥。双方均出言不逊，其中与温芬一伙的134号的无业者郑照，151号西餐馆的陈长和、鲍棠等壮武之士，开始动手撕打。后来局面逐渐平息，此次集会未果而散。会后，一些头面人物重新集会，决定取消15日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凡有关董事选举的一切事项，以后均委托中华会馆的45名干事全权受理。另据获悉，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持派，企图以大同学校为自己的办事机构，以达到提高华人文化水平的目的；改革派则欲利用大同学校之名称、董事及教员的变更，使其成为由孙中山主持的中国革命派的机关。改革派的主要人物还有9号的黎炳垣、50号的温遇贵、80号的谭奋初以及前面提到的温芬等，这些人都不过是受他人役使的壮武之士。谨呈此报告。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十八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呈

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

根据以上报告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横滨兴中会会长冯镜如及其鲍弟冯紫珊，作为保皇派的成员，成了革命派攻击的对象。第二，与保皇派对立的革命派，要求华侨给予支持时所用的名义是中和堂，而不是兴中会。事实表明，在1898至1899年左右，围绕大同学校事件可以看出横滨兴中会已失去其活力。在此之前，征集会费已有困难，只是由南海人冯镜如为代管，并依

靠其同乡商人勉强维持而已。他作为会长既然参加了保皇派，兴中会当然也就不能首当其冲与保皇派对垒，而只深仰赖于忠和堂了。一些资材证明，冯镜如和冯紫珊，以后一直为保皇派而奔走^①。

由上所述，围绕着大同学校董事改选问题而形成的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势力之争，其结果是以保皇派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关于此事，通过神奈川县向外务省的报告记录，便可见分晓^②。据报告称：当时横滨的支持“孙逸仙革命派”与“康有为派”进行势力之争的是华侨中的“中等生活水平以下者”，正如前报告中所揭示的，革命派是“唆使无赖汉”对抗保皇派，而“董事选举事宜由中华会馆四十五名干事全权受理”。结果，当选的董事均系“康有为一派的人”。

那么，作为横滨兴中会的主要依靠力量，站在斗争前列的忠和堂，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如前所引神奈川县给外务省的报告，是把忠和堂会员称之为“壮武之士”或者“无赖汉”的。再上一节已阐明了忠和堂是横滨华侨中下层劳动者的团体。

现在我们将目光集中到外务省记录中提到的中和堂成员鲍棠身上。是什么原因使他成为关键人物的呢？根据报告已知，忠和堂的地址是151号，恰好鲍棠也住在151号。这就需要考虑，在忠和堂的活动中，鲍棠是否起到某些重要作用。

据说鲍棠1896年时（明治二年）约十四岁，先到长崎，两、三年后又来到横滨^③，他当时的职业情况不明，说法不一。传说他在外国轮船上或商馆当油漆工，或经营中餐馆，或杂货店等等^④。在横滨，他最初住在侨民区175号，明治二十六年迁到151

① 见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 支那之部 革命党关系》秘甲第43号，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向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所呈报告，写于明治三十四年二月五日。

② 同上，秘甲第40号，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向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所呈报告，写于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③ 见菅原幸助：《日本的华侨》，1979年，第14页。

④ 同上，第17页。

号，大约在明治三十二年又迁到伊势佐木町开始经营中华餐馆。住在151号时，经营旅店、中餐馆、西餐馆等，他自己的住宅成了中日知名人士之间往来的落脚地^①。鲍棠死于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7日^②，是从自己住宅的二楼跌下，头部受重伤而亡^③。这一年3月9日出版的《横滨贸易新报》说：“前天夜里九点左右”，即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七日晚九点左右，加贺町警察署侦悉山下町151号中国人陈康方在二楼聚赌，立即派警察巡查，赌徒闻讯全部逃跑。但在现场附近的路上，发现一个人因被警察搜捕而沿屋脊逃跑，仓惶不慎中途坠落，头部致伤而死。这个人就是“账町一六四号中餐馆主人鲍堂（五十一岁），即所说华人赌徒的头目”^④。“堂”、“棠”tang发音相同，字形亦极相似，后来账町与伊势佐木町合并^⑤。可见，3月7日死去的鲍棠与3月7日死亡的忠和堂会员鲍棠应为一入。

四 结 语

1895年11月成立的横滨兴中会，是一个以会长冯镜如为中心、出身于南海县商人阶层的团体。由于他们从根本上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因此，其活动不甚活跃，基本处于消沉状态。这一状态又因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来横滨，在日本出现保

① 写于昭和二年二月六日的帝国兴信所横滨支所向复兴建筑助成公司的报告（麦闾玉藏）《过去与现状》中有如下记述：

他（指鲍棠的儿子鲍博公，鲍棠的继承人，当时经营中华餐馆。——笔者）生于横滨市伊势佐木町，这个店是上一代人（鲍棠——笔者）于明治二十八年创立的，最初在山下町151号，经营旅店、中西餐馆，由于成了中日知名人士之间往来的落脚点而闻名。明治三十二年迁至现在的地方，并开始以日本人为主顾，经营广东餐馆，以至生意兴隆。……

② 见前引菅原书第21页及鲍家旧帐（麦闾玉氏所藏）。

③ 同上，第21页。

④ 见《横滨贸易新报》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九日，《中国人的大赌场（发生死人事件）》。

⑤ 见《横滨市史稿》地理编，1932年，第157—158页。

皇派而日益加剧，而会长冯镜如继而又倒向保皇派，这是横滨兴中会作为一个革命团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

那么，针对革命派在日本的中心机构横滨兴中会丧失作用的这种情况，孙中山等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围绕大同学校事件，在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势力斗争中，中（忠）和堂发挥了重要作用。亦即在横滨兴中会的活动处于停滞的时候，代之而起的中（忠）和堂，实际成了革命派活动的主力。

从当时横滨华侨社会的实际状况来看，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对立，正是上层华侨商人与下层华侨劳动者之间矛盾的反映。如外务省记录所载，大同学校董事改选时，保皇派企图把有选举资格的人限定在“华人买办和大商人”的范围之内^①。而革命派则主张以“中等生活水平以下的华侨”^②为基础，“使更多的民众享有选举权”^③，因此酿成了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成为革命派的手足而积极活动的正是向外务省报告的文书所说的“无赖汉”^④、“壮武之士”^⑤的下层华侨劳动者，而中（忠）和堂则成了他们的母体。

此外，与忠和堂所在地同一门牌、居住在151号的鲍棠^⑥，与冯自由所提到的中和堂发起人之一的鲍唐^⑦（Pao tang）以及登载在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九日《横滨贸易新报》死亡记事中的华人赌头鲍堂，大概是同一人物。

另一方面，与成为革命派核心力量的下层华侨劳动者组成的

① 见前引外务省记录，秘甲第32号。

② 同上，秘甲第40号。

③ 同上，秘甲第32号。

④ 同上，秘甲第40号。

⑤ 同上，秘甲第32号。

⑥ 因为在侨居地内，每一个地区都编写一个门牌号，所以忠和堂的所在地不等于鲍堂的住地。但如第三章第三节所叙述的，他当时经营旅店业，因为经常有中日著名人士投宿，因而可以推测，其中包括孙中山等革命派，该旅店也做为忠和堂会址而被利用。

⑦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页。

中和堂一样，参加保皇派的华侨也成立了一个组织，笔者认为，那就是在第二章叙及的、仅限广东出身的上层商人参加的亲仁会。稍后，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报道在日本的保皇派的消息中，把亲仁会当作保皇会的别名，亦可作为旁证^①。

兴中会时期，在横滨及日本其它地方，自大同学校事件发生以后，有关中和堂的活动情况资料，为笔者鲜见。其原因，从中和堂是下层华侨劳动者的团体这一点可以想到。1899年修改条约，颁布了勅令及内务省令，从不熟练劳动者即下层劳动者华侨数目没有增加这一事实也可以推断出来。资料证明^②，留学生在兴中会占优势以前，他们曾作为革命派的中心力量而存在着。

在日本，兴中会时期革命派的活动，反映着横滨华侨社会的阶级分化状况。联系到华侨商人后来成为保皇派的主力，致使横滨兴中会的机能面临瘫痪。然而，这种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却促成了新的革命派主体的诞生，即以下层华侨劳动者为中心的组织中和堂。在此意义上，华侨社会的分化、解体，等于推动了革命派的重新集结。所谓华侨社会的分化过程，也可以说是把当时应运而生的各种华侨组织，集结到革命运动中去的统一过程的开始。

补注：

在有关尤列的记载中，有“尤列”（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册，世界书局1971年版，第107页）；“尤烈”（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载《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主编，1956年，第79页）；“尤少笸”（见《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69页）；“尤列”（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0页；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集，中国文物供应社1967年版，第60页）等等。而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2册中（1973

^① 见《中国日报》，1904年4月6日。

^② 见前引《革命逸史》，第3集，第131—132页。

年,第491页)还见有“尤”以及“尤少纨”的记载。少纨是其号当无问题,留下的疑问是“尤”与“尤”不同。本稿是根据《孙中山选集》及《国父年谱》,采用“尤列”的写法。

兴中会时期,革命派组织支持的下层华侨劳动者与保皇派支持的上层华侨商人的对比,胡汉民等有明确的阐述。(胡汉民述、张振之记:《南洋与中国革命》,载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1页;陈青生:《南洋华侨与革命》,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501页)。在把下层华侨与革命派相结合方面起过作用者,应考虑作为四大寇之一的尤列。

尤列,字会季,号少纨,还用别号吴兴季子。出生于顺德,曾在广州算学馆学习,后就任广东舆图局测量技师、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等职(见《革命逸史》,第1集,第40页)。17岁时,在上海加入洪门会(同上书,第45—46页)。关于他的简历可参照前引《革命人物志》、《革命逸史》等书。

至于他为什么成了革命派与下层华侨之间的媒介,兹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四大寇之一。

第一,如前所述,他很早就就是秘密社会的成员。第二,他的活动,使他有与下层华侨频繁接触。第三,他具备中国人传统的知识与教养……

他出入于鸦片烟馆进行革命排满宣传,在横滨他把海员亲睦关系的俱乐部组成忠和堂,以后又把中和堂扩大到新加坡、马来半岛等地,这些都是上面所举出的第二点的具体内容。而在新加坡开设一叶楼,在神户出版《四书章节易解》(见《革命逸史》,第1集,第51—52页;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华侨问题研究所1979年版,第195页)等等,则是以上所举第三点的内容。

在革命同志陈少白看来,尤列已成了鸦片的俘虏(见前引《兴中会革命史别录》),尤列具有秘密社会会员经常吸食鸦片的一面,这与中国人传统的知识、教养方面,看来似乎相矛盾,但

他能从自身内部进行调整，这一点，在整个革命运动中，可以说有他所起的特殊作用。

详细内容拟在另稿阐述。

译自日本《近代中国》1981年6月第9卷。

周泮池译 白子明校

回忆秋瑾女士

服部繁子^①

一 廉夫人与欧阳夫人

明治三十五年八月，清政府决定在京师大学堂施行新教育，向我国政府聘请人选。政府决定派遣我丈夫，急电将他从国外召回，他便经西伯利亚铁路匆忙回国。政府之所以这样急切，是因为据说，如果耽延，这项差使就会被别国争去。

这时，保定府的学者吴汝纶^②为了考察学务，来到了东京。他获悉我丈夫被选定赴北京任职，我也将结伴同往，很是高兴，便在日本桥的“偕乐园”宴请我们，表示感谢。吴氏对我说：“夫人或许会因现在北京读书妇女很少，她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交际’，而在到北京后感到很寂寞。我有个侄女儿叫吴芝瑛，识字，性格温顺，也乐于交际，目前跟她丈夫住在北京，我写信介绍你们认识，以后请您多加指教。”我听了很高兴。

九月初我们抵达北京。立即有大学堂有关人士和别的一些人前来照料。不久，我们初步安顿好家，那些夫人们就三三两两地

① 服部繁子（1872—1952）是1902年来华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之妻。本文回忆了她1904年上半年在北京与秋瑾交往、同年6月一起赴日本以及到东京后一段接触的过程。1951年，日本《中国语杂志》第6卷第1号发表了上半部，不久因该杂志停刊，下半部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82年才由《东西交涉》季刊第1卷第3号全文发表。全文约可译成中文二万字，现将与秋瑾事迹思想无关的一些段落删节（用删节号表示）。——译者

②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同治四年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后执教保定莲池书院。——译者

来看我们了。我过去听说中国妇女是极为消极、连门也不出的，眼前的情况却与这种传闻不同，因而感到意外。这或许是由于现在与过去相比，新教育的呼声高涨，日本的势力也强了，另一方面大概也有对日本妇女产生的好奇心吧，——但这也是出于殷切的心情，因而我感到高兴。

吴汝纶的侄婿是廉泉。由于清政府刚废止科举考试，只有学校出身的人才有可能做官，所以这位廉泉也进入了大学堂。不久，他的夫人吴芝瑛也来访问了我。她是个年纪四十一、二岁，身材娇小的人，有着杏花般的容颜，穿着黑色的朴素衣服和刺绣的绸裙，莲步姗姗，纯粹是个南方型的美人儿。“伯父已有信来，没有更早前来拜访，请原谅！”她是个态度恭敬而言语不多的女子，真是谦恭淑德的品格啊！此后我应邀去过她的家。她家在西城一个偏僻地方，是一个简朴的住家。但在她卧室里堆置着很多图书。廉泉自己也说：夫人读书比他还勤奋。以后我时常应邀前去。她亲手做的菜很好吃，总是很愉快地招待我。南方妇女做的菜一般都很好吃。大概从南方来到北方，口味不习惯，一般都在自己家里做些合味的菜，从而可说是出现了一个与北方官太太异趣的活动场面。我近来对中国话已渐渐熟悉起来了。吴芝瑛讲南方话，北京话也说得很好。她一般是不多说话的人，不过始终显示出有坚强的信念。

其后来访的是欧阳夫人。她也是南方人，大学堂副教授欧阳弁元的夫人，大体上也是个温厚而有学问，谈话非常谦恭，但很有志气的人。她和廉夫人都倡导女子新教育。总之，南方出身的人富有进取心，即使妇女也往往如此。北方人则因为在为官者的家庭中满族女子多，她们慑于皇太后的意向，对女子教育不能表示赞成与否。廉夫人和欧阳夫人大概因是南方人，对此也有同感。

……

翌年明治三十七年，正月的某一天，欧阳夫人来说：“听说

要为我们中国妇女设立女学堂，真是不胜感激！前些日子，师母（这里的人称我丈夫为师父，称我为师母）也和廉夫人议及此事，我们虽想报效师母的厚意，但却没有力量，很是遗憾；而且，女学堂成立后，纵然我们想入学，但作为家庭主妇，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一些同仁打算集合起来，创立妇女谈话会，经常一起研究学问，交流知识。想请您给予指导。”我很赞成这件大好事，就大体上决定了举行开幕式的日期。

在临近开幕式的一天，我拜访了内田公使夫人，对她说：“开幕式那天，务请您光临，并讲讲话。在北京这还是初次的会，大家一定会很感激您的。”内田夫人是人所共知的“同志社”出身的才女，在美国留过几年学，既是个美国化了的人，又有纯粹日本式的谨慎态度。在观念上，日本妇女同志不喜欢搞妇女谈话会，但奇怪的是她总是对我怀有好意，今天的事也不例外，作为我提出的请求，她终于允诺了，我为此感到高兴。然后她又说了些“您认为这种会能够长久存续下去吗”之类的话，我回答道：“不会长久存续下去的。或者在参加的妇女中有人迁徙了，或者出现了其他的情势，就不会长久存续下去。不过，要考虑这个国家的新事物会不会存续是很难的，只要有机会就先搞起来总是好的，亦即只要播种，总有一天会发芽。”内田夫人中肯地点点头。

二 妇女谈话会的开幕式

一月中旬的一天，妇女谈话会的开幕式在西城某会馆举行。宽敞的会场里来人意外地多，甚至男子也来了不少。与会的妇女大多是南方人，一些莲步姗姗的美人，但也多少可以看到些穿着高跟鞋，把衣服下摆提到大腿上走路的北方人，这是令人意外的。还可以看到三、四位达官太太。宝夫人（肃亲王的姐姐）照例在肥大的身躯上戴着“两把头”（满族妇女在正装时的大发饰），意气洋洋地走向上席，她一见到我立即招手致意。……

三 一颗行星的出现

二月的一天，谈话会在欧阳夫人住宅里举行。房间四壁书架上装着书籍，虽不算大，但收拾得很整洁。桌上花瓶里插着正在开放的鲜花。春天已经来临，但从昨夜开始的寒冷的朔风在猛刮着，不断叩击着窗户。不过室内充满阳光，炉子里炭火熊熊，很是暖和。这天的谈话会出席者很少，连那两、三位常客也因故未到，只有欧阳夫人、吴芝瑛、陶大钧夫人母女和我。“但这也好，不过堪称知己者来得太少，实在很对不起师母”，欧阳夫人这样说。象往常一样，我们首先读中国书，然后读相当于女高一年级程度的日文书，这时便一面提问，一面漫谈。在读书、谈话进行之际，一个丫头悄悄进来向欧阳夫人耳语了些什么，欧阳夫人略一思考，站了起来向我行了个礼。

一会儿欧阳夫人回来了，稍稍皱着眉头，面有难色。她对我说：“我的好朋友刚来到，说要入会，可以允许吗？”我漫应道：“嗯，好的，……见见面吧！”欧阳夫人行了个礼，把她的朋友带了进来。

事情很出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倾，浓密的黑发散乱地披着，全身洋式的男装，歪戴着兰色的鸭舌帽盖着半只耳朵，穿着兰色半新旧的很不合身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在袖口只能看到一点儿白嫩的手，拿着纤细的手杖。从过分肥大的西服裤下面，露出一双破旧的茶色皮鞋，胸前胡乱地挂着条绿色的领带。这是谁呢？面色苍白，大眼睛，细鼻子，薄嘴唇，细身材，在我面前站着的，可说是一位潇洒的美男子！吴夫人面带尴尬，欧阳夫人则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师母！这是我的朋友。”美男子大声说道：“我叫王秋瑾！”我伸手握了一下。吴夫人低着头说：“师母请勿见怪，这位是我们的朋友王太太。”哦！原来这是位男装的女子！吴夫

人盯着她命令似地要她“向师母行礼”，秋瑾微微一笑，“啪”地丢掉手杖，向我行了半跪礼。我用两手扶起她，让她在我邻席就座。她讲话带浙江口音，说得很快，我常常听不懂，由欧阳夫人翻译。我首先按照中国的惯例，问她家住哪里，她很快回答了“前门外”三字。欧阳夫人说：“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门外一家大商店的老板。太太很爱读书，很有学问。”这位男装美人也许有点拘束，同我说话不多，而与两位夫人断断续续地说着话。她们三人讲的都是南方腔，我听不大懂，好象是在认真评论来自东京留学生的一封信，情绪很激动。吴夫人苦恼着脸，欧阳夫人一面窥测我的脸色，一面向秋瑾使眼色。陶夫人和她女儿照例先已离席，我靠在椅子上闭目低声吟诗。

吴夫人对秋瑾说：“妹妹（在中国，朋友之间也把年纪小的女子称作妹妹），今天是谈话会，你既已入会，就可向师母求教”。秋瑾一面点点头，一面看着我们的脸问：“敢请教夫人，您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这确是很适合这位妇女所提的问题。我不由得微微一笑：“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秋瑾嘟囔着说：“孔子之徒！那就是所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信徒！”两位夫人很担心地看着我，可是不知怎么的，我产生了某种好感而答道：“是的，孔子之徒！孔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那个‘女子’，据说是另有含义的，这句话可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格言。即使在现代，也有人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女子有学问说成是害多益少，这是对妇女的侮辱，且是妇女头上的紧箍咒。但愿不要听从这种话而努力修养学习吧！我始终感佩中国妇女有勇气，爱学问，因此常多费口舌劝人学习。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妇女，必须超越国界，同病相怜，同胞相爱，故对于初次相见的你，我也敢好意地这样饶舌。”秋瑾口中说着些什么，而欧阳和吴两位夫人则向我频频颌首。

四 隐约可见的心情

在一个窗外城墙上杨柳吐青、二月的天空风和日丽的下午，在我卧室的暖炉旁，我与王秋瑾女士面对面坐着。按约今日来访的秋瑾，与那次不同，显得很沉静。衣服仍是兰色肥大的普通男式西服。我很自然地招待了她。越看越感到她是个真正南方型的婀娜多姿的美人儿，她长得似比林黛玉高些，并有与此相适合的时常曲着身子的癖性。我说：“秋瑾，一听到你的名字，不由得叫人想到白乐天的《秋瑾》诗，那首诗令人想到妇女的悲哀；但你是与那全然不同的幸福的人。”秋瑾回答说：“嗯，我的名字似乎就取自那首诗，不过把‘瑾’字改成了‘瑾’字。”

今天的谈话很融洽。我说：“秋瑾，你为何要穿男装而且洋服？我稍为猜想过了，但不知对不对，请让我听听你的想法。”秋瑾的白脸蛋上顿呈光彩，薄薄的嘴唇也有点歪了，她说：“我为何穿男装吗？象夫人所知的，在中国，男子强，女子一直受压迫，我想设法使自己树立男子的强心，想先把外形变成男的，再直到心也变成男的；而由于辮发是夷狄的风俗，不是中国人应有的，因此我就穿洋服。夫人您说对吗？”我轻轻点头道：“那么你想成为强中之强的人啦？”秋瑾稍显羞怯地说：“是的。”我有点遗憾的心情看着她说：“我的意见与你不大一样。作为女子，并非生来就绝对不如男子；作为人是同等的，应当同权的。孔子说孝，不说只对父孝，而是对父母并提孝顺，可说就是在家庭里的男女平等。你穿男装的想法是很幼稚，为羡慕男子而在形态上都要仿效，这是卑屈的。穿了男装不可能就改变身体的性质。女子终究还是女子，这丝毫没有有什么耻辱，大大方方反会使男子敬慕。”秋瑾张大眼睛盯着我，不久，她歪着咀说：“夫人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不放弃自己的见解。”我点头道：“好的，那是你的自由。现在，秋瑾，请让我问问你的家庭情况。”秋瑾

忽地脸上生彩。当时，她丈夫是浙江的富翁^①，二十五岁，比秋瑾小二岁。他们已有五岁和四岁的两个孩子^②。她那比自己小两岁的丈夫是个很温和的人，秋瑾的言行都很自由，不受任何约束。我拉着秋瑾的手微笑道：“那么，秋瑾，在你家里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啦？你事实上是个和睦家庭里的女王，不，是女神。在中国，有‘怕老婆’这句话，常有在家行使权威的女神，你就是这类典型；你丈夫是对你这个女神的崇拜者呵！”秋瑾转动圆圆的眼睛，张大了朝我直看，说：“哎，夫人！我的家可说过于和睦了，我对这种无聊的和睦不觉得满意，反而感到厌烦，倒希望丈夫强暴一些，即希望他用强暴来压迫我，以便我可用更强的决心来反抗男子，……不！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所有妇女，我必须使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做连男子也做不到的事。”我怀着怜悯心情看着她说：“秋瑾，你太热衷于空想和追求理想了。家庭不是儿戏，‘丈夫强暴反倒好’，这是对家庭妇女的嘲笑。男子强虽是本分，但有时是弱的；女子弱虽是本分，但有时是强的。女子无论如何始终象个女子才是强的，你硬要胜过男子反显出了弱的本分。”秋瑾把咀一歪说：“但是，夫人，我不堪这种安分守己的状况，我无论到哪也要贯彻强过男子的决心，请您在这方面加以指教。”她又说：“夫人，敢请教您对革命有何看法？”我盯着她说：“革命？！秋瑾，我们日本是拥戴万世一系之天子的国家，听到‘革命’二字是讨嫌的。”我面露愠色。秋瑾握着手笑道：“不！不是说日本。在我们中国，把夷狄作为天子拥戴，我感到卑屈。”谈话到此结束，我看到了这个妇女有着过激的思想。革命思想是正在中国蔓延着的一种流行病，秋瑾也似乎得了这种流

① 秋瑾丈夫王子芳，字廷钧，湖南湘乡荷叶神冲（今属双峰县）人，秋瑾嫁到王家时，王家已迁到湘潭城里。服部在这里把他说成是浙江富翁，可能是听错或记错之故。——译者

② 秋瑾在1897年生子王沅德，1901年生女儿王灿芝（后改姓秋），1903年秋瑾随丈夫入京时，随身只带女儿，王沅德留在湘潭。故服部繁子这里和下文的记述有误。——译者

行病。

五 尘土中也有花开

过了四五天，我应秋瑾之邀访问了她家。她家在前门外浙江会馆旁商店街的尽头。与那些官家的阔邸不同，是一座连街门也没有的简陋的住房。秋瑾这天穿着女装，黑色衣服上套了茶色裙子，踏着小绣鞋出来迎我。她今天才象真的王太太。书架里胡乱地捆放着图书和衣服，屋子角落到处有瓜子壳和果皮之类，发出异样气味，很不清洁。秋瑾的丈夫也随着走了出来，他是个看上去比其年令还要稍为轻些的白脸青年，一个令人爱怜的温顺的家庭青年。他好似害羞地向我行了揖拜礼。秋瑾低声说了些什么后，他又一拜而去，象是到外面去了。

秋瑾笑着说：“从满人的做官人家看来，这真是又小又不整洁的房子，但在尘土中也有花开呵！”我也笑道：“是啊！水底也有珠玉发光呢！”秋瑾听了很高兴。她又说：“您是孔子之徒，我是异教徒，而且我们刚刚相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竟能相互爱慕，这是很奇怪的。”我想看看她的孩子，她说因为怕太吵，让老女佣带出去玩了。我就在此承她招待了一些时候。

秋瑾早已向往美国，她说为了今年之内赴美而正在学习英语，据说她的丈夫也同意她赴美。我认为她去美国是合适的而表示赞成。我对中国妇女，不论满汉——尽管两者有不同之处，都同样喜欢。吴夫人，欧阳夫人等都是我的朋友；不知为什么，这个怀有一些危险思想的秋瑾，也成了我并无恶感的朋友。那兰色肥大的普通男式西服，松弛下垂的领带，拿着细手杖的姿势是骄矜的，有些讨厌的；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我对她却有着一种爱怜之情。

秋瑾此后不大参加谈话会，却有时来我家学几句英语和日语。

日俄战争仍在扩大着，我们身在异国的人都很担心。在看到院中杏花已谢、黄鸟羽毛变暖的四月，日俄之间战云更浓了。令人高兴的是战况对我国有利。我的长女淑子已到入学年令，在东京的双亲不堪寂寞，时常来信要她回去。这年夏，我务必回国一次，顺便带了孩子去；我丈夫也有事与文部省商讨，预定回国一个月，但因轮船的缘故，我得比他先动身。一想到要从布满战云的海上回国，不禁令人生畏。欧阳、吴夫人和其他朋友都很担心，为我祈求一路平安。特别是那些满族夫人，频频劝阻我从如此危险的海上回国。但我回国省亲的决心已定，不可改变。秋瑾因为要经横滨赴美，请求与我同行至横滨。吴夫人也频频有所请托。

六 憧憬着尚未见到的国家

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城墙边的柳树已荫可藏莺；运河水已变暖，可听到鸭群充满生机的叫声；装运煤球的骆驼队从城墙下经过的也少见。我作着准备，六月份比丈夫先走一步，担心地留意着可以大体平安地渡海回国的消息。

秋瑾今天也来了。在白色的女生服上罩着角帽，象个英姿飒爽的美男子，她很高兴与我同行，不时露出笑容。我问：“你去美国想研究什么？”秋瑾象早有准备似地说：“我打算学法律。”我虽也喜欢法律，但仍说：“你到美国好好研究一下妇女问题吧！在中国的家庭里妇女过多，虽自古而然，但到现代，不论从家庭和睦还是从经济上说，都是不利的，有必要改良。美国是人权发达之国，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合适的地方。”秋瑾盯着我的脸说：“家庭的问题太多了，我觉得研究此类问题没有意思。在我国，皮皱、发白的老人受尊敬，这种状况很难对抗，我若埋头这类事，自己也会变得保守起来。我要做的是使任何男人瞠目吃惊之事！”我不禁笑出声来，心中感到不可思议。我说：“你这是说说罢了。秋瑾，

你太渴望出名，太好自我突出了，你说的令人吃惊的事，多半不是好事吧？”她摇着头说：“夫人，我将经常想到自己的志愿，但决不做坏事。”我说：“说不定你以为不坏的事却正是坏事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夫人，我原先想去美国，至今也仍想这样。可是最近我的想法又有点改变，想去日本东京了。”我似乎意外，其实并不，我常常感到她会有这样的事情，这种感觉果然应验了。秋瑾与往常不同，显得腼腆地说：“我自己也想问问自己怎么会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先渴望去美国，现在变成了要去日本。夫人！这恐怕是与您交朋友以后产生的心情吧！夫人与我主义不同，但我爱夫人，夫人也爱我，犹如水火性质不同，对人利益相似。我过去对日本妇女没有了解，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也多少是忽视的。但自结交夫人之后，却想去日本看看了。请夫人带我去东京留学吧！”她的态度很认真。我缓缓地说道：“你想留学东京，我本该高兴，但我仍不赞成。我们日本今天仍然是你所讨厌的尊敬皮皱，崇拜白发，对你并不合适，你还是去美国的好。不过，在美国能否完全如你的意也难说。总之，我不赞成你留学日本，请你还是如同当初想的那样去美国吧。”我这样说着，心里想：把这样的妇女带到东京很好加以教育，是很有意思的。这天，秋瑾也决定不下而告别了。

七 恳 求

已经六月了。北京的六月很热，在内地还是梅雨季而并不那么热，在北京却已如内地七月那么酷热了。日俄战争在继续着，但听说已可安全航海了。我预定在月底带孩子回国省亲两个月。一天，吴夫人对我说：秋瑾渴望去东京，请我带她去。我同丈夫商量，他不赞成。有一天，我有事拜访内田公使夫人，夫人不知从哪儿听说我将带秋瑾去东京，说因为这个妇女有新思想，她不赞成带这样的人到日本去。我说我虽也不乐于带她前去，但难以

推却朋友们的委托。

不久，秋瑾的丈夫突然前来求见我。他仍如过去那样是个温顺的家庭青年，仿佛害羞地啜嚅着。当时我觉得秋瑾好象柳树枝头的小鸟。这个青年必定有什么事来吧。我直接地问他“有何贵干”？他惊慌而羞怯似地抬起目光说：“很对不起，我有一事拜托！”我看着他，心想：一定是让我阻止秋瑾出国吧！可是他说：“夫人！我妻子请求跟您去日本，请您俯允吧！”我答道：“嗯，她要去美国，我答应与她同行至横滨。”这位青年忙说：“不！我妻现在更盼望到贵国去，我今天特地来请您俯允！”

我感到意外。他虽如此放任妻子，但我尽力说服他？“去美国是秋瑾早已有之的希望，从她的思想来说，去美国也比到日本更合适，因此我劝她还是去美国。”这位青年热切地说：“但是我妻要去日本的愿望非常强烈，我无法劝阻。如果夫人执意不肯，我不知她会多么痛苦！我尽管有两个幼儿，但请您带她去吧，留学也罢，参观游历一下就回来也罢，听凭她自由。如果留学，我们在东京有三、四位朋友会照料的，不会给夫人添麻烦。如果她执意要去，不管与谁同去都可以，但委托夫人最令我放心。服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为我们中国兴教育而来，我很感激；也很感激夫人为我国女子教育尽力的德行，请带她去吧！请您垂鉴！”他出乎意料地能说会道。如果我硬是拒绝，他大概会受到家庭女神的处罚吧！在想到他那样可怜时，我改变了语气：

“如果一定要带秋瑾去，我可有个希望。”这位青年把座位往我凑近了一下，笑嘻嘻地说：“您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我尽力做到。”我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不！我说的希望不是对您的，是指秋瑾的思想，关于她那过激的思想。她的思想在我们日本是不能相容的。因此，我很遗憾不能带她前去。”他点着头，明确地表示：“我明白了！我也不赞成她那种思想。好吧，限于贵国的环境，让她放弃那种激进思想吧。”我怀疑秋瑾会听从他的意见，而这事如不与我丈夫商量，我也不好明确答复，因此我让他

先回去了。看来，这位丈夫现在稍稍强硬了，而秋瑾则稍稍顺从了。

两三天后秋瑾来了。她听从其丈夫之意，限于日本的条件，表示愿约束自己，不表露激烈的思想。我向丈夫讲明详情，包括秋瑾约束自己的事。我丈夫说：那就带她去吧，不过，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也无成见。吴夫人，欧阳夫人和别的一些人，都很高兴地为秋瑾而感谢我。

八 出 发

六月二十八日，蔚兰晴朗的夏空，微风舒畅地吹着衣袖。我带了四个孩子和女仆阿波、老女佣阿滨，来到永定门车站。因为丈夫不一同回国^①，故请来华接家属归国的高桥勇顺道同行任护送之责。我丈夫及其学生田中，以及另外两三人也来送我们去塘沽。

王秋瑾已在火车里了。她今天不穿男装，而是穿了浅兰色的简朴服装，用帽子盖住了短发，手抱提篮坐着。在她车位的前面，她的丈夫拉着两个孩子的手站着，后面是老女佣。两个孩子，五岁的是女儿，长着与秋瑾一样的丹眼、脸皮白嫩漂亮，身穿红衣、小鞋。四岁的是男孩，是一个胖敦敦、圆鼓鼓的可爱孩子，梳着短辫、戴着帽子、穿着兰色背心，好奇奇地挥着小手。秋瑾的丈夫面带忧色，辫发随风乱吹，样子很是可怜。尽管如此，他仍象做丈夫的样子提醒秋瑾途中当心 and 到达后来信之类事。两个幼儿可怜地盯着这位无情的母亲。秋瑾只是点着头而什么也没有说，她不想显露离别之愁，背过脸去流着眼泪。在这种场合看到了她又象妻子又象母亲的本色。联想我自己只离开丈夫很短时间，却因担心局势有变而心中发慌；而秋瑾可好啊……，特别是这两个幼儿以后将……，我产生了一种感佩

^① 原文在这里说“因同丈夫一同回国”，显系笔误。——译者。

之情。

汽笛一声，火车徐徐开动。我拉着秋瑾的手站在车窗边。她丈夫抱着男孩在挥手，她女儿由老女佣抱着，也在挥动小手，真是一场悲剧！我和丈夫用怜悯的心情从车窗边目送这些影子渐渐小下去的人。

到达塘沽已下午一点钟。筑田夫人和两三个妇女、小孩是从天津上车来的。大家由我丈夫带着，都在邮船室休息。

.....

九 由小汽艇载到轮船上

我们要乘坐的轮船停泊在远处海面，因而我们坐着汽艇到那艘轮船上。.....

这条轮船叫“独立号”，是德国船。由于日俄战争，这时日本的邮船和其他船只都用于战事而不用于载客，客船主要借用德国的船只。因此，这艘轮船的船长是德国人，但事务长、事务员等是日本人。由于我丈夫特别拜托，我住进了船长室，室内宽敞洁净，只住我和孩子。.....，秋瑾住在比较艰苦的小暗室，这也是由船长好意借给的。秋瑾常到我住室来，她已会说一些日语了。

乘客不多。女乘客除了天津来的那两三人之外，还有从保定来的某学堂教授的夫人和孩子，以及夫人那看上去约二十三、四岁的妹妹。夫人细眼睛，脸有点可怕；而她妹妹眼睛忧郁，总是低垂，似有痼病，做什么事都好象很忧愁。筑田夫人常在室内，不大露面。秋瑾很沉静，每天来我住室读书或聊天。

六月的黄海浪头很高，轮船晃动得很厉害。我尽可能去食堂吃些东西。秋瑾在食堂里结识了从保定来的那位夫人的妹妹，后者也能讲点中国话。两人以不连贯的语言，加上手势在交谈着，样子很可笑。

秋瑾告诉我：“那个姐姐不是好东西，对她可怜的妹妹何必摆出这么可怕的面孔！刚才我同这位妹妹坐在甲板的椅子上，眺望远方天空，看着浪花，她很高兴地同我讲着话，不料她姐姐过来，骂着把她带走了。骂些什么我不大懂，似乎是怪她妹妹用中国话同我交谈。”我说：“大概是她们姐妹脾气不合吧！”秋瑾又微微一笑说：“还有，那位黑黑矮矮的事务长要我给他写几个字。夫人知道，我的字写得不好，会叫人见笑的，请夫人替我谢绝吧！”我笑了起来说：“既然是中国的王秋瑾女士嘛，就不好这样说而只得请你写了。日本人常有看到中国的名人就请写字的习惯。说这是一个叫王秋瑾的伟大妇女写的字而可以夸奖呢？所以请你写吧！”秋瑾也笑了，说：“可是我笔也没有，写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请夫人帮我谢绝了吧！”

今天轮船绕过山东半岛的东端，浪头稍高了些，轮船晃动起来。我躺在床上，孩子们却格外安静地玩着。只有二岁的阿佐稍为吵些，由阿滨婆照料着。高桥君前来问候。高桥刚刚出去，阿波进来说：“夫人，秋瑾在船上很棒！刚才我到甲板上去了一会儿，看到她与保定那位姑娘在甲板上说着什么，那姑娘在哭，秋瑾好象在劝慰。我觉得不好意思老是看下去，就到这里来了。”我感到那个姐姐不大到食堂，也不愿交往，但不知何故对她妹妹很严厉，我还感到秋瑾是个也有慈悲心肠的人。

十 行迹的白浪

……

不久我又到甲板上去看看，秋瑾仍旧站着，虽然人们均已走散，秋瑾却仍站在原处（从保定来的那位姑娘刚刚从甲板上跳海自尽，被海中的沙鱼吃掉，很多乘客曾拥在甲板上观看这一惨景。——译者），呜呜地哭泣着。我依在她旁边叫了声“啊，秋瑾。”秋瑾更放声哭起来说：“夫人！我非常可怜那位姑娘，

我在为那位姑娘行哭泣之礼。不知谁说的，我也许是发疯了吧。是的，人生感意气，对于那位姑娘向我诉说难言之苦衷的悲哀心情，不论是我还是谁，都会发狂的！发生了那样的事，而且那可憎的沙鱼，……啊，可怜的姑娘哟！”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到椅子上。我盯着她的脸。泪眼稍收的秋瑾又说：“夫人，我真痛心！昨天下午在这里，姑娘向我道出了内心的秘密，听口气，她似乎是陷进了不合人伦的恋爱，因而受到她姐姐憎恨，被送回东京；回东京后又不知父母会怎样责备，她为此而哭泣了。我问她为何要搞这类恋爱的蠢事，又为何不及时切断关系，真太懦弱了。这位姑娘哭道：能切断关系吗！回东京是很痛苦的，想找个时机死了算啦。我便说：‘人生没有比无所作为地老病而死更无聊了，我才不做那样的事。我无论如何要使人们“啊”地大吃一惊。你为何这样懦弱？与其饮泣诉苦，不如死了更有意思！’夫人，这句话岂不是促成了姑娘去死的决心吗？我非常痛心！发生了那样的事，还有那可憎的沙鱼。啊，可怜的姑娘！”秋瑾拉着我的手又说：“夫人，请为这个不幸的姑娘唱哀歌吧！”我也为失去那个姑娘难过，便拉着秋瑾的手，含泪唱道：

莫言可怜葬鱼腹，谁知芳魂到龙城！

秋瑾也这样唱着。

……

十一 人 学

轮船平安地经过仁川、釜山，于七月十二日抵达神户。我到西村旅馆给东京和北京发去了通报平安到达的电报。不管怎么说，能平安地回到国内是令人高兴的。大家都很健康。去东京的火车因运送军队而开得很慢，经过两昼夜抵达东京新桥车站。我兄弟和姐姐前来迎接。他们曾听到船在海上迁难的传闻而十分担忧，待收到我从神户打来的电报大家非常高兴。我也感到实在万幸。

我前往在永田町的家。秋瑾由朋友迎往在神田的朋友家去了。……

到了八月，我写信请秋瑾来。秋瑾来到后，很温顺沉着地告诉我：她已与朋友在一起认真学习，并且打算在日本留学，但不知进哪所学校好。我叫她与朋友商量一下再定。过了两三天她又来了，说是想进实践女校。我对她打算进入女子师范感到意外，我说：“你进那个学校能满意吗？”秋瑾说：“嗯，那里有朋友，而且下田女士^①是个名人，因此我满意。听说这时节入学很难。夫人，您与下田女士交情很深，务请您相助！”实践女校当时正在培养许多中国女留学生，下田先生对中国女子教育很热心，因此如果我相托，她定会同意的。可是，秋瑾的思想怎么办？她原来的思想是很难办的。因此我说：“秋瑾，你原来的主张怎么办？你须遵守约束啊！”秋瑾极其认真地说：“嗯，我原来的主张不改变，但遵守约束，请您放心！”但我总怀疑一有机会她那些思想就会露头的。

几天后我拜见了下田先生，讲到秋瑾的事，也讲明了她有着过激的思想，我说：“请考虑可否让她入学。您一向很热心中中国女子教育，前年我与丈夫一同去北京时您很高兴。您因深知西太后的意向对中国女子教育很关紧要，曾打算亲自去中国深入考察，向西太后建议注重女子教育，所以请您用这种心情俯允吧！”下田先生似把西太后当作女英雄敬慕，不过同时她也同情反清革命家，庇护革命的亡命者。她对秋瑾也抱同样的方针，说：“对这样的女子才有教育教育看的必要，请不必担心，可以接受她！”我顿生又是放心又是担心的奇妙心情，赶快告诉秋瑾：下田先生已答应她入学。并向她说明：下田先生是日本第一流女教育家，要她听从先生，不为世上的浮言流语所惑；秋瑾作为中国女子留

^① 下田女士即下田歌子（1854—1936），近代日本著名女教育家，致力于提倡女学。实践女校由她创立于1899年，从1901年起，该校也招收中国女留学生。
——译者

学生中的首屈一指的人，要作多数女生的模范，并遵守其他有关注意事项。秋瑾终于入学并住进了学校宿舍。不久我访问学校，也到宿舍去看过，秋瑾已安顿停当，在用心学习，我稍稍地放心了。

我丈夫已在八月返回北京。九月底我也要赶回北京，正忙着各种准备。秋瑾到我家来，诉说对学校的种种不满。首先是伙食差而且太贵。她说：“一说到吃和钱，日本人就奇怪地认为是卑贱的事情，但是，一般地说，人世却离不开吃和钱，若离此二者，还有什么人世吗！下田女士除了掌管华族女校和实践女校外，还把我们的留学生当作商品牟利，也太贪婪了！”我严斥她入学不久就说出这种话来，太无礼和浅识了。但我决定一定把此事转告下田先生，她就告辞了。

不久我为辞行顺便访问了下田先生，向她转述秋瑾的话，请她让宿舍管理人员注意伙食问题；而且因为秋瑾的思想也影响了其他学生而极为对不起，所以我请下田先生视情况让她退学。下田先生很不介意地说：“不！不满伙食是她们的通病，承您关照了。她们渐渐对环境，对功课产生兴趣后，就不会那样说了。如为这样一点事就生气而提出让她退学，那就不可能进行对中国人的教育了。这您想必也是很了解的。”我虽认为由于秋瑾的个性，她是不会安分的，但下田对多数学生都不会提出退学的事，因此我只说：“秋瑾仍抱有过激思想，请多留意！”

我很忙，但仍请来了秋瑾，向她转告了下田先生的话。我要她“好好学习，如实在不满，退学也行。”秋瑾沉默一会，“嗯”地叹了口气说：“夫人！我近来也不知怎么了，似乎不会久存于世了。我的灵魂已经离开我，唯有鞭打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她几乎哭泣了。我仿佛心头压着什么，说道：“发生什么事啦，秋瑾？连你都说起这种反常的懦弱话！如灵魂离开了你，那一定是你找到了新的灵魂，决不会只剩躯壳的！但是秋瑾，你终究是有了家的人，你抛离家庭，因在异国他乡受到的心情寂寞而神经变得过敏了。倒不如回到你的家里去吧！并想想你在研究的事。

要不然，象当初想的那样去美国也好。”我真心地这样想而规劝她。但她摇着头说：“回家？我感谢夫人的厚意，但不愿沉醉于无聊的家庭和睦中。我不满学校，但不想退学。至于去美国，恐怕会得到与在日本一样失望的结果，我早已不打算去了。啊！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如果不鞭打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不行啦！”她叹息着。我说：“秋瑾，你不要光想令人悲观的事，鼓起勇气来吧！我马上要与你分别了，希望你遵守约束自己的诺言！”秋瑾莞尔一笑：“夫人请放心，我没有在这个国家提倡我的主张之意。啊，夫人，中国是中国人之中国，非满族这样的异种人之中国。夫人，畏首畏尾，徒具躯壳的人何其多呵！”她掩着面孔，我也产生了可怜之心，说：“但是秋瑾，我丈夫在北京主持贵国新教育之后却不这样看。天命不可违。中国是易姓革命之国，天命一到，命就会革了的，不过现在尚非时候。秋瑾，请回到你家里去冷静地研究吧！”秋瑾笑了：“夫人的厚意我明白，但夫人是孔子之徒，讨厌新的事物，对我顽冥难训。”我也笑了：“你的思想是一种毛病。由于有这种毛病，你才顽冥难训的！”我们两人都笑了。

十二 分 别

十月七日，我带了二岁的阿佐，终于动身了。三个大的孩子因我父母之命留在家里，我虽不忍心留下他们，但也无可奈何。阿波跟孩子们留下，她很失望，但为了我而答应留下了。我另外带了阿良动身。

行前，秋瑾前来洒泪惜别。我一想到这位倔强的人也有温情和动感情的时候，也产生了悲哀之情。我问她有什么话要转告她丈夫，她说没有。

于是我与协助下田先生创办女学堂、顺便希望去北京参观的佐口美津子结伴同行，另有直井浩氏与茂同行护送，平安地到达了北京。

回到北京不久，我很忙碌，时日流逝，同时心中一直想念着秋瑾不知怎样了。十一月中旬秋瑾来了信，说了些实践女校的不足、老师们浅学无能之类话。我未给回信。不久后我收到了学校主任的来信，得知秋瑾在用书面向下田先生提了种种批评之后离开了学校。我去信向下田先生赔礼。她回信中就我为什么把这样思想的妇女带到日本并推荐给实践女校，而有责备的语气，我为此怏怏不乐。那么，我既想到退学的事，又为何要推荐她入学呢？我感到这都是出于不得已。听欧阳夫人说：秋瑾的丈夫和孩子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她说她越发不知道秋瑾的消息了。不久，吴夫人也因家庭之故迁到上海去了。

十三 原野上受暴风雨吹打的白露

翌年明治三十八年之初，秋瑾从上海来信，告诉我她离东京到上海之事，并说如果有事也可能再去日本。后来我听说她在这年夏天又赴东京，在那边逗留了两三个月。我不知她何以又去东京。不久我从一些人的来信中得知：秋瑾批评日本的女子教育，特别是对下田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严厉责备实践女校的教师们。她曾经站在水道桥的路边，恶语批评日本对留学生的教育问题，从而引起过一场骚动，以至警察出面干涉。这个小题大作的事不知是否属实。我感到非常痛心。听说那事发生不久，秋瑾就回上海去了，我稍为安心了些。可是次年年初，秋瑾已作为革命派的急先锋和谋划某一事件败露，被捕处死。^①我得知此事后不觉眼泪汪汪，往事涌上了我的心头。……

译自日本《东西交涉》季刊，1982年第1卷第3号。

郑云山译 李廷蕃校

^① 秋瑾因组织光复军起义失败，于1907年7月13日被清政府逮捕，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服部繁子此处的记述有误。——译者。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进步理论

——（梁启超—孙中山）

Л·Н·鲍罗赫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美一个接着一个地创立进步理论。各派思想家力求理解社会进步的规律，评价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包括进步学说的唯物史观。斯宾塞在维多利亚的英国提出了有机进步理论。1879年，美国人亨利·乔治完成了《进步与贫困》一书。在俄国，И·И·拉夫罗夫于1869年写了《历史书信》，他证明，团结是历史的强大动力。八十年代，Н·К·米海洛夫斯基提出了三项公式：进步、幸福和爱情。可以认为，梁启超和孙中山这两位中国理论家也是希望发现人类进步的规律，从而创立自己的社会活动哲学的思想家。用上个世纪俄国社会学的语言来说，这两个人在二十世纪初都引伸出了自己的进步公式。

苏联和西方史学界确认，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思想论战的“战线”是非常广泛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改良或革命，经济逐步现代化或“跃进”——在所有这些观点上，他们都提出了对立的意见。把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考虑，对进步原因的观点加以比较，就能够勾勒出同盟会成立前夕他们之间开始的争论的概貌。梁启超和孙中山对社会进步原因的意见分歧不是一下子可以看清的；世界观性质的矛盾比较隐蔽，因为关于历史运动动机的争论，比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或社会政策原则的争论要少得多。但是，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提出各自的历史观及人类进步规律

的观点以后，就发生了将来才能看到其后果的思想冲突。他们的“历史哲学”观点决定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参加者们的一般哲学世界观点的重要特点，影响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二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容。

1895年起，中国社会开始了解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思想。由于熟悉了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史，这不仅仅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加强。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人来说，新的“西学”是能够绝对说明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普遍真理：从日本和中国培植的梨树品种的区别，到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从欧洲猎狗品种的多样性，到引起进步和退步的原因。^①现代西方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是，每一个人都从达尔文开始出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非常流行，但领会这一学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原则同儒家关于仁与德的观点不能协调一致。达尔文和斯宾塞理论的传播，使传统学说的主要观点受到了怀疑。

在新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好几种思想答案。1904年《觉民》杂志第9、10期以君平为笔名发表了《天演大同辨》一文。我们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准确地传达了当时思想气氛的非常珍贵的社会思想史资料。它恰恰反映了把西方社会学观点移植到中国土壤中来时产生的那种“不协调”。这篇文章的篇名本身就表明了两种理论，即西方新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的相互关系问题。文章是以进化论的拥护者和坚持大同理想的儒家学者之间争论的形式撰成的。力求找到共同立场的作者也参加了争论。文章详细展开了三个不同方面的论据，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达尔文——斯宾塞学说的三种类型的反应。可以有条件的把两种极端观点的拥护者叫做西方派和传统派。作者则采取了折衷立场，企图综合两种矛盾的思想。争论围绕着怎样使宣扬“优胜劣败”原则的进化论

^① 见《淘汰篇》，载于《大陆》第1期，1902年12月。

规律,同体现在“大同”中的统一与平等思想并行不悖这一问题展开。

西方进化论信徒的立场在于,物竞天择(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下同。——译者)是进步的动力,如无天演,文明便会迟滞。传统主义者在回答这一声明时愀然曰:“哀哉斯言!我不忍闻。夫同住地球,同具生命,广言之则彼固物而我亦物也,狭言之则彼固人而我亦人也。彼虽劣,我安忍灭之?我虽优,我又安得独利?牺牲多数之血泪,易此少数之文明,果何忍而出此哉!”西方进化论信徒则用下列问题来回答儒家学者的一切抱怨:“君谓今日之文明,果有胜于昔日乎?如谓然也,则是文明者,将有何术以致之?我知舍‘竞争’二字之外,无以应焉。”他们认为,天演者,人禽之所由分,文野之所由判。所以,只有在生存竞争的条件下,人类才能进步。所谓传统主义者则表示怀疑。儒家学者强调不欲返回古代去,但悲天悯人地谈到了现世的残酷,谈到了众生充满着非正义和灾难,因此,他把全部希望和既无斗争,也无竞争的“大同”理想世界的来临联系起来。他批评了现代文明,因为现存世界秩序同他的人道观是不同的:“善杀人者斯为优胜,不善杀人者斯为劣败,而文野之程度,又视其胜败而分,所谓文明如是如是,实则文明即野蛮之变相耳!蒙马虎皮,夫复何益?”

文章的作者加入了争论,企图使双方调和起来,实际上是使宣扬物竞天择的西方进化论同中国的“大同”观点并行不悖。哲学家君平承认,现存世界是一个血腥的“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也就是他不否定物竞天择规律的作用。但君平也相信遥远的未来大同社会将会来临,而且目前只仁哲之士才理解大同社会的思想:“今日未足以语大同也。众生根器浅薄,争竞因缘不能解脱。”君平认为,对于大同只能梦想魂游,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经得起生存竞争。为了把“大同”思想同生存竞争规律协调起来,哲学家君平利用了两个不同水平的概念:较高水平的“公理”(最高原则)和较窄的“公例”(普遍规则)。这种方法能使“大同”理想

和天演在他的观点中并行不悖。作者写道：“大同者，不易之公理也；而天演者，又莫破之公例也。公理不可刹那弃，而公例不能瞬息离。公理固可宝贵，而公例又非能避弃。当事者亦惟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同之公理耳。”文章的作者信奉斯宾塞的进步论，承认物竞天择将使人类公德完备，认为，那时将会实现平等原则。

发表在《觉民》杂志上的《天演大同辩》一文，提供了作为对西方进步理论的回答而在中国出现的两种矛盾意见的印象。从传统主义派的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熟悉物竞天择原则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思想带来的不协调。从争论所引用的论据中可以理解到，对儒家学派思想家说来，承认这一原则就等于抛弃中国政治思想中形成的传统的大同理想。根据争论的材料（哲学家君平谈到了这场争论的内容），还可以对调和传统理想与西方最新学说之间发生的矛盾的企图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君平能够把“公理”和“公例”统一起来，为“大同”理想和天演存在于同一观念中找到某种可以接受的说明。争论的另一一些参加者没有妥协。这篇叙述进化论和大同的争论的文章还使人们看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一部分有思想的人，从西方哲学中汲取了普遍发展的学说，企图解决对他们来说是新的理论问题：进步是必然的吗？进步的标准和原因是什么？试图确立进化学说和“大同”理想的关系，这不是为了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理解历史运动规律这一实践目的。争论双方所关心的是，什么引起了进步：是崇高的道德理想、平等和正义的普遍原则呢？还是竞争和生存斗争。根据对这一综合问题的理解，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世界观，形成了为各种救国纲领奠定基础的不同的理论基础。

梁启超和孙中山提出的社会发展观点是同中国社会的思想探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各自提出了自己摆脱传统学说和西方社会学公式接触时发生的理论冲突和矛盾的出路。

梁启超提出的历史进化观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现象。因为这种观点是由对青年学生起着特别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提出来的，是从《庄子》中选择“饮冰”一词作为主要笔名的一位不倦地探索着真理的思想家提出来的，即是由一位遭受内心火焰和渴求知识煎熬的人提出来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掌握了老师的成就，在许多情况下寻找并找到了他自己对哲学和政治问题的答案。梁启超还在“百日维新”前夕写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涉及中西方发展规律的某些理论观点。这里我们不谈这位理论家的早期著作，而只指出作为新民说一部分的进步论的主要轮廓。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概括性的著作《新民说》，这一著作的最后一章《论进步》，最充分论述了他的社会发展观。同年，发表了他的《说变》一文，这篇文章揭示了他关于进步的观点的各个重要方面。《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也是这一时期的纲领性著作。梁启超自以为是达尔文尤其是斯宾塞的信徒，似乎斯宾塞创立了能够使人看到世界的统一性的唯一的综合性科学。梁启超崇拜《社会进化论》一书的作者颌德，他认为，同斯宾塞比较，颌德在理解进化学说上达到了新的高峰。梁启超是这样的中国思想家，他熟悉了西方理论，但仍然坚持认为：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不仅有自然选择，而且还有人为选择，进化乃天地之公例的观点。^①

作为进化论拥护者，梁启超企图找到中国发展规律受到的破坏。《新民说》一书指出，他对国家的落后状态考虑得很多，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发展缓慢有五种原因。这五种原因扼要表述如下：1“大一统而竞争绝也”；2“环蛮族而交通难也”；3“言文分而智局也”；4“专制久而民性漓也”；5“学说隘而思想窒”。甚至这样简单地例举五种原因也使人了解到：梁启超为了说明中国社会的退化而把各种因素结合到了自己的发展学说中。他把前两

^① 见梁启超：《新民说》，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45页。

种情况确定为自然方面的原因，认为反映在后三个论点中的因素——文化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因素是人事的原因。

人事原因用不着特殊的说明。梁启超对阻碍知识发达和新思想、新学说传播的中国文字相对复杂这一思想表达得相当简明。用他的话来说：“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扎，车夫可以谈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关于专制制度对国民精神影响的论点（第四点原因）也不难理解，这一论点表达了梁启超的主要政治要求：“专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慧，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如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关于统治思想束缚思想的论点，实际上是为了反对儒学，尽管是以隐蔽形式来反对的：“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梁启超指出了进步与思想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

自然方面引起的原因，是比政治、思想和文化原因更一般的原因。它们反映了阻碍中国发展的客观条件——中国内部结构的特点（第一个原因）和中国外交政策状况的特点（第二个原因）。梁启超在阐述蛮族环绕中国的特点时证明，民族交往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凡一社会与他社会相接触，则必产出新现象，而文明遂进一步。上古之希腊殖民，近世之十字军东征，皆其成例也。”^①至于另一个自然原因，那么如上所述，它扼要地表达在下列公式中：“大一统而竞争绝。”梁启超称这一论点是首要原因，但我们认为，它在我们所研究的观点中带有最大的思想负担。我们在揭示五个进步因素的内容时有意打乱了叙述次序，在分析第一个原因时，事先列举了所有其它原因。这种颠倒的目的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到难于说明，但为了理解整个理论又是最重要的一点上。

^① 见前引《新民说》，第146页。

组成这一论点的第一部分的措词需要说明。“大一统”——确立统一的基础——是“三世”说系统中提到的儒家学说的一个范畴，这是一个巩固中国统一政权和中央集权的原则。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论述了他对“大一统”原则的理解。他写道：“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梁启超承认“大一统”原则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一原则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实现导致了结束国内纷争，给人民带来安宁。他认为，这一原则从秦汉起在中国取得了胜利。^①五年后，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大一统”原则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作了不同的评价。梁启超在批评国家中央集权和加强专制制度的思想时，反对了儒家政治学说的这一观点。按照他的新的历史模式，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鼎盛时期，从秦朝起（即从确立统一政权起），中国二千多年来陷入了退化的境地。

我们觉得，这种不同评价反映了梁启超的世界观所发生的变化。在写作《新民说》时，由于了解了西方著作（达尔文、斯宾塞、赫德），使他形成了一种信念——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这一信念成了梁启超下列论断的出发点：“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只有考虑到这位思想家形成中的理论立场，懂得了“大一统”原则的内容，才能够理解梁启超在《论进步》一章中提出的第一个论点的含义，并对它的意义作出评价：专制统治在各个领域内造成的缺乏竞争以及竞争形式不发达，阻碍着中国的发展。

按梁启超的观点，传统儒学的“大一统”原则和从西方理论与经验中汲取的竞争原则是互相排斥的。“大一统”原则在中国长期占优势，使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停滞不前。梁启超在说明竞争是进步因素这一思想时说：“夫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

^① 见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载于《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上，第290页。

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故夫一国有新式枪炮出，则他国弃其旧者恐后焉，非是不足以操胜于疆场上；一厂有新式机器出，则他厂亦弃其旧者恐后焉，非是不足以求赢于阡阡也。惟其然是，故不徒耻下人，而常求上人。昨日乙优于甲，今日丙驾于乙，明日甲胜丙，互相傲，互相妒，互相师，如赛马然，如斗走然，如竞漕然，有横于前，则后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蹶于后，则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实进步之原动力所由生也。”^①

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援引这位西方社会学的权威，证明竞争是进步的必要条件：“颌德以为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或个人与个人竞争，或人种与人种竞争。竞争之结果，劣而败者灭亡，优而适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在另一些段落中，竞争造成进步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晰与生动，我们认为，这种推论只需稍加注释就可以了。梁启超的竞争概念是一个广泛的、包括各种各样冲突形式——国家之间的战争、企业竞争、个人冲突在内的概念。在斗争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实力，而且还有知识、技术成就、竞赛精神。竞争概念同时把比较局部的原则（例如政治经济学上宣扬企业家活动自由的自由放任原则）和最广泛的原则——斗争是一般运动的动力的原则结合了起来。

梁启超由于掌握了西方思想而形成的竞争概念，是他的社会发展观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奉行“公例”使千百个国家走向文明。关于“公例”（物竞天择）的观念，是梁启超理论基础上一个特长。这一理论是作为进步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新民说》一书中得到了发挥。^②

^① 见前引《新民说》，第145—146页。

^② 同上，第149—150页。

在梁启超的观点中，斗争学说虽然限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范围内，但我们认为，这样解决进步问题是勇敢的和非传统的。梁启超公开指出了竞争和儒家“大一统”原则是不相容的。上面提到的《天演大同辩》一文指出了竞争与“大同”理想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梁启超在关于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的争论中，采取了最彻底的“西方崇拜者”的立场，即他最明显地脱离了某些传统观念，并广泛依靠了西方的思想成就。梁启超承认物竞天择原则是普遍适用的，把竞争突出为进步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和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对立的意见。康有为认为竞争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私本性的表现，并会造成骚乱。冲突和竞争是与他的乌托邦具有的普遍和谐原则矛盾的。康有为在1902年以前（即梁启超《新民说》出版之前）已经撰成的《大同书》中，谈到了他对达尔文及其信徒的否定态度。^①

梁启超的进步学说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说是他本身，不如说是这位中国思想家试图创立以斗争为源泉的发展公式。这种理论的出现引起了争论，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方向。

孙中山宣布自己的社会发展观，要比梁启超晚一些。它的主要内容可据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对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发表的演说《中国应该建立共和国》的内容来判断。他人为（加速）进步论的主要点，是在同盟会成立前形成的。孙中山在晚些时候的一次演说中——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1912年10月）中说明了他从1905年起信奉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发展观的本质。他说：“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混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②在这段话中，孙中山指

① 见肖公权：《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康有为的改革和乌托邦（1858—1927）》西雅图——伦敦1975年版，第474—475页。

② 见《国父全集》第544—545页，台北，1963年。

出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孙中山表示坚决否认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宣布他历来不承认物竞天择是普遍真理。第二，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来是同“公理”与“良知”这两个概念有关。关于社会主义派别的演说，是对孙中山的世界观最清楚的但不是唯一的阐述。他在1912—1913年的大量公开演说中重复了这些思想，并补充了论据。在对北京学界发表的《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1912年8月）的演说中，他呼吁抛弃三十年前在欧洲盛行而以后在中国学界流行的竞争和自然选择理论：“今日则不宜主张此说，应主张社会道德。”^①在革命后的演说中，孙中山坚决重复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二十世纪世界上已完成了新世纪的过渡：文明时代的学说代替了野蛮时代的学说。孙中山在《求建设之学问为全国人民负责任》这一演说（1912年8月30日）中指出：“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现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问，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从前生存竞争之学说，在今日学问过渡时代已不能适用，将次打消。”^②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演说《学生须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中，孙中山激烈批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并明确的用互助论同竞争概念相抗衡。他说：“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理论——鲍罗赫）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③孙中山劝说自己的同志消除敌对和个人主义，而把关系建立在互助与合作的基础上，号召不要信奉物质进化之原则，而应信奉道德原则。

和梁启超不同，孙中山既不承认“公例”（物竞天择）的普遍性，也不承认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他认为，决定社会关系的不是竞争，而是另一些规律：如果人们遵守“理”，那么社会

① 见《国父全集》第531页。

② 同上，第530页。

③ 同上，第560页。

就会向前运动发展。在谈到进步原因时，孙中山利用了“公理”这一概念。在1912年，除了“公理”外，还出现了“良知”、“道德”、“互助”的概念。后来，在《孙文学说》（1918年）中，“互助”概念代替其它一切概念而被解释为人类进化的基本原则。这一框架的每一环节，都是孙中山世界观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包括了新的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原则的新解释，最后，又都包括了两者的结合。例如这一框架中提到的哲学范畴“良知”是从王阳明的体系中借用来的。框架也反映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是进化因素的学说。甚至是在初步研究水平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主义的“进步公式”在晚期表达得更加明确。至于他在1905——1912年形成的关于进步原因的观点，那要联系他对“公理”概念的解释来加以说明。

1905年春，孙中山在东京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到了“公理”。孙中山为了证明中国必须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国而研究了历史经验。用他的话说，过去中国不断遭受内哄和扰乱，内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境遇。今天革命的所有参加者应当抛弃“互争雄长的方式”。孙中山认为，共和政体能够制止地方主义利益和个人野心。孙中山把基于“公理”的行动同“互争雄长的方式”对立起来，他解释说：“方今公理大明”，如果遵守“公理”，那就不会重复他看作野蛮之表现的篡夺政权和长期战争。遵守“公理”能够制止枭雄非分之希望殃及无辜。^①从与宫崎寅藏的谈话原文中可以理解到，孙中山把统一与和平解决问题的原则同自相残杀的斗争及竞争对立了起来。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特别经常提到必须遵守“公理”原则。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对共和党党员所作的演说《民生和国家社会主义》中号召听众在行动上遵守“公理”：“倘以公理为依归，将来必有发达之望，若不以公理为依归，虽人多势众，终必失败，

^① 见《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载于《孙中山全集》第1集第172—173页。
（作者谓谈话时间为1905年春，误，应为1897年8月中下旬。——译者）

此一定之公理也。”^①在这一时期纪念武昌起义一周年的另一篇演说中，他说：“凡事须论公理，放胆而自行公理，不必更有一毫畏惧心。”孙中山用公理的作用来说明民族运动胜利的原因。他以国际事件——英国人反对一个非洲民族的战争为例证明：强大的英国难以取得胜利，因为这个非洲国家的人民“恃公理以敌强权”。在这篇演说以及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的演说中，“公理”概念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强权概念是对立的：“嗣后各大国渐知强权不敌公理，遂不敢侮慢小国，故地球上各小邦，尚能久在而不亡。”^②孙中山在解决辛亥革命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党问题时，也是从“公理”观念出发的。在1913年1月12日所作的演说《政党威力的增强和削弱完全取决于党员的理性能力与道德程度》中，他宣布党纲一定要符合公理：“惟是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意，以坚社会之信仰心。”^③尽管孙中山在演说中没有直接说明公理的思想含义，但从上面的引语中毕竟可以得出结论：公理在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中历来是同强权、竞争原则对立的。无论如何，当孙中山号召遵守“公理”时，他指的是统一、团结、平等，没有竞争和斗争。“公理”概念的内容和起源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在孙中山的进步观中居于主要地位。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政治著作中收集得到的有关“公理”这一术语的含义的资料，能够澄清对“公理”的解释，并对公理在孙中山主义中的起源作出某些推论。

“公理”概念是基督教传教士（不仅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在揭示其宗教内容时使用的。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基督教原文的译文中，“公理”概念同英文“Universal Principles”

① 见《国父全集》，第534页。

② 同上，第540—541页，题为《凡事须论公理不必畏惧》。

③ 同上，第566页。

(普遍的原则)相对应。严复在翻译赫胥黎著作的前言时使用了这一术语,以说明东西方科学分类的区别,以及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在“公理”的基础上)到个别的本质。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广泛地使用了“公理”这一概念。根据梁启超的话可知,康有为在1891年对“长兴”学堂的学生曾谈到他正在写作论述“公理”与“大同”关系的书。梁启超还进一步说明,他有机会听到康有为同他的学生陈千秋就老师所写的《公理书》这一著作进行的争论。康有为关于打算写这一著作的声明具有严肃的根据。1885—1887年,他勾勒了据现代研究者说可以认为是他的社会乌托邦的雏形的轮廓。

在对理想世界的早期观点的名称——《公理书》、《人类公理》、《实理公法》中^①,包括了“公法”(最高的、正义的、普遍的规律)和“公理”(最高的、正义的、普遍的原则)两个概念,这些概念反映了当时力图推导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普遍法则的康有为对人类生活现象的全局观点。在保存下来的手稿《实理公法》(另一个名称是《人类公理》)中,康有为提出了构成他的乌托邦的基础的某些真理。他把关于天赋人权和人性的观点提高为公理:人之始生,便具爱恶二质,人按照自己的本性有信而无诈等等。^②康有为根据他提出的公理,推导出了一些应当调节社会关系的公法。他们的本质如下:人有自主之权,以平等之意,用人立法,以兴爱去恶立法,重赏信罚之法。^③

①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1884年,康有为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他“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他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人类公理》与《公理书》均未刊布于世,原稿至今未见。《实理公法》应作《实理公法全书》,可能是《公理书》的修订稿。《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收录了全文。——译者

② 在《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中,康有为一共提出“实理”四条,除鲍罗赫在文中所引两条外,还有两条,它们是:“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以及“人各具一魂,故有知识,所谓智也。”——译者

③ 在《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中,康有为共提出公法六条,除文内所引四条,还有“以互相逆制立法”和“制度咸定于一,如公议以某法为公法,既公共行用,则不许有私自行用诸此例之法者”两条。——译者

在《礼运注》中，公理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下来。在《礼运注》这部被研究者们评价为社会乌托邦的早期名著中，康有为把对儒家三世说解释为发展（进化）及其原因的学说。“公理”这一概念作为一个主要概念在《礼运注》提得很多。康有为用这一概念对孔子的格言“天下为公”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当“天下为公”时，一切关系都将根据“公理”来确立。康有为在论证他的社会理想时，划分出了公理应当获胜的四个“领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此君臣之公理也。国之与国际，人之与人交，皆平等自立，无诈无虞戒争戒杀，和亲康睦，此朋友有信之公理也。社会必须关心幼老疾矜寡废——这是另一个“公理”。最后，夫妇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根据“公理”而确立。妇女巍然自立，不得凌抑。康有为在描绘未来社会制度的最初轮廓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在于：夫有国有家有己，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进化甚矣。^①在康有为的观点中（以及后来在孙中山较晚时期的观点中），取得进步有赖于遵守“公理”。并且康有为的“公理”概念包括了一个明确的含义。它包括下列人们关系的准则，如平等、独立、团结、正义，没有敌对及斗争，即康有为根据人性公理推论出来的那些最普遍的原则。康有为把进步思想同平等、普遍自由原则（抽象的）结合起来，指出了通向未来公正社会的历史发展前途。按照他的历史发展公式，“公理”（最高原则）是作为进步的必要要素的独立的道德价值：离开了所有人承认这些原则，进步是不可思议的。但康有为的“公理”不仅是达到进步的手段，而且是他在论证其社会理想时广泛使用的概念：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公理”基础上。

孙中山的著作没有引用过康有为的思想，他的回忆没有提到过曾精细研究过康氏著作。孙中山曾顽强地争取同维新运动的信徒建立联系，并同康有为最亲密的战友长期进行过合作的谈判，他不了解这位改良派领袖的社会理想，是难以想象的。孙中山本

^① 康有为：《礼运注》，载于《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上，第120—121页。

人从未对他的听众解释过“公理”的含义，仿佛他指的是众所周知的理想。其内容在上个世纪末由康有为揭示的“公理”在这位革命领袖提出的进步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一事实值得专门评价。我们认为，孙中山在构思其社会发展理论时并没有抛弃古代遗产。孙中山在把“公理”这一概念包括到进步学说中去时，依靠了康有为起先在早期手稿和《礼运注》中提出，以后又在《大同书》中作了新解释和现代化的中国乌托邦传统。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使孙中山后来易于有机地把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原理、首先是（从1912年开始）“大同”理想包括到自己的学说中来。

但是，孙中山提出的进步理论并不是对各种已知名的思想的简单通俗解释。孙中山的“公理”既不是康有为提出的“公理”（最高原则）的完全重复，也不是宗教文章中提到的“公理”（普遍原则）的完全重复。我们认为，还存在着—类决定孙中山对社会进步看法的思想。在这位对西方经验和理论涉猎甚广的中国思想家的世界观中，未来社会的传统理想，基督教的全人类博爱说教同最新社会学理论的结论“混为一体”。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1905年开始的就进步所展开的争论材料，能说明孙中山赞同哪一位西方作者而不同意谁。研究亨利·乔治的世界观是解决西方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的可行方法之一。研究者在研究孙中山——乔治问题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税上，而没有研究这位美国作者的全部理论，尤其是没有考虑到乔治的著作所阐明的进步观念。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的主要倾向已经反映在书名中。这一著作不仅论述了随着财富增长而发展起来的贫困的原因，而且还论述了进步。这一著作的第十章即最后一章题为《人类进步的规律》，力求回答什么是人类进步的规律，这是乔治的最终目的。他为此而写了这一著作，并驳斥了马尔萨斯的理论。

如果说乔治在著作的经济部分同马尔萨斯展开了辩论，那么在最后几章则批评了斯宾塞。这位哲学家认为，世界文明进程是一个进化过程，人类的才能在这一过程中扩大着，他们的品质由于

自然淘汰而改进着，这种观点十分流行。用乔治的话说，斯宾塞的哲学造成了进步注定不可避免的幻想：“从这一角度来看，进步是对人类的提高缓慢地、不断地、无情地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结果。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盲目起作用的战争、奴隶制、暴攻、迷信、饥饿、瘟疫和贫困是驱使人淘汰比较低级的类型而使高级的类型得到扩张的动因。”^①乔治不同意斯宾塞的观点，他企图发现只有人的智慧才能认识“公理”。他通过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联合与平等是社会进步的条件。

照乔治的说法，联合（结合、协作、合作）是进步的第一本质，联合愈是广泛和牢固，人们就愈益能够完善，愈是能够发展作为文明动力的智力。承认每一个人权利平等，承认这种平等产生的没有斗争，是进步的第二本质，因为这种斗争消耗着人的智力，妨碍着社会发展。^②乔治在著作的最后几章中宣扬下列思想：谴责任何形式的斗争（竞争、冲突、战争）和奴隶制度；因为它们必然消耗智力，并号召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作者的建议归结为必然遵守人类进步的规律，因为“只要社会措施促进文明，只要它们保证每个人最充分的自由而仅仅受其他一切人的同样的自由限制，文明就一定会前进。”^③乔治把人类进步的规律称为道德的普遍的规律。他断言说，这一规律能够说明各国发展水平的现有差别、它们的衰落和崩溃，能够说明欧亚文明性质的差别，最后，能够说明“进步的中断、跃进和停滞”^④。把孙中山关于世界史发展所写所说的观点同《进步与贫困》最后几章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可以认为，这位中国革命领袖从乔治的书中获得了他关心的许多问题、包括进步原因问题的答案。我们觉得孙中山抓住了斯宾塞和乔治的辩论的本质，恰恰由于信奉后者的观点，他在关于进步的思考中走了和梁启超不同的道路，抛弃了认为人类进步

① 见亨利·乔治，《进步和穷困》，彼得堡1896年俄文版，第562—563页。

② 同上，第507页。

③ 同上，第617页。

④ 同上，第594—595页。

是一个竞争起决定作用的过程的看法。

孙中山的理论和这位美国作者一样，强调了道德原则的意义。乔治认为，只有在人类平等和联合起来的时候，人类才能前进，而任何形式的斗争却会导致消耗力量和退步。孙中山在《社会主义的派别及方法》的演说中，以及在1912—1913年的言论中还证明，人类进步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互助、团结和道德原则。我们认为，孙中山显然不仅接受了乔治的单一税理论，而且接受了他著作中关于进步和退化原因的基本结论，并且和传统思想作了比较。孙中山的“公理”包括平等、团结、互助和缺乏斗争，在思想上和乔治用“联合”与“平等”这两个名词扼要表达的人类进步规律是一致的。

孙中山的“公理”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构成物。我们认为，这一构成物由三个成分汇合而成：对未来社会的传统理想（“天下为公”）、基督教“人人皆兄弟”的信条以及从乔治的进步论中借用来的学说。当时，孙中山明显比其他一切人更偏重于乔治的社会学公式。在揭示了孙中山的“公理”的内容后，就能够理解，过渡到他的进化公式的下一个环节，即过渡到他1920年包括在自己的进步论中的一句话——“互助是人类进化的基本原则”，这是多么自然。孙中山以及中国社会某一部分人（不仅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先前关于进步理论的论战为接受克鲁泡特金思想，包括他的互助是生物进化的普遍世界规律和学说作好了准备。

熟悉了孙中山关于社会进步因素的观点，就能够说明这位中国革命领袖世界观的某些特点。苏联史学家已经作出了分析孙中山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态度的尝试。这位中国政治活动家所创立的进步论，对他为什么那样坚决而彻底地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说明。孙中山保持着对大同正义社会的传统乌托邦思想的某种信念，承认乔治关于普遍联合和普遍平等的规律，并参照自己的宗教信仰，认为进步是通过人们的合作与互助实现的。他相信普遍团结思想，认为斗争的一切表现（社会

内部的竞争、战争和冲突)都是阻碍前进的因素,是人们不得不同野兽斗争的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的残余。他把宣扬生存竞争和强权是进步动力的理论称为过时的、不适用于二十世纪的理论。孙中山对以生存竞争规律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毫不妥协,他采取了不承认任何斗争形式的态度。在他的社会发展中,那种理论是没有地盘的。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否定联合并堵塞了进步的道路。不揭示孙中山世界观的这一特点,便无从认识他对包括阶级斗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按其意义来说,这是从孙中山的进步论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更准确地说,第二个假设涉及到康有为——孙中山的思想继承性。通过他们的人类进步观的比较,暴露了二人世界观的共同性。通过康有为的著作可以看到孙中山主义和儒家传统的联系。把他们的进化纲领加以比较,暴露了这两个理论共同的“公理”概念。没有“公理”,社会进步是不可思议的。这位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大同书》的作者,随后是孙中山,预测到了通向社会统一与社会平等的历史运动的基本路线。由于他的努力,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思想中产生了新的社会思想。尽管这一思想是空想的,因为未来完美制度的基础是普通的抽象原则,但我们觉得,这种理想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

恢复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的进步论的基本轮廓以后,就能够把它们“放到”世界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总潮流中去观察。中国思想家的观点属于这样一种理论,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企图“泛谈进步而不去研究某一社会形态的具体进步”。中国思想家或者把竞争突出为进步的必要因素,或者把团结突出为进步的必要因素,他们在自己的探索中走的是和影响他们观点形成的西方思想家同样的道路。拉夫罗夫在《历史书信》中对社会发展学说作出了分类的尝试。他在谈到“各种极其不同”的进步观点时划分了几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的作者认为:“人类争取进步的斗争在于发财致富的天然愿望,在于竞争,在于最聪明、最狡猾的人借

以使自己发财致富，因而，向人们指出发财致富的最好过程，也就是最正确的进步道路的竞争。”^①另一些理论的作者则认为，进步是、也只能是团结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提高的体现。这种团结，“当然不能在争逐财富和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只能在用体力和脑力进行生产劳动的一切人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②可以把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理论归入这两个类别中。梁启超把自己的进步学说和每一个人为自己利益而斗争和竞争的发展联系起来。孙中山则比较接近于通过平等、正义、互助、团结的抽象概念来确定进步本质的那些人。

熟悉了二十世纪初的进步理论，不仅能够澄清当时中国社会运动中主要思想家的世界观的区别，而且能够划分出两种彼此对立的社会学说。我们认为，1905年出现的梁启超——孙中山在进步动力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具有更深刻的后果。“竞争”和“公理”（即平等、团结和互助）这两个概念在两种进步观念中是作为绝对不相容的概念提出来的。在中国社会的意识中认为斗争思想和团结思想的不能相容的观念相当根深蒂固。这种状况在二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也暴露了出来。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同阶级斗争比较，“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更应当成为新道德的基础。^③据他的话判断，也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冲突并没有解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内部克服意识中很牢固的刻板公式：或者斗争，或者团结。他们不得不摧毁牢固不拔的社会舆论，证明正义社会的理想和阶级斗争这种实现理想的方法能够存在于同一种理论范围内。1919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首先是《阶级竞争与互助》，含有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对待团结——斗争这一思想矛盾的非常有趣的材料。李大钊在“通向”马克思

① 见И·И·拉夫罗夫：《历史书信》，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316页。

② 同上，第319—320页。

③ 见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2月1日。

主义时，企图克服互助论（在更加广义的角度上是一般社会主义理想）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对立。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阶级冲突对于实现“互助的光明”世界是不可避免的。^①

译自《中国在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史》，1979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版。

吴根梁译 董进泉校

^①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于《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①

B. A. 克里夫佐夫

B. A. 克拉斯诺娃

早期思想

李大钊政治思想形成过程的最初时期，约为十年，即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起，到1917年为止。在这一时期内，李大钊逐步克服了传统的儒家观点、道家观点和自由民主主义观点，而成长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李大钊，字守常，1888年10月6日^②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童年生活孤苦伶仃，毫无欢乐可言，刚一岁，就父母双亡，被当过杂货铺商人的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在农村私塾里接受了传统的儒家启蒙教育。1905年，他考入中学，但是由于交不起学费，没能念到毕业。

必须指出，席卷河北省的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给少年时期的李大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影响到他以后思想的形成。后来，李大钊一直把这次运动，看作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为祖国遭受不幸而极度悲愤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作品和生平，也深深地打动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看来，屈原是一位彻底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是一位政治家的楷模。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在校中第一次

① 标题是译者加的。——译者

② 应为公历1889年10月29日，即阴历一八八九年十月初六。——译者

接触到经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新学”，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日文和英文。正如列宁所指出，在1905年革命之后，“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强有力地发展了。列宁由此断定，“中国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①。李大钊这一代人的思想发展的特点，正在于他们是在“新精神”和“新学”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并日益同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天津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受到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中国的关于共和制、议会民主和民族主义等学说的强烈影响。这些学说都是由中国人从欧美和日本介绍过来的，由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的著作加以阐明。

由于严复的翻译介绍，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这些作品立即在中国青年中得到广泛的流传。

严复赞成进化论，主张斗争和政治进步。他认为，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西方比中国强大。他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由于技术和武器，而首先是由于实行民主制度而“解放了个人的力量”，由于民主制度能够较充分地发挥人民的潜力去建立富强的国家。严复断言，中国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父道主义和君权至上，使得社会停滞不前了。

严复的思想鼓舞了李大钊去批判中国的旧传统，指出它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梁启超认为，只有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救中国。照他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非更新不可。不管是否自觉自愿，梁启超把“人民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人民是“政治、科学和技术的源泉”的思想提到了首位。

同时，正在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逐渐加以发展的孙中山，也谈到人民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在中国特别盛行欧洲的进化论，以及与

^① 见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9页。

之有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严复的努力，1895年在天津出现了有关这类专题的论文和欧洲人著作的译文。严复最初在当地的《直报》，后来在1897年创刊的《国闻报》上发表这些文章。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这些论文和译文，接触到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著作对于中国青年的思想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天津学习期间的李大钊，也受到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中国近代与儒教》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高田淳写道：“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在这以前，他们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受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影响，该书传播了当代的欧洲思想。”^②

李大钊在天津度过的那几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工作量却很大。但是他仍旧孜孜不倦地掌握新知识，汲取新思想。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天津。华南和华中各省宣布独立，皇室把政权授予了袁世凯政府。在华南，清皇朝势力已被推翻。1911年12月，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被光复后的各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人身、言论、出版、集会和组织自由。

中国的革命高潮，推动着李大钊去参与政治活动。有材料说，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一个会员，以表示献身中国革命的决心。但是，孙中山及其信徒的主张，看来没有对李大钊产生明显的影响。当时，李大钊更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所以他于1912年底向江亢虎的社会党靠拢，并领导社会党天津支部的工作。李大钊充满共和幻想，对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家满怀信心，同时还参加北洋政法学会的工作，并成为支持袁世凯的《言治》月刊的领导人之一。可是，这并不妨碍

^① 今译《进化论》。——译者

^② 见高田淳，《中国近代与儒教》，1970年东京版，第141页。

李大钊对孙中山和宋教仁表示钦佩。

尽管袁世凯出卖革命，但是李大钊囿于自由主义而于1913年初加入了汤化龙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李大钊在天津期间的这种政治摇摆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有折衷主义观点。当时，在他头脑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由民主主义思想。

李大钊发表在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上的文章《大哀篇》，最充分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该文有一个副标题——《哀我民之失所也》。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特别重要。李大钊是以一个炽烈的共和派政论家，一个君主专制的死敌，一个人民之友的口吻来写这篇文章的。李大钊在文章中把中国的一切祸害归咎于君主专制，归咎于吾民“范于一尊”，因而断定，君主专制“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①。李大钊说：“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②李大钊用植基于人权、自然人权的共和思想，去对抗君主专制。同时，他已经对辛亥革命的结局抱极端怀疑的态度。李大钊写道：“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鐫心，志兹硕德，亦欣欣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之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③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就已经对中国的议会制度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李大钊公开指责议员们“坐拥千金，以供其购买选票者，又果谁之骨髓耶？”他把议员们看作“此辈蝇营狗苟，

① 见《李大钊选集》，1978年北京版，第2页。

② 同上，第1页。

同上。

敲吾骨吸吾髓耳”。

李大钊尖锐抨击资产阶级政党，强调指出彼等“冀鸟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①。他把这些政党形容为：彼等“或则谓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狴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②李大钊认为，这些党的政纲之最大弊端，在于欲集权于“一人之手”，似乎此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也。李大钊揭露这些政党购买选票，动辄数万金，以“保证高官所踞之要津”。他指出，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③。李大钊对各政党发表一通议论之后断言：“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④

李大钊汲取参加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的惨痛教训，才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所以，毫不奇怪，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不认真贯彻孙中山的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还在该文中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各省都督专政，认为都督们猎取“民权”以自恣。

李大钊对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共和制所作的最后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狴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⑤

《大哀篇》一文证明，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形成过程的特点是，他较早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议会制、政党等等持批判态度。这一切推动他去寻求中国发展的新道路，并为他后来向科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同上，第2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3页。

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当时，李大钊还看不到既成局面的出路。四年之后他才明白，除非经过激进的革命改造，中国人是无法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李大钊在1917年3月写道：“如果需要为共和再次进行革命，国民将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早在1917年春天，李大钊就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榜样。他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中论断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

但是，早在1913年春天，李大钊就清楚地看出“吾民乃委无望矣”。他痛苦地惊呼：“不得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李大钊对中华民国的危急状况所做的评价是正确的。形形色色党魁的夺权斗争，反动势力的加强，导致了中国逐渐背离辛亥革命胜利后所宣布的温和的民主改革。人民群众自发地要求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却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革命家感到失望而不再加以支持，于是革命就一败涂地了。1913年11月，反革命政权禁止国民党和社会党进行活动，党的领袖遭到驱逐。自由主义和制宪的危机，必然推动人们去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实际解决办法，使中国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1913年秋天，是李大钊最苦恼的时刻，他因共和理想和希望的破灭，而陷入悲观失望之中。由于不能为既成局面找到出路，他甚至决定抛开世俗的生活，遁入空门去当一名和尚。这时，他常常考虑如何帮助贫穷的弱者去结束暴力。李大钊决定到日本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时有一批中国青年在日本研究当代的欧洲科学。

1913年9月，李大钊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本科，^①一直学习到1916年。在日本，阅读政治和经济著作的机会要比中国多得多，所以，东京时期在李大钊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① 可能是政治本科之误。——译者

如前所述，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日本知识界、随后是留学日本的中国激进青年，对于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亚当·斯密、孔多塞、圣西门和其他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符合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早在二十世纪初就由严复翻译成中文出版。选译这部著作并非偶然，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竭力探索中国富强之道。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青年学生，很熟悉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政治经济学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李大钊，当然也知道这部书。后来，他又研究了孔多塞和圣西门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东京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一个思想和政治生活都很活跃的主要中心，那里有人传播激进的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李大钊到来之前，日本已经有了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日译本，又有日本和其他外国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专题论文。李大钊在日本阅读社会经济和政治著作，钻研社会主义学说。显然，李大钊在日本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李大钊一开始写文章就揭露政治制度，怀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社会制度，所以他必然要去探索新的政治理论，为革命受镇压的局面寻找出路。他当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中找到了这种理论，所以他东京时期发表的著作显然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反映了克鲁泡特金关于互助是社会生活规律的观点，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革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任何暴力的论点。这些思想是同李大钊身上还没有根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互相矛盾的，他1915年夏天发表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国内时期，李大钊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了兴趣，那是1913年4月他发表《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这篇译文的时候。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是折衷主义的，是克鲁泡特金、巴枯宁、

施蒂纳、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的混合物。有一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改造社会，但不主张通过革命方式，而要采取总罢工的办法。其中最流行的是关于消极抵抗暴力的思想。相反，另一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使用暴力。当时在中日两国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流传最广的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互助论的信徒，根据克鲁泡特金关于任何权力都会变得专横的思想，主张实行革命，主张在互助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联合会。孙中山也支持生物社会学的互助论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

受柏格森著作的影响，李大钊当时反对历史发展中的“消极宿命论”，而倾向于自由意志论。此外，李大钊还研究了埃梅逊和杜威的著作，但是避开了他们的影响。他也没有受非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当时对圣西门和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之上的日本“新村运动”发生了兴趣。据说，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版译者、日本社会党人河上肇也对李大钊起过很大影响。

在东京时期，李大钊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他也随时注视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当时中国正在策划复辟帝制。1914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打算一笔勾销辛亥革命以来（1911—1913年）的一切微不足道的改革，这次事件是考验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忠于民主制度的试金石。李大钊发表了几篇批判性文章，表示坚决反对复辟帝制。1914年11月10日，他在东京出版的《甲寅》杂志上发表《国情》一文，^①反对袁世凯的两个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痛斥他们就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发表的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意见。古德诺硬说什么，中国大多数之人民知识不甚高尚……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古德诺还建议，中国元首可以享受无限权力，终身其任。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4—7页。

李大钊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同古德诺进行了论争，并且断言，人民是需要政治权力的。李大钊写道：“纵悬厉禁以闕之，民亦将索政权而不顾。”他认为，洋人所否认的今日中国之“国情”，乃人民力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也；洋人“乃谓其（吾民）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①。

所以，李大钊是首先注意到中国人民的新“国情”的人，首先注意到中国人民具有革命的民主传统的人。他断言，如果一定要复辟君主制，则“吾民舍群起而抗之，无他术也”^②。

李大钊《国情》一文的精神实质，与《大衷篇》有很大差别。在《国情》中，他竭力反对洋人干涉中国的命运，反对夸大中国已往的国情，并指出已经出现了新的国情。前文以激昂的主题、修辞性的问话和感叹取胜；后文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一篇严谨的分析文章。

李大钊《国情》一文的重要结论是：“稽近世政变之由来，直可谓为因赋税之加重而起也。”这就是说，他力图找出政治现象的经济原因。

中国虽已宣布保持中立，但没有能够躲开已经爆发的世界大战。1914年11月，日本派兵侵入中国领土；1915年1月，又以最后通牒方式向中国提出侮辱性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事件使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李大钊领导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和《民彝》杂志，同日本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进行了斗争。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呼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认为侵略是日本国内存在君主制和专制制度的结果。

由于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李大钊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爱国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同胞起来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5页。

^② 同上。

抗击日本。他强调指出：“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为此吾国民应承担救国之责，“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胜则此锦绣之江山可保，而吾祖宗袭传之光荣历史，从此益可进展于无穷。败则锦绣之江山虽失，而吾祖宗袭传之光荣历史，遂结束于此。”^①李大钊在这里再次展示了他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对君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不可调和性。

叔本华 (Schopenhauer) 和尼采 (Nietzsche) 的著作，这几年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他们的悲观主义哲学，完全符合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低落情绪。针对这种情绪，李大钊在1915年8月号的《甲寅》杂志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以答复陈独秀在该杂志前几号上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陈独秀断言，“爱国心”在中国阻碍了国民自觉心的产生，因为它同忠于现有国家、忠君即爱国的旧传统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头脑清醒的深思熟虑的人在中国建立国民自觉心之后，爱国心在中国才是进步的现象。因此，知识分子暂时不应当从事政治活动。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获取知识、学习、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只有社会条件改变之后，才能着手去进行政治活动。

李大钊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在中国阻碍国民自觉心产生的不是爱国心，而是笼罩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的厌世心。厌世心和宿命论削弱人们的斗争精神，阻碍人们努力前进，阻碍人们去改变现状。相反，爱国心却能促使国民自觉心的产生。李大钊断言，自觉心的意义在于力图“改造国家”，知识分子的任务就在于根据自己的认识去“改造国家”。如果国民连爱国心都没有，那就谈不上改造国家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参与政治活动。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就中国国民自觉心进行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27页。

问题抱有不同的态度。

迈斯纳 (M. Meisner) 认为, 李大钊是站在民族主义、唯意志论和个人主义乐观主义的立场上参加这次辩论的。其实, 李大钊并非站在民族主义 (现在所理解的民族主义) 立场上, 而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自觉心; 并非站在唯意志论立场上, 而只是强调主观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 他的乐观主义, 并非象迈斯纳所说的那样出自对艰苦童年的补偿性反应, 而是出自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感触。这就是说, 他的乐观主义带有主观基础, 而非客观基础。

李大钊反对宿命论。他受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 鼓吹自由意志。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习惯于受制于境遇, 而不是与境遇进行斗争。他号召人们放弃“消极之宿命说 (Determinus) ……。须本自由意志之理 (Theory of free will), 进而努力, 发展向上, 以易其境。”^①在儒家的宿命论、天命论和道家的无为而治论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 李大钊发出这样的号召是有极其进步的重要意义的。如果不从宿命论和无为而治论的信条下解放出来, 中国就谈不上有任何自觉的革命运动。因此, 鼓吹不要消极地受制于境遇, 号召人们以“自由意志”去改变境遇, 都应当得到正确的理解, 而不应当被解释为纯粹的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 (迈斯纳正是这样解释的)。这样的鼓吹会导致中国社会意识的改变, 最终为中国社会的革命改造准备条件。

李大钊竭力要中国老百姓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比其他民族毫无逊色。他就中国古代哲人、著名统治者写道:“舜人亦人, 我何弗若? 国无论善恶, 均决之于人……中国人应自决其命运, 而且必能决之。”^②

① 见《李大钊选集》, 第31页。

② 见A.Γ.克雷莫夫:《1900—1917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和论争》, 1972年莫斯科版, 第308页。

1915年创刊的进步杂志《新青年》，对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李大钊是该杂志撰稿人之一，后来又成了领导人之一。他的观点与其他撰稿人有明显的差别：钱玄同认为，废除汉字是救国之道，因为汉字支撑了孔孟之道；陈独秀把启蒙运动简单归结为打倒孔家店；胡适又把它归结为少数有才干的文人去启迪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而李大钊则呼吁人们积极起来反对整个旧制度。

《新青年》杂志在那几年里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纲领，虽然它的基本宗旨是民主主义的。《新青年》的作用主要是启蒙，它向中国激进青年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科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领导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和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一方面大量发表关于西方自由民主派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文章，另一方面又用一定篇幅猛烈抨击资本主义。例如，读者可以从《新青年》杂志中找到下列内容的文章：关于法国大革命，关于共和制，关于现代文明，关于富兰克林、穆勒、斯宾塞、尼采等等的文章。另外，读者还可以看到《血与铁》这样的译文（译自伦敦《自由旬报》），该文宣称：资本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文明“乃从强权之力而组合者，乃从各国中寡廉鲜耻之扩张领土手段而成立也”^①。

该文写道：“资本主义即战争，社会主义即各国之间之和平而已。夫併吞主义无别物，不过据一己国家人民之工商业为其基础，以遂其展拓经济政策于他国耳。”^②接着说，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从而对人类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夫惟有欧罗巴人民一番新革命复兴，乃反对此等人类死仇之惟一政策而已。该杂志写道：“吾人必为之先导，若到必要之时候，拚吾人

① 见《新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号。

（这句话录自《新青年》原译，按英文直译应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之上的，是建立在对所有国家进行无耻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译者）

② 这句话按英文直译应为：“帝国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在剥削本国人民基础之上对其他国家进行的经济剥削。”——译者

之生命以赴之，为一新社会秩序之凯旋。”^①

《新青年》杂志1915年译载《血与铁》这样的文章，是轰动一时的。该文当然引起李大钊的注意，后来李大钊自己发表的有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战争等问题的观点，都直接同该文的思想有关。

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发起著名的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是在“科学、民主和再造政权！”的口号下展开的，它号召人们反对保守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毫无根据的幻想。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认为，青年人缺少传统思想的包袱，懂得革命理论，有能力再造中华。李大钊参加了这次运动，并且很快成为运动的积极领导者之一。

1916年4月，李大钊没有参加早稻田大学的期终考试，就急急忙忙从日本回国。他觉得，直接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那时，轰轰烈烈的反帝制运动正在中国不断高涨，从而导致1916年5月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北方宣布独立的各省的联合。

最初，李大钊留在上海这个反袁情绪高涨的中心，1916年夏袁死之后，他移居北京，全身心地投入进步党的工作，搞政治、办杂志、做教育工作。1916年8月，李大钊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即进步党的机关报《晨钟报》。李大钊总共在该报工作了三个月，因为作为进步党喉舌的该报的老板，显然不同意李大钊的民主主义观点，而李大钊又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以该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李大钊认为，该报主要目的应当是唤醒国民去创造新生活 and 传播国民革命的思想。他要求记者具备高度的原则性和职业技巧。他最喜欢用的一句话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办报纸特别注意青年问题，他把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李大钊在题为《〈晨钟〉之使命》的创刊号社论中写

^① 见《新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号。

道：“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在附有副标题《青春中华之创造》的该文中，李大钊提出了外人诋为“待亡之国家”的中华必然再生的问题。照他的话说：“过去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李大钊把复兴中华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寄托在一代新人身上，从而预见青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李大钊断言，复兴旧中华是青年的天职。他号召青年提高自觉心，锻炼意志，参加青春中华之创造。他向青年大声疾呼：“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盖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①

一个月之后，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满怀乐观主义情绪的著名论文《青春》，进一步阐发了同样的思想。李大钊的《青春》一文，对再造中华充满信心，认为中国青年应当永葆青春，播撒再造中华的种子。李大钊在该文中写道：“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②李大钊号召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③

《青春》一文给中国激进青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使李大钊一跃而为中国青年一代的思想主宰。

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和《青春》，以及后来写的一些文章，反映了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坚信新的、青春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62—63页。

② 同上，第71页。

③ 同上，第76页。

的；反对旧的、传统的。恰恰是坚信新的、青春的这种立场，促使李大钊同中国的传统观念决裂，首先起来抨击中国的孔孟之道，勇敢地向中国的旧社会挑战。这种立场也推动李大钊去向国外寻求真理，起初寻到了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后来是斯宾塞、达尔文、柏格森、圣西门、克鲁泡特金，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李大钊的思维特点在于，他总是以深邃的哲学眼光观察宇宙。在思想形成过程的初期，李大钊因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受黑格尔和埃梅逊观点的影响，建立了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观，其特点是浪漫主义的乐观主义。这种思想观点在他的文章《青春》和《今》之中都有表现。

然而，李大钊青年时期的哲学观是折衷主义的，是中国传统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加上西方思想家——斯宾塞、穆勒、黑格尔、埃梅逊等人的观念的混合物。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尽的，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即为永恒。在宇宙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二元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所组成。宇宙在自我更新中发展，每一次自我更新都达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因此宇宙有无尽之青春。人为宇宙之一部分，宇宙之我亦即宇宙之一部分。宇宙无尽，人与宇宙之我亦无尽。李大钊断言：“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然而，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始终自我更新，所以人也自我更新，而有无尽之青春。

我们从李大钊的这些观念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确信宇宙和人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对青春永恒的周围世界抱有坚定的乐观主义态度。李大钊的这种宇宙观，证明他已经同儒家传统决裂，因为儒家传统是悲观主义的，是把发展理解为一种循环的运动。

李大钊根据这种宇宙发展观认为，时间只存在于“今日”，而不存在于“昨日”或“明日”，因为“今日为昨日之终，为明日之始”。

尽管这种哲学观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却使李大钊能以激进的乐观主义态度对待周围事物，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的。李大钊断言，既然宇宙再生并有无尽之青春，那么揩着过去的积尘重压的中国也应当再生。“中国应昭示于世者，不在赧赧辩诬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①

但是必须说，李大钊在1916年还没有完全克服儒家学说的影响。他的头脑中仍旧保留着以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儒家学说的成分。例如，甚至在他的进步文章《青春》中，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思想：“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这一阶段，李大钊确实认为，儒家经典（特别是早期的经典）可以被利用来创造进步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时期，孔夫子及其信徒的学说中有关个性、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等论述，都吸引了李大钊的注意。

1916年，在离开日本之前不久，李大钊还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该文在一定意义上是李大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信条。我们根据这篇文章可以断定，李大钊基本上懂得，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特别是儒家学说，阻碍了中国的政治觉醒，阻碍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李大钊向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挑战，他在那一时期发表许多文章猛烈抨击儒家学说。他把“民彝”同体现儒家传统和奴隶制的“宗彝”对立起来。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了儒家传统与自由的问题。他认为，自由乃“代议政治所必需”。李大钊不止一次地引用严复译成中文的穆勒的《论自由》^③，指出人权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谈到自由与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断言过去的传统束缚了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71页。

② 同上。

③ 严复原译本书名为：《群己权界论》。——译者

自由，阻碍了自由的广泛发展。李大钊说，历史传说、往哲前贤，束缚自由为尤甚焉。这种传统又对人权起否定作用，从而导致政治上的腐败。于是，李大钊作了这样的论断：孔子生而晋华衰，国民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夙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

李大钊猛烈抨击了孔孟之道和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纲常法度。他强调指出，孔孟之道“剥夺了人的独立性”并把人变成了傀儡。^①李大钊得出结论说，“结绳之治不能行于文字传译之世也”，“弓矢之器不能施于飞潜炮火之战也”，“井田之不可复反也”。他认为，中国社会思想保守和停滞的原因是：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

李大钊把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归咎于暴秦（公元前三世纪）之蹶起和使用商鞅、李斯之术。他转述谭嗣同的话说：“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秦之政也，”亦即反民主之专制之政也。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曾经写道：“中国无学术，有之皆荀学也；中国无政治，有之皆秦政也。”^②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伟人、英雄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他引用十五世纪中国思想家王阳明的话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同时他认真研究了卡莱尔、埃梅逊和托尔斯泰的英雄论。卡莱尔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动力。常人薪也，英雄火也……引以一星之火，可使燎原也。常人之于社会，其受压迫酷至何度，亦不能自奋其力而为反抗。于此有英雄焉，一夫崛起，齋有天赐之灵光，足以烘耀常人之精神……故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异于常人也。

托尔斯泰之说，正与卡莱尔之说相反。托氏认为，众庶乃历

^① 李大钊的原话是：“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纲常法度之人人既深也。”——译者

^② 见谭嗣同：《仁学》，载于《谭嗣同全集》，1954年北京版。

史之动力。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李大钊由此得出这样结论：卡莱尔之说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他同时也否定了与卡莱尔之说略同的埃梅逊之说。他认为，只有托尔斯泰之说是最民主最正确的。所以说，李大钊是反对英雄主义的，认为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他提倡民主主义，拥护人民。

李大钊认为，“英雄主义断不能复活于二十世纪也”。他反对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拥护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主张制定宪法和实行代议政治，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李大钊当时认为，中国的代议政治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

李大钊断言，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顾自由之保障，不仅系于法制之精神，而尤需乎舆论之价值。”李大钊还提出个人的作用问题。与论述英雄的作用时一样，他把个人的作用问题，同反对儒家学说和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照他看来，立宪国民的责任，不仅在于保持国家的权威，而且在于尊重个人的价值。他说：“必须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国家和国民都应该做到：“国民全体，亦有其大生命焉，其与环境相战。”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对环境逆来顺受，神衰力竭，完全是君主专制造成的。他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①李大钊指出，中国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他强调说，“当知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②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56页。

^② 同上。

对于李大钊来说，《民彝与政治》这篇文章带有一定的纲领性意义。他在该文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都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他将反复论述中国的旧传统和儒家学说的反动作用等问题。

在中国革命史上，反对儒家学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否则就谈不上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中国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儒家学说的斗争同时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李大钊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展开的反孔运动，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对于克服旧中国的传统意识，都有重大的意义。

《新青年》杂志1915年发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陈独秀在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就是抨击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纲常法度的。该文给中国的激进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有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对孔子学说提出过批评（谭嗣同和梁启超温和地批评过孔子学说），但是，象《新青年》杂志发动的这种打倒孔家店的批评，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它不仅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而且也带有政治意义。

中国反动派显然想利用孔子学说，来反对中国的革命和民主运动。到1916年，关于孔子学说之争，成了中国一个特别尖锐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条文的问题。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得到袁世凯的大力支持。袁世凯死后，国会对孔教问题表现得摇摆不定。但是，康有为继续坚持要把孔教定为国教。为此，《新青年》杂志发动了反孔运动，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运动。

在《孔子与宪法》（1917年1月）和《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站在共和派和民主派的立场上反对孔子学说。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所以，他坚决反对在宪法草案中列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他写道：“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

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①

在李大钊看来，孔子的道德就是专制社会的道德。因此他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就孔子本身写道：孔子“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之下，李大钊不仅指望“自然淘汰不适于今日社会之生存”的孔孟之道，而且呼吁人们努力加速这个“自然进化”的进程。李大钊深信，在孔子学说影响之下形成的中国传统道德，必将被中国人民所克服和根除。

在克服孔学影响的同时，李大钊开始逐步摆脱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他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道：“历稽中国、印度，乃至欧洲之自古传来之种种教宗哲派，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由吾人观之，厥说盖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也。”^②接着，他对宇宙作了这样的评价：“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故道德之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③李大钊号召人们：“少加以人为之力，冀自然进化之程迅速蜕演。”^④

进步党解散之后，其成员于1916年成立了一个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李大钊与该会有关，并一度担任该会首领汤化龙的秘书。但是，这种关系纯属形式上的，因为李大钊日益激进的观点，同研究系首领的政治主张发生了冲突。

离开《晨钟报》之后，李大钊就去编辑《甲寅日刊》。他在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② 同上，第7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80页。

1917年的三个月之内，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六十多篇文章和短评。但是，李大钊的民主主义观点，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引起了《甲寅日刊》老板的不满，于是他又不得不离开该刊。

当俄国革命、首先是二月革命、随后是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时，李大钊把它当作是整个宇宙再造的开端，当作是期待已久的、能够促使青春中国之诞生的开端。因此，他对俄国发生的事件极其关心，无条件地、兴高采烈地欢迎俄国革命。俄国革命证实了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所表达的人类有无尽之青春的信念。

必须指出，从现代中国革命一开始，中国革命家就把俄国革命当作自己的榜样。中国革命家正是把新纪元的开始和世界革命胜利的希望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影响的结果。因为日本社会主义者非常推崇俄国革命，经常在自己的刊物上论述俄国革命。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中国的革命报刊也载满俄国革命（1905年革命）的消息。中国人当时认为，1905年革命主要是民粹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结果。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是当时中国青年所喜爱的巾帼英雄。

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随时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并在许多方面模仿俄国革命者。1905——1906年的俄国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起过直接的影响。一位中国姑娘在1906年的俄国《意志报》上写道：“贵国的革命不仅仅是贵国一国的事情，而且是国际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本国开展这样的工作，让我们的思想传遍全世界吧。正义必胜。”^①

普莱斯写过一部论述俄国革命对中国影响的专著：《俄国与中国革命之根源（1896——1911年）》。他认为，中国革命者“是把俄国革命者或俄国革命运动当作自己的榜样的。的确，我们分析中国革命者在1911年之前对俄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俄国

^① 见《意志报》，1906年7月4日。

这一榜样……大大激发了中国的革命。”^①

李大钊就俄国事件写过一系列文章。他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中论断说，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将结束“官僚政治”。他认为，俄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俄国革命对世界政治命运的影响就在于此。他断言：“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官僚政治’而革命。”^②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之后，作了这样的论述：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

1917年3月，李大钊就俄国事件还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等文章。他把俄国革命叫做大革命，认为俄国革命对中国和全世界的政治命运具有深远的影响。今“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此则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③

李大钊追随孙中山，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看作是俄国二月革命的榜样。为此，他做出这样的论断：“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吾共和政治之势力。此因果之定律，报偿之原则，若兹其巧，或即异日中、俄两国邦交日笃之机缘欤？”^④1917年10月，李大钊写道：“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憚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⑤

1917年，李大钊还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从而证明他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以一个君主制及其思想基础的揭露者的身份出现，而且以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① 见D.C.普莱斯：《俄国与中国革命之根源（1896—1911年）》，1974年坎布里奇版，第214页。

② 见《李大钊选集》，第8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90页。

者的身份出现。他在文章中尽管没有进行深刻的社会分析，但是力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他批判了被利用作为侵略战争借口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驳斥了土地报酬递减法则。

同时，李大钊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掠夺性的世界大战（1917年4月，5月），但是，他还看不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观点和行动有什么差别。

李大钊所工作和生活的华北地区的政治气氛，是极其沉闷的。虽然1913年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已经恢复，但是实权完全落在一个军阀兼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之手，而段祺瑞是受到研究系这个政治派别支持的。北京政府受制于安福系，安福系的靠山则是日本。所以，政府内部权力之争不息，贪污勒索盛行，国会成了军阀统治的御用工具，宪法所宣布的政治自由当然只是一纸空文。谁想维护共和制，政府就残酷地镇压谁。

反对专制制度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高度的原则性的。李大钊虽然是一位满腔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一位君主制的揭露者，但是在1917年之前他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因为他还没有找到确实能再造中华的力量。在那个时候，李大钊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受过教育的青年身上，寄托在知识分子、学生身上，然而他还不能为运动提出明确的纲领。根据中国学者高全朴和张岂之的意见，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思想特色是：具有着要求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百折不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对于中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心。^①

俄国十月革命前不久，李大钊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改造中国的政权，非进行革命不可。1917年10月15日，李大钊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暴力与政治》一文，从而与自由主义和议会主义彻底决裂。李大钊在同梁启超辩论时分析了中国的现状，他的出发点是：中国现政权是与人民为敌的，是建立在暴力

^① 见高全朴张岂之，《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载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第19页。

之上的，因此，力图实现民主的人民应当以暴力对付暴力。李大钊此文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依靠暴力维持政权的国家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所以只有借助暴力，即借助革命，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革命反抗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加速革命进程。

所以说，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李大钊才彻底抛弃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幻想，从而得出了中国一定要进行革命改造的结论。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李大钊这时的革命观还远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只是建立在暴力论之上的。可是，李大钊政治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对于他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他进一步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一转变证明，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日益带有革命的性质。

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伟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它根本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对整个中国革命及其个别革命家，其中包括李大钊，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主要同以下因素有关：对于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作用的理解，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加深理解，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史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的了解，对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政策的加紧批判。同时，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及其以后时期，李大钊日益频繁地参与实际革命斗争，也对其思想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月革命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发生的。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增加，土地危机加深，农民破产，国内政治分崩离析，形势不断加剧。

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是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广泛注意。十月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早在1917年11月10日，中国各报就报道了俄国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报道苏维埃政权第一批法令的内容。在随后的日子里，俄国事件成了京沪各报争相报道的主题。

1918年4月，孙中山信徒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强调指出：“俄国列宁政府之所以得以巩固，是由于它遵循了和平的不干涉原则，这是值得中国模仿的榜样。”该报有些文章还指出，俄国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表现是改善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民国日报》声称，“我国的革命要求也应当这样。”《民国日报》摘要登载了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给各边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国际部的指令，并且呼吁：“如果中国人民想回击日本和欧洲资本家，反对压迫和非正义行为，就应当同俄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是被压迫人民的最好朋友。”

1918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劳动》杂志，登载了列宁传略。该杂志四月号的一篇文章指出：“备受压迫的劳动者满怀希望地注视着革命，渴望革命尽快取得胜利，使大家都能获得自由和幸福。这就是我国社会人士积极响应、极其重视、热切同情俄国事件的原因。”^①同一篇文章又说，官僚、大地主和富豪也注视着俄国发生的事件，他们担心骚动会达到可怕的规模。该杂志指出，俄国的社会革命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一次简单的“造反”。它着重指出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认为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次试验。

1918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一批文章论述列宁的活动。

同时，中国报刊也对俄国革命散播了一些无稽之谈。所以，甚至中国知识界的开明进步人士，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这样的人，都以为社会主义实行“妇女国有”，都不知道十月革命究竟是要

^① A·Г·克雷莫夫：《1900—1917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和论争》，1972年莫斯科版，第330页。

实现托尔斯泰的不以武力对抗罪恶的戒律呢，还是要大量残害知识分子并加以消灭。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和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自1917年8月起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所以大战结束的消息受到中国的普遍欢呼。各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由政界要人发表演说。11月15日出版的一期《新青年》，成了专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辑。

这些发言和文章，成了讨论大战结果和中国的发展前途的开端。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俄国顺利发展的第一年，以及世界大战的结束，都向中国民主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俄国的道路（无产阶级道路），还是西方的道路（资产阶级道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蛊惑人心的《和平条款十四条》，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群众大会的发言中，把协约国说成是“光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说什么这种思想保证它们战胜了德国黑暗势力。他呼吁按照西方的道路，按照“调和、阶级和平、合作与互助的道路”建立一个新中国，亦即重复了那时比较时髦的克鲁泡特金信徒的观点。胡适把大战的胜利与威尔逊主义联系在一起。照他的意见，建立国际联盟就能永远消灭战争。胡适认为，重复美国的经验是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陈独秀认为，协约国之所以战胜，是因为德国君主政府在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中被削弱了。他赞扬威尔逊及其和平条款，认为实现这些条款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唯一道路。

胡适和陈独秀在自己的发言和文章中甚至提也不提俄国革命，蔡元培则猛烈抨击俄国的道路。担心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改造中国，这种心理状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凑到一起来了。

李大钊对俄国事件和世界大战结束的反应完全不同。1918年

4——5月间，他发表《今》和《新的！旧的！》两篇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道路，是推翻整个旧制度。他以这个论点去对抗陈独秀和温和改良主义者胡适的观点。陈独秀和胡适把中国整个思想论战，仅仅归结为反对孔学。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样一篇重要文章。我们应当把这篇文章看作是，中国民主主义著作第一次对十月革命进行的分析。李大钊精确地说明了俄国的政治形势，他说：“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这篇中国著作第一次提到了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①李大钊认为，法兰西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历史阶段的开始，而俄国革命的结果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他指出，法兰西革命和俄国革命的重大差别在于：“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②李大钊认为，这两种革命的差别还在于，法兰西革命根于国家主义，俄罗斯革命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

李大钊对两种革命进行的比较，证明他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俄国革命的胜利，不认为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与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同，李大钊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01页。

② 同上，第102页。

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①

《新青年》杂志所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是李大钊在北京群众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他在这两篇讲演稿中，对世界大战作了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评价：“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②李大钊揭示了战争结束的真正原因：“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乃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主义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陀罗慈基【托洛茨基】、郭冷苔【柯伦泰】的功业；是列卜涅西【李卜克内西】的功业……是马客士【马克思】的功业。”^③

李大钊得出结论说，大战的社会结果是，“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④。他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也第一次表述了自己关于世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观点。

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向中国社会人士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布尔什维克“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使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⑤李大钊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目的，称作“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照李大钊的意见，二十世纪的革命，都将是“俄罗斯式”的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04页。

② 同上，第110页。

③ 同上，第113页。方括号内的现译名是译者加的。

④ 同上，第110页。

⑤ 同上，第114—115页。

革命，这种革命将扫除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李大钊用如此激动人心的语言描绘俄国革命对人类所起的作用：“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①

《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证明李大钊在政治上迅速成熟了。他在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在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李大钊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建立在马克思学说上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无疑说明，李大钊本人已经热情洋溢地站到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来了，虽然在资产阶级反苏宣传的影响之下，李大钊对布尔什维主义还有一些极不全面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上面，看到了他在1916年如此满怀豪情所写的青春：“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李大钊的文章断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所指引的道路。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王统照，在谈到当时李大钊文章的意义时指出：“李大钊先生……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几篇内容崭新思想清锐的论文，更给读者以明白的指示，青年读者们……进一步对于十月革命之历史的意义与其对全人类的影响有了比较明了的认识……虽然一般青年还不易完全看透中国革命要如何按步进展，要怎样以阶级观点对一切分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17—118页。

析、批判，而当创巨痛深，想寻求出路的当前，这些文章的刊布自是强烈有力的引导。”^①

1918年2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②继续进行大量的实际工作、组织工作和启蒙工作。1918年11月，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开设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史等课程，第一次向中国青年学生介绍唯物史观的原理。李大钊还在经办报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兼任《新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并且为下列期刊撰稿：《新生活》、《国民杂志》、《少年中国》、《晨报》，等等。

1918年春天，李大钊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受意大利和土耳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立志模仿青年意大利派和青年土耳其派。少年中国学会的部分成员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李大钊、周恩来等。

另一部分坚持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曾琦，李璜等人，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党，他们沿用少年中国学会的名称把这个党叫做少年中国党^③。该党敌视马克思主义，带有极端的沙文主义性质。

李大钊认为，中国少年（即中国青年）的重要任务是，团结亚洲和全世界的青年普遍开展青年运动。

1918年底，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向他们讲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必须指出，尽管李大钊全神贯注于马克思主义，他当时还是受到黑格尔、特别是埃梅逊唯心主义的影响，受到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影响。这些人竭力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谬误，竭力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二十世纪的条件等等。

① 《中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文献资料》，1969年莫斯科版，第111页。

② 据查，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时间应为1918年1月。——译者

③ 即青年党。俄文把少年和青年译成一个字。——译者

例如，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欧仁尼奥·里尼亚诺等人）硬说什么唯物史观是同阶级斗争学说矛盾的等等，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抹煞伦理学和人道主义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李大钊越来越正确地评价国际事件，越来越正确地理解十月革命开创的新纪元的意义。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自己编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①对于李大钊来说，所谓新纪元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在别国的反应，而不是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人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才能别开一新纪元。“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②

李大钊认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人类生活不是靠着竞争，而是靠着互助发展的。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把新纪元的到来同工人阶级登上舞台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③

可见，李大钊在1919年一开头，就进一步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受到俄国革命经验影响的缘故。特别有意义的是，李大钊还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虽然还没有完全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但是他从俄国革命中逐渐理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逐渐认清了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1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21页。

前景。

尽管李大钊明显地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一步，但是他当时还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科学社会主义者（例如W.莫里斯）的一些观点。

在1917—1918年间，李大钊逐渐克服了当时很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他仍旧深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众所周知，互助论的矛头是指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李大钊认为，“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①也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学说普遍固有的法则；“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②李大钊公开写道，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自然进化论”是错误的。他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并且断言，“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助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③

李大钊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也反映在他当时否定一切专政上面。1919年1月，他发表《平民独裁政治》一文，根本反对一切专政。因为照他看来，专政必然会使阶级差别永远保存下去。

关于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争论，导致了中国知识界和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他们彼此划分为激进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

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而且日益猛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李大钊那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纯粹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劳工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李大钊的抗议，他要求停止压迫劳工阶级，保障他们的工作。李大钊断言，“须知今后的世界，变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22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20页。

成劳工的世界……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①

在中国，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人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历史的兴趣增长了。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及其学生的活动就反映了这样的兴趣，他们热烈地讨论在中国青年中日益流行起来的社会主义。李大钊的一个学生瞿秋白回忆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②

1918—1919年期间的中国革命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象俄国民粹派。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提要中指出，民粹主义就是“民主主义要素 + 空想社会主义 + 小资产阶级改良 + 小资产者的反动性。”^③在革命民粹派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前两个因素，因此从革命民粹派中出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第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由民粹派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后两个因素。

在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从而导致他们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是，要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变到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实际经验搬到中国大地上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但是，这不应当是一种机械式的搬动，而必须很好地研究中国的实际，了解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

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者里面首先有兴趣研究工农生活的人，他把工农看作是进步的民主派争取美好未来的同盟者。1919年2月，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11页。

② 见《瞿秋白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39—40页。

③ 见《列宁文集》，第19卷，1932年莫斯科版，第237页。

题》一文中指出，“民主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民主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民主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①李大钊从为数不多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力量，并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种力量上面。他在1919年2月写道：“现代的劳工社会已竟渐渐觉醒，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有‘一日工作八时’、‘一周工作四十时’、‘假期休工不停给’种种的要求。”除了这些经济要求之外，李大钊还为“终岁勤动，蠢蠢的象牛马一样不知道人间何世”的工人，补充提出教育的要求。他呼吁为工人创作通俗的文学，多设补助教育机关和适当的图书馆。1919年3月，李大钊发表《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一文，指出煤矿工人受到极苛刻的剥削，号召他们进行有意识的罢工运动。

《青年与农村》一文，反映了李大钊这一时期对农民的关心。他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②李大钊断言：“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这些预言，是在群众性的五四青年运动发动之前三个月提出的。它给先进青年指出了在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李大钊提到了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的活动，他指出，“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农民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李大钊就选举权和立宪问题写道：“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38页。

^② 同上，第146—147页。

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在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文章最后号召中国青年开始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①

同时，李大钊继续宣传中国人还很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夏季为止，被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总共只有三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宣传正好赶上中国民主主义工人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

从1919年5月5日起，李大钊倡议，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专门发表马克思的原著和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由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五月号，全部刊登马克思的原著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李大钊在这期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扼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

李大钊深知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极其贫乏，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接着，他向读者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英国经济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他论述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②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又称社会主义运动论。他着重指出，这三部分理论，是由阶级斗争学说联系在一起的。李大钊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注意到孔多塞、圣西门、梯叶里和其他学者对于历史研究作出的贡献。

李大钊指出，历史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149页。

^② 同上，第176页。

重要；经济现象决定所有其他社会现象——法律的现象、政治的、伦理的现象等等。照他看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论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在文章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论，同时也提到了西斯蒙第、圣西门、普鲁东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李大钊在文章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他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然自马氏昂格斯合布《共产者宣言》^①，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②

李大钊在该文一个专门段落里，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他强调说，“与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斗争说。

李大钊详细阐明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力量状况作了如下表述：“一方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另一方是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③

李大钊这篇文章，是中国著作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第一次尝试。有一些问题，他还来不及详加研究。他的许多结论还带有互助论的味道。例如，他断言，社会主义只改造社会的经济组织，而人类精神的改造只有借助人道主义才能办到；他还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认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是矛盾的；他甚至提出，“劳动价值论有根本动摇的危险”。

但是，大体说来，李大钊这篇文章客观论述了马克思的学

① 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译者

② 见《李大钊选集》，第191页。

③ 同上，第188页。

说。该文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在于同一期《新青年》杂志还向读者介绍了猛烈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章。例如，顾孟余^①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认为法律调整是社会发展的道路；凌霜^②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中，从无政府主义立场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所以，毫不奇怪，向广大知识分子普及马克思主义，反对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庸俗化，很快就成了李大钊的一个主要任务。他特别注意研究的是唯物史观。

李大钊之所以对唯物史观有兴趣，首先是与他具有渊博的经济学知识分不开的，因为经济学知识无疑有助于他加快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重要原理——唯物史观；其次是因为他具有一个概括性强的哲学头脑，并且孜孜不倦地从广泛的实体观察各种现象和事物。这一切都使他能较快地克服所有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特有的唯心史观和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因为他们不仅受本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而且还受斯宾塞、穆勒、黑格尔、埃梅逊观点的影响。

李大钊开始掌握唯物史观，这是一件难以估计其重要性的大事。因为他是善于克服唯心史观并以唯物主义观点理解历史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率先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使之很快得以普遍流传，并获得许多信徒。这件事不仅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到今天还十分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学者（B. 施瓦茨、S. 施拉姆等人）千方百计伪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歪曲唯物史观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发展的作用，包括对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作用，而李大钊在初期也是并非没有错误的。伪造李大钊观点的周策纵之流，正是拚命揪住这些错误加以挑剔，而只字不提李大钊在后来的著作中很快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足之处。

① 发表此文时用的笔名是顾照熊。——译者

② 黄凌霜，又名黄文山，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译者

周策纵沾沾自喜地写道，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国民党人胡汉民，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驳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了答复胡汉民，李大钊又发表了一些论述唯物史观的文章。这些文章证明，李已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周策纵为此不得不承认，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于戴季陶和胡汉民，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戴胡两人则从国家主义立场应用马克思主义。^①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之下产生了“五四运动”，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更积极地从组织上形成了一个激进的左翼，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明显增长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关于对德和平条款的决定。因为根据和约草案，德国一切在华特权（尤其是山东特权）均须移交日本，而对撤退外国在华驻军问题却只字不提。

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四周年的国耻日，学生原定那天举行群众性反日大示威。正当学生准备大示威期间，传来了关于巴黎和会决定的消息。于是学生提前于5月4日走上北京街头，所举的标语口号是：《还我青岛！》，《洗雪国耻！》，《抵制日货！》，《保我主权！》等等。

警察驱散了示威群众。第二天，学生们停止学习，宣布总罢课。5月6日，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其宗旨是“以学生之力，谋国家之富强”。以北京学生为榜样，其他城市的青年学生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展开了。资产阶级代表，特别是那些想排挤危险的日本竞争者的工商业者，也纷纷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特别重要的是，工人和小商人也参加了学生的行动。

1919年6月，北京学生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警察一再加以

^① 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60年美国坎布里奇版，第299页。

镇压。全城戒严，许多报刊被查封。上海七万工人商人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中国其他工业城市也开始罢工，要求停止镇压学生和拒签凡尔塞和约。这些要求使中国的罢工运动第一次带有政治性，虽然其目的还比较狭窄。

这次群众运动，归根到底有两个目的：把山东权益直接交还中国，罢免政府中的亲日派总长。这就是说，运动带有反帝性质。

胡适及其信徒，由于害怕罢工运动扩大和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开始要求停止群众运动。孙中山及其信徒支持学生，反对对学生实行镇压，但是他们认为罢工不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只有以李大钊为首的一小批战友才认为，学潮及随之发生的工人罢工是民众政治运动的萌芽。

李大钊直接参加了这次运动，而且是运动的思想鼓舞者，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具有革命热情的青年。李大钊参加示威游行，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组织北京教职员工会营救被捕学生。

李大钊尽管在1919年日益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还没有完全克服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这明显地反映在他1919年7月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上。李大钊写道：“我们试一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①

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也存在伦理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李大钊确认：“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基础就是协合、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222—223页。

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①

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是，竭力把马克思的思想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结合起来，竭力把阶级斗争学说同互助论调和在一起。李大钊坚信，“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他把新社会同互助联系在一起，认为新社会将建立在“互助的原则之上”，在这种新社会里，“互助精神的火光，可以烧那自私自利的恶萌，使他不能发生”^②。

然而重要的是，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又扼要论述了马克思学说的实质。他写道，马克思“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建设在经济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③接着，李大钊向读者简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发生的原因；谈到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谈到地主资本家阶级为一方，工人农民阶级为另一方；最后谈到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和消灭阶级。他说：“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④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发表半年之后，李大钊又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根据达尔文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研究了道德随物质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又一次扼要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并用大量资料证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都随着社会的物质经济变化而变化。李大钊直接指出，经济对于政治具有决定性的作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222页。

② 同上，第224页。

③ 同上，第223页。

④ 同上。

用。他的结论是：“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①

这篇文章证明，李大钊进一步成功地掌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他还没有确实排除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世界大同论”和互助论）。

1919年夏天，李大钊初次会见苏俄代表布尔特曼（Н.Буртман）。布尔特曼向他介绍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正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发表了许多尖锐的反帝文章，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任务。他在“五四”运动高潮的1919年5月18日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政治》一文中写道：“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的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②李大钊认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所以，中国的仇敌不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是整个强盗世界。李大钊号召人们积极起来推翻这个“强盗世界”。他写道：“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③

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论战加剧起来了。

蔡尚思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展过程时写道：介绍过来的思想“最初多属英法美各国的旧哲学与资本主义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269页。

② 同上，第212页。

③ 同上，第213—214页。

思想；中间则旧哲学与新哲学，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都
有人提倡；最后多属德俄等国的新哲学与社会主义思想。”^① 这样
的思想演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是一场激烈的思想论
战。中国著名共产党人吴玉章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文章
中，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论战的基本内容，作了明确的叙
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在发展着、斗争
着……这两条路线各有它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
因为在当时它们都是新时代和中国新兴阶级的产物，表面上都是
反帝反封建的，因而使人难于辨别是非、认识它们的好坏。其实
这两条路线，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改良主义的；一个是代表无
产阶级的，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是
实验主义的。”^② 除了这样说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思想发展
的两条基本道路之外，还可以补充说，其中一条道路包含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成分，另一条道路则是把民族主义同世界主义成分
结合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时期，除了有这两条主要路线之外，还有许多其
他思想流派，它们主要代表中国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观点。这
些流派的绝大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思想体系，一般仅限于
代表他们那派社会主义信徒（无政府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等）的各种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或者打着当
时流行于中国的均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尼采主义等等旗号。
这些流派都参加当时的思想论争，从而使得论争的场面变得更为
错综复杂，五花八门。情况尤其复杂的原因是，“五四”时期思想
论争的参与者往往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政治上很不稳
定、很不彻底，他们大都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常常表
现得动摇不定。

尽管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如此复杂，左派总算是披荆

^① 见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1950年上海版，第264页。

^② 见《五四纪念文辑》，1950年东北版，第32页。

斩棘地开辟了一条道路，把越来越多的论争者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梁启超1922年就曾指出，“马克思几乎代替了孔夫子的地位。”

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胡适、梁启超等人则代表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改良主义路线。胡适梁启超等人反对激进的革命、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潮社所办的《新潮》杂志的活动，就反映了这条路线。该杂志的顾问胡适，试图用《新潮》来对抗《新青年》。在《新潮》杂志周围有俞平伯、冯友兰、顾颉刚等这样一批北京的青年学生。杂志对俄国十月革命也表示欢迎，它主张“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鼓吹“个人主义”等等。由于胡适的思想指导，《新潮》社社员都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

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前不久发表的文章断言，在中国不应有社会主义的地位，中国所需要的是资本主义。然而，甚至这一派信徒也不敢积极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反对欧美的资本主义。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写道：“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孳生崛起，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①

“五四”运动的矛头就是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反对中国国内的反动派。这次运动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例如，《中国工学》杂志1920年3月发表一篇文章说，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这种经济仍旧处在不自然状态，组织得不合理，现在已经走入死胡同，其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所以西方经济不可救药，其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和苏

^① 见《孙中山全集》，1982年北京版，第2卷，第326页。

俄的兴趣大大增加了。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两条路线的公开对立，反映在一系列重要的论战上，特别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论战上。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思想分歧，早在1918年至1919年初就尖锐暴露出来了。那一时期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

李大钊发表的观点，导致了他与胡适之间的论战，这种论战一直延续到1919年的整个下半年。论战的起因是，1919年7月，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李大钊的观点，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批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改造社会的根本解决办法，他呼吁走改良主义道路，否定马克思学说的作用，说什么马克思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

篮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批评胡适的主张。

为了答复胡适，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

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评论李大钊的文章。1919年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算是对论战的总结。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论战，也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进行。李大钊在论战过程中主张，从实际斗争的革命者，应当用先进的科学理论、“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他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有理想和实用两个方面。李大钊说，只有解决经济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任何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同时，他又着重指出，如果不进行“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不进行阶级斗争，经济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李大钊在结束《再论问题与主义》时，呼吁对

社会进行“根本”的即革命的改造。他写道：“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①

李大钊着重指出，“布尔扎维主义^②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③他呼吁人们研究布尔什维主义，介绍布尔什维主义，把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揭露有人把布尔什维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等等。就在资产阶级报刊把布尔什维主义称作“过激主义”的同时，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李大钊的一位朋友建议翻译几本“过激派”的著作出来，开通开通那些害怕“过激主义”的资产者。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此事，并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为文章的结束：“这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

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再次阐明唯物史观的实质，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他写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④

胡适的一些文章竭力败坏马克思主义，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学理，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写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力图驳倒李大钊的观点，恶意中伤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否定社会主义必然要实现。他呼吁劳动者与资本家互相合作（见《四论问题与主义》），竭力把革命者推上实用主义道

① 见《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第35号。

② 即“布尔什维主义”。——译者

③ 见《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第35号。

④ 见《李大钊选集》，第233页。

路。胡适公然反对采取革命行动，主张必须对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逐步改良”。

1919年底，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论战表面上结束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在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的论战已经停止。

李大钊、陈独秀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激进派，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上的价值》）、俄国的革命事件（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和法国的革命事件（李大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①》），继续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反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陈独秀：《谈政治》）等等。

这些文章及其类似的文章，在二十年代初重新掀起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关于人类生活的争论等等。同“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样，这些争论也是在中国知识界的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进行的。

李大钊与胡适之争，以及中国知识界随后发生的思想论战表明，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后特别加剧起来的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反映了在中国展开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论战，它证明：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由于种种情况，已经在思想上准备好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人民民主革命。

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成了中国国内思想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于从思想上准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革命，起了突出的作用。由于这场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二十年代起就在中国思想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李大钊的杰出贡献就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从日本输入中国第一批关于列宁主义和列宁建党学说的著作。中国人由此获得了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

^① 现译巴黎公社。——译者

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初步概念。^①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第一次重要论战。尽管这场论战（只是一般化的）没有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由于李大钊的努力，论战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加强注意，推动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随着中国对社会主义兴趣的增加，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也打出了社会主义的牌号。所以，1919年夏天，李大钊注意到“假冒牌号的危险”，特别指出亲日派的安福系军阀头子为了进行政治投机而竭力假冒社会主义牌号，因为当时谈论社会主义成了一时风尚。

李大钊当时写道：“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②李大钊这一警告，是很英明的预见，因为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为列强的国家利益而“假冒牌号”，即假冒马克思列宁主义牌号，以非马克思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呼吁：“我们愈发应该……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③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期间，人们对于苏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空前高涨了，对于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的兴趣空前高涨了。

李大钊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各种庞杂的思潮。

早在1919年夏天，李大钊就公开宣布自己拥护社会主义，从1920年初专心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张国焘写道，1920年，“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

^① 参见吴玉章，《我和共产党》，载于《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

^② 见《李大钊选集》，第231页。

^③ 同上。

活动问题。”^①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日益浓厚的兴趣，促使他去深入研究唯物史观，更积极地在中国报刊上论述唯物史观。1920年间，他发表了五篇文章论述唯物史观和社会物质生活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问题。这些文章就是：《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这些文章表明，李大钊是一位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一位彻底的唯物史观论者。他把唯物史观称作“进步的、科学的新史观”，强调唯物史观对中国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传统的史学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

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这篇短文中，李大钊再次论述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并对唯物史观加以肯定。他注意到，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史学家的立场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背道而驰的。这些史学家认为，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才是历史学，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和当权者的政治活动上面。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历史，借助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历史过程。李大钊在结束论文时写道：“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②

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以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相对立，该文已经远远超出了纯学术讨论的范围。李大钊在文中公开呼吁人们“深入了解唯物史观的意义，用唯物史观去解释新社会的必然到来”，^③这就是说，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创造“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

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号召老百姓积极行动起来，去创造一

①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71年伦敦版，第1卷，第90页。

② 见《李大钊选集》，第294页。

③ 李大钊的原话是：“不可以不明白唯物史观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与俄译文略有出入。——译者

种新社会。例如，他写道：“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的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①

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对唯物史观的深信不疑，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导致李大钊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②

李大钊批评有人错误地以政治概括整个社会生活，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经济。

然而，这并不是说李大钊把整个历史过程仅仅归结为物质因素，经济因素。他写道：“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③李大钊认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李大钊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他强调指出，这一说法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变动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

迈斯纳根据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把李说成是一个历史唯意志论者。迈斯纳硬说：“李大钊在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不注意客观的历史动力，而多半去注意人的革命意志，人类的意识。”^④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② 同上，第338页。

③ 同上，第339页。

④ 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87年坎布里奇版，第170页。

然而，迈斯纳这样评价李大钊的历史观，一点也不新鲜。因为，资产阶级伪造者早就对列宁及其历史观作过类似的评价。

1920年，李大钊及其战友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两个不同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以梁漱溟、张东荪和梁启超为首的一派，根据中国经济落后，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理由，呼吁人们回到古代的东方文化中去，即回到封建文化中去，呼吁人们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人数较多的另一派，则积极宣传在中国知识界广为流传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在中国各大城市作了一年多演说的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英国人罗素和美国人杜威的观点，给当时的青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威指出，中国经济落后，所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罗素强调，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所以中国应当寻求以本国固有传统为基础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两位哲学家向中国介绍一种赋予行会以政治职能的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说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能使资本主义有利于整个社会。

李大钊、李达、李季、陈独秀等人，驳斥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解释了马克思学说的国际性质及其应用，其中包括在中国的应用。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1921年)中指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①

在这场争论中，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的问题，首先是与孔子学说有关的问题，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大钊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看待中国传统思想的，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了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356页。

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①

李大钊指出了孔子学说在农业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原因：“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②李大钊指出，由于社会的经济发生了动摇，中国的大家族制度也就崩颓粉碎了，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孔子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它总是把劳动者置于受侮辱的地位，不是导致个性的改善，而是导致个性的受压。李大钊证明，孔子主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他呼吁：“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③

从李大钊关于孔子学说的这些论述来看，资产阶级史学家钟一多（音）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在1973年第二十九届东方学大会上，硬说什么李大钊是通过孔子学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什么中国的古代哲学之中。^④

李大钊有关孔子学说的论述证明，他是在克服和否定孔子学说的道路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李大钊及其《新青年》杂志的战友们，还继续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论战，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想把人民群众引离实现自己要求的道路。1920年，《新青年》杂志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思想和老子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296页。

② 同上，第296——297页。

③ 同上，第302页。

④ 见《远东问题》杂志，1973年第4期。

的某些学说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国家的作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形形色色为数众多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别中间，有不抵抗主义者、新村主义者、禁欲主义者、自我修身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新虚无主义者等等。正如列宁所指出，所有这些派别，归根到底都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①

李大钊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取消政府的论调，他写道：“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②李大钊的追随者和学生——瞿秋白、蔡和森、柯庆施等人也积极地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协助之下，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是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1920年10月）。小组总共九人，其中五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五人把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原则带进了小组，不愿设立小组书记，坚持要李大钊担任小组联络员，而不是担任书记。李大钊与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发生矛盾，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的共同兴趣，积极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把这些人凑到一个小组里来了。小组成员都同意建立一个党，并自愿为党员。几个月之后，小组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选为支部书记。小组提出的任务是，开展工会工作，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外，小组还出版了一个月刊《劳动音》（一共出了六期）。

小组成员委托李大钊发起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秋天，李大钊主持研究会成立会议，会上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

^① 见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19页。

^② 见《李大钊选集》，第357页。

书籍。后来，这个组织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参加研究会第一次会议的总共只有十九个大学生，而到1922年春天已经发展到六十三个人。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议上，李大钊就科学社会主义问题做了演说。

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还积极参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同他们一起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

中国这时的政治局势仍旧错综复杂。1920年，由日、美、英在背后支持的中国军阀战争日益加剧。经过这场战争，段祺瑞下台，军阀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操纵的政府执掌了华北政权。

从1920年11月起，华南另有一个孙中山领导的政府。国内工人运动日益蓬勃展开。到二十年代初，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已达二百七十万。他们生活和劳动在极端艰难的状况之中，毫无政治权利可言。1920年8月，进步知识分子发表了《争自由之宣言》，李大钊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宣言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实际上并未成为共和国。为了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必须让人民参政，让人民获得真正的言论，思想和批评的自由。宣言起草人号召人民不惜一切牺牲去争取自由，要求警察停止迫害争取自由者，坚持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政府当然不予理睬。

1920年11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秘密出版月刊《共产党》，其中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包括俄国）的资料，还载有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该杂志总共出版七期，除上海外，还秘密发行到中国其他城市——北京、武汉、长沙。

1920年下半年，各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上海、北京、广州为工人出版刊物，1921年还为女工出版了刊物。这些刊物都宣传工人要组织起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研究马克思主义，参加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促使中国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工人阶级靠拢。1921年初，李大钊开始在华北工人中进行实际工作。在李大钊直接参与之下，第一批

工人组织建立起来了。1921年1月，他为刚成立的铁路工会的工人演讲。后来，又积极协助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这一年夏天，各共产主义小组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其任务是成立工会和领导罢工。

1921年初，李大钊读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译成中文的俄共(布)纲领之后，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得“非常出色”。他认为，中国应该尽快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完美的大型组织，即象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所组织的那种工人政党。同时，他预先警告，这样的工人组织应当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有根本的区别，不应当是改组的党。

李大钊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关心组织成员的教育，是“中国社会大改革”的基础。他在《曙光》杂志上论述了尽快建党的主张（1921年3月）。

1921年初，中国共产主义信徒虽然人数还少，理论准备也不足，但是把各共产主义小组结合成一个统一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李大钊及其战友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向革命民主力量的优秀代表揭示了引人入胜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帮助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大量庞杂的理论区别开来，向他们揭示了苏维埃俄国的经验。

二十年代初，李大钊成了中国的世界劳工问题的最大权威。正因为如此，1921年上海《申报》在创刊五十周年之际，约请李大钊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可是，李大钊为该报写了一篇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登载在该报纪念文集——1923年上海出版的《申报之最近五十年》上。

李大钊在该文中注意到，巴黎公社是法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他不仅叙述巴黎公社的历史，揭示其发生的原因，而且还向读者介绍了巴黎公社所实行的第一国际的一些政纲。李大钊写道：“巴黎的人民在‘巴黎康妙恩’(The Commune of Paris)

名义之下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谁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又在伏尔加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①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李大钊早在二十年代初就认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工人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都在蓬勃发展。李大钊和大多数共产主义者那时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上面，所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就成了特别受人注意的迫切问题。

早在北京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李大钊就认为必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吸取共产国际的经验。李大钊之所以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是因为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并科学地理解中国革命的经济基础。

1920年，李大钊与邓中夏主持召开中国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

李大钊的国际主义精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苏俄的友好感情上面。1920—1921年间，他为承认苏俄发动了广泛的运动。在他的积极参与下，成立了中俄友好协会。李大钊召集群众大会，不断在报刊上宣传同苏俄友好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因为苏俄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

必须指出，早在1920年底，李大钊就有兴趣研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始热烈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列入自己的《临时纲领》，从而导致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小组。

二十年代初期，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早在那时，中国就有人竭力败坏唯物史观，以唯心史观与之对抗。例如，朱谦之1921年发表《革命哲学》一书，主要是批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这种新哲学史观的创始人朱谦之，把自己的学说称作新虚无主义，实际上是鼓吹极端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447—456页。

的无政府主义。他写道：用“新虚无主义”代替无政府主义；最彻底的革命，在把宇宙的一切组织都推翻，几时到无天无地，无人无物，这才是归宿；一旦实现无政府主义革命，就将轻易实现“彻底毁灭的伟大事业，把整个地球夷为一片平地”。

1921年，当中国刚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朱谦之就断定，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对二十世纪的青年已经失去意义（《十九世纪的残余思想》），必须代之以虚无主义。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是，“证实唯物史观的根本错误”。朱谦之认为，只有产生了精神上的需求，也才有物质上的需求。物质需求不能没有精神需求而引起变革。所以不能用唯物史观去解释革命。根据朱谦之的观点，革命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产物，所以他千方百计证实“唯心史观的意义和价值”，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

到1921年，李大钊基本上克服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坚定不移地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成为中国第一个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的这一转变，是有许多主客观原因的。首先是因为中国不仅日益发展了资本主义（正如我们所见，世界大战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日益卷入国际经济关系。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还发展得不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懂得，“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①工人运动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这种思想。

正如我们所见，俄国十月革命在这一转变中起了重大作用。它促使早在1917年之前就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的李大钊特别关心马克思主义，最初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深入研究的对象，然后是广泛加以宣传。

另一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大失所望，越来越怀疑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他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356页。

们或多或少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如上所述，社会主义已经成了热烈讨论的问题。

《学术月刊》写道：“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看作是可以救中国的真理。民族危机越严重，这种学习西方的热潮也表现越加高涨、越加激烈。但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也都失败了。”^①

1920年，瞿秋白指出，在“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②

此外还必须注意，中国知识分子也日益对中国的传统思想采取批判态度，特别是表现在李大钊身上。所以，认为李大钊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中国固有传统的有机结合”^③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李大钊是一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哲学头脑的渊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这些都有助于他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原理，并迅速克服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不免要产生的错误。

李大钊参加实际活动，与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工农密切联系，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这些活动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它们使李大钊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使他直接感触到各种理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缺陷，从而日益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译自B. A. 克里夫佐夫、B. A. 克拉斯诺娃：《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1978年莫斯科版，第72—110页。

郑厚安 刘佐汉 译

① 见《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第10页。

② 见《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页。

③ 见W·鲍尔：《中国与命运之希望》，1967年慕尼黑版，第150页。

华莱士使华前后^①

罗伯特·菲斯

中苏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问题

在1944年2—6月中国抗战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共产党发展起来了。他们对重庆所提的许多意见和要求，投以轻蔑和冷淡的眼光。美国大使馆和史迪威总部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他们越来越确信国民党政权将要垮台，因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生活更加悲惨了。日军在中国正规军和共产党游击队聚集的地区畅行无阻，长驱直入。他们利用铁路运送军队，而这些铁路共产党本来是能够破坏，使日军无法利用的。

处于支配地位的国民党人比以往更加深信，共产党迟早会设法控制全中国——他们认为；这大概要到国民党被战争进一步削弱，苏联军队占领毗邻地区的领土之后，才能实现。因此促使他们消除这种危险的想法仍然十分强烈。但蒋委员长忠实地坚持他去年9月所宣布的立场：要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国民党宣传部梁部长于1944年2月证实了这种态度，他对外国记者说：“统一和以政治方式解决目前困难局势是我们已宣布的政策。因此没有理由使外国认为，此种问题无法以政治方式解决。以政治方式解决是中国政府热切真诚的希望。所以我们不想谈这个问题。”

然而政府依然保持着（或许还扩大了）封锁共产党区域的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其数量据美国大使馆1月份估计，大约有四十万，

^① 这是《中国的纷争》一书的第14—17章，标题是译者加的。——译者

其中有些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中国国内的这种分裂局面既减低了它在缅甸作战的努力，又削弱了保卫美国在华空军基地的能力。同时，如前所述，中国人民正在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更多的帮助。因此不可避免地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无法将中国这两部分互相对抗的军事力量撮合在一起，投入对日作战吗？史迪威和美国陆军部都认为，应当另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五六月间，虽然缅甸战事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日军进攻势头很猛，美国政府还是开始以直接和间接的办法从中斡旋，以实现上述目的。它试图使蒋介石相信，把全国的一切军队都用来抗日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又力求取得斯大林的帮助，使中国内部的冲突缓和下来，这也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不过这种双重努力的活动是散乱的，不紧凑的。白宫、国务院和陆军部都参加了，但他们之间缺乏协商配合，也不注意互通情报。

到五六月间，整个中苏关系又使人因疑虑而感到困惑。总统和国务卿都感到纳闷：他们自认为在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所已做过的努力，是否将要付诸东流。

美国在这些会议上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中苏两国达成一项协议，以防止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蒋介石一如既往，不大相信苏联真的会丢开中国而不插手。他和他的集团的大部分人对此都格外忧虑，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境不利，丧失人心，以及军队存在缺陷。他们确信，莫斯科与中共存在着密切的和秘密的关系。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共顽固拒绝将自己的军队和政治组织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原因。他们的这种疑虑，可以拿蒋介石3月17日给总统的信作为例证，信中说：“……中共虽佯装支持政府抵抗日本侵略之政策，但自2月以来，即从各地秘密聚集其游击部队，并集中于陕北，显系待机反叛，而攫取黄河流域之作战基地西安。此种迹象甚为明显。如客观考虑问题，中共若未与苏联达成某种谅解，似未必敢贸然采取此种行动。”

当时已发生新疆事件。苏联飞机3月份沿该省与蒙古边界对

中国军队进行扫射，打死中国军人。据我国驻华使馆报告，这些部队是追击逃亡的中国人的，按中国政府的说法，他们都是反叛分子。苏联政府则声称，中国政府军越过了外蒙边界。中国政府对此加以否认。不管事实如何，苏联的这种行动是粗恶的，而且似乎预示看一种怀有敌意的目的。蒋介石给总统的信就是这样分析的。他征求总统的意见。总统和国务卿都认为，这一事件大概是被不成比例地夸大了。^① 总统4月8日的复信对此未明确表示态度。复信指出，自3月以来，再未发生冲突，并对苏中双方在盟国中影响团结一致的任何行动和态度都表示遗憾。作为一个实际的现实问题，复信建议把“最近发生的事件搁置起来……”，任何一方都不放弃任何主权和权力，问题等战争结束后处理。

华盛顿对这一插曲的处理似乎是恰当的，因为在新疆所发生的纠纷平息下去了。中国政府调动更多的部队进入该省未遇到困难；蒋介石也谨慎从事，避免在新疆或新疆外蒙边界与蒙古人发生任何冲突。但苏联政府提出要求，要中国赔偿它遗留在该省的财产。更碍事的是，与此同时，苏联要求对抗日初期运往中国的供应物资和武器装备付款，款项的支付又要以经俄国土耳其斯坦的陆路向苏联运送战略物资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战略物资盟国正试图筹办。

为这一运送物资路线而设想的各种良好方案都失败了——时而是这种理由，时而又是另一种理由。于是在1944年上半年，美

①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国务院中国处倾向于将俄国人袭击中国军队并顽强维护此一行动的目的解释为：要明白表明苏联的意图，即不许中国试图再把权力扩展到外蒙，并表明他们要维护外蒙的彻底独立。

至于中国政府夸大这一事件的动机，有各种不同的分析：

- (a) 确立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无可争辩的控制；
- (b) 考验苏联对外蒙的政策，可能也要考验苏联将来对中共、对新疆和对满洲的态度；
- (c) 试图在国内激起反苏情绪；
- (d) 重振民族主义思想，转移目标，将国内对政府失败的注意力引开。

这些分析都是1944年5月19日为中国处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系统地加以阐述的，该备忘录题为《美国对中苏关系的政策》。

国要求苏联政府同意经这一路线派遣一个大型卡车运输队，为战斗在中国的第十四航空队运送供应物资，第十四航空队的作战人员都是美国人，他们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要留在中国。这一要求是哈里曼4月22日向莫洛托夫提出的。但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回答是：苏联政府正在考虑；同意的可能性甚微；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的行为一直很差。

引起中国人不信任的另一个原因是3月30日苏日关于萨哈林岛(库页岛)渔业协定的签订。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这两个强国已达成协议，互不进行战争——尤其是由于苏联从西伯利亚向西方调动军队，就会使日本调集大军南下进入中国。^① 白宫和国务卿对这种问题也同对其他问题一样，都持保留态度。他们不相信苏联与日本已在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取得和解。赫尔找不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关于萨哈林岛的协议与日本调动军队或日本抚慰苏联之间有任何联系。^② 而且国务院和陆军部研究了驻华大使馆和武官的报告之后，都认为中国政府关于日本从满洲调动军队到中国的估计是不现实的，是夸大之词。^③

总而言之，总统和国务卿都一直不相信蒋委员长对苏联的怨言是有根据的，也不认为他的担心有足够的根据。他们倾向于同意高斯大使的意见：蒋介石是在尽情流露他那激奋的困恼心情，为的是要我们给他更大的帮助和积极的支持。因此他们在四五月间想法使委员长平静下来，使他从整个战争出发，习惯于与苏联和睦相处。但委员长一直平静不下来，他执拗地表示担心，认为一旦可能，苏联即会援助中国共产党，并把它的势力扩张到中国边疆地区——内蒙、新疆和满洲，或控制这些地区。

① 见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与美国大使会谈备忘录，以及中国驻美大使与赫尔国务卿的会谈备忘录。两者都在4月进行。

② 见国务卿5月3日给美国驻莫斯科和重庆的大使馆的电报，这封电报记述了4月29日国务卿与中国大使的谈话。

③ 见国务卿1944年6月15日给高斯大使的电报。如第13章所说，中国人的各种估计之间差别甚大，而且美国人对他们的一切估计显然都表示怀疑。

总统在决定付出更大的精力注意这些问题时，一直很感烦恼。在他看来，中苏之间并无根本的对立，因此应当有可能促使他们友好谅解，而且这样做对盟国也极为重要。于是他便要求华莱士副总统前往中国与蒋介石会谈。5月份，当哈里曼在华盛顿时，总统要他返回苏联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会谈。

6月10日晚，哈里曼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①这是盟军首次在诺曼第登陆之后的第四天，这几天显示了盟军的磅礴气势与进攻力量，而且由此也开辟了苏联所渴望的第二战场。一开始，哈里曼大使回顾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曾经说过，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团结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这种说法。然后哈里曼又说，总统认为应当鼓励蒋介石，首先使他想和北方的共产党和解，好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其次是使他在国内放宽政策。斯大林评论说：“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之后，他似乎要使自己比通常更畅所欲言一些。他重新肯定了他的看法，即蒋介石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因此必须给予支持。但他又感到这个最佳人选并不太好。他认为蒋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战斗不力，并举出事例加以说明，这些事例有的可能是公正的，有的可能不公正。他有一种印象：蒋介石周围的许多人都是些无赖，甚至是卖国贼，因为重庆所发生的一切，日本人似乎瞭如指掌。他吹毛求疵，说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他认为这是愚蠢的。他说——据备忘录记载，他发出哈哈大笑声——因为“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②共产党。但他们却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他们是抗日的。”^③

① 这里所作的关于这次重要谈话的说明，引自美国驻苏大使馆的爱德华·佩奇所作的备忘录（他当时是译员），又是对哈里曼6月11日给总统报告的释义。

② margarine，人造黄油。——译者

③ 斯大林对中共的这种说法以后在各种不同的时候还重复过几次，是否真实，大有推究的余地。这可能是反映了过去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及策略上的若干分歧。见许华茨：《中国共产党人与毛的兴起》。毛的纲领与苏联的农业合作化不同，是以在千百万贫苦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为基础的。

哈里曼征询斯大斯的意见，并说他所考虑的是美苏联合的对华政策。斯大林似乎是要我们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应当而且也能够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因为英国和苏联都无法起到这种作用。他建议，我们美国人应当使蒋介石更加完全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坚持要他将那些阴险狡猾的助手排除掉，起用要抗战的较为年轻的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应当是灵活的，准备支持那些优秀的新人物，如果他们出现的话。然后斯大林相当详细地谈了新疆与外蒙之间新近出现的麻烦问题。他说，虽然目前那里局势平静，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件，苏联将应邀武装支持外蒙。最后，他谴责蒋介石周围的人散布流言蜚语，说苏联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搞秘密交易。他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这是胡言乱语。他再次肯定，苏联的对华立场，仍旧建立在1924年对华友好条约的基础上。^①

哈里曼立即向总统送去一份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但国务院好几十天都未得知这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在此期间，它又在6月15日向高斯大使发去一项指示，广泛阐述了它自己关于挽救中国军事危局和改善中苏关系的意见。

6月15日的这一指示是国务院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日军在中国进攻的严重性和中苏两国政府之间裂痕的扩大逐步有了深刻的印象。它处理这些麻烦问题的办法已在6月初给驻

“冒牌共产党”一词不过是几种说法的一种，使人想起伪制品，他不时地用来描绘中共，使美国来访者感到茫然。1945年9月，他对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议员团的成员们说中共是“来路不正的”共产党。译员是可靠的。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说过中共是“红萝卜”式的共产党，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

- ① 苏联在华盛顿的新闻记者此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他们对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表示关心，指出，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苏联对日作战中具有战略重要性，因此对苏联军队来说，利用这些地区和中共部队是很自然的。但他们又解释说，苏联政府害怕这样做，因为这会与国民党之间引起麻烦，并被美国说成是要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苏联政府不希望在与中国问题上与美国政府引起麻烦。见国务院远东司的斯坦顿1944年6月2日所作的关于他和巴兰坦同沃尔特·李普曼之间一次谈话的备忘录。

莫斯科和重庆的大使的备忘录中预示了。^①其主要之点是：

1、新疆和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应当这样对待这一问题。

2、最好是承认既成的实际状况，即外蒙自治这一事实。如果中国政府试图控制这一地区，苏联完全可能进行抗争。

3、朝鲜应当独立，该国人民理应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其政体。

4、我们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主要政权。它在盟国事业中已尽了很大努力，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但中国此时还能在战争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国将所有军队（不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都用来进行对日作战。此外，美国政府不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它并不关心中国的两个对立集团之间的主义之争，它所关心的是在中国实现一项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纲领。

5、美国政府要求中苏两国政府继续保持友好同盟，因此希望双方考虑对方立场和利益时都能以宽厚为怀。

这就创造了一种朦胧而又宽厚温和的气氛，从这种气氛中出现了美国对中国政府所提要求的反应：中国政府请美国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并请美国运用自己的影响赢得苏联对中国的好感和善意。6月1日，高斯大使将这些要求中最强烈和最确切的部分送交华盛顿。这就传递了一种信息，表明中国陆军部长对中国“岌岌可危”的军事局势的极端焦急心情，并转达了一种要求：请美国军事当局考虑，设法劝告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边境采取行动，使日本无法从满洲继续向关内调兵。美国又作出了另一种努力，斯退丁纽斯忧心忡忡地告诉前驻日大使、暂任远东司长的格鲁，要他想法缓和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并阻止中国强烈反苏情绪的增长。

^① 这是中国处5月19日题为《美国关于中苏关系的政策》的备忘录，过去已经提到过。国务院得知总统要哈里曼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商谈中苏关系，特别是莫洛托夫埋怨重庆政府之后，于6月3日将这个备忘录用航件寄给哈里曼。但哈里曼于6月10日与斯大林会谈之前是否见到这个备忘录，则是有疑问的。另一份同样用航件于6月7日寄给了高斯大使。

6月15日，美国督促高斯大使实现上述想法，要他支持陆军部在激励中国防御日军进攻和阻止中国反苏宣传方面所作的努力。并通知他，国务院认为，建议苏联采取行动牵制日本从满洲抽调军队是不合时宜的；苏联能否这样做，如果这样做，此种恐吓行动能否奏效，都是有疑问的。国务院认为，它倒能够向蒋介石及其幕僚指出，如果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部认为应将中国可以作战的军队全部用来抗日，中国的局势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因此，除其他措施外，他可以强烈要求：（1）更加充分地运用中国装备较好的军队进行抗日；（2）国民党当局与中共达成协议，结束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将双方的军队腾出来进行对日作战；（3）由中国人采取步骤，实现与苏联较好的谅解和较密切的合作。这一忠告要用一项有份量的声明表达，大意是：美国因须忙于欧洲战事，无法迅速向中国增加实质性的援助；只要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就不能指望苏联给国民政府以任何帮助。①

劝国民党政府自助并与中共和苏联这两个可怕的政权实现和解的这一忠告，对于它的接受者来说，肯定是严峻的。就在高斯向史迪威说明军事形势时，华莱士到了重庆。高斯按国务院的指示，将这封电报的内容告诉了华莱士，等待他与蒋介石会谈的结果。这时高斯只充当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哈里曼在离开莫斯科前往塔什干迎接华莱士之前，通知莫洛托夫，他要将与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告诉华莱士副总统。他认为华莱士将会对这位大元帅的观点极感兴趣，特别是关于“冒牌”共产党的观点。在另一个问题上，哈里曼也想为华莱士的工作减少

① 给高斯大使的这封电报指示，是由国务院中国处起草，经格鲁、斯退丁纽斯和赫尔批准的。其中似乎有两个互相结合的目的：缓和中苏之间恶化的感情；帮助美国陆军部处理中国要求立即给予较多军事援助的问题，并帮助该部实现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军队的愿望。指示的内容曾与陆军部讨论过，并让高斯向史迪威总部说明这一指示中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各条。同一天，6月15日，国务院将高斯最近的报告和这一指示的大意电告在莫斯科的哈里曼，以指导他与苏联政府的会谈。但哈里曼已离开莫斯科，前去迎接华莱士副总统。

阻力。有一个时期（这点以后还要谈），驻华美军总部一直想获得蒋介石的同意，派遣一个美国观察组去延安。哈里曼曾告知莫洛托夫，美国正在为此作出安排，并说，如果此事办妥，将与苏联政府共同利用该团获得的情报。可以推测，这也是哈里曼提防苏联可能提出异议；他或许还想看看，如果美国政府向延安派出这样一个使团，苏联政府是否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莫洛托夫对此似乎未加评论。哈里曼在塔什干见到华莱士，并将他刚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华莱士。^① 下一步就是缓和中苏关系，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国内的纠纷。

华莱士使华

3月初，当总统第一次建议华莱士前往中国，看看有什么办法打开局面时，华莱士并不认为这一要求有何重要意义。但当他确信总统确实感到有此需要时，遂表示同意。他还想去莫斯科与印度。总统认为这并不适宜，但又说，访问一下西伯利亚，看看那里的工农业生产活动，对他来说或许不错。

赫尔国务卿对此行颇感担心。他暗示说，如果华莱士不去，他会更高兴。但当华莱士写信告诉他，如果有几个懂中国话、熟悉中国最近事务和中国人物的人陪同，对他将有很大帮助，并要求国务院指定几个具有此种条件的官员陪他同行，赫尔同意了。选择的是不久前在重庆工作、此时任中国处长的约翰·卡特·文森特（范宣德）。此行的其他成员是：对外经济管理局苏联供应处能讲俄语的约翰·N·哈扎德，和战时情报局的官员欧文·D·拉铁摩尔，他长期研究中苏边境的亚洲腹地，写过许多这方面的著作。

华莱士是被派去安抚蒋介石，鼓励蒋，并说明盟国间要互相

^① 6月15日至16日，哈里曼在塔什干过了两天，17日与华莱士在阿拉木图度过，然后华莱士动身前往重庆。

信赖的。总统解释说，他第一次感到担忧，怕中国国内的团结坚持不到战争结束。然后告诉华莱士，要尽可能使国共两党军队之间停止作战。^①其余的问题，让华莱士根据他的认识去处理。他无权作出许诺和决定，只可作解释和提供劝告。当他和哈里曼在塔什干相见时，哈里曼反复报告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中国局势的全部讲话。

华莱士先到东西伯利亚各地和外蒙古旅行。在那里他访问了农场和农业实验场，并发表演说，诚挚地谈了美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认为听众与他分享了这种感情。

在这种短暂热情的旅行访问之后，他就急忙前往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渴望美国的支持和友谊能得到证实，而华莱士的到来即被看作是这种支援和友谊。他们被艰难困苦所困扰，他们的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正在溃退。有许多迹象表明农民所产生的不满；学生、知识分子和政府职员因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正在转向存在于北方的政权。美国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供应物资继续空运，飞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巅，运进中国，第十四航空队正在昼夜不停地飞行，想破坏日军的进攻。史迪威已回到缅甸，正在奋力使那里雨季的战役进行下去。

华莱士与蒋介石的会谈是诚恳的、广泛的。他们第一次见面寒暄之后即开始会谈，一直继续到委员长在机场送他回国。^②会

① 见华莱士在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证词，1951年10月17日。这种说法为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5月24日或这一天前后给格鲁的备忘录所证实，备忘录记载了总统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总统在内阁最后一次会议上作的，说明他派遣华莱士的理由，以及他希望华莱士所取得的成果。这个备忘录对一个可能是令人困惑的解释作一个令人困惑的记载。

② 我这里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资料来自：(1) 约翰·卡特·文森特所作的1944年6月21—24日华莱士与蒋介石会谈梗概笔记，此笔记已作为《中美关系》的附录43发表；(2) 一份分作两部分的电报，此电报是6月26日华莱士在昆明起草的，于1944年6月28日从新德里发给总统，报告了会谈中的主要问题和他的主要印象，后又概述要义，作为附件，附在华莱士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见1951年9月24日《纽约时报》；(3) 1944年7月10日华莱士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见1956年1月9日《纽约时报》；(4) 华莱士的证词，见《听证会，太平洋关系学会》；(5) 华莱士1951年9月19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信；(6) 华莱士的信，见1953年1月9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谈是不系统的，他们详细讨论的问题和略而不谈的问题，都没有任何预定的程序。因此说明会谈内容梗概的摘要，可能从两个相反的方面使人误解：可能使人感到会谈似乎比真实情况更连贯更明确，也可能未表达出这两个人态度上的前后基本一贯性。也未表达出他们会谈系列的连续性，尽管这种连续性是松散的。我还没有什么好办法鉴别它的实质。

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

6月21日华莱士第一次与蒋介石及宋子文会晤时，提出问题的方式似乎有点蠢。他说，罗斯福总统曾和他谈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总统设想，因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没有什么不可更改的事”。而且总统说，如果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搞不到一起，他们可以“请一个朋友”帮忙，并且示意，他，罗斯福，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蒋介石在首次会晤中不愿详谈这一问题，遂让华莱士继续谈论这一问题的其他方面。但等到第二天第二次会谈时，这位委员长便以外交照会的措词，“大发中共的牢骚”。在他看来，美国不了解问题的真象；有些美国人（他还举了例子）正在严重地为中共宣传所左右；他说，这不仅是他个人对中共的看法问题，中国人民就不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而是受第三国际支配的“国际主义分子”。他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应对中国的许多灾难和目前中国的困难负责；他们的颠复活动正损害着人民的道德和军队的士气。更有甚者，他认为共产党实际上是希望中国的抗战事业破产。当华莱士对此种说法表示困惑不解时，蒋介石作了解释。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共产党不希望打败日本，而是他们确信，日本将被打败，即使中国崩溃也在所不惜。因此他们想方设法使国民党在战争结束前垮台，这将使他们获得政权。他们知道，如果和平到来时，国民党仍在控制局势，他们就要失掉机会。

华莱士将哈里曼与斯大林谈话的某些内容告诉了委员

长，文森特告诉宋子文的还要多些。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蒋介石接下去谈论这一问题时或许有可能将斯大林的“冒牌”共产党一语放在心头。蒋介石说，共产党用心机敏，他们正在散布一种印象：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不过是土地民主改革者而已；他们也不依附于苏联。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假的。正相反，中国共产党比俄国共产党更共产党。^①华莱士不愿对如此理解中共的真正性质以及他们的意图如何展开争论。或许是由于对这种说法感到怀疑和无法断定，他似乎中止了这一话题，因为接着他就开始讨论与中共谋求一致的可能性。^②

蒋介石概括地回顾了近期的谈判。他说，在可以接受的协议中有两点是决定性的（这两点他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两点是：共产党放弃独立的军队，使其成为国军的一部分；放弃对中国国土的独立控制，使其成为中国统治的全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愿意做这两件事，他就保证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大赦，与其他中国人同等对待，他们并有权作为合法政党进行活动，有集会与言论自由。他声明，他将就这些条件继续谋求问题的解决。如果达成协议，他就能够比较预期为早地实现他的民主纲领。他敦请华莱士让罗斯福总统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宣传顾虑极大，这种宣传正在试图利用美国的舆论，迫使国民党屈从共产党的要求。^③如果美国对共产党表示冷淡和敬而远之，那将是大有助益的。

① 会谈备忘录告诉我们，他说到这里时哈哈大笑。“哈哈大笑”这个词曾被用来描绘斯大林称中共为“冒牌”共产党时的神态。

② 1951年10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华莱士在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会议之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说，他与蒋介石的会谈“目的有点互相矛盾”，因为他感到在呈现出一派“打赢战争”的气氛中，很难理解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共事。

③ 这种宣传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在重庆的许多美国记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紧张，而与共产党在重庆的总部的关系则和谐愉快。许多美国记者不信任政府的声明，对它的压制与新闻审查表示愤慨。对比之下，共产党代表倒能制造一种瞒骗的气氛，表明他们的谈话是坦率豁达的，他们的声明是可靠的。关于这种情况的有趣细节，莫拉德在他的《失去的和平》一书（1949年版）的第40—41页有所论述。他评论说，在重庆的共产党首席代表和谈判者周恩来很惹人喜欢，他热心，不装腔作势，而且机敏。魏德迈后来也说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洒

华莱士转了话题，问道，即使无法在政治上达成总的协议，是否也可以在“较低的程度”上做出某种安排，这将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利用在北方的军事力量。这是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人所共知的愿望相一致的。蒋介石回答说：“请不要催逼，请你了解，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并无助益。”第二天（6月23日），华莱士又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次是从需要采取一切步骤迅速结束战争和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出发谈的，蒋介石的答复依然如故。他说，美国军队的态度支持了共产党。正如头一天他已说过的一样，他认为美国军队不了解共产党是多么大的一种威胁，他们过高估计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他继续埋怨说，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军队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政府与共产党和解，但并不对共产党施加任何压力，使他们顺从政府。华莱士回到美国之后，是否愿意把他们应当这样做这一点搞清楚？

会谈的最后一天，6月24日，当蒋介石和华莱士乘车前往机场时，又谈起了与共产党各方面的关系。他似乎感到需要对他违背罗斯福总统愿望一事进行辩解。他重复说，共产党没有诚意；他们的签字是不算数的；他们并不实现自己的诺言。但他又继续说，他希望能转告罗斯福总统，在考虑成熟后，他愿意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他，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过总统应当知道，他可能纠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无论如何，委员长还是希望华莱士转告总统，他要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的局势，而且只愿以政治方式对待局势。这是一个使人感到清新的诺言。

华莱士向总统报告时得出结论说，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一事，因“受偏见的影响太深”，他看不出有什么满意的长期解

脱……英语讲得很好”。魏德迈又说他是一位公认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人。见美国参院第82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武装部队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关于质询远东军事形势及有关免除该地区军队统帅麦克阿瑟任务的事实证词，〈远东军事形势〉，美国政府印刷所1951年版，第2300页。以下引用简称〈联合委员会关于远东军事形势〉。

决的可能性。

中苏关系

蒋介石断定，中共与他们的莫斯科阴谋同伙有密切的联系。但他并不因此认为与苏联政府达成谅解是无用的和不可能，从而排除这种机会。他在这一问题上滔滔不绝的谈话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在对待这一问题时感到了中国的虚弱。

华莱士副总统在6月21日开始谈论这一问题时谈到，一切可能导致苏中冲突的问题都应当解决；他认为苏联在远东没有领土野心。^① 蒋介石立即回答说，他希望问题求得一个解决。他急忙继续说（这或许超出了华莱士所说的和所想的），罗斯福可作为他们之间的公断人或“中间人”。这种有准备的反应使华莱士不知如何说才好。他想了想，然后对蒋介石说，总统并未提出要充当公断人；他也不认为美国政府能够充当“中间人”，或成为任何协定的一方或保证人。但他继续说，他认为美国政府愿意以它的斡旋把他们聚合在一起。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想看看，在斡旋、牵线和公断之间划出和保持一条界线究竟有多困难。

委员长流露了一种与这个具有威胁性的北方邻国搞妥协的几乎是热切的愿望。他说，中国政府不愿廉价出卖主权来避免冲突。但由于认识到值得签订协定，所以他愿意有机会早日与苏联政府进行会谈。他说，他还是希望找到某种途径，以便能在美国的帮助下看到会谈取得成果。顺便说一句，他所表示的这种愿望是通向雅尔塔会议的手段。

关于6月23日所谈的这一问题，会谈备忘录写道：

“蒋委员长请华莱士先生转告罗斯福总统：‘美国如能使苏

^① 两天之后，华莱士以提到苏联曾向罗斯福表示要在远东有一个不冻港的愿望的方式修正了这种说法。蒋介石，正象他告诉华莱士的那样，早已熟知这件事，并已在开罗告诉罗斯福，如果苏联愿在远东与中国合作，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同意这种要求。两人似乎都未提到苏联的其他愿望，这些愿望罗斯福总统从开罗和德黑兰回国后不久即通知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国之间出现较好的关系，并能促成中苏代表的会谈，蒋委员长将非常欢迎这一友好协助。’美国如愿‘发起’召开这一会议，蒋委员长将进一步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达成一项协议。希望能召开一次关于太平洋事务的会议，而美国则是召开这一会议的合理场所。蒋夫人插话建议将这一会议称为‘北太平洋会议’。文森特先生问道，是否不要把相互有关的问题混为一谈，而是分别谈为好，即中苏代表讨论他们之间的问题，北太平洋沿岸各国则讨论更为广泛的问题。他说，让中苏会谈先于任何北太平洋会议是可取的。宋子文博士说，可以假借北太平洋会议的召开进行中苏代表的会谈。华莱士先生说，宋博士如能在华盛顿奠定这一会议的基础，将大有裨益。蒋委员长说，他在重庆很忙，抽不出空，又笑道，孔祥熙博士已去，蒋夫人也打算去，宋子文博士是他向美国人讲话的唯一代言人。”

顺便说一句，华莱士的努力与他的同事是合拍的。哈里曼根据总统的命令，也在寻求途径和机会，把中苏两国政府拉在一起。赫尔国务卿也是如此。他力求通过同盟国使他在莫斯科时已被认可的原则声明成为一个政治关系和道德规范的新体系。他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强调了他的信念：中苏达成一项协议对于战后一切安全计划都是重要的。赫尔认为它们之间的分歧不大，他还告诉魏道明，斯大林的态度是善意的。他建议说，私下会谈比正式会谈能取得更多的成果。^①

军事形势

华莱士清楚，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作战是失望的。他发现蒋介石也为此感到苦恼，但又不打算承认过失或接受指责。华莱士提到，有报告说，政府军队在河南战役中不战而逃。蒋介石承认这些军队战斗不力，但又以他们为自己家庭的苦难烦恼和装备不足来解释这种行为。而且他暗示说，如果他的军队有时放弃战

^① 见赫尔1944年6月24日与魏道明和孔祥熙博士会谈备忘录。

斗，也不应引起很大的惊异，因为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一直战斗了七年，由于得到国外的援助太少，他们感到被抛弃了。他回顾说，在开罗时，他已告诉罗斯福，那年春季在缅甸进行一次全面的战役很重要，这会援救中国军队。他继续说，他已告诉罗斯福总统，不如此就别指望中国继续有效地抗击日本。这次全面的进攻——包括从南方两栖作战进入缅甸，在开罗已经决定；但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完全改变了；所展开的攻势并不是一举击败敌人的攻势，而且滇缅公路也仍未打通。如果所进行的是他所要求的那种战役，中国军队就不会遭受现在这样的失败。“最近形势的发展证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在批评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但……他希望提醒罗斯福总统，他，蒋介石，当时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稳妥的。”他的这种见解对开罗会议情况知之甚少的华莱士，可能是一个突然袭击。华莱士似乎不是要探讨这种军事上的失败责任归谁和原因何在的问题。

在华莱士启程之前他们乘车前往机场时，蒋介石更加镇静自若地回到这一话题。他再次要求提醒总统，开罗计划改变之后，他就已预见到现在要发生的事；但中国并未垮台，局势实际上并不象他当时担心的那样糟。这种对局势的见解证实了史迪威和高斯的印象——蒋介石更加焦虑的是中共，而不是日本人压垮他们的可能性。

在华美军

讨论军事形势自然把蒋介石引向驻华美军的问题。他明显表示了他的苛评情绪。他说，驻华美军军官不信任中国军队，而这种态度是有害的。他认为这也是在鼓励共产党。他说，他本人“对自己的军队依然有充分的信心”。他希望华莱士这样转告总统。华莱士以论述中国异常信赖委员长作了回答。他没有说明，许多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似乎并不是对中国士兵的战斗力的信心（如果食品充足，组织和领导得好，他们是有战斗力的），而是对军队

的指挥缺乏信心。

委员长乘此机会表明，他与史迪威的关系是多么不能令人满意。①在谈到他与美军强加给他的这个人打交道时产生的一大堆麻烦中的最近一个麻烦时，他举了史迪威在河南战役初期阶段拒不同意他要求将飞越喜马拉雅山巅空运进来的汽油从其他领受者手中转给中国空军这件事。他说：面对“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作战是很困难的。应当指出，史迪威向华盛顿报告时说，按蒋介石的要求去做就是一种浪费，因为中国空军已证明是不能有效作战的。

接下去蒋介石直截了当地告诉华莱士，他“对史迪威将军所作的判断不太信任”。但或许因为他想起了以前想掉换史迪威所引起的吵闹，所以再未重复这句话，而是要求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一位可能控制史迪威和纠正史迪威错误的高级使者。委员长要求不经陆军部和国务院直接与白宫联系。丘吉尔已向他派了一位处理军事和政治问题的个人代表，即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蒋介石问道，罗斯福为什么不能选择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能做出很大的贡献。现在由于人选问题，军事合作十分困难。他感到陈纳德最好合作。史迪威有改进，但他不了解政治问题。他的见解完全是军人的见解。”史迪威则写道（又提到他的笔记和电报），蒋介石所说的“合作”，意思就是“服从”。他从华盛顿接到的命令说，他的任务是在中国战区实现美国政府的军事目的，这与蒋介石的目的和计划并不总是吻合的。

蒋介石所说的与史迪威产生纠纷的那些事打动了华莱士。他后来回忆说：“……我深为一个苦恼的人的呼声所感动。”②

派往延安的军事观察组

在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蒋介石意外

① 华莱士访华时史迪威在缅甸。史迪威认为，在控制密支那机场的重要战斗进行之际他不应当离开缅甸，而且温盖特的困顿不堪的部队也有令人忧虑的问题。华莱士认为他可以去视察缅甸前线，但他的时间很短促，而且恶劣的天气使他无法前往缅甸。

② 见《听证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第1368页。

地表示了同意。他同意让一个美国军事使团前往西北的共产党地区。这对史迪威总部和陆军部都是极为重要的。关于这一计划的许多问题，下面就要讲。

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蒋介石反复提到美国报纸对中国局势的批评意见。他暗示说，这些批评意见大都是由于共产党的宣传。他说，这正在使中国人民消沉下去，使他们失去从国外获得援助的希望。他断言，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援救造成当前局势的经济困难。

种种总的印象

华莱士与蒋介石滔滔不绝会谈的记录在这位委员长的心情方面给人留下了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印象。

1、蒋介石的心情极为苦恼，但他仍十分确信，能把局势维持到战争胜利。

2、关于军事问题，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新步骤，使他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采取进攻行动。如果采取这种行动，那将是因为美国督促他的军队，并给他们以必要的训练、装备和指导。

3、他要使中国政府的政策沿着民主的道路发展下去的愿望和意图是真诚的；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也是真诚的，如建立一种较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减息等。但他认为这些措施可以延缓。他不认为这在战争时期对于继续控制中国和赢得战争胜利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宁可等待，直到较为安全和易于进行时，再以他的党能够接受的逐步展开的速度采取这些措施。

华莱士副总统于6月26日抵达昆明后，即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报告与蒋介石会谈后他的想法的要点。这个报告是与艾尔索普和文森特一起商议写成的。^①戴维斯也在昆明，是被史迪威派

^① 艾尔索普在《路易斯·布登兹的怪事》(1952年4月《大西洋月刊》)中说，这封电

去代表他请华莱士到缅甸视察的，但他很少见到华莱士。

华莱士认为，蒋委员长对经济形势一筹莫展，对政治形势毫无把握，虽然表示对他的军队有信心，但又对军事形势的发展感到苦恼。这种令人忧虑的事华莱士想得很多。在他看来，中国的局势在各方面都是极为使人沮丧的。

华莱士在报告中赞成委员长的要求，即总统指派一位个人代表作为他们之间的联络人员。他以适当强调的语气，概括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了之后随之要采取更多的意义深远的措施的道理。他告诉罗斯福总统，华东，包括美国空军基地在内，很可能不久就要落入日军之手，或许就在三、四周内。这将使我们在中国所作的军事上的努力一笔勾销。除此之外，还会从经济上政治上给早已削弱了的重庆政权以强烈的震撼。因此，除非采取步骤，制止崩溃，否则总统就会发现，中国将失去作为盟国军事基地的一切价值。他劝告说，不仅需要采取军事措施，也需要考虑采取政治行动。不然的话，很可能产生一个政治真空，“这个真空如何填补，总统是知道的”。

华莱士又说，委员长十分焦虑不安，渴望援助和指导，如果处理得明智，会有一个相应的戏剧性的转变。他还认为，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处理问题得当的人应当能够实现一种外观上是统一战线的东西。接着他又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与共产党结成联盟——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太小了——而是“这样一种联盟，其成员由重庆政府在其控制的地区吸收……包括进步的银行界和商界领袖，……一大批西方培养出来的思想不囿于长期保持旧式地主统治的乡村社会的人；以及相当一批既不属于地主也不惧怕农民的

报是他们三人谈话时提出的；艾尔索普请求写，华莱士注意这一请求；文森特赞成并说服了华莱士；电报由艾尔索普打字后，华莱士发出。关于这个电报，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和想法，见艾尔索普1951年9月10日和12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

将军和其他军官”。^①华莱士建议说，现在的局势需要有一位美国将军，把政治的和军事的权限暂时都统一于他。华莱士说，史迪威无法承担这一任务。首先，他陷入缅甸的进攻作战很深，其次，他信不过蒋委员长。新被指派的人可以是史迪威在中国的代表，有权与白宫一起直接处理政治问题，也可以把他从史迪威的指挥地位中分出来。^②

华莱士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时间是最紧要的，新指派的人应在华东彻底丧失以前到达重庆。

华莱士使华之后

尽管蒋介石感到共产党是他的政权的深仇大敌，他还是同意让一个美国使团进入西北的共产党地区。正如人们所说，他的这种同意是仓促之间作出的。或许是他对美国所提出的军事上的理由有了深刻的印象，更可能的是他要讨好总统和陆军部，使他们对他的需求给予较为友好的重视。

美国要求进入共产党地区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冲动。由于美国空军在共产党地区上空作战和美国在沿海登陆的前景越来越接近，需要军事情报的愿望就更加明确了。而且由于共产党已成了一

^① 华莱士的信，见1953年1月9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种说法与他1944年7月10日给总统的报告十分一致。

这种关于“统一战线”或“联盟”的说法，与他下面的一种想法之间有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变化：他与蒋介石会谈的记录表明他当时有这种想法，即他似乎反复考虑要把共产党包括在内。委员长就是这样理解的。华莱士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很可能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十分固执，所以继续遵循这条路线是无用的。

^② 据阿瑟·克罗克发表在1951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说，华莱士告诉新闻界：“他选择代替已故史迪威将军的第一个人……是陈纳德陆军少将，美国在华空军首脑，这支空军正在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唯一的保护，以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原文如此）。”又说，文森特同意这种选择，但艾尔索普反对，于是华莱士确定选择魏德迈陆军中将。在上面刚引证过的华莱士的信中，华莱士说，他推荐了魏德迈，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推荐魏德迈不到十天，罗斯福就走向了正好相反的方向。”

种更为重要的力量和因素，看看他们能在中国起什么作用的想法也比较强烈。大使馆人员不时地与来重庆的共产党官员交谈。但这种接触并不是持续不断的，所以无法检验来自延安的人所说的话。

我们与延安直接建立联系的第一个正式建议，似乎是在1944年1月戴维斯送交史迪威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的。这份备忘录简要地提出了派美国使团去共产党地区的两条主要理由：第一，为我们自己获取有关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情报，以及俄国人在华北和满洲作战的重要情报，如果俄国人参与这种作战的话；并获取日军在这一地区的状况的情报。第二，打破共产党地区的孤立状况，因为政府对它的封锁正在迫使它依靠苏联。在这方面，戴维斯说，美国使团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对于国民党想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并因此而引起内战的那种冲动，将成为一种障碍物。他注意到，共产党曾说过他们欢迎美国观察员，但又指出，他们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敦请马上行动。他预料委员长不愿让我们与共产党建立独立的联系，只有总统充分运用讨价还价的权力，他才会同意。^①

戴维斯将这个备忘录的一份送给霍普金斯，霍普金斯认为这一建议有道理。总统要马歇尔将军和李海海军上将进行研究，然后于2月9日向蒋介石提出这一问题。电报是通过史迪威发出的，要求委员长在派遣美国观察组方面给予合作，这种观察组将立即派往陕北、山西，根据需要还派往其他这类地方。总统强调说，为了指导未来空中和地面的作战，我们要了解华北和满洲大量日军的一切可能了解到的情况，这件事已变得极为重要了。

国务院可能不知道总统的这个电报。不管怎么说，在委员长正在考虑的时候，国务院也已开始动手做这件事。2月16日，国务院问高斯，他对派遣这样一个使团意见如何。第二天，17日，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要求远东司与陆军部商议此事。高斯回答说，委员长可能不会同意，但他认为值得作这种努力。他说，派遣的使团须是军事方面的，但他又建议，可以带谢伟思（史迪威下面的另一

^① 见戴维斯的备忘录，1944年1月15日，标题：〈向华北派观察组〉。

个外事军官)一同去。①

高斯的看法是正确的,蒋介石并不高兴这个意见。在他给总统的答复(2月22日发出)中,他想使总统满意,而又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在搜集华北和满洲日军更准确的情报方面,他正准备给予帮助。为此,他正在让他的陆军部长与史迪威接触,“以便在国民政府政治权力所达到的和中国军队所在的一切地区,为使团在地图上标明未来的行动路线”。②可以有把握地推测,蒋介石知道史迪威总部处在这一要求的幕后,而且也是把美国援助要扩大到共产党的紧急建议与这一要求联系在一起来想的。

总统3月1日所表示的谢意是低调的。他感谢委员长为方便美国观察组进入华北和东北所采取的步骤。他同意这种说法:这些地区应当有非常丰富的日本军事情报。他不象被人敦促的那样,坚持要让这个使团进入共产党地区。前面已经说过的其他问题,如缅甸问题,美国空军在中国所作的努力的问题,以及美元的偿还问题,都是当时总统与蒋介石通信中优先考虑的问题。而蒋介石则沿着原来的思路一直想使总统确信,在中国有一种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实行进犯的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如前所述,总统安慰了蒋介石,叫他不要担心苏联的意图,并劝他不要做任何有损同盟国合作的事。

向延安共产党总部派遣美国使团的主意并未放弃。3月22日,总统重申了这一要求,并附加了一条理由,即该使团或许能够获得使蒋介石十分不安的有关新疆边境动乱的有关情报。史迪威看到中国陆军部长仍在抗拒,便再次采取他认为必要的压力,使中国人就范。他把中国空军学员动身前往美国受训的事拖延下来。赫尔和史汀生在华盛顿反复谈过这件事,赫尔国务卿完全赞成这一建议。但他认为,以广泛的国际和睦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

① 戴维思原来的备忘录建议派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后来在3月20日的备忘录中,他推荐把谢伟思包括在这个使团之内。

② 委员长1944年2月22日给赫恩将军转交总统的备忘录,见森德兰—罗马纳斯手稿,第2卷,及史汀生3月7日给赫尔的备忘录。

比用军事上的理由更有说服力。这一问题遂留给华莱士在访华期间去处理。哈里曼还就此事试探了莫洛托夫。

蒋介石虽然坚持反对让美国官方使团到延安，却允许另一个团体去那里。中外记者一直要求访问共产党地区。外国记者聚集在《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周围，以他为发言人，于2月16日向宣传部正式提出要求，经过一段拖延之后，被允准了。史迪威总部提出质问，中国政府为何允许到共产党区域进行这种访问，而不同意美军观察组到那里去。陆军部长回答说，这两种访问的意义完全不同。新闻记者是民间人士，他们的访问不会有任何官方意义，他们的观点不会被人认为是代表官方政策。如果美国军事使团去延安，那就会被认为是美国将要与共产党合作。

记者们终于在5月中到共产党的中心延安去了。共产党的领袖们掩饰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迎合讨好地谈论他们致力于民主和中国统一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接见记者时就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决不动摇它支持蒋介石委员长的政策，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之间继续合作的政策，以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为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而奋斗的政策……但是这在中国有障碍，而且是严重的障碍。这种障碍用一句话说，就是缺乏民主……能够确保战后统一的也是民主……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在党的事务和国际事务方面，也要有民主。在所有这些领域内都要民主化，而且一切都必须统一。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①

大多数新闻记者都熟悉这种语言，熟悉这类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名词。许多人都对他们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发现的热情、质朴和目的感感到高兴或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新闻报道、文

^① 见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会见记者的谈话，发表在1945年1月的《政治事务》上。这位共产党领袖同时在党的会议通报和声明中又说，全党和党的领导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忠实的信仰者，而且都献身于共产党纲领的最终目的。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暂时的政治权宜之策，而且不妨下结论说，他的共产党同事都知道是如此。

章和著作缓和了或掩饰了隐藏在这些词句和态度背后的过激的和执拗的革命意图。他们或多或少都赞扬了共产党正在进行的顽强抗日斗争。^①

就在华莱士与蒋介石开始谈判的那一天，史迪威在重庆的总部已传话给美国陆军部：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印缅的陆军航空兵司令，蒙巴顿的代表）和沃尔夫将军（第二十轰炸机队司令，在马特合恩作战）都认为，搜集关于日军战斗序列、天候、机场、友军驻地，以及其他方面更多的情报是很重要的，而且正在敦请美国政府再次要求允许派军事使团到共产党地区。史迪威在重庆的代表费里斯将军同意将这封电报发给马歇尔。他建议总统要华莱士再次与蒋介石讨论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华莱士已从哈里曼那里听到此事。总统立即电告华莱士，看看他能做些什么。但华莱士在接到这封电报之前，已获得了蒋委员长的同意。

头一天委员长说过，除非共产党答应他的条件，否则他就不同意派遣这一使团。当文森特试图挖苦他时，他坦率地表示，他不喜欢这种使团。但到第二天上午（重庆时间23日），文森特和华莱士又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出乎华莱士意料的是，委员长改变

^① 这需要有一种单独的研究，而且几乎可以写一本书，来详细审查和论述这些去延安的记者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所发表的许多报道。在1944年7月19日国务院给高斯大使的电报中，关于记者报道的显著特点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我们可以借来一用，这封电报是要把这些记者发回的报告通知高斯知道的。

“记者在发给《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电讯中，称赞共产党的工农业成就，赞扬共产党部队的战斗精神和军事胜利。《纽约时报》的记者7月1日报道，他在延安看到了‘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反对一切干涉、保卫自己成果的决心’。他还强调说，他觉得，共产党认识到对日本的反攻即将来临，他们的军队和游击队要全力参加这一反攻。他报道说，他看到不毛之地如何被改变成集约耕作区、牲畜饲养和手工业区。哈里森·福尔曼在6月23日的《先驱论坛报》上把延安描绘成‘边区人民顽强与决心的伟大象征’。他描绘了这个边区自三年前被隔绝于外部世界以来如何变成自力更生，如何鼓励‘一切大小工业，甚至补贴公认不能赢利的工业，只要其产品是重要的’。冈瑟·斯坦在6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宣称，任何盟国的指挥官‘都会以指挥这些顽强、营养充足和刚毅的部队而感到骄傲，他们的操练显示了这种战斗的技巧和精神’。”

了态度，他说，“可以这样做”。他的唯一条件是，使团应在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主持下，而不是在美军的主持下前往共产党地区，而且中国军官要一同前去。在表示同意时，蒋介石又强调了共产党不服从他的命令这一事实，并敦请华莱士回国后弄清楚，共产党是应当让步的。

那天稍晚，华莱士由带着谢伟思的费里斯将军陪同，进一步与蒋介石和宋子文谈了这一计划。委员长肯定了他对此事的同意。他欣然同意使团一组织起来即动身前往共产党地区，并同意使团直接与在华美军指挥部联系，有移动的自由。不管此事是否经过讨论，反正可能是达成了谅解：谢伟思将与使团成员一同前去。

使团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一个月后，乘一架由战斗机护送的军用运输机飞往延安。负责人是曾在重庆任武官的包瑞德。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蒋介石的想法是对的，共产党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美国同情他们的事业，并希望同他们合作。正如一位接近延安政权并注意观察组到来的记者所描写的，“延安人民也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之中。两个月之内，他们被封锁被严禁的地区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延安人民尽管对我们那么尊敬，但这些客人显然比世界上最重要的报纸的代表重要得多。美军显然认识到，中共在对日作战中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政府的宾馆里，插着在重庆飘扬的中华民国国旗，迎来了第一批访问延安的盟国军官。在接待他们的人中，有委员长驻延安八路军的代表周少将，他微笑着，对于重庆-华盛顿与共‘匪’的团结，显然很高兴，而不是感到为难。这一切似乎有点空幻，好得几乎不象是真的。”^①

使团到延安几个星期后，毛泽东对谢伟思吐露：“最后一点是，你们美国人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有益的。我们当然欢迎观察组来延安，因为这有助于打日本。但你们到这里来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国民党政治上的影响，掩饰这一点是无用

^① 摘引自对观察组的到达、开始工作和对接待的反应的生动记述，见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5年版，第347—353页。

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①

委员长同意派遣这一观察组，事实上并不表明他与共产党关系的任何改善。华莱士使这个问题松动了，但他的访问并未使这两个对手有任何靠近。他们的谈判一如既往，在同一个圈子里，带着同样妨碍运转的、猜疑的暗色砂砾旋转着。

国民政府的态度依然未变。华莱士6月28日离华之后几天，宣传部梁部长再次肯定：“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共产党同意服从法律，只要它的军队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切问题都会自动解决。”只要共产党接受这些基本规定，政府就召开所有各政党的会议，确定如何最终建立民主和宪制的政府。

这就是政府给进行挑战的共产党出的价，给它在政治竞争的正式法规下提供的追求共产主义纲领的一种机会。在待机诱导共产党接受这些条件的同时，在大多数美国新闻记者看来，政府在有效地改正自己过失和赢得人民支持方面，似乎并未做多少事情，或者根本未做。特别是对农民的状况和联系，没有显著的改变，这可能是它最大的失败。农民只好去倾听共产党关于减租减息和占有土地的喧闹声。在土地上从事长期艰苦劳动的人，很少有人对这种事关自己利益的呼声不闻不问。政府曾表白过它的坚定意图，即战争紧急情况一过，它就解决这些问题，但它又想，到那时它将无法驾驭这些改革所遗留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巨大调整工作。

共产党不厌其烦地说，他们所要求的是一种关于政党的民主安排处理。但他们在同意政府所提的条件之前，继续坚持他们的重要条件。他们要求共产党军队在政府军内保持十八个师，政府要和中国其他军队一样装备和对待这些军队。他们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控制地区“普选”的政府，并要求政府结束对这些地区的封锁，他们还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②

^① 见谢伟思的第15号报告，标题：〈1944年8月27日会见毛泽东〉。

^② 共产党的要价和条件是经常变化的。这里所说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6月30日在重庆与沃德会谈时概括的共产党立场的主要之点。沃德6月30日的备忘录于1944年7月5日由高斯签字，用快件送交国务院。在此期间国共会谈的完整记载，见〈中美关系〉第55页，及附录40和41。

这两个对手在这一时期所施展的策略使高斯大使得出一种阴郁的结论：“从本质上讲，是这样一种斗争：政府显然在以政治手段谋求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斗争，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蒋介石曾告诉华莱士，如果罗斯福总统想缓和这种斗争，他不会感到不愉快。同时他又警告说，总统可能会被伤害和愚弄。白宫和国务院都不准备接受这样的结论：这种斗争无法以使双方共存的公平交易方法进行调解。

因此他们开始努力——这种努力越来越积极——诱导或强迫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感到，对于进行战争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此外，他们还对未来的威胁感到忧虑：战争结束后，中国将陷入混乱，无法扮演开罗会议规定的角色。更糟的是，中国有可能陷入长期内战，美国可能被迫站在战争的一边，而苏联则站在另一边。那末组织世界和平的整个计划就会在中国的骚乱中崩溃瓦解。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在美国政府的一些文武官员中丧失了对它的同情和赏识。谢伟思在等候去延安时所写的备忘录，列举了这时在美国大使馆、在华美军和美国国务院中流传的对中国局势的看法。^① 备忘录大体谈到，中国的局势是危急的，有增无已的崩溃正在发生。它又说，国民党证明自己无能防止这种崩溃；事实上，它的政策正在加速和迫使这种危机的发生。主要原因是，由于失掉了人民的支持，它正在让保持政权的希望支配自己的行动。总之，中国局势的关键是民主改革。既然中国政府的垮台对美国损害极

① 有两个理由使人相信1944年6月20日的这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看法是广泛流传的，(1)1944年夏季的美国政策遵循了备忘录所建议的方针，(2)备忘录受到了格外的注意和赞赏。高斯在与备忘录一同送交国务院的急件(7月1日，第2733号)中，赞成备忘录的观点。中国处认为这是一种及时的、有价值的议论。国务院特意写给谢伟思一封赞扬信，赞扬他的“及时的、有才华的分析”和“建设性的建议”。这封信于9月13日寄给高斯。史迪威总部选派谢伟思去延安，表明赞成他的分析。

这份备忘录全文发表在《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第2035—2046页，标题：《中国的局势及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大，美国政府就应该把它支持中国的基础放在促进必要的变革的政策上。

这种对局势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道打开的大门，通过这道门，人们可以走向许多不同策略路线的任何一种。向右，就会是一种友好地劝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向左，可能意味着一种努力，迫使政府接受共产党的很多条件和计划，以致共产党可能获得对整个中国的控制。在以后的两年中，美国的政策就在这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地前进着。

1944年夏季美国的紧急建议

在1944年这一年的夏季，日本人抱着执拗的目的向前推进。他们正向美国在柳州和桂林的空军基地前进。如果他们再向前进攻，美国在中国的全部空战努力就会变得微不足道。除非当时未见抵抗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否则，他们就能够从那里或者进攻昆明，或者进攻重庆，或者两地都进攻。^①

史迪威虽然在缅甸遭受了挫折，但还是要对中国的战局表示遗憾。他的日记和笔记记载了他的悲观思想，他认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所提出的那些不被人理睬的警告：当在华的美国空中攻势开始对日本人造成真正损害时，他们就会设法夺取这些美国空军基地；除非中国军队完全重新振作起来，否则他们就会这样干。在他看来，即使是容易做到的事，蒋委员长也不去做，

① 正如《美军参谋长两年报告，1943年7月1日—1945年6月30日》（向陆军部长的报告）所扼要概括的那样：“但在1944年5月，日军从湖南的洞庭湖向南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攻势，夏末，又从广州向西开始了一个辅助攻势。这两支进攻部队在为中国大后方效力的桂林美国空军基地附近会合，而且越过了七个重要基地，第十四航空队就是一直从那些基地向中国海的日本航运施加压力的。”

昆明是通往印度的空运供应线的终点站，又是我们向在华日军进行空袭的神经中枢。如果昆明丢失，盟国向中国输送供应物资以及维护有效的空军基地和设施的整个巨大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而且他所掌握的作战，又是招致毁灭性后果的。^①这位在多雨的缅甸的苛评家将中国的这种怠职行为与美国人组织和训练的其他中国部队的奋斗精神和持久作战能力作了鲜明的对比。

陈纳德也作了尖锐的对比，他认为在中国和缅甸发生的事件，都是史迪威方针严重错误的证明。他把失败归咎于他的这位同事将美中两国战斗部队刚愎自用，用于无休止的缅甸作战，归咎于过分抑制在华的美国空军，致使空军不够强大、无法击溃日军。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故意忽视他所提出的关于日军策划和准备进攻的警告。此外，他还认为史迪威对于援助要求的答复受对他和委员长的敌意的支配，史迪威想惩罚他俩，想无情地迫使蒋介石让自己全面指挥中国军队。^②在这种非难中，他忽略了一种限度，即史迪威的意见是经华盛顿批准的，史迪威处理第十四航空队问题的决定是受华盛顿的命令左右的。

蒋委员长也想法使自己不得咎，不受指责。他的看法是：保卫华东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根据租借法给中国的供应物资的总份额太少，而且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说服，违背自己对局势的判断，派出很大的一支部队到缅甸作战。不过他对过去和当前所发生的事件，都采取了有节制的看法，因为他还在等待着罗斯福对他通过华莱士所提要求的答复：派一位使他能与罗斯福总统直接接触的特派代表。从他的态度中也许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传统癖

① 他的观点充分表现在《史迪威文件》中他那喷泉般涌出的话语里。

陆军部军事情报处1945年7月5日送上的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就此谈到中国政府这一时期的防御努力，报告说：“重庆政府保存军事实力的政策，使它许多最精锐的部队调离华东前线，尽管有些较好的部队驻扎在前线地区，但许多前线部队都是国民党所讨厌的；他们之中有些是军阀如庞炳勋、吴化文的部队，有些是以前与蒋介石作过战的国民党领导人物如桂系李宗仁、前东北军于学忠、粤系薛岳的部队。”见《听证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第7部分A，第2355页。

② 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战略、行动和目的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一个战士的遗路》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当时在陈纳德手下工作的艾尔索普对这年夏天的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与陈纳德相同，但他的说法更慎重一些。见1950年1月14日《星期六晚邮报》。至于对事实、责任和各种辩解理由的考察，必须留待更有资格、更充分掌握资料的人去做。

性：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正当方针终归是坚持慎重的退却战略，等待，消耗，而不是速战速决。

在如何才能最好地保卫中国的明显分歧中，美中官员都在美国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要求于中国的又是什么这种问题上被互相冲突的意见所支配。史迪威也象其他美国军人一样，挑剔不已，认为为了使中国生存和作战，美国已给了中国很多东西，但这些援助都被浪费了。他们有一种印象：中国在等着美国和英国去进行艰苦的战斗，并为它赢得胜利。与这种看法显著不同的是，蒋委员长和他周围的人对他们所得到的援助感到失望，这正象他们自1941年11月以后所经历的情况一样，当时他们对盟国将集中力量在中国进行联合作战抱有很大希望，但后来终于成了泡影。他们将美国在别处与在中国所作的战争努力的大小作了对比，认为中国被亏待了，成了一个被忽视的战区。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在互相表示愤懑。中国人虚弱和失败的后果正在战斗中显露出来；同样，曾经在金额和性质上左右过美英与中国军事合作的那个重要决定（首先击败德国）所产生的效果也正在显露出来。这种结局正出现在眼前。不出一年，就会在太平洋战争中投入大量的战斗部队。在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前景减轻了现时在中国所受挫折的严重性，而且或许还使他们之间的隔阂不致走向极端。

美国关于未来对日作战步骤的规划方案正在修改中。美国人正在得出结论，攻抵日本最理想的路线，不是在中国或通过中国，而是在太平洋上，并通过太平洋。7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地面部队击败了日军的疯狂抵抗，终于占领了塞班岛。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夺取的第一个海岛基地，从那里起飞，美国远程轰炸机就可以飞到日本本土诸岛上空。一星期后，接受了民主党第四次总统竞选提名的罗斯福，前往珍珠港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共商大计。迄今为止，他倾向于支持海军和空军所赞赏的那种战略，

即下一步的主要登陆地点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福摩萨，从那里的海空军基地，并从中国大陆，切断日本来自南方的重要物资供应，并准备用封锁和轰炸迫使日本投降。^①但他有感于麦克阿瑟的论证，转而批准了下一步进军菲律宾的方案。从此，麦克阿瑟的部队和海军都急忙为此一行动作准备。

在中国作战的问题更加不占重要地位；自此以后，这种作战不再被认为是赢得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了。然而仍有许多理由使中国继续作战，而且更有效地作战。在华日军仍然是一支凶猛的部队；如果中国人不促使他们忙于作战，盟国就得在别处对付他们。因此，尽管战略计划改变了，从7月起美国政府还是比以前作出更大的努力，以改变中国军事上的方向和努力。总统和陆军部都要求委员长将一些军事上的措施付诸实施，而这些措施是有伤他的自尊心的，对他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

陆军部自史汀生和马歇尔以下，都深深感到，人们正在不公正地评判史迪威的才能和他在中国及缅甸所取得的成就。在他们看来，正如托马斯·T·汉迪将军在一份备忘录中所表明的一样，史迪威的成就是优异的，他在密支那进行的战役是光辉的。^②但在缅甸他不得不与之一起工作的英国人也在建议将他调回。^③于是意见就转到将他调离缅甸的可能性上，因为那里未来的任务不大，而且可以用他来挽救中国的局势。这样，马歇尔就在7月1日将英国的态度告诉了史迪威，并问他，他是否认为蒋介石会让他在中国的作战中发挥作用，他能否在中国把事情办好。史迪

① 正如《舰队司令金，海军纪事》第566—567页所说：“海军赞成从福摩萨直接进攻，而放下菲律宾群岛不管，认为这一阵地将控制日本从它最近征服的南方地区得到石油、大米和其他物资的海上航线。海军对于在日本本土陆地作战并无兴趣，认为以海空封锁即足以取胜。另一方面，麦克阿瑟将军则强烈赞成回菲律宾。这两种方案执行起来都有难处。海军知道，进攻福摩萨会有一场恶战，因为日本人已向该岛派遣了强大的空军和地面增援部队。”

② 汉迪给马歇尔的备忘录，1944年6月30日。见森德兰德—罗马纳斯手稿，第2卷。

③ 6月份马歇尔在伦敦时，英军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爵士曾说过，应当调换史迪威，因为他在东南亚指挥部中和他的同僚不能和睦相处。

威的回答是：如果总统以危局需要采取非常措施为理由，坚定不移地力主这样做，就可以劝使委员长交给他一个在中国的指挥任务。但他认为，要把事情办好，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的全权。即使答应这样做，已经造成的损失他认为也是太大了，因而要挽救局势，只有一种可能，即从华北的山西省发动反攻。为了这种作战，他的意见是，需要有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他们也应当参加。他最后说，总之，这种措施，也只有这种措施，才稍能挽救中国。

顺便说一句，可以看出，这种估计是太极端了。但主要原因可能还不在于中国国内。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在别处的进攻与威胁解救了中国的军队。美国的这种压力对于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日军来说实在太大了，使它不得不在该地区的行动有所收敛。^①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在几个月以后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不管怎么说，华莱士要将史迪威从中国战区免职的建议是被撇在一边了。正相反，美国政府开始热衷于想让他负担在中国的指挥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呈送给总统一份备忘录，敦请总统这样做。这份备忘录断言，需要采取断然措施，以防止美国在亚洲所作的努力出现灾难性后果。备忘录指出，在整个战争中，美国一直被迫增加向中国的空运，尤其是服务于陈纳德空军的空运；这种必要的努力是巨大的，但指导不当，而且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陈纳德单独能做到的，不过是略为迟滞日军的进攻而已。对比之下，备忘录赞扬了史迪威在中国人和英国人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设想和他的指挥行动。备忘录附上一封电报，劝总统立即发给蒋委员长。正如李海海军上将向总统递交这份备忘录时所写的简要报告概括的那样：“我们完全赞同，为了挽救中国的局势，马上采取此种行动实属必要。”

^① 对日军向最终目标昆明或重庆进攻的第一次牵制性攻击，开始于后来的八九月间。部分中国派遣军部署在浙江东海岸附近，用以挫败预料的美军登陆企图。见美国陆军部：《日本专论》，第129号，《中国战区作战纪事》。

长时期对史迪威的个人作风和能力有疑虑的罗斯福，这时同意了这种意见。6日，他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这封电报发出。这封电报要求蒋介石将权力交给一个人，让他协调在华的一切盟国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部队。总统继续说，他要晋升史迪威为陆军上将；并敦请蒋委员长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回，在他自己的直接领导下，将这种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总统认为，应使史迪威负起一切责任，并有权协调和指导对日战争的一切作战。总统最后说，除非采取此种措施应付危局，否则共同事业就会遭到灾难。^①

自战争开始以来向蒋介石所提的一切建议中，这一建议对他来说要算是最严峻的了。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即使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也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种打击。中国的一些军事长官肯定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并起而反抗。将史迪威置于此种地位，就等于把蒋的政权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位粗鲁傲慢的吹毛求疵家去摆布，否则他就要与史迪威进行一场斗争，而这又可能使他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破裂。^②如果象总统所要求的那样，将使用和装备全中国任何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的自由权给了史迪威，那就要冒使叛逆军队占优势的风险。^③可以推断，这种要求对蒋委员长来

① 在《亚美杂志》社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份备忘录的复写本，说其中的情况是谢伟思提供的。这份备忘录中有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的这封电报的要点，并说明该电报是由费里斯将军交给蒋委员长的，谢伟思充当译员。蒋介石通过当时在布雷顿森林参加会议的孔祥熙对这封电报作了答复。这份备忘录还叙述了罗斯福所发的下一封电报的要旨。据备忘录评论说，从这封电报中可以找到蒋介石答复中的花言巧语。见《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第1912—1913页。

② 艾尔索普在1950年1月7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将蓄意强迫蒋介石无条件地与危害自己的人并为一体一事，归咎于史迪威。他暗示说，如果史迪威完全自主行事，中国局势的发展就会象大战中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蒋介石将沦为被抛弃的米哈伊罗维奇那样的角色。这当然是臆说，可以争论。史迪威虽然是一个强硬的、爱刻薄憎恶的人，但总是美国政府遵守纪律的代表，而且总会想法按命令办事。美国政府要蒋介石做的事还很多，不会在此时抛弃他。

③ 文森特在委员会的证词，见《听保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第2072—2073页。这个有关总统所提要求的含义的证词是很有意思的：

“文森特先生：……我回想起——我认为这是陆军部-白宫的问题——史迪威受权到蒋介石那里会见蒋，并建议对中国的全部军队进行统一指挥。

“索瓦因先生：这意味着什么？”

说似乎是太严峻了，而且也难以实现。

但是蒋在8日迅速发出的复电却是心平气和的。蒋委员长说，他原则上同意总统为应付危局而提出的“严正而诚恳”的建议。但在决定以前有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慎重考虑，其中谈到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军队不易接受指挥这一事实。他说，如果安排不当，就会在美中两国之间引起很大纠纷。然后蒋委员长又提出他以前的要求：请总统派一位得力人物，这个人总统能信得过，并能在政治和军事的一切问题上与他经常合作。他需要一位政治上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因为（在这里他暴露了问题的根本）军事合作必须建立在政治合作的基础之上。这封复电是一种说法，表明总统认为必须做的事他并不加以拒绝，但在做之前，他要求一定要使他确信他能忍受得了，并对美国的意图深信不疑。

总统将这封复电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加了一句评语：“委员长在这里谈了许多问题。”他想建立蒋介石要求的那种直接联系，

“文森特先生：就我所能记起的来说，这意味着史迪威要负责指挥中国的一切军队。

“索瓦因先生：这是否必然含有武装中共的意思？

“文森特先生：如果史迪威接过全部指挥权？

“索瓦因先生：当然。

“文森特先生：那就含有在他的指挥下武装他们，并作为一支统一的军队使用他们的意思。

“索瓦因先生：那末，这是一项为武装中共而提的建议了，是不是？

“文森特先生：这项建议如果按我所理解的办法付诸实施，史迪威就要实现这一点，他会这样做的。

“索瓦因先生：这是一项为武装中共而提的建议，不管它是否已实现，是不是？

“文森特先生：这是一项史迪威要指挥一切军队的建议，我想，随之而来的就是使用中共部队

“索瓦因先生：这一定要含蓄而不明言，是不是？

“文森特先生：是的。”

随同费里斯将军为蒋委员长翻译总统电报的谢伟思也是这样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项要武装中共的建议，因为这是当然的：如果史迪威要指挥全中国的军队，就会包括中共，因此他们就有资格得到一部分装备。”见《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第1970页。

但这需要一些时间。而且他深感中国的军事局势不容许拖延。罗斯福在7月15日的下一封电报中告诉蒋介石，基本方针和工作细则都能够在任命史迪威指挥和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但蒋介石却不愿因马大哈而冒风险。他明白表示，在任命史迪威指挥之前，他要求：（1）充分明确他的权限；（2）要达成一种谅解：共产党不包括在他的指挥权限之内；（3）租借法供应物资分配的控制权移交给他本人。这就是他的三项条件。

罗斯福前往夏威夷和阿留申群岛期间（在此期间作出了进攻菲律宾的决定），中断了他就史迪威问题与蒋介石的交换意见，但他仍在研究向中国派一位特派代表的事。他征得史迪威的同意，选择了赫尔利将军。^①8月10日，他将这一选择告诉了委员长。几天以前，日军在衡阳击败了中国军队撤退途中的英勇抵抗，直指美国空军基地。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认为，立即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现在比已往更加迫切了。他们担心，如果让蒋介石等着与赫尔利商讨仍在使他烦恼的有关任命史迪威的各种问题，那就会失去挽救危局的最后机会。因此他们想把委员长的三项条件作为细节问题撇开不管。

但蒋委员长并不这样看，他依旧认为任命史迪威的事可以缓一缓。他并不急于要拿他懂得的那种危险去交换他无法衡量的别种危险。总统8月23日向他保证，在史迪威和赫尔利之间肯定会对他所面临的那些政治问题达成谅解。罗斯福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值此危急之秋，拒绝共产党的帮助是不合情理的；史迪威的职位是国家元首领导下的战地指挥官；他的官衔也应与他的职位相一致。总统又说，他将解除史迪威对租借法供应物资的控制权。这一步骤的目的可能是想消除蒋介石的忧虑，他怕史迪威利用权力，决定将什么装备给予政府军队，什么装备给予中共军队。^②

^① 史汀生曾向马歇尔谈到他正在设法给赫尔利派一适当工作。这显然在马歇尔的心目中引起了在中国使用赫尔利的想法，因为就在这同一天，8月3日，他曾发电报给史迪威，问他对此有何想法。

^② 这封电报的要点，见《美中关系》，第67页。

9月7日蒋介石与赫尔利（他刚到达）和史迪威会谈时，在同意上述做法方面走得似乎太远，以致马歇尔和史迪威都认为有争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①他们急忙让参谋人员展开工作，为蒋介石着想，也为美国战争计划和和平计划着想，估算如何挽救中国尚能挽救的局势。但蒋介石给了美国人一个不祥的预兆，他不愿将这种计划安排付诸实施，除非保证他以后依旧发布命令，并在与共军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直在敦促蒋介石建立一个联合的作战委员会，以协调中国一切军队，共同抗日。美国政府的一切部门都试图做这种说服工作：陆军部是从军事上的理由出发，国务院这样做，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步骤可能为中国统一问题的某种总解决铺平道路。

他们的设想是：蒋介石召集所有各党派，包括共产党，组成一个军事委员会或最高指挥部。这个机构要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但都要与他共同对军事作战负责。我所看到的有关这一建议的文本，并未说清楚这个委员会如何行使职权，或者说，如何调整他们之间的分歧。

美国大使馆参赞艾奇逊于7月3日先与孙科讨论了这一设想，孙科是立法院长，又是蒋介石国内政策激进的批评者。他以明显的热情接受了这一建议。高斯与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讨论了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整个前景。宋子文对蒋介石改变立场不抱希望。他反复向高斯大使谈了委员长所发表的议论：华莱士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不了解中国。他说，尽管蒋介石感到苦恼，但还是怀疑是否一定要采取极端措施来应付危局。高斯在7月12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说，只有采取急进的措施，实现所有各党派和各方人士的统一战线，在指导作战上与蒋介石共同分担责任，才能稳住局势。这对委员长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转弯，只有总统采取主动，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因此高斯提出让贤，不做驻华

^① 森德兰德—罗马纳斯手稿，第2卷。

大使，让位给总统按蒋介石的要求指派的特派代表来指导美国在华的一切活动。

根据国务院的建议，罗斯福于7月14日，即在他首次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一周之后，又要求委员长努力设法与共产党达成一项能解决重大问题的协议，以加强中国对日军的防御。他指出，此事一成，在他（总统）看来，由他斡旋为中苏代表安排一次会议就比较容易了。^①顺便指出，宋子文是被指定担任赴苏使命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同意总统的意见，并认为，中国政府与中共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应在他访问莫斯科之前。^②

在下一个月，正当人们商讨美国紧急建议——交给史迪威指挥权和建立联合作战委员会——的时候，在延安的美国观察组的报告开始涌回美国。军事观察员的报告要送到史迪威总部，再从那里转到陆军部，其他人就能更确切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总之，他们发现共军情况不错，纪律严明，渴望战斗，领导有方，但装备很差，而且这支部队也没有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大。谢伟思报告的上送，有时通过一个渠道，有时通过两个渠道，有时通过三个渠道。^③这些报告都是对共产党有利的。^④他总结说：中共已健康地成长起来，比较成熟，是不会轻易被消灭的。谢伟思是否认识到他在判断共产党的社会目的、态度和有关事实时所达到的程度，仍旧是一个需要推测的问题。他这时所提的建议，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美国给中共军队以援助。他提倡这样做是从军事和政治

① 7月14日的这封电报，是以总统收到华莱士与蒋介石会谈的详细报告的通知的形式发出的。见《美中关系》，第560页。

② 见1944年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报。

③ 这些渠道是：（1）送往史迪威总部，再从那里转到陆军部；（2）送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再从那里转到国务院；（3）送给戴维斯，由戴维斯转交霍普金斯。

④ 其中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报告是：（1）1944年7月28日第1号备忘录，《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印象》；（2）1944年8月27日第15号报告，《会见毛泽东》；（3）1944年8月29日第16号报告，《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性》；（4）1944年9月3日第20号报告，《对于因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产生的问题美国需要有一种政策》。

两方面的理由着想的。他认为，我们因此就能在对日战争中得到更有效的帮助；我们还能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迫使国民党进行改革，以保持中国人民的利益。^①他预测，国民党会顽固地反对这样做，那我们就要决定，根据我们预计会得到的好处，究竟是克服这种反对态度好，还是对它置之不顾好。

可能是由于对观察组的活动和报告有所耳闻，蒋介石烦躁不安起来了。8月30日，他召见高斯，研究他与中共关系的整个问题。他想更充分地说明他反对美国政府文职和军职人员所提忠告的各种理由。他说，他特别要一再说明中国的共产党问题，是因为他感到，尽管他一直在谈这件事，华盛顿依然并不理解。他认为，我们正在以一种将产生严重后果的方式行事，因为共产党企图统治全中国，并将中国苏维埃化。他认为，美国坚持要与他们达成协议这件事，正在促使他们更加顽固不化，美国观察组在延安的出现，更使他们狂妄起来。他说，他们目前正在提出等于要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美国政府不应当再强迫他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而应当告诉共产党，让他们顺从国民政府。他最后说，至于史迪威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美国人强调击败日本需要中共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为了对日作战而使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那将是无益的。在他看来，此种危险并不因为任命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而能避免。

高斯不承认美国观察组在延安的出现使共产党更难对付。他指出，共产党已经拒绝了委员长过去所提的要求，在他看来，他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建立互相信任为止。他设法解释说，美国政府并不是要中国政府屈从于共产党的要求。所有一切主张都是为了促使中国从军事危局中得到自救。他承认，中国政府多方面的改造目前也许不可能，但他又争辩说，危机的严重性使谋求一定的解决变得非常可取，即达成协议，使所有各党派都参加一个负责作战的委员会，筹划和实施抗日工作。如果能建立这样一个机

^① 高斯8月27日发出的快信，附有谢伟思第15、16和20号报告，并加了评语。

构，并能有效地工作，那么目前分裂中国的互不信任和敌意就会减少，和解的机会就会随之而来。蒋介石在谈话终了时评论说，这种建议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研究的。^①

赫尔发现高斯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很象华莱士所做的报告，它指出：“……蒋介石的思想中缺乏进步的东西，缺乏的程度令人沮丧。这是因为据报告不在共产党势力之下的其他地区都有不同意见在发展，而且蒋介石要按照自己表白的愿望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高斯被授权回到这一问题上来，并告诉蒋介石，总统和国务院都认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是适时的，合乎实际的，值得慎重考虑。他还受权重申，由于这一意见来自总统和国务院，如果蒋介石愿意在重庆安排与共产党代表会晤，他，高斯，将根据与委员长谈话的那些精神与共产党代表商谈。他将象对委员长强调的一样，对共产党代表强调统一，强调诚意，容让和互相妥协的必要性。^②

美国的这种建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想形成这样一种建议的话），无法得知，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公式，而且是非常粗线条的。在高斯大使的心目中，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的联合政府，而是目标比较小，只建立一个联合作战指挥部，决定如何利用全国人力物力进行作战的问题。但是很难看出，如果既不在作战委员会内又不在政府内作出分配权力的决定，怎么能够安排好这件事。谁将被授权向谁发布命令？发布什么命令？

高斯在按这个指示行动以前，等了一周时间。当时是否任命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危机正在接近顶点，而且赫尔利也已到达重庆。对美国这几项紧急建议达成协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① 对高斯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1944年8月31日）的释义，见《美中关系》，第561—562页。

^② 1944年9月9日赫尔给高斯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国务院起草的，并上送罗斯福总统。国务院随这封电报的初稿，作为背景材料，还向白宫送上了高斯发回的各种电报和快信的摘要，以及远东司准备的两个备忘录的摘要。这两个备忘录都是根据谢伟思的快信和6月20日的备忘录起草的，谢伟思的这些文件谈的是中国政府虚弱的原因和特点，并提出了美国所要采取的政策建议。

但似乎并不是达不成协议。每项建议达成协议都需要作出严肃的决定，以解决政府有多少权力和在什么条件下要移交、分享或让出的问题。美国政府要求将这些问题迅速加以解决。在别的地方善于解决这类争端的赫尔利有希望能处理这些问题。但他发现中国和别处不同，比世界上任何一种人都有耐心的中国人，是利用时间和谈判作为斗争武器的。

林海 译

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

——马歇尔使华与满洲

史蒂文 I·莱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将军对国共冲突进行的调处，即便是误入歧途，人们也常常把它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上一种无私的行动。据说，美国谋求促进中国的统一与民主，乃是在继续奉行海约翰时代以来的对华政策。马歇尔未能实现其在政治上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即促成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面小党派在内的民族联合政府。一般人都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了马歇尔赴华使命的失败。

对于如何评价马歇尔调处一事，本文提出了另一种可供探讨的观点。首先，我想把美国调处中国内战的原由放到变化着的国际形势中进行考察。当时的局势是，冷战的序幕正在揭开，美国对苏联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日益感到关切。其次，本文把论述的重点集中在中国的东北（满洲）。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讲，这一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满洲是中国敌对双方兵戎相见的战场，同时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政策也使美国大为焦虑。最后，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马歇尔的调处没能使中国实现统一，但它却成功地阻止了苏联的扩张主义，而这正是调处的根本目的所在。这一结论看起来似乎不合常情，但仔细研究起来或许还有些道理。

美国和国民政府因战时联盟而互存奢望。美国援助不力和美国在重要政治、军事战略问题上撇开盟国自行其是的作法，使国

民政府颇为不悦；而美国对蒋介石抗日不力，更是深感失望。^①尽管如此，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仍期望中国成为维持战后亚洲稳定的一个伙伴。他们还担心国共之间的不和会导致美苏发生冲突。正因为这样，他们积极促进中国内部矛盾的解决，即便是中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的作用已明显减少以后也仍是这样。

日本的战败标志着美苏对东亚的政策开始了一个新时期。美国后勤上的及时支援，使蒋介石的军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华东和华北的主要城市，从而使包围这些城市的中共部队不能对它们加以占领。随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保卫铁路线并驻守华北的重要城市，使国民党军队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然而由于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中国东北的侵占，美国未能在国民党收复东北的斗争中起直接作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14日签订）中规定了苏联只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但满洲局势的发展使苏联的政策变得复杂化了。国民党对东北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非常敏感。同样，延安共产党领导人也制定了一项关于满洲的重要决策。他们要抢在国民党进入满洲之前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这一地区。国共双方都企望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则时而倾向这一方，时而又倾向那一方，利用其屯兵满洲所造成的局面，尽可能地攫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应国民党的要求，苏联曾两次推迟其中国东北驻军的撤退日期。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给国民党以更多的时间来接收东北。实际上，苏联的政策倒使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秋这段时间里得到好处，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接管却被延误和变得复杂化了。

华盛顿的以及驻华的美国观察家们把苏联在满洲的行动看作是人们熟知的一种侵略方式。美苏在战后赔偿、对德政策、租借法、东欧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争论，造成了美国对苏联的这样一

^① 关于这方面有很多著述，其中可参阅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79年纽约版）；梁敬尊，《史迪威在中国》（1972年纽约版，本书反映了国民党人的一种看法）。

种普遍看法：一旦轴心国战败，苏联将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潜在敌人。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的破裂以及斯大林对美国独占日本所表示的不满，使得暴风雨前的天空又布上了一层乌云。

虽然蒋介石和毛泽东举行了重庆谈判，并于1945年10月达成一项协议，但这只是一般原则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国共双方的军队仍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争夺战略阵地，双方在关键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公开的冲突看来一触即发，此时苏联又介入满洲，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些都是局势不断恶化的征兆。战后和平的到来使原来暂时平息下去的许多矛盾又尖锐起来，并且酿成了新的矛盾。

总之，到1945年深秋，中国事态的发展，尤其是苏联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对满洲的军事占领来谋取利益的明显倾向，使得华盛顿官方深感忧虑。在1945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远东部分以及随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斯大林已表现出他恢复老沙皇在辽东半岛（旅顺和大连港）的势力范围的企图。此时的情况表明，他可能谋求攫取更大的战利品。为制定出行动方针以制止这种逆流，杜鲁门政府要求中国战区的部下们提出建议。

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奉命于1945年11月14日回电说：“中国国民政府对接管满洲和应付共产党的反抗尚无任何准备。”^②魏德迈认为，苏联正暗中帮助共产党发展势力。他劝蒋介石在接管满洲之前先巩固对华北的控制。他说：“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满洲完全是中苏之间的问题。”^③魏德迈还提醒华盛顿注意，奉行使中国内地和满洲统一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政策，不但会冒卷入中国内战的危险，还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冲突。^④与此同时，在华北的美国外交官员担心，过早地撤退美军会破坏这一地区脆弱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中国》（1969年华盛顿版），第628页。

③ 同上，第628、613页。

④ 同上，第665页。

的稳定局面。^⑤

在华盛顿看来，上述悲观的分析并不说明美国为避免今后的种种麻烦应当从中国退出，而是证明了美国应进一步介入中国事务，以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既定目标。11月中旬，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埃弗雷特·左莱德论证说，为防止出现一个苏联支配的傀儡政权，美国应该帮助国民党收复满洲，亲苏的傀儡政权“将导致美苏的决裂。”^⑥

美苏在战略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在美国核心权力机构“国务院、海军部、陆军部协调委员会”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似乎还使美国决策人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项政策，把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来，交还给国民党政府。^⑦1945年11月27日三方协调委员会集会，初步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大纲。其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留驻中国，美国为国民党运兵至华北和满洲并促使中国停止内战，实现政治解决。杜鲁门总统告诉内阁成员说：为不使苏联取代日本成为威胁和平的因素，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须持强硬的立场。这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提出措辞尖刻的辞呈，杜鲁门随即任命刚卸去陆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马歇尔将军为特使来执行这项新的对华政策。^⑧从1945年12月中到1947年1月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马歇尔将军调处国共纠纷虽勇气可嘉，但最终徒劳无益。

据后来所知，马歇尔使华的基本原则是审慎地运用压力，使国共双方都做出让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⑨

⑤ 见前引《美国对外关系》，第7卷，第600页。

⑥ 同上，第633页。并参见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的尾巴》（1972年华盛顿版），第417—418页有关这一政策的评论。

⑦ 例如国务卿贝尔纳斯断言，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可以防止苏联控制满洲和对华北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前引《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62页）海军部长弗雷斯特说：“他不愿看到我们因受到苏联的压力而撤退。”（前引《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646页）

⑧ 约翰·M·布鲁姆编：《想象力的价值：1942—1946年华莱士日记》（1973年波士顿版），第520页。华莱士认为马歇尔是坚决的反苏派。（见该书第522页）

⑨ 赫伯特·费斯：《中国的纷争》（1968年纽约版），第418—420页。

但是，华盛顿的指示并没指望马歇尔成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人。美国把增强国民党在东北的实力看得十分重要，以至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玩弄外交花招的问题。马歇尔大权在握，他可以根据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来决定给予国民党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程度，但却不能不履行美国对国民党部队开往满洲所承担的支援和运送义务。^⑩杜鲁门给马歇尔的口头指示中提到，即使顽固阻挠政治解决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美国也不能丢下蒋介石不管，而应继续帮他运兵至华北。^⑪这就进一步表明了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为争取蒋介石的合作，华盛顿保证，一旦中国实现了统一和民主，美国将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大战期间，马歇尔任陆军参谋长，他始终是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有力支持者。他同情史迪威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战绩的苛评。他对国民党首脑尊重多、幻想少。^⑫然而，马歇尔在赴华前夕极力主张美国应帮助蒋介石控制满洲，因为他担心共产党的拖延战术会导致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控制。^⑬如果考虑到1945年秋季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和华盛顿的政治气候，那么马歇尔带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美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5日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中说到，美国为“恢复被日本侵略满洲所首先破坏的和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强调，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均有义务保证“中国的光复，其中包括使满洲回到中国的管辖之内。”^⑭马歇尔很快就会明白，这些听起来简单的话实际包含着多少复杂的问题。

如上所述，美国对苏联在中国特别是满洲的意图，日益感到关切，马歇尔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奉命使华的。国务院的中国

^⑩ 美国国务院编：《美中关系》（白皮书，1949年华盛顿版），第607页。

^⑪ 同^②，第770页。并见詹姆斯·F·贝尔纳斯：《毕生经历》（1958年纽约版），第330页。

^⑫ 见D·C·格普：《美国对中国的态度》（1969年德里版），第138页。

^⑬ 同^②，第748页。

^⑭ 同^⑩，第608页。

问题专家们感到，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理智上都有责任阻止中国的内战。此外，华盛顿决策者首先关心的也是中国国内纠纷的解决。因为只有这样，衰弱和分裂的中国才不至于落入苏联的虎口。这种想法贯穿在杜鲁门给马歇尔的指示中，并且成为马歇尔在华活动一年中的指导思想。马歇尔在华使命即将结束时，副国务卿艾奇逊给他打了一个电报，再一次申明了对华调处政策的实质：“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之所以极力促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全部原因的话），就是要预防中国成为导致美苏关系恶化的隐患……关键问题是要协调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又不使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我们，还有您，一直都希望中国内部问题的和平解决会有助于这种关系的协调。”^⑤虽然从来也没人明确地说出来过，但可想而知，美国的“合法权益”有赖于维持这样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它将站在美国一边；它将充分照顾美国在华的财政、商业、工业、文化和宗教利益，并跟美国携手共同反对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涉。

同华盛顿的其他官员一样，马歇尔始终对苏联在华是否会断然采取行动保持着警惕。在主动地采取任何新的步骤以扩大美国在华作用之前，马歇尔总是认真地考虑这种行动是否会导致苏联采取类似的步骤。美国愿意支援国民党，但因预料到苏联会有反应而受到很大的制约。华盛顿判断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苏联不惜直接出兵干涉而不愿看着国民党在美国的全力援助下把共产党消灭。为了使美国对此有所顾忌，苏联只须不时地发出几声咆哮即可。

美国对苏联在华活动的意图感到忧虑，这种担忧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关。尽管周恩来作了反复说明，马歇尔仍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并非一个独立自主的政

^⑤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1972年华盛顿版），第559—560页。

治组织，而是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政治上的动荡不定促使苏联去支持中共在满洲等地区扩张势力。由此可知，美国所以提出促进中国统一和稳定的政策目标，主要是由于想排除苏联的影响。美国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并非花言巧语或海约翰时代留下的残迹。在华盛顿看来，这是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途径。这个战略目标就是要防止具有危险性的苏联势力范围的形成。1946年仲夏，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曾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被排斥在中国大门之外，用不了几十年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后果：苏联的扩张势力将控制满洲和中国内地的人力、原料和工业生产。那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就会在中国海及中国南方面临一个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同1941年日本在那里所建立的颇为相似。不同的只是，苏联还可能会在欧洲和中东取得占压倒地位的优势。”^⑩所以会设想出这种地理政治的恶梦，是因为人们刚从历史上第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中脱身出来，有了亲身经验。上述这种估计显然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因素，而这必然会给1949年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带来灾难性后果，虽然这时头脑清醒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恶梦已经变成了现实。就短期来讲，华盛顿所担忧的是奉行扩张主义的苏联将通过它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来造成中国的分裂，并把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北半部置于扩张中的苏联帝国控制之下。迪安·腊斯克在1951年对这种情况所作的描述是很有名的，他把共产党中国说成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斯拉夫满洲国。

针对驻华美军的活动，苏联加强了它的宣传攻势，以此作为对杜鲁门关于马歇尔使华声明的反应。1945年11月底到12月初，苏联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图把人们的视线引到美国在华北的活动上去，以转移世界舆论对苏联在满洲行动的注意力。^⑪

^⑩ 同^⑩第27—28页。（马歇尔·S·卡特上校1946年8月14日致马歇尔将军电）。

^⑪ 最典型的作法是报道美国公众和国会中对于政府干涉中国的不满舆论。见《真理报》，1945年11月21日第4版、11月28日第2版、11月30日第4版。

12月底，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前夕，《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其中说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国家的“民主化”和团结统一。而这需要争取同“民主分子”（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真理报》的文章指责美军留在中国鼓励了中国的反动派，破坏了用政治方法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该报又声称，满洲跟苏联接壤，关系到苏联的安全，因此苏军继续留在那里是合理的。文章的结论更使人感到不安，它说：“苏军完全有理由在一定的时期内留驻满洲，而其他任何外国的军队则不应继续呆在华北。”^⑧

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讨论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企图把美军驻在华北的问题同苏军留滞东北的问题扯到一块儿，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尽量回避这个问题。贝尔纳斯向莫洛托夫反复耐心解释说，对日本人的缴械和遣返工作需要美军来做。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贝尔纳斯的解释则显然是托辞。莫洛托夫提议具体确定1946年1月15日为美苏共同从中国撤军的日期，贝尔纳斯反对这一建议。^⑨不久前莫斯科曾向重庆保证说，它要在2月初撤军，且不以美国撤军为交换条件。既然这样，此时莫洛托夫的建议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美军的仓促撤离将使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地位受到威胁；同时，苏军过早撤退又会使满洲的共产党力量得到加强，因为当时蒋介石还没来得及往那里运送足够的军队进行接收。

斯大林在同贝尔纳斯的谈话中并没有对美军驻华一事表示出强烈意见，他虚伪地说他并不反对此事，同时又说蒋介石的地位将因其依赖外国军队而受到削弱。^⑩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公报对有分歧的美苏共同撤军问题仅提到：“苏、美二外长对于两国军队应在完成义务及职责的条件下，尽早撤离中国一事，彼此意

^⑧ 苏科洛夫斯基：《日本投降后的中国局势》，载《真理报》，1945年12月19日第4版。

^⑨ 同⑧，第424—426页；同②，第845—847页。

^⑩ 同②，第848—849页；詹姆斯·F·贝尔纳斯：《直率的话》（1974年纽约版），第228页。

见完全一致。”^{②①}这使得双方可以各行其是。贝尔纳斯到莫斯科去是为了寻求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但他只得到了斯大林对马歇尔将军表示信任的安慰性保证，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也采取了类似的暧昧态度。^{②②}事实上，此时苏联还没有放弃那种对国共双方脚踩两只船的基本政策。

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曾留学苏联，1946年1月初被任命为蒋的私人特使前往莫斯科。他获悉，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疑虑因马歇尔使华而加深了。斯大林告诫蒋经国说，美国将牺牲中国的利益。同时他建议用苏联的工业技术换取中国的矿产和农产品，以巩固苏中关系。他说，他的首要目的是要让中国人保证不使美军驻在中国。^{②③}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赴苏举行首脑级会谈来讨论这些问题，但蒋介石谢绝了。蒋介石按照自己早先的立场，宁愿实行多边外交，而避免中苏之间的单独谈判。这样，美国的支持或许能补救中国力量上的不足。

杜鲁门在对华政策上所采取的进取性步骤，在国共两党内部引起了不同反响。总的说来，两党内部的基本分歧都是一些人把马歇尔的调处看成一种契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调处威胁了他们的地位。前一部分人欢迎马歇尔调处。作为国共两党领袖的蒋和毛站在他们一边，但受到党内的强烈反对。反对派拒绝任何调解的企图。国共两党中“反对和解的人”占了上风，终于导致马歇尔

②① 《直率的话》，第228页；公报俄文本见《苏联外交政策，1945年》（1952年莫斯科版），第161—162页。

②② 《直率的话》，第122页；《毕生经历》，第335页。斯大林当时正在实行他的长期既定策略，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再度表示赞同。莫洛托夫则更实际的表达了苏联对马歇尔使命的看法。但一个星期后莫洛托夫在同美国驻苏大使艾尔里夫·哈里曼的会谈中又采取了同斯大林一样的腔调，声明苏联对马歇尔使华表示赞同。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6卷（1969年华盛顿版）第689—691页。

②③ 蒋经国：《我的父亲》（1956年台北版，该书未标页码）。斯大林对哈里曼的谈话则与此大相径庭。他说，他拒绝了蒋经国要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不会同意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见艾尔里夫·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特使》（1975年纽约版），第532页。）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因为马歇尔刚刚开始调处工作，苏联人想让他卷入国共冲突中去，而他们自己却作壁上观。

调处失败和内战爆发。

为欢迎马歇尔的调处，中共领导人须考虑作出一些让步，而这些让步可能会使他们来之不易的政治和军事成果受到损害。这一点很快就在满洲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苏联对满洲的阴谋在美国引起的惊恐促成了马歇尔使华。难怪在初次同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会谈时，马歇尔便直截了当地声明：“美国有义务把(国民党)军队运送至满洲。”^{②④}周恩来曾设法阻止蒋介石运兵东北，但未能成功。马歇尔支持国民党所坚决要求的不受限制的接收满洲的权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一切部队停止调动，但国民党开进满洲的军队调动除外。^{②⑤}这期间，美国船只继续把蒋的精锐部队运往南满。

延安的共产党首脑想必算计到，马歇尔调处在政治上带来的益处要超过国民党军队自由进入满洲所带来的害处。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东北问题发布了一项指示，其中提出要在两年内在东北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这表明原来夺取东北大城市的计划因美国的压力和苏联对中共的两手策略而告失败。然而，有理由相信，以彭真和林彪为首的中共东北领导机构当时对毛的指示是勉强贯彻执行的。1946年春东北地区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希望借苏联的援助迅速夺取东北政权。

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到达中国，这为以和平方法打开政治上的僵局带来了希望。在马歇尔参与下，国共签订了1月10日停战协定。随后，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共同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政协决议。这些决议预示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结束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形成。这种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的过渡性纲领的中心要求。另外，共产党所坚决要求的充分的地方自治

^{②④}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1972年华盛顿版），第12页。

^{②⑤} 同上，第125—126页。

权也在政协决议中得到了支持。②⑥政协决议规定，在问题最后解决之前，“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持现状。”②⑦决议认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民选地方自治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采取“均权主义”。②⑧如果这些条款能在不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得到承认并实施，那么在以后的国共政治斗争中，中共在组织上的优越地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毛泽东主席赞扬政协决议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胜利”。②⑨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刘少奇在1946年2月1日的讲话中肯定了毛泽东的看法，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刘少奇强调指出，党的干部必须为在民主政权中取得胜利而学会新的斗争艺术。在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下，多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指出，今后党的工作将向城市、工厂和农村中发展。他认为，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即党内那些习惯于游击战争的同志不能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斗争形式，他们对新的斗争既无经验，又缺乏思想准备。③⑩

刘少奇的讲话提出了一个重要而且十分复杂的问题。一个长期在地下从事武装斗争的非法政党能够适应以合法地位进行和平政治斗争的新情况吗？虽然人们一般认为任何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都应该掌握这两种斗争艺术，但是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实际运用起来就不是个简单问题了。尽管在发动群众和提出深得民心的农村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内行，但在进行公开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斗争方面，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都缺乏足够的经验。③⑪

②⑥ 参阅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1963年芝加哥版），第403页。他在书中对共产党的策略作了深刻分析。

②⑦ 同②⑥，第617页。

②⑧ 同上，第613页。

②⑨ 《毛泽东文选》第10卷（1970年东京版），第27页。

③⑩ 中国研究杂志社编：《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1970年台北版），第182—185页。

③⑪ 这并非中共一党所遇到的问题，许多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在战后也存在类似问题。它们面临着武装斗争和议会斗争两条道路的抉择。见威廉·O·麦卡格：《斯大林高举战旗（1943—1948年）》（1978年东兰辛版），第31—71页。葡萄牙共产党在同萨拉查——卡埃塔诺专政斗争四十年后的1974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刘少奇认为，要想成功地实行这种策略上的转变，党的领导同志必须有意识地向广大党员讲明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新任务的重要性。在1945年4月到6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人早已承认了这一点。刘少奇跟毛泽东不尽相同的地方可能在于，刘极力支持中共军队“国家化”的方案，作为换取蒋介石政治上让步的必要条件，并且坚持认为，这一关键性步骤应该付诸实施。^②文化大革命中提到当时毛、刘之间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就当时的史料看，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

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然已经接受了华盛顿和重庆所提的要求，同意他们不受限制地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满洲，这就无疑会使中共在东北的同志地位受到威胁。另外，这两位领导人后来还特意表示共产党赞赏马歇尔在三人小组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以前，从1944年到1945年，共产党为了争取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做出了一系列努力，这些努力曾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美国认为中共基本上仍是苏联代理人的老观念。此时，周恩来在1946年1月31日同马歇尔的谈话中，再次谋求打通难以捉摸的“美国关系”。为此，他尽量消除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疑惧。

“毛主席特别要我向你说明，他重视你在停战调处问题上持公正与合理的态度。以你的态度所体现出的原则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准备在地方和全国性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我们认为，中国将采用的民主制度要以美国为榜样。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尚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并不是说很快就要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走美国的道路，是指学习美国式的民主和科学，尤其是农业改革、工业化、自由企业和使个人得到发展。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繁荣的中国。”^③

^② 同^①，第184页。

^③ 同^①，第151—152页。

这就是当时中共对一个美国官方人士所表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从这里人们看不出它和共产党一贯倡导的那种革命，也就是列宁在三十多年前所说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何相同之处。毛和周知道美国把中共看成苏联扩张主义的工具，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保证来改变美国这种看法。在以后几个月的会谈中，周恩来多次明确地表白，中共同苏联的对华政策和战略目标没有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加强，但这时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仍然可以对他的决策提出批评。有迹象说明，延安和东北的一些中共领导人怀疑追随美国的作法是否明智，他们宁愿依靠苏联。2月中旬，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满洲问题表示了强硬立场。他重申了中共对满洲问题的一贯立场，即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营（蒋在满洲的地方政府），并要求国民党承认东北的地方民主政权和共产党的军队。他进而强调指出，鉴于外来威胁已经消除，国共之间也实现了停火，又需要减轻人民负担，国民党开入满洲的部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④（这一要求跟1月10日停战协定直接抵触）同时，他还从中共的政治需要出发来解释苏联推迟撤军的问题。他宣称：“苏军不得已滞留满洲完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要求苏军解除满洲地方武装和中共武装”。他接着说：“一俟政府承认满洲的地方武装并同意和平商讨满洲问题，苏军即能够撤离满洲。”^⑤

遗憾的是，没有直接的材料能证明受苏联控制的中共领导人曾就中国东北问题同俄国人达成过什么非正式协议。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苏联在规定的2月1日撤军期限后仍将它的军队留在满洲，这样就阻滞了国民党对这一地区的接收。苏联用这种办法支持中国共产党，迫使国民党承认一个事实上的区域性联合政

^④ 《为东北的和平民主而斗争》（1946年版，出版者不详），第6—7页。

^⑤ 同上。

府。1946年3月初，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专门负责研究中苏两国共产党关系的官员雷蒙德·卢登注意到，中共在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上跟苏联一唱一和，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中共2月14日满洲问题声明发表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⑤⑥}卢登报告说，《解放日报》总编、著名的亲苏人物博古声称，只要美国还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上留有军事基地，就不能指望苏军会从满洲撤走。^{⑤⑦}如果说延安有一派人期望在满洲得到苏联援助的话，这些人很可能是受中共驻满洲领导人的支持。中共驻东北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当地中共领袖彭真、林彪等人的地位，使他们有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迫使别人接受他们的意见。看来他们实际上也这样做了。1946年3、4月间，满洲的军事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急剧变化。这时，重庆的周恩来在谈判中的自主权受到严重削弱。他不时向延安请示，而延安又显然要在得到东北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后才能做出决定。^{⑤⑧}

苏军留驻满洲为中共撑了腰。对此，国民党内开始对蒋介石温和外交的策略产生了疑问。蒋介石认为除了就有争议的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但国民党内一些人（通常属于右翼的CC系）早已对蒋主席解决满洲问题的方法感到不满。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马歇尔的调处十分反感。苏联单方面延缓撤军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遍不安情绪，加上国民党政府为收复失地所作出的长期艰苦的努力，这一切使右翼集团得以乘机发动一场攻势。另外，国民党东北行营的最高领导人物属于新政学系，CC系指责他们对东北问题处理不当，这也是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1946年2月底，重庆和其他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学生游行，强烈要求苏军立即从满洲撤走，反对苏联一切新的经

^{⑤⑥} 同②④，第513—516页。

^{⑤⑦} 同②④，第514页。

^{⑤⑧} 中共军事上的胜利不断加强着周恩来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这时他自然要实行拖延战术。

济要求，呼吁解散中共组织的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地方政府。一小撮暴徒捣毁了设在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日报》社。^{②9}国民党内反对派的策略是，把满洲的共产党人同苏联不得人心的占领联系起来，以此造成压力来改变政府同苏联和中共谈判的政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努力到此已遭到失败，这将严重地破坏政协所达成的协议。^{③0}

在1946年3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反对派对政府在满洲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们谴责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中苏谈判上，并指责外长王世杰和东北高级官员熊式辉、张家璈昏庸无能。会上，一项弹劾熊、张二人的提案大得人心。蒋对此则采取主动承担责任和息事宁人的作法。他力主双方互相团结信任。^{③1}蒋的努力为谈判和静待苏军撤走争得了时间。但反对派的行动并非没有产生效果。他们利用满洲最易引起人们反苏情绪这一点有效地防止了政府在满洲经济权益问题上的让步。^{③2}另外，他们的所做所为还引起了苏方的强烈反应，并明显地破坏了谈判气氛。^{③3}

为了回答反苏示威和中国舆论界对国民党政府满洲政策的指责，驻长春的苏军司令部就撤军问题发表了一项充满火药味的声明。特罗岑科将军虽然正确地宣称，苏联两次推迟撤军都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但他说最近一次苏军延迟撤退的主要原因是天气恶劣以及国民党不能及时把部队调往苏军驻地接防。另外，他再

^{②9} 《纽约时报》，1946年2月23日第4版；《真理报》，1946年2月25日第4版。

^{③0} 同^{②9}，第440—441页。对国民党政府东北政策的不满不仅限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中国大部分报刊都对中苏秘密外交谈判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作公开说明。东北人士则站在对政府进行批评的最前线，他们要求政府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经济要求，并呼吁将东北的领导人熊式辉和张家璈撤职。

^{③1} 《纽约时报》，1946年3月7日第3版、3月16日第6版、3月17日第27版；同^{②9}，第538—539页。

^{③2} 当时苏联要求参与对东北重要工业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③3} 《真理报》，1946年2月25日第4版、2月24日第4版；熊式辉，《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军方代表就苏军从东北撤退问题进行谈判的报告》（中文），第96—101页，载《熊式辉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特别收藏。

次把苏联推迟撤军同美军仍留在中国一事联系起来。^⑭他没有提出一个苏联撤军的时间表，从而在国民党一些人士中引起了悲观的看法，认为苏军准备对满洲作长期占领。事实上，驻东北的苏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于1946年3月5日曾命令驻沈阳的司令官作长期留驻的打算。^⑮

苏联继续占领满洲并要求在那里获得经济上的特许权引起了美国的日益关注。美国就此在1946年2月11日向苏联发出抗议照会，说苏联对中国的经济要求违反了1945年中苏条约，威胁到了美国在满洲的商业利益。莫洛托夫无礼地驳回了这一照会。^⑯当时身在重庆的马歇尔将军对此更是十分关切。2月9日他致电杜鲁门总统说：“我认为，过去一个月在华取得的成果能否巩固，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满洲局势恶化问题的尽早解决。”^⑰

马歇尔之所以这样担心，是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中共和苏联内外夹攻的威胁。他认为在改组政府之前，中国“极易受苏联慢性渗透之害”，因此他告诫中国政府应“尽量加紧实现团结统一，以消除它目前易受苏联暗中攻击的弱点。只要中国还存在着独立的共产党政府和共产党军队，这种危险就不会消除。”^⑱显然，毛泽东表示对“美国道路”感兴趣的谈话并未减轻马歇尔的疑虑。马歇尔认为中共跟苏联是串通一气的。他的策略是，运用国际上的压力使苏军撤出满洲，同时把中共揽入联合政府，以此破坏中共跟苏联的结合。这种联合政府将指挥一支忠于国家而不再受党派控制的非政治化军队。

马歇尔设想中共参加联合政府后，其政治态度将发生根本性

^⑭ 《1946年的苏联外交政策》第98—99页转载了特罗岑科1946年2月27日在《消息报》上的声明。

^⑮ A·I·科夫通-斯坦克维奇：《沈阳驻军司令》，载于《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志愿人员回忆录》（1974年莫斯科版），第366页。

^⑯ 同⑮，第1104—1105、1112—1113页。美国在3月5日提交的第二个照会也同样受到冷遇。见⑮，第1114、1122—1123页。

^⑰ 同⑮，第428页。

^⑱ 同上，第143、427—428页。

变化。很明显，马歇尔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他对民主宪法的改造能力深信不疑。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最直截了当地说明了美国的意图。他说：“减少共产党影响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国民政府把他们作为少数派吸收进来，而不是设法把他们杀绝。”^④但美国打错了算盘。就这一点来说，人们肯定会倾向于一般传统的说法：导致作出马歇尔使华决策的那些想法是天真的。美国压迫蒋介石从内容到形式上接受联合政府，绝非如美国右翼批评家们后来所说是出于政治上对共产党政治目标的任何同情。^⑤相反，马歇尔是在“极力说服那些人（国民党领袖），使他们相信让共产党参加一个民主政府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了”。^⑥

美中两国的政治观念相去甚远，最好的证明是：无论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他们对联合政府的看法都同美国大相径庭。在共产党领袖人物中，恐怕只有长期在“白区”从事城市工作的刘少奇认识到联合政府对党提出了挑战，即要求党更好地掌握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取得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艺术。其他中共领导人，尤其是军队干部，很容易认为联合政府充其量不过是夺取全国政权道路上的一段曲折，而就目前来讲，联合政府是对他们现存力量的威胁。蒋介石国民党认为，搞联合政府只会让共产党钻空子，使中共得以在马歇尔不自觉的掩护下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渗透”。^⑦蒋介石在台湾写了一本总结中国内战的书，断言联合政府正是斯大林要在中国实现的目标，因为它体现了“莫斯科想使中国‘和平过渡’的阴谋”中的关键一步。^⑧总之，国共双方都不认为联合政府是通往真正民主国家的途径，而马歇尔却是那样希望的。蒋介石和中共的军事将领都担心联合政府会影响他们获得

^④ 同⑬，第164页。

^⑤ 约瑟夫·佩雷：《阿尔弗雷德·科伯格的故事》（1969年新洛瑟尔版），第157、183页。

^⑥ 约翰·罗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1970年纽约版），第51页。

^⑦ 同⑭，第528—529页。

^⑧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年纽约版），第148页。

权力，而刘少奇恰当地运用列宁主义理论，把它看成是夺取政权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尽管存在这些基本分歧，到1946年2月底，马歇尔还是创造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奇迹。1月10日的停火协定基本上停止了关内的战斗；政协决议制定了联合政府的蓝图，它将引导中国走上立宪民主的道路；2月25日达成的整军协议规定要废除“党军”，使军队国家化而不再受党派影响。^④然而有一个问题马歇尔没有把握住，就是亟需为“日益严重的满洲局势”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不然那里的战斗继续不断就会使迄今已取得的成果遭到破坏。

马歇尔异乎寻常地试图通过提高他自己以及北平军调部的权威来解决这个问题。（军调部是马歇尔、周恩来、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组建的停战实施与监督机构）他尤其希望把三人停战小组也派人满洲，以期在那里实现停火。^⑤由于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占了上风，而且停战小组的一般任务又是使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维持现状，因此起初共产党人赞同马歇尔的提议。国民党反对这个提议，显然是由于那样会使他们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增添麻烦，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往满洲运兵以及在满洲当地调兵的自由。^⑥

3月中旬，马歇尔回华盛顿述职，这时共产党主张向东北派遣停战小组的积极性明显减退。共产党看到，紧接着苏联红军撤退而展开积极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能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好处。马歇尔给他在三人委员会中的代表阿尔文·C·吉尔姆中将拍了一封电报，其中说：“你须迫使双方立即就停战小组进入满洲一事达成一项协议……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拖延。”^⑦两周以后，停战小组终于到达满洲，但并未取得任何成果。这时马歇尔又电催吉尔姆，要他亲自到满洲督促实现停火。“停战小组就在那里，而那里

^④ 同②，第295—300页。

^⑤ 同上，第376页。

^⑥ 同上，第206、259、387、428、502页。

^⑦ 同上，第590—591页。

还在出乱子，我们不能隔岸观火。你须采取有力手段获致一个满意的协议。”^⑧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马歇尔的焦躁心情。

此时马歇尔作出“迫使双方达成协议”的决定，表明他唯恐在离开中国期间使过去已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他可能已经感到，如果在场的是他本人而不是那个不顶用的部下，就可以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马歇尔急于收拾满洲的混乱局面，所以放弃了通常的谨慎作风和靠多方会商共同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试图运用压力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成功的希望。虽然国共代表都深谙事故而不愿中断谈判，但很明显，从3月中旬到5月中旬，三人委员会的讨论并没有涉及还在不断发展的政治及军事形势的实质问题。其中的原因是不难明白的。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苏联终于从3月9日开始撤军。因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想从中得到好处，这一行动立即加剧了双方在东北的冲突。

马歇尔盼望已久的关于停战小组进入满洲的协定，于3月26日在重庆签订。协定规定：停战小组可在国民党或共产党占领区活动（但不包括苏军占领区），以达到停火。^⑨周恩来曾要求将满洲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一并解决，但协定中只含糊地保证说：

“为使满洲的政治问题得到及早解决，将就此进行单独讨论。”^⑩第一批停战小组最终到达满洲后，情况很快就证明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愿意让停战小组取得成功。国共军方人士给停战小组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这样，代表马歇尔去迫使东北实现停火的停战小组也就一无所获。

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力争乘苏军撤退之机来夺权。与此同时，重庆和延安之间政治上的互相攻击也接连不断。蒋介石在4月1日的国民参政会上怒气冲冲地发表了一篇演说，断然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共产党的要求是改组东北国民党政权和承认中共

^⑧ 同④，第737页。

^⑨ 同上，第603页。

^⑩ 同上。

在东北的地方政府及军队。^①同时，国民党政府领导人还破坏了共产党在辽北建立政府的计划。共产党想造成建立联合政府的既成事实，并把它作为整个满洲地区的样板。^②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政府言而无信，破坏了关于用谈判解决东北政治问题的协议。^③

驻华美国官员看到，中共很轻易地占领了许多苏军撤出的地区，这一事实使他们更加深信“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人之间在策略上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与合作”。^④马歇尔在华盛顿逗留一个月后回到中国。这时他发现，国共双方都不愿让出他们在东北占据的地盘。马歇尔私下里指责国民党不作让步，致使局势发展到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他力图使双方相信，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是不可能的。^⑤马歇尔显然相信美国，尤其是他自己，掌握着实现和平的钥匙。基于这种想法，他为实现东北停火起草了各种方案，想以此恢复三人委员会的权威。但是，国民党表示在共产党军队撤出长春之前拒绝考虑任何方案。共产党于4月18日占领长春后，军事上的胜利达到顶峰，因此它拒不接受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撤兵要求。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批评美国的政策，说它一方面帮助国民党运兵到满洲，一方面又试图和平地解决问题。^⑥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致电杜鲁门说：“我相信长春地区获胜的共产党军事将领们……现在正左右着中共代表的谈判。”^⑦然而，他仍幻想能说服周恩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说服毛泽东到满洲去，向固执的军队领导人讲明让步的必要性。^⑧

① 《国民参政会报告》，1946年4月4日，引自唐云：《东北问题之真相》（1946年版，出版者不详），第15—18页；中国宣传部编：《中国手册（1937—1945年）》1946年增订本（1947年纽约版），第762页。

②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1965年台北版），第154页。

③ 同①，第640页。

④ 同②，第727页。

⑤ 同上，第788—790页。

⑥ 同上，第752—753页。

⑦ 同上，第818页。

⑧ 同上，第832页。

5月份的第三周，国民党夺取长春的长时间战斗以共产党的失败而告终。国民党占领长春后不久，周恩来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他又回到谈判桌旁谋求达成一项东北停战的协议。共产党在战场上得势的时候，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是不必要的。既然战场上失利，他就又被召回到谈判桌旁，设法补救原来希望用军事手段迅速达到而又没能达到的目的。这回是国民党方面变得顽固不化，因为蒋介石命令前线指挥官要扩大战果。

早在国民党攻打长春之前，马歇尔就警告蒋介石，不要幻想在东北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马歇尔认为，国民党的军事能力远不足以在东北取胜。^⑥但是，当共产党军队向北跑过松花江，司令员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时，马歇尔的警告便显得优柔寡断了。蒋介石含蓄地忠告马歇尔，叫他不要庇护共同的敌人。蒋坚持说，只要马歇尔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就会接受蒋目前提出的苛刻条件。^⑦然而，马歇尔毫不动摇。他威胁蒋介石说，如果蒋不停止军事进攻，他将终止调处工作。^⑧不听马歇尔的警告，蒋就有可能失掉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这些正是蒋所迫切需要的。这样，蒋同意从6月6日起在满洲休战十五天。但他踌躇满志地告诉马歇尔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同共产党打交道……即使是全面内战也比这样好”。^⑨

休战期延长了下去，令人头痛的谈判一直拖到6月底。国民党的条件很苛刻，共产党又不愿多做让步，马歇尔没能填平双方之间的鸿沟。共产党担心的是蒋介石不会就此罢手，接受这种对他不利的和平，而会利用休战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以消灭东北共军。^⑩事实上，满洲国民党军司令杜聿明已经预言说，只要停战期限一满，林彪所部即将被彻底打垮。他的话无疑反映了蒋

⑥ 同④，第828页。

⑦ 同上，第906页。

⑧ 同上，第912页。

⑨ 同上，第978页。

⑩ 同上，第1010页。

的思想。^⑭周恩来提议长期休战，这说明共产党想巩固其在北满业已削弱的势力。休战期延长到6月30日，这时国共双方仍未就争论不休的问题达成协议，马歇尔的调处也就此告终，虽然毫无成效的谈判又时断时续地进行了半年。

我们上述分析的重点是马歇尔在调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马歇尔其人及其观点。马歇尔常常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物，不可能根据公开的文件档案，对他作细致的观察。尽管如此，我们这里对他在调处中的作用所做的深入分析，可能会对人们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有所帮助。关于马歇尔的思想，虽未见有系统的论述，但贯穿在他赴华调处的官方文件和记录中。

从一种明显矛盾的政治体制的构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歇尔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思想脉络。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只有在中国实行真正彻底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止共产党人席卷全国的革命。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改革。马歇尔有时相信实现改革须依靠蒋介石。当然，必须把蒋同给他出主意的反动分子区别开。^⑮不过在中国呆了一年以后，马歇尔便不再认为蒋能够实现民主了。马歇尔“不相信仅靠观察和评论就可以使委员长走上民主化道路。如果委员长身旁能有个精通民主与宪政理论的专家，经常敦促蒋实行民主宪政，情况可能会好一些”。^⑯然而，当蒋打算聘请马歇尔充当他的私人顾问时，马歇尔一眼就看出这是为了索取美援。马歇尔断然拒绝充当蒋介石这个狄奥尼修斯第二的柏拉图。^{*}马歇尔有时又设想中国共产党能作为一个合法的反对党，在地方上对政府的腐化和弊端进行批评与揭露，这样可以使执政的国民党比较廉正和有效率。^⑰

马歇尔主要是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进行公民学教育，但他也

^⑭ 同⑩，第162、644—645页。

^⑮ 同⑮，第655页。

^⑯ 同上。

* 柏拉图未能劝说狄奥尼修斯第二成为仁慈的君主。——编者

^⑰ 同⑮，第603、644页。

没有忽视，要在中国民众中实现普遍的民主，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例如，他曾和蒋介石商讨过为失业工人提供职业训练和就业机会的问题，甚至还谈到要推广教育影片来消除群众性的愚昧无知。^⑭

到调处工作结束的时候，马歇尔对国民党改革自新的希望已经破灭，也不再指望国共两党的顽固分子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敌对立场。至此，政治上的重新改组成了马歇尔医治中国疾病的新药方。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应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单一的爱国党”。这种“真正自由派的党代表了中国最光明的未来”。^⑮马歇尔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建议将他召回。信中他进一步设想在回国后立即发表一篇谴责国共两党极端分子的声明，这样他或许能促使自由党的形成。^⑯这时，马歇尔作为一个勉为其难的政治活动家，已经跳出了中国混乱的政治局面，而改用超政治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解决办法。他又回到典型的美国政治改革家的幻想中去了，希图把政治从勾心斗角的政客手中挽救出来，而通过坚持原则的超党派人士来开创一个“廉洁政府”的新时代。

然而，如果说马歇尔要把中国政治美国化的想法，完全是天真无知或是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帝国主义思想而加以否定，则是欠公平和不适当的。须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战后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时有很多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当时日本的民主土壤比起中国来要贫瘠得多，而麦克阿瑟将军却在那里播下民主的种子。（当然，最大的不同是马歇尔是个调停者和顾问，他缺乏麦克阿瑟所拥有的那种象总督一样决定事态发展的莫大权力。）在亚洲的其他地方，革命力量正在聚集，民主概念成了变革的武器。亚洲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如甘地、胡志明等，有的是出于真心

^⑭ 同⑭，第1470页；同⑮，第997页。

^⑮ 同⑮，第653—654页。

^⑯ 同上，第664页。

信仰，有的则仅仅出于策略上的权宜之计，都对西方政治崇拜备至。毛泽东曾声明他对美国的民主感兴趣。如果马歇尔本能地对此采取怀疑的态度，那么他就会希望国民党内以及无党派分子中很多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会真正追求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再说，孙中山在朝着列宁主义方向发生重大转变之前，不是也自发地吸取美国的模式来丰富自己的政治思想么？

我已指出，1945年至1946年美国政策的基本构想是促成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使之在渐起的冷战中与美国并肩同苏联作斗争。但也有理由这样说：马歇尔将军逐步扩大了美国对中国实现统一所承担的义务，它超出了马歇尔使华所包括的冷战内容。即使是马歇尔这样久经沙场、老成持重的军事家也象在他之前的很多美国人一样，曾经一度明显地受害于传教士兼教育家在中国散布的毒素。司徒雷登是个典型的传教士兼教育家，1946年马歇尔推荐他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但马歇尔不象司徒雷登，他很快就明白为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而对中国进行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从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看，最值得注意的恐怕就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那种旧观念，即认为国民党政权显然无法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或成为一个象样的政府，因此它也就丧失了统治中国的资格。^⑧六十至七十年代华盛顿在它保护下的西贡和金边政权中看作是次要缺点而且通过宣传和引导可以克服的东西，马歇尔却认为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马歇尔反复警告蒋和他的同伙说，美国不会大规模地介入中国战事去挽救自取灭亡的国民党。后来马歇尔任国务卿期间（1947年——1949年），一些人吵着说只需给中国以少量的军事援助和兵力上的支援，就能改变中国战场的形势。马歇尔不为这种诱人的说法所打动。毋庸置疑，正是在中国的那段亲身经历使他不会接受这种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任何要求和建议。

在评价马歇尔使华一事时，必须把马歇尔个人和他所要达到

^⑧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⑤，第578页。

的目的区别开来。调处过程中，他个人的品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担当调处工作的先决条件。他是一个杰出的上层人物，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代表的权力，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刚开始，他关于中国的直接知识虽然不多，但他很快地就掌握了必要的细节，并且能熟练地为谈判拟定议题，综合各种建议和解决谈判程序上的困难。在谈判的头三个月中，他坚定地但也是客气地引导勉强参加谈判的双方去达成协议。然而，在回华盛顿述职期间，和平的前景大大地暗淡下来。这时马歇尔几乎是斥责似地命令他的代理人吉尔姆将军迫使双方达成协议。这不免使他那个倒霉的部下张惶失措。此后，他又对蒋介石和周恩来交替采用引诱、蒙哄、威胁、恳求等手腕，然而却一无所获。

对于调处任务，马歇尔认为只要不爆发全面内战，美国的影响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马歇尔设想，如果和谈失败，全面内战爆发，美国的公众舆论将会呼吁美国从中国全部退出。^②与此相联系，他认为采取全力支持国民党人的政策势必使苏联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并卷入冲突。因此，最好的政策是对蒋介石进行“有条件的援助”。

马歇尔同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性质和程度上有着重大的区别。尽管他拒绝了蒋要他做幕僚的请求，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仍起着一种心腹顾问的作用。他相信，作为一个与国民党内部派系无牵连的外国人，他处在向蒋提供逆耳忠言的绝好地位。否则，蒋手下的人会蒙蔽蒋，使他看不清现实。^③尤其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马歇尔感到有责任告诫蒋及其同伙，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是他们力所不及的。1946年6月他在给杜鲁门的一份电报中说，国民党军事首脑们自认为可以打垮共产党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他预言说，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愚蠢的想法，“一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

② 同②，第1397页。

③ 同上，第1263及以后诸页。

将是不可避免的”。^④马歇尔试图通过促使蒋让步来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流露出他认为他可以比蒋更好地断定国民党政府的利益所在。尽管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非常正确的，但这已越过了蒋所规定的界限。蒋把史迪威看作是一个态度傲慢、爱到处插手的人。在赶走史迪威刚两年之后，蒋是不会允许史迪威的老上司马歇尔给他拨算盘珠子的。对比之下，马歇尔与共产党的接触是冷淡的但却是恰当的。他得到了周恩来的尊重，但周也懂得马歇尔以及其他美国人对他的事业从根本上是怀有敌意的。

马歇尔无力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解，在评价这一问题时，有两个因素很值得重视。第一，马歇尔错误地强调国共之间的误解是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在与国共双方领袖会谈时，他反复强调问题在于双方都基于错误的理由而互不信任。必须设法扫除二十年来国共两党积怨所造成的相互猜疑，这样两党才能作出必要的让步。毫无疑问，双方在相互看法上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但更确切地说，问题不在于相互的误解，而在于双方都打算一遇机会便吃掉对方。因此，满洲的问题，进一步说整个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互存偏见，而是权力之争。可以肯定，马歇尔绝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可能是认为有必要在表面上把国共间的相互误解说成是谈判中的关键问题，以便给双方任何可能做出的让步留下余地。然而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政治熏陶使马歇尔相信，谈判过程中的固执己见、地方观念、自私自利以及妄自尊大等干扰因素一经消除，和解的协议就有可能达成。

第二，调处纠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达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协议，协议的内容不应牵涉调处者个人的利害关系。换句话说，无论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调处人一方的利益都不受影响。正象托马斯·霍布斯精辟地说明的那样：“如果一方获得胜利后给仲裁者带来的利益、荣誉或快乐能明显地大于另一方，那么这样的

^④ 同②，第1101页。

仲裁者是千万要不得的。”^⑤不过，中国问题的谈判结果对马歇尔所代表的美国政府来说可并非无关紧要。华盛顿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前景是不能泰然处之的。这是因为美国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无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一伙多么恼火，蒋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没有受到美国人的严重怀疑。即使是在最后分析失败原因的时候，人们也只是认为蒋政权不值得美国作出任何合理的努力来挽救。^⑥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离开了中国。他的使命显然是失败了。马歇尔觉得他已经为公正与和平地解决中国内战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案，而国共双方却不屑一顾地把他的方案抛到了一边。毫无意义的谈判越来越没有进展，和平的幻影总是在捉弄马歇尔。若不是军人那种严格责任感的驱策，他也许早就不干了。然而马歇尔在中国调处的一年可以说是他从事外交活动的实习期，这为他后来担当国务卿做了准备。杜鲁门用这副更重的担子给他增添了新的拖累。

马歇尔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月，形势变得暗淡下来。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相信能以此最后打败共产党。他曾为达到这一难以捕捉的目标而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马歇尔在华盛顿出任国务卿期间，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第一期攻势，向南打过了冰封的松花江。随着战争的进展，第二年便决定性地扭转了满洲战场的局势，使之有利于共产党。

战争狂飙似乎更证实了马歇尔使华的失败。在长达一年的调处活动中，马歇尔力图促成一个民族联合政府。的确，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目标非但没有达到，反而激起国共两党对他和美国政府的敌视。然而，这样看问题只能是把马歇尔使华的手段与其本来的目的相混淆。从战后在华利益的角度讲，美国本无意

^⑤ 《巨物》(1960年牛津布莱克韦尔版)，第102页。

^⑥ 这段文字摘自本人所写《美苏在满洲的较量与冷战》，载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范围》(1977年纽约版)，第36—37页。

把平息中国政局的混乱作为自己的目标。罗斯福曾设想中国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国。但这个预言显然下得过早，它与战后中国的现状相去甚远。中国因饱受二十年内战和日本八年侵略战争的摧残而贫弱不堪，成了一盘散沙。美国的战略海空军力量驻扎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军基地上，最重要的是美国单方面有效地控制着日本，这些对保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远比同中国结盟可靠得多。更确切地说，战后很多关键性的政治问题都需要从美苏关系的角度加以权衡，美国对华政策也要受美苏关系的左右。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不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中的暗礁；二是最大限度地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控制。在调处国共冲突的过程中，马歇尔将军希望能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的。如前所述，马歇尔设想的中国民族联合政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与国共两党完全不同的“第三党”人士。组成这个政府的目的，一是要使各党派把通过和平竞赛谋取执政作为党派活动的中心问题；二是要拆散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同时，促成一个统一与民主的中国还可以防止莫斯科混水摸鱼。换句话说，马歇尔在华促成一个民主统一的民族联合政府是谋求划定中国政治舞台的界限，以便把苏联排除在外。答应让中共在政府中获得一部分权力并承认中共对它实际控制地区的统治权，这样就可以激发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感和安定政局的兴趣。同时，把隶属于党派的军队改编为国民军可以消除对国内和平稳定的首要威胁。

总之，马歇尔企图通过组织手段改变中国的政治素质。中国的政治将不再被枪杆子所控制，政府中的各党派都承认和平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这样就会有助于把政治活动纳入安全的轨道。只要中国政治上稍能稳定下来，美国就会减少其公开驻华的军事力量，并终止对中国政治上的斡旋。这样，美苏在相互对立的双方中各站在一个方面来插手中国内战的危险就会被永远消除掉。

美国的调处没能阻止中国的内战，这一明显的事实是毋须争

辩的。正是以此为根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一个失败。然而，如果把美苏关系放在首要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用另一种眼光看问题，就会得出多少有点不同的结论。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最值得指出的就是从1946年中到1950年，当美苏早期现实性的纷争象麻疹一样一下子全面迸发出来的时候，中国并未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争论问题。马歇尔使华间接地为此做出了贡献。

战后，苏联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没有多少余力可用于中国。不过，美国仍然采取了有条件援蒋的政策。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战略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更积极地卷入中国内战为蒋出力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这样做还得冒引起苏联干涉的危险。（当然，美国缺乏可动员的机动兵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产生杜鲁门主义的那篇演说中，杜鲁门曾夸夸其谈地保证要组成讨伐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篇讲演发表前夕，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曾对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抱怨说，美国似乎对中国政府反对共产党人的战争不感兴趣。^⑧顾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然而当时杜鲁门政府（时马歇尔任国务卿）已决意要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地中海蔓延，因此它无意为蒋介石火中取栗。

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对蒋介石越来越暗淡的前途采取明显的淡漠态度，有三个基本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在中国的表现仍然是小心谨慎的。苏联的谨慎起了消除美国疑虑的作用。苏联于1946年5月就从满洲撤兵了。马歇尔和其他人原来还担心苏联会提出参加调处中国内战的要求，但苏联克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早先苏军留驻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决策人曾因此对中国在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作出过高估计。既然现在苏联潜伏不动，从边缘地理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似乎不会对全局产生多大影响。

^⑧ <1947年3月11日下午5时15分与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国务院的谈话记录>，第5—6页，载《顾维钧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特别收藏。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迟迟认识不到问题不但在于国民党正走向失败，而且在于共产党正在取得胜利。当时美国的官员们对中国混乱的政局已经习以为常，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们对于共产党即将取得迅速而全面的胜利还缺乏思想准备。就是在共产党的胜利已经到手的时候，人们经过认真冷静的分析后仍然认为，共产党中国面临着繁重的巩固和恢复任务，它不会有多大的力量来进一步加重已经达到严重程度的苏联的威胁。^⑧

最后一个原因是，可能由于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国务卿马歇尔怀疑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来对中国内战的结局发挥重大和有效的影响。华盛顿最后得出一个莫斯科早已作出的结论：中国内部斗争的解决不以外国人的意志为转移。

经过全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歇尔的使命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冷战初起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某种联系。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心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战期间，华盛顿看待中国主要着眼于中国能作为一个反日的同盟者。不过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薄弱，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很快就减退了。此后，在冷战初起阶段，中国成了一个美苏冲突的潜在战场，成了一个力量真空地区，而苏联又可能向这一地区扩张它的势力。然而，一旦情况表明俄国人并不积极参与中国的内争，美苏也并未因中国问题而发生冲突，中国就再次降到了不受重视的地位。直到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及后来同苏联决裂，美国的政治家们才开始把它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而到那个时候，这种过去积累起来的错误和偏见已具有难以驾驭的强大冲击力。

译自美国《外交历史》(Diplomatic History), 1979年第3卷第4期。

肖健宁译 王应一校

^⑧ 这一段引自本人所写的《美中关系中的苏联因素》，载于罗伯特·奥克斯南姆、米歇尔·奥克森特格合编，《龙与鹰》(1978年纽约版)，第244页。

四十年代末期美国 对华外交策略

A·马鲁欣

三十五年前，中国国民党依仗美国全面援助而发动的内战，进入了高潮阶段。美国一方面大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另一方面怂恿蒋介石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和政府改组，以图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削弱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力量，阻止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然而，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勾结蒋介石分子，以及谋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接触的如意算盘，全都落了空。苏联的外交活动阻碍了美国的如意算盘的实现。苏联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也大力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近期著作，对此都有反映。^①

在内战已接近高潮之际，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景问题在华盛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意想不到的看法和新见解展开了极其激烈的交锋。在对华政策方面持各种见解，甚至是相互对立见解的派别纷纷登台表演。唯一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华盛顿外交的总目标——利用中国的一切条件和势力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这一冒险主义的外交政策最终大大触痛了国民党上层，首先是盲目指望“美国朋友”庇护的蒋介石本人。在蒋介石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制订的对华政策，使南京当局大为震惊。

^① 见O·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1945—1949年）——粉碎军国主义日本三十周年纪念》，莫斯科1975年版，第87—97页；A·列多夫斯基：《苏联、美国与中国人民革命》，莫斯科1979年版，第160—167页；《远东国际关系史（1945—1977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1978年版，第43—47页。

笔者当时就在苏联驻国民党首都大使馆工作。亲身的观察加上对各种消息的研究，使笔者得以透彻考察战后美国外交人士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当今美国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政策。

1948年秋季，中国内战各战场发生转折之前，美国还在全力支持南京政府武装反共。春夏两季，蒋介石在南满和华北集中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在首都，他竭力显示国民党内部在这场斗争中的团结有力，力求缓和国民党上层不断出现的危机，指望美帝国主义更坚决地插手而使内战变成国际战争。

1948年4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为数四亿美元的新援助。但是，一心指望美国参与反共战争的蒋介石，对美国新近援助的规模并不满意。1948年5月29日接替张群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职务的翁文灏，6月15日在立法院发表施政纲领演说时强调指出，他的内阁将实行进一步依赖美援的政策。而美国方面则要求国民党更加有效地利用已经提供的援助，为此主要把希望寄托在新任行政院长身上。^①

翁文灏内阁力图激化美苏关系以解决内战问题，为此施展国民党反动派的惯技——反苏主义：缩小同苏联之间本来就不密切的事务关系和接触，召回驻莫斯科代表。苏联驻华领事馆（新疆和解放区除外）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

在东北，苏中关系继续顺利发展。东北具有在物质上使1945年苏中条约生效的条件。1948年底，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条约基础上与苏联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人民解放军依靠中苏两国在1945年条约范围内进行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军事、经济革命根据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清楚地表明，东北在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指望美国加紧挽救国民党政权，他把赌注押在共和党

^① 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8月7日。

领袖托马斯·杜威竞选美国总统上面。以杜鲁门为首的民主党的1948年总统竞选纲领规定，只是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同时，向中国提供一些援助。^①相比之下，共和党的援华方针显得更为坚决。杜威6月25日第一次接见记者时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的主要施政方针是更有效地援助中国防止共产党势力扩大。^②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包括下列要点：“维护与发展历史性的中美友好政策，切实关心维护中国的独立完整与自由。”^③

南京官方宣传机构把内战同所谓“中共受到外国支持”或“存在外国侵略”搅和在一起，把人民解放军称作“铁幕后的第五纵队”，说什么政府进行的完全不是内战，而是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战争。^④

在中国北部，辽沈战役（9月12日—11月12日）^⑤即将展开。杜鲁门外交当局对迫在眉睫的军事事件感到惶恐不安，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实际上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正如美国国务院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证实，早在1948年夏季，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就怀疑蒋介石是否能保住自己的政权。

8月10日，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公函中指出，共产党继续在内战中获胜，而蒋介石一心想打败对方，南京方面人士批评蒋领导不力。虽然大使馆认为，防止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始终继续甚至扩大支持处于困境的蒋介石政府是适宜的，但是美国大使强调指出，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承诺重大责任”已经很冒险了，因为这“会超过我国（指美国——作者）的财力。”^⑥

马歇尔国务卿在8月12日致司徒雷登的复信中指示，对于建

① 见《国会记录》，1948年7月28日，第A4904页。

② 见《纽约时报》，1948年6月26日。

③ 见《国会记录》，1948年7月28日，第4908页。

④ 见《中央日报》，1948年7月23日。

⑤ 应为9月12日—11月2日。类似日期上的错误尚有多处。——译者

⑥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1949年版，第886—887页。

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不要采取肯定的态度。^①次日，国务卿又通知大使，既成局面不允许“采取任何强硬的对华政策。”^②

在驻南京使团举行的人数众多的招待会（这种招待会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由各国大使分别在其本国国庆节时举行）上，人们对美国今后是否会继续援助蒋介石政府表示怀疑。京沪两地的亲美报纸一致认为，国民党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③

但是，蒋介石领导集团仍然坚信，美国将向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军事与财政援助。国防部长何应钦8月24日专门就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④蒋介石派遣国民党中最反动的派系领袖陈立夫，带着介绍信出使华盛顿。陈立夫与杜威会晤时，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再次声称，美国应当执行“两洋对外政策”。9月30日，杜威在盐湖城对他的竞选纲领补充说，美国“一定始终分担自己的老朋友和盟邦中国当前所经受的考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第一次称国民党中国为盟邦。^⑤

蒋介石的另一位特使——前行政院长张群带着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军政合作计划，前往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张群此行的使命首先是把日本的军费吸引来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为了这样拼凑所谓亚洲联盟，蒋介石竭力使反对中共的斗争“国际化”。国民党分子毫不掩饰，他们正主动地、不遗余力地争取“在国际战争中寻求内战的出路”。^⑥

在辛亥革命三十七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演说，声称“以不变应万变”。《中建》杂志就这个演说发表评论指出，蒋介石所预言的“万变”是指美苏将进行一场原子战争。因此，“中国

①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1943年版，第279页。

② 同上，第280页。

③ 见《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9月11日。

④ 见《大陆报》，1948年8月25日。

⑤ 见《字林西报》，1948年10月1日。

⑥ 见《观察》，1948年11月20日。

现政策的重心不仅在于忍辱负重，以便等待美苏战争爆发，而且还要主动促成美苏之间发生战争。”《中国外交新阶段》一文分析了挑动对苏战争的手段及其障碍。文章承认，严重的障碍是苏联“不愿打仗，一贯坚持和平”。①

在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沈阳兵团和解放沈阳前不久，蒋介石于10月29日②答《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北平记者A·斯蒂尔时声称，一旦共产党控制整个东北，“世界战祸亦将从此开始”。蒋介石继续说，为使人类免遭第三次世界大战涂炭，首先必须拯救亚洲。中国应当成为致力于拯救亚洲的中心。他在结尾时说：“余愿美国人民及其政治家引为已任”。③

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国民党集团更加露骨地把希望寄托在杜威当选上。陈立夫甚至为杜威竞选基金捐款。北平还策划了以“杜威总统万岁！”为口号的示威游行。在美国总统选举计票那天，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表示深信杜威将取胜。他确信，一旦杜威在白宫就职，美国对华援助将大大增加。④然而，选举结果使国民党大失所望。这个打击不仅在于杜鲁门重新当选对他们不利，而且主要在于他们毫不掩饰地押在“认准了的马”上的赌注可耻地输光了。

* * *

辽沈战役告捷以后，人民解放军随即在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枢纽徐州为中心的地区的地区展开新的攻势——淮海战役（1948年11月7日⑤至1949年1月10日）。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还拿不定主意如何对待蒋介石，确定不了中国军事、政治局势可能的发展趋势。10月23日，司徒雷登要求国务院给予指示，同时从他本人的角度提出一系列左右为难的有关解决中国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方案，

① 见《中建》，1948年10月20日。

② 应为11月29日。——译者

③ 见中央社北平分社1948年10月31日电

④ 见《大陆报》，1948年11月4日。

⑤ 应为1948年11月6日。——译者

其中既有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方案，也有主张蒋介石引退的方案；既有成立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以便“更有效地”同中共“作战”的方案，又有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以便“实现中国统一”的方案。^①马歇尔在答复司徒雷登时，再次回避作出明确的指示，只是反复说明局势不允许美国今后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②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事务的方式，越来越受军事形势所左右。这时，人民解放军步步逼近上海和南京。美国空军企图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残部空投弹药和粮食。杜鲁门当局对国民党的危急处境当然立即有所反应。

11月6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说明美国驻南京大使及武官、参赞等开会讨论中国战局的结果。与会者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或者美国继续在军事上与共产党较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报告断言：“不能动用美国军队。”他们还承认，傅作义将军驻防北平的军队抵挡不住华北共军的攻势，而陈毅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则可能在两周之内从徐州地区直下南京市郊。^③

11月6日，翁文灏政府通过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巴黎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蒋廷黻，访晤当时在巴黎的马歇尔国务卿，请求美方增加军事援助，尤其是派遣由一名将军率领的一批美国军官来华。美方藉口难以满足要求而加以拒绝。^④

蒋介石立即致函杜鲁门。该信于11月9日送达白宫。信中称，中国有“丧失民主事业”的危险。蒋介石说什么中国战局恶化的最基本原因是苏联不遵守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持蒋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杜鲁门11月13日复函蒋介石

①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85页。

② 同上，第286页。

③ 同上，第894页。

④ 同上，第888和287页。

石，没有对未来作出任何承诺，仅仅保证美国将履行既定的援华计划。^①

华盛顿外交当局对中国当前事件所持的令人捉摸不透的立场，使国民党人大失所望。美国报刊把这种立场称作“观望政策”，或者叫做“没有政策”。所谓美国对华没有政策，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当局在中国内战转折时期采取的一种见风使舵的权宜之计罢了。

南京政府继续坚持要美国正式说明其对华政策。顾维钧大使不止一次为此拜访国务院和白宫。11月24日，他呼吁美国人火速援华，以对付中共这一“共产国际代理人”（顺便说说，从1943年起共产国际就不存在了）。

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孙科为行政院长，接替翁文灏。翁文灏内阁垮台，是因为实行了煽动反苏战争和把宝押在美国总统选举上的方针。同一天，立法院致电美国国会，请求向中国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国民党报纸纷纷发表社论，再次用所谓东方侵略的怪影来吓唬美国。报纸写道：“美国应当更广泛地看待中国问题。事关东亚和世界的前途，美国不应当犹疑不决”，^②“如果援助不及时，世界性灾难必将发生”，^③“中国乃在东方实现国际和平的关键”。^④国民党报纸在整个12月里继续呼吁美国火速援助蒋介石政府，反苏主义始终是蒋帮的主要论据。

美国最高当局在中国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和第七舰队司令官柯克主张向蒋介石提供广泛的军事援助。周以德、克拉克及其他院外援华集团分子大肆活动，要求增加对南京政府的援助。共和党人麦劳向国会提议，“不惜冒险与俄国打仗，也要立即援助中国”。^⑤美国统治集团中狂热偏袒蒋介石之徒

①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88—890页。

② 见《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6日。

③ 见《新闻报》，1948年11月26日。

④ 见《益世报》，1948年11月27日。

⑤ 见《大陆报》，1948年12月3日。

及其辩护士，企图趁共和党人在国会仍旧占据多数之机，把援华法案确定下来。

在对华政策上的两派斗争尚未平息的情况下，谋求不诉诸武力干涉便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马歇尔-杜鲁门路线，不能忽视中国人民革命及其强大的国际后方苏联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因素。白宫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在欧洲实现马歇尔计划的沉重的财政经济负担。

正当留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着手组建一个由美国“志愿”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以“阻止共军攻势”的时候，司徒雷登大使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向这位美国将军指出了他办这件事的危险性。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S·布里奇斯正式委托前美国驻苏大使W·布利特搜集材料，作为援蒋的依据。布利特乃大肆活动，但是由于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中失败，其活动没有收到任何效果。^①

美国报刊在中国问题上仍然争吵不休。《生活》杂志称中共为“莫斯科的信徒”，断言中共政权是“美国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要及时把注意力从欧洲移向中国。^②美国大多数报纸认为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是正确的，其理由是：“对于一个既得不到本国人民信任，又缺乏切实的政治基础的虚弱的政府，援助是救不了它的。”^③

在中国的亲美报刊公开提出，必须撤换南京领导人、废除等级制、杜绝营私舞弊和封建传统。^④同时，由于担心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它们认为美国必须在“好朋友确实需要帮助的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以便抵御共党的攻势。^⑤也有的人举出谋求同中共妥协的理由，因为按照美国人的看法，“中共分子与其说是马克思

^① 见《南京日报》，1948年11月24日。

^② 见《生活》杂志，1948年11月22日。

^③ 见《巴尔的摩太阳报》，1948年11月23日。

^④ 见《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11月20日。

^⑤ 同上，1948年12月4日。

主义者，倒不如说是地道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①

正是这家报纸企图说明，美国外交当局的任务在于援助那些适合美国口味、准备谋求妥协的中国政治势力。②

美国的对华观望外交，实际上是美国力图用“民主”联合政府取代蒋介石政府的一种障眼法。其用意是阻挠全国解放，遏制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进步刊物《群众》载文说，美国人是不会心甘情愿离开中国的。美国扶植和豢养中间党派，组织并加强亲美势力，竭力巩固军阀的地方政权，供给他们武器，以及指示“改革”大计。③

美国特务机关急急忙忙地发展它的谍报网，到处开辟渠道，以便同民主的敌人取得联系并给予援助。他们制定了反革命活动的具体计划。但美国最关心的是，不要在中国形成对美国不利的舆论。司徒雷登给马歇尔寄去陕北电台揭露美国在华秘密机构的特务活动的广播电文时，强调指出共产党这一揭露所起的不良影响。④

有人试图用“呼吁和平”的蛊惑性手段来制止前线局势的迅猛发展。南京的大学知识界搞了一次“呼吁和平运动”，领头的是一个国民党教授刘不同。运动的结果是由一批教授上书蒋介石和毛泽东。⑤刘不同的挑衅性活动被蒋帮利用来攻击中国共产党。

人民解放军开进沈阳后发现，美国企图在解放区保留它的官方代表。但是过了半个月，新政权逮捕了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驻沈阳领事安吉斯·华德及其四名同伙。原来美国领事馆在辽沈和内蒙设有十一个据点，它们从事政治与军事侦察活动，以及破坏新政权的活动。《人民日报》在发表新华社关于人民法院判决美

① 见《大陆报》，1948年11月16日。

② 见《大陆报》，1948年12月15日。

③ 见《群众》，1948年第46期。

④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82—885页。

⑤ 见《和平日报》，1948年11月23日。

国间谍的消息时声言：“人民政府保护外国人的私人利益，但决不容许他们进行犯罪活动。”^①

许多美国人并不急于离开自己的宅第，随蒋军一同撤退。这种做法博得垄断集团的称赞，它说：“美国实业家打算留在中国同共产党人做生意，这可称得上绝处逢生。”^②国务院很赏识实业家们从“对中国人民中立友好的”立场出发，“自担风险地进行活动”。^③据12月8日《大陆报》报道，有四十个美国实业家和一百五十个英国实业家决定留在天津。留在新解放区的还有美国传教士。例如，路得派新教教会决定留在其设于中国的教堂、普通学校、专业学校、医院及阅览室继续活动。^④

美国把自己的领事馆人员和侨民留在已解放地区，这本身表明美国希望调整同新政权的关系。此外，美国对已解放地区的政策的重心是，希望在中国维持一个内讧的局面，即让反动势力与人民民主力量进行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院外援华集团分子和中国学家预言：共产党的胜利并不能使整个中国统一起来，各省政权仍将长期控制在军阀和政客手中。他们不仅寄希望于反共基地和反革命匪帮，而且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由于民族主义倾向和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的发展而自行瓦解。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美国报界和中国亲美报纸纷纷报道美国学术中心和国务院的资产阶级中国学家就中共的政治性质而展开的讨论，他们大多数人认为，中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力主土地改革的政党”。美国外交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不在援蒋和同情蒋政权遭遇的性质上，而在中共一旦打败国民党，美国将取何种政策上。

在淮海战役紧张进行期间，蒋介石最后一次力图使美国火速帮助他挽救危局。12月1日，蒋夫人宋美龄带着特殊使命抵达华盛顿。她两次得到马歇尔接见，第二次会谈持续了四个小时。12

① 见《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8日。

② 见《商业周刊》，1948年11月20日。

③ 见《大美晚报》，1948年12月8日。

④ 见《大陆报》，1949年1月7日。

月9日，杜鲁门又接见宋美龄。蒋夫人本来想争取华盛顿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争取在民主党占优势的下届国会召开之前解决援华问题以及派麦克阿瑟将军赴华指挥国民党武装部队和批准给中国三十亿美元的拨款计划。但是，宋美龄此行一无所获。杜鲁门总统没有作出任何新的承诺，他声称，美国不准备干预中国的军事。^①

同一天，即12月9日，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议院发表声明说，他的政府将遵守1945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②

华盛顿外交当局在中国问题上的下一步骤是：派美中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赴华。12月13日，霍夫曼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只要共产党人尊重“基本自由”，在中国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③

于是，美方暂时停止执行从尚未动用的七千万美元拨款中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工业、运输设备的计划，而且借口避免落入中共之手，把给蒋介石运送武器的运输船扣押在菲律宾和冲绳。^④

当时正是蒋介石在南京执政的最后两个星期。在进行淮海战役（最终消灭国民党五十五个师，总计五十五万五千人）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对蒋军展开了第三次决定性攻势——平津战役。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濒临绝境。

12月13日，张群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前往美国大使馆，探询司徒雷登对下述问题的看法：既然美国人也主张蒋介石引退，那么蒋介石在必须引退的呼声日高的情况下该采取何种对策。在长时间的会晤中，张群重弹蒋帮的滥调，说什么苏联背地里支持中共打内战。司徒雷登大使最后明确表示，他主张蒋介石“放弃权力”，因为他掌权是“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障碍”，这是“大多数美

① 见《和平日报》，1948年12月14日。

② 见《大陆报》，1948年12月10日。

③ 见《自由论坛报（自由西报）》，1948年12月15日。

④ 见中央社华盛顿分社1948年12月14日讯。

国人的看法”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司徒雷登大使接着说，美国准备帮助中国获得“体面的和平”，张群及其他中国领袖应当“做些建设性的工作，而且越快越好”。^①

12月17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同司徒雷登会谈时，请他就国民党继续打下去还是“乞求和平”提出意见。司徒雷登提出了一种左右为难的说法：一方面，美国对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它又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中国人民要求和平，而蒋介石却千方百计想打下去。美国大使巧妙地表示：“关于用军事还是政治手段同共产主义作斗争更有效的问题”，应当由孙科本人及其同僚决定。^②

司徒雷登在12月21日的电报中，向马歇尔报告了他于12月17日同胡适会见的情况。胡适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学者，过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首领，现在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在中国旧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不消说，在美国外交界心目中，胡适是没有蒋氏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最有希望的首脑候选人。虽然胡适在同司徒雷登会谈时强调他效忠蒋介石，但大使要求这位国民党教授重新肩负起“新思想运动”的领导责任，挺身拥护“自由与民主”；大使还同他“讨论一旦成立联合政府，美国将采取何种政策”。^③

当时，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认定：“除了让事态自然演变到有可能帮助中国人用他们所希望的政府取代共产主义统治以外，美国没有别的选择余地。”^④

孙科直到12月23日才完成组阁任务。政府危机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国民党上层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而被迫采取应变策略

①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95—896页。

② 同上，第896—897页。

③ 同上，第899页。

④ 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48年12月17日。

时才宣告结束。孙科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实现和谈。①

美国外交当局致力于尽快促使南京政府谋求“体面的和平”。12月28日，司徒雷登约见新任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对他重复了华盛顿的暗示：美国等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一旦时机到来”，美国很快就会给予援助。12月30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对孙科内阁在蒋介石许可下所采取的头几个步骤，表示悲观；他认为，“蒋氏下台是同共产党人进行任何谈判的前提”。②

蒋介石在其致同胞的新年文告中声称，他的政府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的方法，他暗示：他“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各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这是他准备辞去国家元首职务的声明。但是，国民党报纸的新年评论所谈的不是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问题，而主要是对“中美关系的转机”表示惋惜，并且论证什么“东半球是美国的切身利益之所在”。③

提起美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们顿时会联想到上个世纪的门罗主义，据说，门罗主义在现代条件下不应当只适用于美洲大陆。参议员乔治·梅隆主张“把门罗主义扩展到西太平洋和亚洲”。④《益世报》用两天的篇幅发表《从门罗主义到杜鲁门主义》的社论，文章确认什么中国已纳入“美国切身利益的范围之内”。⑤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推测，由于蒋介石行将引退，“共产党人可能提出自己的联合方案”，以便实现政治上的调整。大使馆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冲突即将结束”，⑥因此，华盛顿对华外交的重要任务即将完成。马歇尔恰好在这个

① 见《大陆报》，1949年1月1日。

②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99—900页。

③ 见《救国日报》，1949年1月1日；《和平日报》，1949年1月2日；《展望》，1949年1月15日，等等。

④ 见《大陆报》，1948年11月30日。

⑤ 见《益世报》，1949年1月2日与3日。

⑥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89页。

时候离任，由艾奇逊接任国务卿，这个变动在国民党所有报刊上掀起一阵新的政治浪潮。

在蒋政权危在旦夕时，苏联驻南京大使馆以及驻北平、天津、上海的总领事馆，实际上无法进行日常工作。警察和密探加紧监视苏联驻华机构和人员的活动。使馆工作人员同中国团体、机关的联系与接触实际上中断了。

但是，尽管国民党上层坚持反苏立场，但它还没有下决心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且在美国的指使下，为了通过和平手腕摆脱军事危机，国民党免不了要同苏联大使接触，指望此举能对中共的立场间接施加影响。这种接触由副总统李宗仁维持。1948年底，张治中将军和前任驻苏大使邵力子拜访苏联大使馆。1949年1月，他们被委任为国民党同中共领导人进行和谈的代表团成员。

1月8日，蒋介石通过外交部请求苏、美、英、法出面调停国共谈判。苏联政府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提议，因为这种调停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其他大国也相继拒绝这一请求。1月12日，华盛顿当局在十分详细的复电中向蒋帮说明，美国政府认为，参与“当前局势”的调停有弊无利。^①

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平津地区结束了分割与歼灭蒋军五十二万人的战役。先是在1月14日占领天津，俘虏国民党官兵十三万人。后是向傅作义将军及其二十五万守军发出了劝降书。

1月20日，杜鲁门在就任美国下届总统发表施政演说时，提也不提美中关系。当天，民主党取代共和党，在国会占据多数。蒋介石期待“美国友人”关照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国民党面临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直接威胁，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时间，以保住京沪地区和华南。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奉化“休养”，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同一日，孙科内阁提出总辞职。与中共领导进行谈

^①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91页。

判的“和谈代表团”也于此时组成。1月23日，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款。京沪各报报道，“曾经帮助过中华民国政府，并提出过建议”的美国军事顾问联合小组结束了自身的工作。^①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

人民革命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统治的覆灭。尽管美帝国主义竭尽全力，但无法防止蒋介石在内战中的败局和蒋政权的垮台。美国冒险主义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了。

译自苏联《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3年第3期。丁如筠译 郑厚安校

^① 见《大美晚报》，1949年1月26日。

耶稣会^①士在中国

A·布鲁

一

我们的江南传教区，从前叫做南京教区^②，位于扬子江口。过去，传教士抵达那里，需要一年半或两年时间，而且有三分之一死于途中。今天，从马赛到上海，中途停靠塞得港、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香港，一个月时间就够了。

这个传教区地域辽阔，有二十四万二千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半个法国。它包括沿海的江苏和在內地的安徽两省。居民五千三百六十五万（1901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传教区。城市的人口数：上海六十五万，苏州五十万，南京三、四十万，无锡二十万，镇江和芜湖十七万，扬州和亳州十万。农村的人口密度，江苏每平方公里是二百四十人以上，安徽是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在扬子江口的海门，密度达到七百人，而其邻近的崇明岛竟高达一千四百七十五人。两省土地肥沃，捐税占全国十八省的四分之一，但因人口众多而显得贫穷。

这个广阔地区是托付给耶稣会士^③的。新耶稣会士继承着老耶

①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创始人是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正式成立。耶稣会会规要求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会长和总会长，还规定会士立“绝财”、“绝色”、“绝意”三誓愿外，须效忠教皇，无条件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本文脚注都是译者加的。）

② 南京教区，随着教区的沿革曾定名两次。第一次是1690年罗马教廷宣布成立的南京教区，属印度卧亚总主教区。第二次是江南传教区分为江苏、安徽两教区后，江苏教区于1926年分出海门教区，改称南京教区。

③ 西欧国家的耶稣会士，在耶稣会于1773年被解散之前来中国传教的，称老耶稣会士，1842年后重来中国的，称新耶稣会士。

稣会士的传教遗业。1599年，利玛窦（Ricci）神父终于在江苏省垣南京定居。1608年，郭居静（Cattaneo）神父把十字架插到了当时无足轻重而今是世界上最大商埠之一的上海。在上海撒下第一颗信仰的种子的，是徐光启。以后信教的人不断增加，一百年之后已有了十万教徒。1690年建立了正统制的南京教区。耶稣会士的会院曾有二十三处之多。

继之而来的是考验的年代。江南有过一些殉教者：1748年9月12日，谈方济（Tristan d'Atimis）和黄安多（Antoine Henriquez）神父在苏州因信天主教而被绞死。以后耶稣会被取消。奉命在南京教区内公布教皇克莱芒十四（Clément XIV）关于解散耶稣会的谕旨的南怀仁（Laimbeckoven）^①主教，本人就是耶稣会士。从此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放弃阶段。在中国的葡、法、德籍耶稣会士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后，没有人再来自欧洲接替他们。四十年之内只有屈指可数的若干中国籍的老耶稣会士（最后一个姚若翰，死于1796年）、遣使会士^②和无会籍的神父^③在传教区服务。在这阶段，教徒的人数下降了。1840年只有五万教徒。有些地方以前有许多教堂，后来几乎成了无教徒的地方。

中国的神父和信徒知道世界上还有耶稣会士后，就迫切恳求他们重来中国。但只是到了1842年，耶稣会士才得以再来。南格禄（Gotteland）、艾方济（Estère）、李秀芳（Bruyere）三位神父到达上海，协助教区主教罗伯济（Louis de Bési，亦名罗类思）。那时中国籍神父只有十人，且其中四人已年老力衰。教徒们几乎在五年或六年内才能告解^④一次。他们中有的搞迷

① 与清初来中国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使用同一个汉名。

② 遣使会的成员。遣使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1625年由法国人味增爵（Vincent de Paul）创立于巴黎。耶稣会被解散后，遣使会士来到中国，替代了耶稣会士。

③ 天主教神父有入修会的，有不入修会的。不入修会的神父，即无会籍的神父，亦称“世俗神父”或“神职班神父”。

④ 天主教内教徒向神父“告罪”，神父为之“解罪”，称“告解”。

信^①活动，有的不知道教义教规，有的赌博，存在着混乱现象。但是，教会还在。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它坚持下来，证明了老耶稣会士所创建的教会是牢固的。

现在该是使这个教会重新走上发展道路的时候了。工作在困难重重中进行。果真，1844年和法国签订的条约，保证了传教士在帝国通行和教徒信教的权力，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教难结束了，但是各种考验不断地接踵而来。1849年大水灾之后，接着是饥荒、贫困和流行病。1852年发生内战：十年间，来自南方的太平军乱徒占领南京，打败清军，传教区的发展陷于停顿。以后，法国为传教士获得了新的特权，但中国官员不履行协定，因此继续和他们进行了三十年的斗争。在此期间，教堂和孤儿院被劫等堪称为教难的事，屡屡发生。1866年，1869年，1870年，1876年，1884年，1891年，发生的事件都带有暴力性质，只是严重的程度不一罢了。1900年发生义和团巨变时，江南传教区靠了两江总督的聪明才智，才得安然无恙。

二

经过这六十年，传教区几乎扩大了四倍。下面提供若干数字，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天主对传教事业的祝福。

1842年开始时，在罗伯济主教的领导下，大约有五万教徒和四、五个身体健康的中国籍神父。学校、修道院、孤儿院，开始草创。1848年神父的数字是二十六人，其中七、八人是无会籍的中国神父。今天已有了一百九十九人：一百三十三名欧洲耶稣会上，二十五个中国籍耶稣会士和四十一个无会籍的中国神父。大修道院有修士三十一人；它已经给传教区输送了近百个中国神父。修士修女中有三十五个主母会修士（*Petits Frères de Marie*，三十四名圣衣院修女（*Carmélites*），一百个拯亡会修

^① 天主教称天主为“真神”，称别的教所奉的神为“邪神”，并把敬拜“邪神”的活动叫作“迷信”。

女 (Auxiliatrices du Purgatoire), 四十一个仁爱会修女 (Filles de la Charité), 十六个安老会修女 (Petites Soeurs des Pauvres)。在这些修女中, 大约六十个是中国籍的。献堂会 (Presentandines) 都是中国籍修女, 共一百四十二人。还有三十八个守贞的教经先生, 二百九十二个普通的教经先生, 八百名贞女和相当数量的男女教师。

传教区的真正中心在离上海城八公里的徐光启的家乡徐家汇。新来的传教士一下船, 就到那里学习中国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新来的传教士如果已是神父, 那末一般不消一年, 他就能到农村去传教了。如果还不是神父, 那末他就去徐汇公学当学监或教课, 也可以和大修道院的修士、读神学的中国籍耶稣会修士, 一起攻读神学, 准备成为神父。除了学校、神学院和大、小修道院之外, 在徐家汇还有闻名远东的观象台、自然博物馆、圣心报 (Messager du Sacré-Coeur) 馆、男孤儿院、印刷所、男工场间、圣衣院。还有在拯亡会修女领导下的献堂会初学院, 妇女教理讲习所, 兼收教徒和非教徒女青年的住宿学校, 有六百个孩子的女孤儿院, 有四百个女工的工场间, 一个施诊所。还有一所初创的取名震旦的大学(现迁至卢家湾)。

依靠这些不同的事业, 天主教给中国人留下了合法进步的印象。现在中国也像日本那样, 开始有了自由思想, 论证这一点是必要的。

主教在上海的座堂和住所, 靠近中国县衙门和租界。在这个国际大城市里, 耶稣教把金钱用在许多欣欣向荣的教育和慈善事业上。天主教的事业也颇可观。在城里, 在近郊, 在法租界和美租界内, 共有四座天主教堂。体现出天主教的仁爱之道的是, 它设有四所医院, 还有安老会的养老院、几个施诊所和拯亡会的孤儿院。拯亡会的修女们还在一所为欧洲青年办的寄宿学校和一所为中国人办的走读学校内从事教育工作。主母会办有圣方济中学、圣若望·伯尔各满寄宿学校和法国工部局学校。

在芜湖，有一所传教区所辖的安徽中心住院、二所小医院、四个施诊所、一个为守贞的教经先生办的训练所。去年（1907年——1908年）三十三个孤儿院收了七千六百十五个孩子，其中一千一百七十六个自己收养，六千零九十三个寄养在一些家庭中。在二百七十八个教理讲习所中，学过教理的望教者，男的有一万三千六百九十四人，女的有六千四百九十九人。一千三百零五所小学共收教内外男女儿童二万六千一百三十七人。

1848年有三百五十一个堂口，今天有了一千三百十八个。从前一年内给八百十八个教外孩子付洗。这些年来，每年付洗的数字经常超过四万个。1907年至1908年是四万三千零五十二个。从开始到现在，总数是一百三十二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他们在洗礼中获得重生^①后，大部分是死了。江南好比是圣婴会的天堂^②。

但更重要的是成年人的受洗。1848年，登记入领洗册的有六百三十一人，望教者有五百零六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平均增加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义和团战争后增加数字尤为显著。1901——1902年，是四千四百零四人，以后各年是五千零九十二人，四千七百三十八人，六千一百七十人，六千四百六十六人，七千九百八十三人。1907年至1908年，达到八千六百三十七人。

若不是为了对望教者给予严格的培养，成年教徒的受洗人数可能还要增加二、三倍。望教者越来越多。从1901年起，望教者的逐年数字是：五万二千人，六万六千五百三十人，八万五千八百九十三人，八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人，九万二千零八十一人，八万七千五百六十人，九万五千零十三人，最后1907年至1908是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七人。正是望教者数字的持续增加，比其他一切更表明在有些地方产生了归向天主教的运动。“圣神^③要在哪里启

① 天主教称人有“原罪”。受了“洗礼”后，“原罪”被赦免，“灵魂”获“重生”，可上“天堂”。

② 新耶稣会士重来江南后，法国成立了“圣婴会”从事募捐活动，提供经费给耶稣会士开办孤儿院，收中国婴孩，予以付洗。

③ 天主教称其教义中“天主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为“圣神”。

迪人，就在哪里启迪人。”

自1842年起，每隔十年教徒的总数增长如下：五万人，七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八万三千八百九十七人，九万九千五百九十八人，十万零五千三百五十三人，十三万四千四百七十人。最后1907年至1908年达到十七万三千一百十三人。再过三、四年，就能达到二十万人。七十年内增加了四倍。

从传教的发展情况来看，教区所包括的两个省很不相同。江苏大部分地方有老教徒，特别是在上海的四周和扬子江以南。那里，传教士大都是管理着堂口的本堂神父。往北，情况迥异，有些地方是耶稣教在传教，有些地方过去有天主教徒，现在已经叛教了。但在西北部，如新开教的徐州府，去年望教者的数字是三万三千九百七十四人。徐州靠近山东南部。山东南部是德国传教区，仅望教者有四万四千五百六十四人。安徽省是新传教区，老耶稣会士几乎没有到过，1867年还只有三个堂口，而现在已有二百九十七个堂口，有三万零八百七十六个教徒和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个望教者。

教区下面分为在总本堂神父管理下的总本堂区，总本堂区分为由一个本堂神父或一个本堂和一个副本堂神父管理的本堂区，本堂区分为有大、小教堂的堂口，每个堂口有教经先生、贞女和学校教师。江苏、安徽两省总共有十九个总铎区，一百十八个本堂区，一千三百十八个堂口。

每个传教士领导着若干大小教堂。一个大的本堂区好比法国一个行政区，下设十个、二十个分区。在徐州府西部，八个本堂区的教堂数依次是：十八、二十一、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八。四十八个教堂只有一个神父。至于所管理的教徒人数，在江苏，一个神父管二千以下教徒的很少，有些神父有教徒三千以上，有的本堂区有五千教徒。有老教徒的总铎区，望教者比较少。在安徽，教徒众多的本堂区是不多的，只有一个本堂区的教徒超过一千五百人。为补此不足，没有一个神父

不在致力于发展教徒的工作。

三

在有老教徒地方的传教士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从这年的九月到次年的耶稣复活节，从一个堂口到另一个堂口为教徒开四规^①和施行圣事^②。早上四点半钟起身，做默想。六点钟，教徒来到教堂。教徒诵经，神父做弥撒，宣讲真道。近八点钟，给孩子们讲解教理，教经先生准备开四规条子。每天约为三十人开四规。九点钟，给要办神工^③的人讲道，然后听神工。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二点钟之间，找一个时间吃饭。二点钟之后，同当天办神工的教徒拜苦路^④。第二次讲道，第二次听神工。六至七点钟，吃晚饭，念日课经^⑤，等等。晚上，谈论省里发生的事情。十点钟过后，始上床入睡。

在每年的传教工作中不乏到各堂口去的机会。每个堂口的主保瞻礼^⑥有神父参加。十二月，神父要到各个教堂去看看那里读书的人数。二月又要去视察学校。三、五、六月，要到各处举行敬礼圣若瑟、童贞圣母、耶稣圣心的弥撒。此外，还要看望病人，降福婚配，处理迫切事务。传教士的生活就是不断奔波。他徒步行走于没有道路的田野，坐船过河，不论雨天，晴天或者雪天，都要坐独轮车或骑着骡子赶路。夜里借宿于人家，在神父看望过后的日子里，办事人、贞女、学校里的老师照顾着堂口，逢到主

① 天主教规定教徒必须遵守四条教规，称为“四规”。“四规”中的第三规是，教徒“办神工”和“领圣体”，每年至少一次。教徒到教堂履行这一规，叫做“开四规”。

② 天主教称神父为人“付洗”、为教徒“解罪”，给教徒“送圣体”等为“施行圣事”。

③ 天主教内教徒向神父“告罪”，称“办神工”，神父听教徒“告罪”，称“听神工”。

④ 天主教徒纪念“耶稣受苦受难”的宗教活动。

⑤ 天主教规定神父每天必须念的经文。

⑥ 天主教把一年中许多日子定为敬礼“天主圣三”、它称为“圣人”的“瞻礼日”。各天主堂奉为“主保”的“瞻礼日”称“主保瞻礼”。

日^①，领导教徒过主日瞻礼。

在有望教者的地方，例如有些总铎区记录着有三千人、一万五千人、一万八千人、二万六千人要求领洗。在那里，一项特殊的工作落到传教士的肩上。要求领洗的人如此之多，而他们的情况各异，在未作决定之前，必须多多研究他们。这些穷苦人愿意成为教徒，但常不是单为寻找天国。假定他们要求入教的动机是诚朴的，让他们成了望教者，但他们毕竟有着人的弱点，所以选择仍是必要的。各堂口都不接受单身汉入教，也不单独接受一家一户入教，而是让他们自己去结成一伙，并成群而来。他们成群而来之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查考，并叫他们耐心等待和激励他们要求领洗的愿望。先是教经先生去看望他们，并开始教导他们。在一年内他们学习诵经祈祷。然后传教士从中选择二十个左右准备得好的，进教理讲习所，用一个月时间考察他们，训练他们，教育他们。

一清早，为已经领洗和预备领洗的男人、女人、小孩讲解要理，接着是弥撒。之后，教经先生教给围在他身旁的四十岁、五十岁，甚至六十岁的望教者划十字，复习经文，并予以记分。九点半吃早饭，吃的是高粱面馒头、高粱粉豌豆粉做的汤和生萝卜。吃罢早饭，到教堂拜圣体。^②教经先生向神父报告成绩，分析每个人的进步、品德、行动、聪明和他们对领洗的愿望。之后，望教者先排列在神父面前，背诵经文，回答问题，讲述他们的情况。经过这种直接的接触，神父才作出决定，答应给他们付洗说：“我的孩子们，我要使你们重生，使基督生活在你们身上！”然后，把他们集合在神父的房间内，采用谈话和对话的形式讲解要理，问和答交叉进行，非常活跃，有心灵的呼声，小眼睛中闪耀着领会的光芒，憔悴的脸呈现出笑容。在这美好时刻和心心相印的过程中，神父经

① 天主教称星期天为“主日”。

② 天主教称神父在弥撒中“祝圣”的面饼为“圣体”，即“耶稣的实体”。

常看到圣宠^①和信德^②对望教者做着工作。郁郁无表情的面容突然开朗了，眼睛湿润了，态度完全变了。这情景将持续下去，效果已产生，印象不会磨灭：这是从今以后皈依于您的另一个人了，他是信徒，一个爱慕和尊重神父的孩子。望教者整整一天时而在查考学生的神父的观察下，时而在教读要理、经文的教经先生的教导下，学要理、交谈、祈祷。

然而住宿在教堂学习教理的这段时间，麻烦也不少。有的人脑子迟钝，记忆力差，什么都记不住。另一些人有思乡病，想着他的犁和牛。一个小贩借了五百个铜板让妻子和儿子维持生活，家里铜板用完了，他得另外去借，然后再回来。在这为期三个星期的教理讲习所内，要克服多少次不称心不如意的事情，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要得到领洗的代价。因此，天主自会把如此丰富的圣宠赏赐给这些善良的灵魂，^③是不足为奇的。

除了吸收望教者入教的工作外，神父还得关心教徒，教导他们，访问他们的家庭，给病人施行圣事。还要去拜望绅士和官吏，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还要极度耐心地同来讨膏药、奎宁的望教者，同来要求帮助打官司的教徒，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在做了好几个月这样的工作之后，传教士需要休息了。暑期的休息称作“歇夏”，冬天的称作“避静”^④。最紧要的是灵魂的休息。每年，一月或二月间，传教士们回到某一个已布置就绪的中心住院，在那里做八天的避静。以后在七、八月间，两个省的传教士，有的到上海附近的徐家汇，有的到扬子江边的芜湖，过十五天左右的集体生活。在传教生活中，长辈所规定的这避静和歇夏，对灵魂和肉身是再好没有了，可以重新恢复工作的热情，可以共同商议，遭到过不可避免的挫折的则可以得到安慰。为了使

① 天主教称天主赐予人的恩宠为“圣宠”。

② 天主教把信仰天主称为“信德”。

③ 天主教称人有“灵魂”和“肉身”，又称“灵魂”是“不死不灭”的。

④ 亦叫“退省”。日期有一天、三天、八天，甚至四十天不等。天主教称在“避静”期内，参加者当“避开世务”，“清静地专务神工”。

各个岗位上不完全没有人，歇夏和避静都分两批进行。

此外，没有一处的传教士是完全孤立的。不管他的岗位多么远，一旦有困难都能得到同会弟兄的帮助。

不单单是神父对传教作出了贡献，还有辅理修士^①，他们是宝贵的助手。他们担任医务配药，搞印刷，管理工场，等等，作些可贵的服务工作。神父们需要他们。有一个辅理修士，由于他的长期工作，给传教区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四

该讲一讲教徒了！当然我们讲的教徒是穷人教徒，特别是勤劳的农民教徒。他们有天生的缺点，他们平庸务实。中国的外教人绝对不知道什么是理想，但这个民族是审慎有度的，温和平静，有着羞耻之心的本能。这虽然不能说是德性，但至少是近于德性的。中国教徒，特别是老教徒，在这些不太出色的、自然的朴实品质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品质。他们惯常是慷慨大方的，十分知恩的，知道要有牺牲精神。没有比东南一带（苏州府和常州府）的穷苦渔民对受托代养的孤儿的热爱更感动人的了。在他们船上的男女小孩中，他们最疼爱的，常常是“天主的儿女”。

传教士认识他的众多的教徒，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至于教徒们，他们也认识传教士，甚至灵魂上犯了罪的教徒，都听从他，尊敬他，热爱他。当他给男女小学生讲解教理时，看到孩子们信任的笑容，对外国人毫无拘束感，而且今后常把他看作好比是一个父亲，他心中怎能不留下甘饴的印象。到了吃饭的时候，你会看到在饭桌周围一张张同情的脸。善良的农民教徒关心着神父吃点什么，讲点什么，单纯朴实。这对一个新来的传教士也许会感到尴尬，但对一个懂得他们的语言和知道他们诚实的人，则会感到可爱。教堂内教徒济济，神父在讲道，这是一个新来的传教

^① 耶稣会内不升为神父的会士，称“辅理修士”。

士。几个善良的老年妇女，无疑是聋子，在热心地拨着念珠。其余的人张大着咀听着。新来的传教士讲得结结巴巴，犯了不少可笑的语病，但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个人说神父讲错了。至多弥撒后，如果神父有勇气问问某个教友长者是否听得懂他讲的道理，教徒的回答是：听懂“二、三成”。这批评也许是一种谅解。不用说，只有这些教徒才会对传教士有这种来自深切的信仰的尊敬。在外教人中远远不是这样。外教人对传教士往往采取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

然而传教士不陶醉于所取得的成绩。说实在的，取得的成绩只是初步的。四千七百六十万居民中，教徒只有十七万四千人，就是说差不多三千个无信仰者中只有一个教徒，这算得了什么？据1907——1908年的统计，在帝国四亿二千六百四十三万居民中，天主教徒只有一百十四万一千七百十一人，这又算得了什么？因此，凡愿毕生献身于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和把中国看作是第二故乡的神父，当他经过这些喧闹的城市和一望无际的到处是乡村的平原，想到对为数尚微的一些望教者的教育需要付出的代价，想到为在他堂口中增加五十或一百个教徒必须做的工作，在他的咀里能够不发出“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①的祈祷吗？

是的，当他骑着骡子，乘着颠簸的独轮小车，坐在轿子里或坐在船上，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

是的，当他站在一幅中国地图前，计算着省市，比划着距离，数着传教区，读着这些惊人的统计：直隶，居民二千零九十三万人，神父二百二十四人；山东，居民三千八百二十五万人，神父一百五十人；江南，居民四千七百六十五万人，神父二百人；四川，居民六千八百七十二万人，神父二百三十五人，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

是的，当他看到在乡村的一些小教堂里，在主日瞻礼，满堂

^① 〈圣经〉用语，拉丁文为：Mitte operarios in messem tuam.天主教把句中的“收庄稼的工作者”喻为传教士。

善良的信徒在祭台前面朗诵着经文，但难得有神父去那里给他们送圣体，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

是的，当他在夜间从床上起来，带着圣体，步行好几里路，脚走在泥泞中，头顶着雨，借着灯笼的微光，想到那些垂死的病人，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工作者来吧！

是的，当他在旅舍中，无信仰者跑来围看洋鬼子，他们的眼光中显露出好奇、讥笑、同情、仇恨，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

是的，每天早上，当他俯着身子，注视着里面是救世主的圣血的爵杯时，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

是的，当他精力衰竭，死期将至，或是年纪尚轻，充满着计划，独自一人在一个遥远的堂口里，在不知所措的教经先生和流着眼泪的新教徒中间，等待着也许来得太迟的邻近的弟兄，他祈祷着：请打发收庄稼的工作者来吧！

译自《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 1909年4月号第257—264页。

顾裕禄译

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 亚的孔教复兴运动

—— 颜 清 湟^① ——

当林文庆博士，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华人和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华人基督徒之一，在1899年改信孔教之时，孔教对华侨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业已显示出来。^② 在新马华人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孔教和民族主义的传播是1899——1911年期间骚动和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他们当中，这两股新的思潮极大地改变了华侨社会的状况并使其对现代世界更为适应。孔教复兴运动就是促使变革的首次运动。要弄清这次运动对华侨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必要追溯其在中国的起源。

中国的孔教复兴运动

使孔教成为中国国教的孔教复兴运动是著名的改良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在1895年由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改良主义的爱国人物首次与其它 的体制改革措施一起提出来的。^③ 在其后几年中，这一运动逐步猛烈地发展起来。1897年，一个专门从事孔

① 颜清湟博士现任澳大利亚阿德莱特大 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译者

② 林文庆博士改信孔教将在本文后面讨论。

③ 在1895年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演讲厅被改为传播孔教之处。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1898年的改良）（WHPF）（上海，1953年），卷4，第391页。

教研究和宣传的团体成立于广西桂林。^①1898年，康有为在其“百日维新”的高潮中试图定孔教为国教，立教部、建孔庙，并以孔子诞辰为国历。他还要废除淫祀（包括那些对道教、佛教和本地神灵的祭祀），而代之以尊孔。^②所有这些想法都包括在他给光绪皇帝的奏摺中，但似乎毫无效果。康有为规劝皇帝采纳他的建议的尝试失败，部分可能是由于实行“百日维新”后的历史环境所致。皇帝手中没有实权，在接受康有为的改革考试制度和建立新体制的建议时已冒极大风险，再把孔教定为国教也许会给改良招致更多的守旧派的反对。

虽然1898年后改良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但孔教复兴运动却幸存下来，并首次在1906年获得了好处，当时清廷下诏宣布要象祭天那样庄严地祭孔。^③这次孔子祭祀的升格促使国内外孔教复兴分子更加野心勃勃。1906年，一个建立孔庙和尊孔学堂的运动在新马发动起来。次年，陈焕章（1881—1931）这位康有为的信徒，后来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纽约组织了孔教会，提倡把孔教作为一种国家崇祀。^④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运动在中国直到1912年清王朝覆亡时也显得微不足道。是年，陈焕章在上海建立了另一个孔教会，作为孔教复兴分子活动的总部。1913年，大约130多个分支机构已在北京、烟台、香港和澳门等大城市里建立起来。一份作为这个运动喉舌的《孔教会杂志》出版了。同一年，该组织请求新的民国国会将孔教定为国教。请愿获得了极大成功，许多保守的文

① “圣学会”是由康有为建立的团体。见《康南海自编年谱》（赵丰田编），载WHPF，卷4，第136—137页；并见罗荣榜编的康同碧的英文译本，载罗荣榜编：《康有为：传记与论丛》（图森，1967年），第77页。《知新报》（中国改良家），1897年5月17日。

② 见康有为：《奏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载《康有为文集》（上海，1913年），卷5，《奏议》，第10—13页；并见康有为“《不忍》杂志”，第7期（1913年8月），“文”，第1—8页，载WHPF，卷2，第230—236页。

③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沈阳，1937年），卷567，第6页。

④ 见罗荣榜：《康有为自编年谱续编》，载罗荣榜编：《康有为：传记与论丛》，第206—207页。

人和督军都联合给予支持。军方的支持表明这个运动已具有极大的政治特点。这次请愿已成为袁世凯总统和保守派同国民党之间政治斗争的中心议题。在国会中，一项给予孔教以国教地位的决议案遭到了国民党议员的反对，但却得到了袁世凯的追随者及一些进步党议员的支持。其结果是1913年在国会达成一项折衷方案，就是“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句子被塞进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第19条中去。^①在教育中对孔教地位的部分肯定，显然没有使孔教复兴运动的领导人满意，他们迫切要求得到更多的好处。部分由于他们的努力，部分由于要为在中国恢复君主制度开辟道路，袁世凯总统在1914年1月颁布法令，恢复中华民国在1912年已中止的祭孔和祭天。^②

1916年袁世凯总统的去世对孔教复兴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丧失了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庇护者，并遭到了广泛的抨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们认为孔教是一股守旧势力，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抨击开始于1915年，当时袁世凯总统试图利用孔教为君主专制的目的服务。新知识分子的著名领袖陈独秀首先发难。在《新青年》月刊上登载文章，抨击孔教的伦理观和制度，号召对孔教进行全面的再评价。^③大约在1917年到1921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抨击达到了高潮。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下，主要由大学生发起的上百种出版物相继出现，目的在于宣传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他们开始从两个方面对孔教进行抨击：向孔教的伦理和社会原则直接挑战；从西方引进新的道德观，间接地削弱孔教的威信。^④

1921年后的时期表明孔教在迅速衰落。由于知识分子普遍倾

① 见周策纵：《民国初期的反孔运动》，载A·F·赖特编：《孔教的传播》（斯坦福，1960年），第289页。

② 见《政府公报》，第631期，1914年2月8日。

③ 见前引周策纵文，第293页。

④ 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斯坦福，1967年），第50页，第300—313页。

向于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故进一步加速了该教的衰落。孔教复兴分子在使孔教成为国教的一系列尝试中都失败了。虽然蒋介石在三十年代曾试图恢复孔教的伦理制度，^①但其衰落的趋势已无法挽回。由于康有为在1927年逝世，这个运动已实际上结束了。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

新马的运动是整个孔教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对中国的运动有多大的支持，而在于刺激和影响了其它华侨社会类似的运动，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中国本土的孔教复兴运动形成对照，新马的运动是相当生气勃勃的。显然，这两地的运动是以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知识背景为条件的。在中国，它是作为康有为改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几乎已决定了孔教复兴运动的命运。慈禧太后的政府不仅重金悬赏要砍杀康梁的头，而且还试图以禁止他的书籍的流传和销毁他的书籍的版型来消除康有为在知识界的影响。此外，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文人绅士阶级，他们自命为中国传统的卫道士。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这些文人绅士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极力反对康有为的新解释，并把他看作一个左道旁门的文人，认为他歪曲经典以达到个人的野心。康有为影响的衰落和政府的严格措施迫使以前支持康有为思想的人从孔教复兴运动中分离出来。因此，在清末，这个运动在中国已无法顺利开展了。

对比之下，新马的社会和知识界的环境是有利于孔教复兴运

^① 蒋介石在1934年以儒家的四个基本美德“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四个支柱，运动是由他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起的。见王孝章，《现代中国的宗教潮流》（纽约，1953年），第22页。目前探讨新生活运动背景的最新文章是阿里夫·德拉利克写的，《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关于反革命的研究》，载《亚洲研究学报》，卷34，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页。

动的兴起和发展的。第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马的中国移民迅速增加，扩大了当地华人社会的范围。^①这些移民的流入自然要使其社会变得更加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倾向就成了孔教复兴运动兴起的先决条件。第二，近代华文新闻业的兴起为这个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叻报》、《星报》、《天南新报》和《日新报》在新加坡同时创立，使许多新马华人随时了解有关中国的新闻，并宣传“中国人的共同意识”和“关心中国”的思想。^②更重要的是，有些报纸支持这个运动作为表达华侨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并成为将此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的媒介。第三，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扶植和维持了这个运动的发展。密切家族联系和热爱祖国是华侨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华侨民族主义情感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于1877年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个领事馆之后出现的。^③这种情感由于1893年中国改变了对华侨的传统敌视政策而得到了加强。^④在新马出现的华侨民族主义运动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里。在政治上，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表现在支持中国在1884年的反法战争；^⑤庆祝皇帝和皇太后的诞辰，^⑥和欢迎中国舰队访问新加坡。^⑦在文化上，

① 见J·埃厄：《到马来亚的中国移民》，载《东南亚历史学报》卷2，第1期（1961年3月），第38页；《海峡殖民地蓝皮书》，1881年；J·R·英尼斯与马里奥特：《关于海峡殖民地的人口普查报告》，1911年。

② 见陈蒙鹤：《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纸（1881—1912）》（新加坡，1967年），第111—146页。

③ 关于清朝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的细节，见温春池：《十九世纪在海峡殖民地的中华帝国领事馆》（未正式发表的文学硕士论文，马来亚大学，新加坡，1964年）。

④ 废除敌视华侨的传统政策是在1893年9月宣布的，朝廷据此任命薛福成为驻英、法、比、意的中国公使。见薛福成：《薛福成全集》、《海外文编》，卷1，第17—20页；《光绪朝东华录》（北京，1958年），卷3，第3243—3244页。

⑤ 一位著名的华人甲必丹郑景贵（在官话中称为程金贵或阿贵）捐献了十万两（银子）给清政府，以支持在印度支那对法国作战。见《张弼士率同人在郑景贵75岁寿辰上的贺词》，引自邝国祥：《檳城散记》（香港，1958年），第112页。

⑥ 见《叻报》，1889年2月27、28日；3月8、11、18、26日。《天南新报》1898年11月12、21日，第2版；1899年11月10日，第2版；1902年7月29日，11月8日。

⑦ 当中国舰队在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下，于1890年4月抵新加坡访问时，丁提督和他的部属受到了当地华人社会最热情的接待和欢迎。见《叻报》，1890年4月10、14、16日，第2版；1890年4月15日，第5版。

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表现在拒绝西方化和土著化，通过建立名种识字团体，如“会贤社”、“图南社”和“好学会”（通常称为华人学问协会），提倡中国文化和文学。^①对华侨民族主义者来说，孔教复兴不仅意味着象康有为所解释的那样，使中国从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也意味着在当地华人社会中传统的中国道德价值观的复兴和中国化的重申。

与中国相比较，新马的孔教复兴运动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孔教复兴分子试图“自上而下地继承”：他们运用政治手段试图使孔教成为一种国教。与此相反，新马的孔教复兴分子则试图以建立孔庙、提倡孔教的研究和纪念孔子诞辰的方法直接使人民皈依。他们这种更为大众化的、非政治性的战略可能是由他们生活的不同环境所制约的。如果试图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各邦使孔教成为一种国教，那是荒唐可笑的。

新马的这个运动开始于1899年，即在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的一年，并在1902年有所加强。其后到1908年时曾一度低落，其后此运动又逐步恢复并于1911年达到了另一高潮。运动初期集中于孔庙和现代学堂的建立。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纪念孔子诞辰，作为一个民族节日，但到后期，孔庙和现代学堂的建立又成了主要的内容。与此同时，运动的地理中心也从新加坡转移到了槟榔屿。

运动开始以前，这里对孔子的崇拜已经加强了。早在1894年中，由一位中过进士的人写的一篇赞扬孔子伟大的文章被《星报》（新加坡的一家华人日报）所转载了。^②这份报纸虽创刊于1890年，^③这却是它第一次对孔子的介绍，可以被看作是新马华人知识分子对孔教感兴趣的第一个标志。^④1899年前的几年里，在同

① 见前引陈蒙鹤书，第114—116页，第124页。

② 这篇论文是由会元陶世凤写的。见《叻报》，1894年6月7日，第1版。

③ 见前引陈蒙鹤书，第54页。

④ 新加坡最早的华人报刊《叻报》社论的一个调查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在1894年以前没有一篇文章与孔教有关。

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几篇文章，赞扬孔教或为其弱点进行辩护。^① 这些文章中有两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孔教复兴运动的重要文件，即1897年由康有为在桂林起草的并于是年6月4日发表的《圣学会章程》^②和由康的一位信徒徐勤写的一篇号召横滨华人尊孔的公开短评，发表于1898年10月28日。^③ 这些文章的出现，与其它类似的文章一起，不仅表明华人知识界对孔教兴趣的增加，而且也是海外知识界震惊于中国改良运动的直接表现。《星报》^④的编辑和社论作家经常撰文支持中国的改良，看来，中国的孔教复兴运动领袖的言行已极大地地震动了他们。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星报》是一家中国改良运动的机关报，但它已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马华人的改良情绪。值得注意的是一家报纸的主编，^⑤即后来成为一个革命的坚定的拥护者的黄乃裳，^⑥对于改良运动有一种早期知识分子的癖好。他对康及其他改良主义领袖的崇敬和与他们的联系，影响了他对孔教的态度，并帮助他推动新加坡知识界的奋起。

从1899年3月到8月，新加坡的一家华文日报《天南新报》的社论专栏上，登载了大量文章，号召当地华人纪念孔子诞辰以表

① 见《叻报》，1895年1月7—8日，第1版和第4版；1896年4月28日，第1版；1896年9月8日，第4版；1896年10月22日，第1版和第4版；1896年10月29日，第1版；1897年10月1日，第1版；1897年10月16日，第1版和第4版。这篇文章是由一位专栏作家写的，题目是《论孔教胜于基督教》，这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驳斥了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关于孔教是中国积弱的根源的观点，强调孔教与保守主义并非一致。见《星报》，1896年10月22日，第1版和第4版。

② 见《星报》，1897年6月4日，第5版和第8版。

③ 见《星报》，1898年10月28日，第3版。

④ 《星报》，1895年11月25日、27日；1895年12月20日、23日；1896年1月3日、14日、20日；1896年2月6日、8日、25日；1896年3月2日、4日、5日、11日、20日；1896年4月6日；1896年6月18日、19日、23日；1896年7月3日、7日、9日、11日；1897年8月30日；1897年9月28日、29日。

⑤ 见前引陈蒙鹤书，第57页。

⑥ 关于黄乃裳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革命者，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1933年），第108—112页。

示尊孔。^①另外一些报道仰光（缅甸）、维多利亚（加拿大）和西里伯斯（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尊孔的文章也刊登在这家报纸上。^②1899年9月，吉隆坡一个华商集团组织了一次公开集会，发起了这次运动。会议决定将纪念孔子诞辰（阴历的8月27日）这一天作为全体华人的节日，商店应停止营业，在家里进行庆祝，人们应该向临时安置在同山医院的孔子偶像顶礼膜拜。^③当地华人社会的不同方言集团应选出代表举行仪式祭祀孔子，号召所有华人采用孔历和光绪皇帝的年号。^④引以为趣的是，首先发起运动的并不是在东南亚华人商业和知识分子中心地区的新加坡，而是在相对地不太重要的吉隆坡。这可能是由于在吉隆坡广东人占优势，这也许是他们对中国孔教复兴运动的一个引以自豪的反应：因为发起这个运动的正是他们的广东同乡——康有为和梁启超。

运动在迅速发展。约在吉隆坡集会后两周，称为“萃英书院”^⑤的中华自由学堂理事会决定响应吉隆坡华人的倡导，纪念孔子诞辰。^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新加坡的福建帮的领袖。他们的决定可以作为这个帮对运动支持的表示。仅在几天后，林文庆博士，一位福建帮的领袖和新马孔教复兴运动和改良运动的主要推动人物之一，到吉隆坡宣传建立孔庙和现代学堂。^⑦是年12月马六甲华人也跟着尊孔。^⑧这些华人的响应部分是由于为吉隆坡华人所表现的热情所感染，部分则是由于受了一些华人报刊所做

① 《天南新报》，1899年3月8日，第1版；1899年4月29日，第1—2版；1899年5月2日，第1—2版；1899年5月3日，第3版；1899年5月4日，第1—2版；1899年6月6日，第2—3版。

② 同上，1899年3月31日，第2版；1899年6月10日，第1—2版；1899年8月17日，第2版。

③ 同上，1899年9月28日，第2版；1899年9月30日，第1—2版。

④ 见《提倡尊孔条例》，载《天南新报》，1899年9月30日，第1版。

⑤ 新马早期建立的中华学校是属于福建帮的，目的在于教育福建帮的子弟。见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1967年再版），第46页；许魁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1950年），第14页。

⑥ 《天南新报》，1899年10月13日，第7版。

⑦ 同上，1899年10月17日，第2版。

⑧ 同上，1899年12月4日，第2版。

的宣传。由邱菽园^①创办，拥护中国改良运动的《天南新报》，对孔教复兴运动的发起与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该报除了刊登中国孔教复兴分子领袖的重要讲话之外，^②还报导其它华侨社会的孔教复兴分子活动的详情。^③1898年后，该报还开辟了社论专页作为新加坡孔教的一个论坛。其编辑和社论作家不断鼓励华人领袖尊孔和传播孔教。^④吉隆坡华商之所以首先采取行动，即是由于受到了该报的影响。^⑤该报甚至支持在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成立一个联合的孔教会。^⑥虽然这件事情没有成功，但这份报纸的确表明了它对宣传孔教和致力于这个运动的决心。

同时，这个运动也受到了新加坡的另一家华文报纸——《日新报》的支持。该报是1899年10月由林文庆博士创建的，^⑦其目的部分是为了帮助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推行改良运动。该报也象它的同行《天南新报》一样，强烈地支持孔教复兴运动。它从其它

① 邱菽园1874年生于福建省的海澄县，其父邱正志因家境穷困来到新加坡，后逐渐致富，成为这个殖民地最著名的富商之一。菽园最初是由其在澳门的叔父施予教育，后于七岁时来到新加坡。他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后回国去参加朝廷的考试，于1894年中举。当他进入中国官场的夙愿幻灭后，于1895年返回新加坡时，已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著名的人物，也成为新加坡文学界的一位领袖，并常常充当一些月刊文学竞赛的评判员。关于他卷入改良和孔教复兴运动的细节将在本文后面论述。见邱菽园，《五百万洞天探尘》，卷16，第18—19页；邱鸣权（邱菽园的女儿），1966年9月4日和9日在新加坡其住宅的访问录。

② 《天南新报》1898年10月28日，第3版；1899年8月19日，第1—2版。

③ 同上，1899年3月31日，第2版；1899年10月9日，第2版；1899年10月19日，第5版；1899年10月28日，第2版；1899年11月7日，第2版。

④ 同上，1898年6月16日，第3版；1899年3月8日，第1版；1899年4月29日，第1—2版；1899年5月2日，第1—2版；1899年5月3日，第3版；1899年5月4日，第1—2版；1900年3月26日，第1—2版；1901年11月28日，第2版。

⑤ 吉隆坡华商给《天南新报》的信称赞它在宣传孔教上所做的努力。同上，1899年6月6日，第2—3版。

⑥ 同上，1899年11月8日、9日，第2版；1899年11月10日，第7版；1899年11月11日，第2版；1899年11月13日、14日，第2版。

⑦ 《日新报》是《星报》的继承者，《星报》也许是由《日新报》的业主林文庆博士购买和重新组织的。见《日新报》1899年10月14日，第1版，前引陈蒙鹤书，第75—77页。

改良主义的刊物转载著名的复兴分子的讲话和文章，报导其它海外孔教复兴分子的活动，开辟社论专栏对孔教进行讨论。^①两家当地改良主义的报纸的坚决支持，表明在孔教复兴和改良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中国的孔教复兴运动一样，像邱菽园和林文庆博士这样的改良主义领袖就成了新马孔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除了利用《天南新报》和《日新报》制造舆论支持运动外，还不时向“华人贤学会”、“好学会”成员演讲，以开导海峡殖民地受过英国和中国教育的知识分子。^②林文庆博士尤其活跃，他用中英两种文字撰文阐述孔子学说，^③主办孔学课，周游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的许多中心城市，宣传孔教。^④无疑，他的努力对该运动的发展贡献甚大。

1900年康有为和另外两个孔教复兴分子丘逢甲和王晓沧的来访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康有为在1900年2月2日应邱菽园的邀请到达新加坡。^⑤在他于是年12月离开此地前往印度之前，他在新加坡住了约四个月，在槟城住了四个月。^⑥在新加坡，他主要与邱菽园和林文庆这两个孔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住在一起。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直接卷进这个运动。他没有发表过讲话和撰写过文章支持这个运动。他也许是隐居起来——他经常过着恐怕别

① 见《日新报》，1899年10月13日，第1版；1899年10月14日，第1版；1899年11月13日，第1版；1899年11月14日，第1版；1899年11月15日，第1版。

② 同上，1899年10月5日，1899年10月9日，第4版。

③ 见《日新报》，1899年12月13日，第1版；1899年12月14日，第1版；1899年12月15日，第1版。林文庆宣传孔子学说的大部分英文作品都发表在《海峡中华杂志》上，例如《儒家的婚姻和睦法则》（卷11，1907年，第1期，第24—27页），《儒家的友爱伦理观》（卷11，1907年，第2期，第70—78页）。

④ 见《天南新报》，1901年10月11日，第2版。

⑤ 康从香港去新加坡的路费是由邱菽园所提供的。见罗荣榜，《康有为自编年谱续编》，第183页；《海峡时报》，1900年2月3日，第3版。

⑥ 康有为在新加坡的时间是从2月1日到8月8日，在槟城是从8月9日到12月6日。在槟城，他主要是住在督署公馆。10月份曾访霹雳一次。见前引罗荣榜书，第188—189页。

人暗杀他的生活，因为清政府悬巨赏要他的头。^①在这种情况下，同孔教复兴运动的任何公开联系都是不适宜的。^②他也正预备为华中的汉口起义制订计划和做配合行动的工作，^③作为其计划的主要部分就是恢复被废黜的光绪皇帝的权力。他在海外为筹集支持他的计划的资金而奔忙。^④然而，由于他与林文庆和邱菽园的接触频繁，还是可以对当地的孔教复兴运动提供帮助和建议的，起码由于他们在他们中间出现这个事实，就是对新马孔教复兴分子的一个极大的信任。

另外两个来自中国的孔教复兴分子丘逢甲和王晓沧的来访，也证明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王晓沧除了是广东省的嘉应州人和曾作过儋州书院的副学正这一级的小官外，其余情况鲜为人所知。^⑤丘逢甲却是相当著名的，他是一位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出生在一个定居台湾的家庭，并于25岁中进士。在他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很顺利地通过了帝国的最高级的考试，这种成功表明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力。其后他被接纳进入了地方官府之中，并曾一度做了台湾布政使一级的高官。^⑥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台湾割让给日本，丘和巡抚唐景崧就直接卷入了抗击日本占领的运动。^⑦失败后，他逃回到广东原籍家中。中国失败的羞辱唤醒了他。像其他进步的文人一样，他认识到进行体

① 清政府以十万两（银子）之巨款要康梁的性命。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58，第11页；并见《光绪朝东华录》，卷4，第4—5页。

② 为了瞒过潜伏的刺客，康假装离开新加坡，并在一艘船的甲板上露面，然后仍安排他回到新加坡并隐居起来。见前引宋旺相书，第313—314页。

③ 前引罗荣榜书，第184页；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史》（旧金山，1952年），第32页。

④ 前引罗荣榜书，第184页。

⑤ 见丘逢甲：《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暨大学堂启》，载《日新报》，1900年3月27日，第1版。

⑥ 见A·W·休麦尔编：《清代著名的汉人（1644—1912）》，（华盛顿，1943—1944年），卷1，第171页。

⑦ 见曾乃士：《乙未起义丘逢甲事迹考证》，载《台湾文献》卷7，第3—4，67—68页；并见H·J·兰利：《1895年的台湾共和国》，载《亚洲研究学报》，卷27，第4期（1968年8月），第745页。

制改革的必要性。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康有为的改良运动，但他创办了现代学堂和一个专科学校，^①一方面引进西方的知识，同时阐述孔子的所谓“真学”。他认为创办西方式的学校并不违反孔教原理。这种孔教与近代教育相结合成了新马孔教复兴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广东政府派遣丘和王访问东南亚华人社会，目的是为了促进商业。^②他们作为孔教复兴分子，很自然就与当地孔教复兴分子的领袖结合起来，^③并成为这个运动的头面人物。他们周游新马，既为建立孔庙，也为发展商业而奔走；他们发表文章，公开演讲，倡导这个运动^④；他们到处召开集会，为孔庙和图书馆筹集资金。由于他们的官方地位和在本埠华商中的影响，故活动非常成功。据说霹雳的一位富商王元树为之响应，捐献了价值七千新加坡元的一块土地作为孔庙的地址，并拨出部分房屋作为一个计划兴建的图书馆之用。^⑤

运动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困难来自三个方面：中国人对任何社会或政治运动的传统态度，普遍的不团结；害怕受清政府通缉的改良主义流亡者的连累。中国人对待政治的传统态度是冷漠——这种冷漠在传统社会里是一种通病，并得到了历代中国政府的鼓励，而海外华人的商业倾向更进一步鼓励了这种冷漠。^⑥他们对赚钱比对卷入任何社会运动更感兴趣。普遍的不团结当然要妨碍运动的开展。由于当时新马的华人社会仍分裂为几个大的方

① 前引A·W·休麦尔书，第171页。

② 前引丘逢甲书，〈日新报〉，1900年3月27日，第1版。

③ 按照丘的说法，他会见了林文庆、邱菽园、黄乃裳和苏琪春（〈天南新报〉的一位编辑），听取了他们有关运动情况的汇报。他向他们保证支持该运动。见〈日新报〉，1900年3月27日。按照罗荣榜的说法，丘是与康有为在新加坡时接触密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丘可能已从康那里得到了对运动支持的鼓励。见前引罗荣榜书，第184页。

④ 见王晓沧，〈星洲拟建孔庙暨开大学堂说〉，载〈日新报〉，1900年3月26日，第1版；并见丘逢甲1900年3月在怡保的公开演说，载〈天南新报〉，1900年6月4日，第1—2版。

⑤ 〈日新报〉，1900年5月5日，第6版。

⑥ 关于这一时期新马华人对于价值观的讨论，见颜清煌：〈清王朝威望的下降与新马华人领袖〉，载〈东南亚研究学报〉，卷1，第2期（1970年9月），第20—32页。

言集团,很多人对公共的呼吁都是按照方言的一致性来响应的。^①对孔教复兴运动不利的是,它的两个最主要的领袖林文庆和邱菽园都是福建人,这就限制了运动对其它方言集团的感染力。但是早期的最大障碍是害怕受到政治流亡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连累。林邱二人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后曾以支持中国的改良运动而著称于新加坡;支持孔教复兴运动的《天南新报》和《日新报》也对清政府猛烈抨击。这些联系就在公众中产生了一种猜疑,即孔教复兴运动纯粹是康有为的一个政治工具。^②康有为对新加坡的访问,和他与林邱二人在新加坡过从甚密,更加强了这种猜疑。

这种猜疑由一位来访的中过进士的人的声明而得到了最好的证实,他规劝吉隆坡的商人不要支持这个运动。他在1899年发表的一个声明宣称,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将会被清政府作为康梁的追随者,或作为从事颠覆活动的秘密社会的成员来看待。这类性质的警告在当地华人中产生了一种害怕卷入任何反清活动的心理,当时的清政府对他们的命运仍有一定的控制力。这种恐惧由于邱菽园被清政府惩罚而得到了加强,他和林文庆博士被认为直接卷入了流产的汉口起义^③。

运动的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回击反

- ① 见顾清澄,《马来亚华人的革命运动(1900—1911)》(未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1970年),卷1,第7—9页。
- ② 我无法找到有关它的最早的论述。只是从《天南新报》发表的有关规则中推断。见《天南新报》,1899年12月12日,第1版;1899年12月13日,第1版。
- ③ 进入本世纪时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戏剧性插曲是邱菽园对于他与康有为的联系有所悔悟。因为他被深深地牵涉进了汉口的起义,清政府利用他家乡的乡亲来与他作对,公开地责备他过去与改良主义者混迹一起。1901年初,两广总督陶模指示新加坡的清朝总领事罗叔葵调查邱和林是否卷入了起义事件。这封指示信最先发表在香港的《华侨日报》上,1901年4月4日《天南新报》又将其转载。邱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两封公开信,否认卷入起义。事实上,他花了一大笔钱购买清朝的官衔标志着从倾向于改良主义转变到对清政府表示忠诚。见“两广总督陶模给罗叔葵总领事的信”,载《天南新报》,1901年4月4日,第1版;1966年9月11日在新加坡的住宅对邱菽园的女儿邱鸣权的访问录,载前引陈鹤书。

对派的议论；他们认为孔教与华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他们联合清朝的官员；他们尽力减少由来访的中国进士在吉隆坡引起的恐惧。在那位进士的声明发表后不久，驳斥他的文章就在该运动的半官方机关报《天南新报》上登载出来。在文章中进士被谴责为十足的无知。这些作者认为，虽然康有为和梁启超已在中国开创了孔教复兴运动，但支持新马孔教复兴运动的人并不能被认为就是康梁的追随者，或从事秘密会社的活动。^①

更概括地和更确切地说，他们力图使这项运动与全体华人的利益相一致。在传统上，孔教被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思想意识，而只有这一阶级才起着这种思想意识的保护人作用。许多华侨认为，孔教复兴运动与他们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显然妨碍了他们对运动的支持。为了改变这种传统的看法，运动的领袖反复地强调孔教并不仅仅属于士大夫阶级，也属于所有其它社会阶级，它应该被认为是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部分。^② 衡量这种观点得到舆论支持的有效程度是困难的，但这种孔教与整个中国人民的一致性却有助于扩大其在社会上的支持基础，并产生出一个属于大多数华人的意识。

对这些领袖来说，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就是驱散对清王朝权威的普遍的恐惧。虽然康有为在1900年12月已去了印度，这有助于解除这种恐惧，^③但大多数的华商仍不愿支持这项运动，除非经清政府的特许。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侥幸有另外两名作为孔教复兴分子的中国官员来这里，帮了这些领袖的忙。张克诚和吴桐林是由广东政府派往东南亚促进华人商业发展的。^④ 由于张等

① 《天南新报》，1899年12月12日，第1版；和1899年12月13日，第1版。

② 这个观点将在下一部分关于孔教复兴运动的理论一节中加以阐述。

③ 在新马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康与他的女儿同璧从檳城乘船前往北印度，时在1900年12月8日。见《自编年谱续编》，载罗荣榜编：《康有为：传记与论丛》，第189页。

④ 张中过举，广东省大浦人，他与吉隆坡的商人有些私人联系。吴是潮州人，曾做过同知（付知州），由于他在华侨中提倡孔教而在1903年被清政府所奖励。见吴桐林：《关于建孔庙和现代学堂给同志的公开信》，载《天南新报》，1902年3月17日，第1—2版；《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16，第46页。

人的努力，两广总督陶模对此运动表示了认可，并指示驻新加坡的中国总领事帮助建立孔庙和现代学堂。^①

运动的领袖们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敦促群众采取行动。1901年10月9日（光绪27年8月27日）孔子诞辰，也即官方对运动认可公布后仅仅一周，林文庆和在新加坡的一些其他的孔教复兴分子领袖就召集了一个讨论建立孔庙的预备会议，不同方言集团的几百位代表，包括许多富商都出席了。^②在会上发表讲话的重要人物有：林文庆，清政府派来促进商业发展的官员吴桐林，和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罗叔羹。罗呼吁与会者支持孔庙的建立，^③他以公布官方对全体华人的通告来加强他的号召，该通告于次日（10月10日）发表。^④在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的总领事首次直接卷入了孔教复兴运动。罗虽然仅仅是执行官方对海外华人的赞同路线，但对许多华商来说，他的直接参与可能被视为一种庇护作用。因此给运动以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消除主要障碍之后，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02年2月，罗总领事调往澳洲，庇护人的地位由代理总领事吴寿珍充任（官话称吴寿珍，在汉人官绅界则称吴世奇）。吴是一位富商，也是新加坡福建帮的领袖。由于他与孔教复兴运动领袖人物的关系亲密，^⑤和他具有维护中国传统的倾向，^⑥故他更愿意成为孔教复兴运动的官方庇护人和支持者。由于他的赞助，1902年2月和3月于同济医院召开了两次会议，成立了一个由一百九十五人组成的理事会。^⑦并发表了一份呼吁全体华人团结的公约，还制定了建立孔庙和现

① 见《叻报》，1901年10月2日，第6版；1901年10月3日，第6版。

② 见许邗生：《详记新加坡孔教同人演说》，载《天南新报》1901年10月11日，第2版。

③ 同上。

④ 见《叻报》，1901年10月11日，第2版。

⑤ 吴与林文庆和邱菽园都是漳州同县人，他们三人在当时都是福建帮的领袖。

⑥ 吴是新加坡“乐善社”理事会中的一个活跃成员，在那里通过举办循序渐进的经典课程的讲解来维护中国的传统，《康熙皇帝钦赐十六箴言》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见《星报》，1896年3月5日，第5版；1897年3月6日，第5版。

⑦ 理事会成员的全部名单发表在《天南新报》，1902年3月19日，第1版。

代学堂的章程。^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理事会中有各个不同方言集团的代表，这样它就成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真正权力机构。^②这个不同方言集团的全面的代表机构对于上述呼吁的实现是必要的，因为它在华人中提供了一个普遍团结一致的基础。

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庙宇和学堂的建立筹集充足的资金。除了在第二次会议上一次筹集到四万多元新加坡币之外，^③理事会的成员还按方言分成若干小组，逐家募捐。^④这些方法看来颇有成效，但最有成效的办法是给予捐献大笔款项者以荣誉。条例规定：最慷慨解囊者的神祖牌将被安放在孔庙中或旁边的一个神龛中。从五百元到五千元新币共分为四等，神祖牌也就按照所捐款项的数额多少而排列在神龛之中。^⑤由于新马的许多富裕华商都乐意通过不同的捐献来获得荣誉，^⑥故这种方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⑦同样的办法经过细微的修改后至今仍使用于新马华人社会。^⑧

到1902年中，筹集资金已达二十万元以上。^⑨其后，运动突

-
- ① 见《新加坡征集孔庙学堂资金启》，载《天南新报》，1902年3月10日，第2版。
- ② 福建帮的著名领袖是吴寿珍、邱菽园、林文庆、陈武烈、罗金榜、吴懿甫、吴翼熙、张善庆和林乘祥；广州帮的著名领袖是陆佑、林维芳、黄亚福（或叫黄莆田）；潮州帮的领袖是张永祺、曾兆南、张颢善。见《天南新报》，1902年3月19日，第1版。
- ③ 见《天南新报》，1901年3月17日，第1—2版。
- ④ 见前引吴桐林文，载《天南新报》，1902年3月17日，第1—2版。
- ⑤ 按照这个规则，四个级别——五千元、三千元、一千元、五百元都被供起来。捐款超过五千元的神祖牌被放在神龛的中央，三千元的在中左、一千元的中右、五百元的在左边。这种等级制度显然是基于传统的中国等级地位的概念。见《为筹款建孔庙和学堂的十四条规则》，载《天南新报》，1902年3月10日，第7版。
- ⑥ 见顾清澹：《清王朝威望的下降与新马的华人领袖(1895—1912)》，第20—32页。
- ⑦ 《天南新报》，1902年5月2日，第6版。
- ⑧ 在新马任何一座中华会馆的建筑里，引人注目的是在墙上挂有许多肖像。这些肖像主要是对于这些团体有过巨额捐资的捐款人和团体中创建人。这种抬高其名望和声望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吸引更大的善行。
- ⑨ 筹集到的资金并没有全部在《天南新报》上公布出来。1902年9月底，一位《天南新报》的编辑所写的文章中提到大约七千到八千元是由大约十二位富商捐献的。这个数字显然不能代表整个筹集到的款项的总额。在1902年11月给康有为

然转入低潮，直到1908年止，没有了提倡孔教的喧嚷的公开演说、会议或研究团体，在报纸上也没有了关于孔教教义的热烈讨论，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但并没有建筑孔庙的实际行动。^①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其背景：第一个是运动固有的软弱性，它既不是一个宗教的也不是一个政治的运动，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宗教和社会激动的综合物。它不像一个宗教运动，缺乏像基督教传教士或伊斯兰阿訇那样坚持有效的热衷于传教的献身人物的集团。它不像一个政治运动，缺乏一个长远规划、完整的纲领和一个为达到目标的组织网。这种组织的涣散在1902年中当林文庆去伦敦出席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时已清楚地显示出来，^②其他领袖像邱菽园和吴寿珍也显得不活跃了。^③运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对运动的更直接的打击来自梁启超态度的突然转变，他曾是中国孔教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1902年2月，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目是《保教非尊孔论》，登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篇文章于1902年5月底在新加坡的《天南新报》上转载。^④在这篇文章中，梁认为没有必要将孔教作为一个国教，因为它起着束缚中国人民思想自由的作用，而这种自由是拯救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⑤虽然梁启超反对运动部分是基于他的新认识：即中国的未来主要依赖于吸收外国新思潮的能力，^⑥但也

的一封信里，梁启超认为起码已筹到了二十万元新币。这个数字与在新加坡筹集到的全部款额数字较为接近。见《天南新报》1902年9月27日，第2版；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1959年），第152页。

① 见《答客问本埠孔庙学堂事》，载《天南新报》，1902年9月27日，第2版。

② 同上。

③ 吴在新任总领事到任后不久便卸去代理总领事一职。

④ 见《天南新报》，1902年5月23日，第2版；1902年5月24日，第2版；1902年5月26日，第2版。

⑤ 见梁启超：《保教非尊孔论》，载《新民丛报》特刊第5号。并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香港，1955年），卷3，第20—22页。

⑥ 同上。菲力普C·黄：《梁启超和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西雅图，1972年），第62—83页。

可能是由于他较多地被运动的轻浮的和象征性的倾向所困扰，他甚至怀疑耗费若大资财纪念孔子诞辰和建立孔庙的正确性。^①由于梁启超的文章在华侨中的巨大影响，故他对尊孔运动态度的突然转变，必然把新马的许多支持者拉向后转。

运动退缩了好几年。到1908年，该运动才以每年8月27日举行纪念孔子诞辰的形式逐渐复兴起来。^②许多人以当天为节日表示他们的热情，店铺关门，学校停课，有的人甚至在家中设置孔子像进行祭祀。^③1911年由于大规模地开展捐款建筑孔庙的活动（虽然主要在檳榔屿），使该运动声势大振，达到了高潮。^④

这一复苏显然是在清政府及其在华侨社会中的同盟者的巨大影响下出现的。对清朝总领事号召庆祝孔子生日的倡议，^⑤不应仅仅看作是他个人的文化爱好和对孔教的奉献，^⑥而且应看作是清政府所实行的基本路线。新加坡中华商会这个亲清和在当地华人社会中起着半官方作用的机构，也支持该运动，这一事实也加强了这一论断。^⑦虽然清朝的统治者是中华帝国官方思想体系孔教的庇护者，但他们对孔教复兴运动的态度看来却是暧昧的和矛盾的。光绪皇帝虽依靠康有为着手于雄心勃勃的“百日维新”，但却

① 见丁文江所编书，第152页。

② 见《叻报》，1908年9月23日，第1版；1908年9月30日，第9版；1909年10月9日，1909年10月12日，第5版。

③ 《叻报》，1908年9月23日，第1版。

④ 见《檳城新报》，1911年7月31日，第2版；1911年8月3日，第2版；1911年8月5日，第3版；1911年8月21日，第3版；1911年9月12日，第3版；1911年9月15日，第3版；1911年10月5日，第3版；1911年10月9日，第2版；1911年10月23日，第2版和第3版；《南州日报》，1911年10月28日，第9版；1911年10月30日，第9版。

⑤ 关于把纪念孔子诞辰日作为全体华人的公共假日的通知，是领事馆发出的，并发表在当天的华文报纸上。见《南洋总汇报》，1909年9月29日，第3版；1909年10月5日，第4版；《叻报》，1909年9月29日，第5版。

⑥ 总领事左秉隆曾两任于新加坡（1891—1894，1907—1911），在当地华人社会中，他以文化修养和活跃而著称。他的诗和作品被收集在一本书中，题名为：《勤勉堂诗钞》（香港，1959年）。

⑦ 新加坡中华商会常务委员会发出一个通告，宣称孔子诞辰日作为华人的公共假日应该适用于新加坡的所有华商。见《新加坡中华商会会议纪要》，乙戌年（1909年9月22日）8月9日（手稿），第176页。

不接受康有为把孔教定为国教的建议。^①废黜光绪皇帝的慈禧太后起初势必与运动是敌对的，因为这是她的头号敌人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倡导的；但她后来认识到运动对她是有直接好处的。在1906年对孔子祭祀的改进中她的态度转变已清楚地表现出来。^②她和她的尊孔的大臣们也认为孔教可以作为反对当时帝国被迫勉强进行近代化措施时所受到西方过分影响的一个屏障。^③最重要的尊孔大臣张之洞就对现代学堂中学生们的衣饰和行为受到西方影响而深恶痛绝，因而强调学习孔子经典的重要性。^④对这些传统的中国价值观的保护者说来，很自然要将西方文化的入侵视为危险，^⑤尤其是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在青年学生和华侨社会中广泛地传播开来。孔教的某些价值观准则，如“忠”，“孝”，则可用来抵制颠覆活动。

对于孔教态度的转变与清王朝努力控制华侨教育是相一致的。1898年，在“百日维新”的刺激下，清政府首次表明了它对其海外臣民教育的兴趣。^⑥但在光绪皇帝被废黜后，却突然冷却下来。1904年前，慈禧太后一直对华侨教育不感兴趣。是年，她赐给檳城的近代华人学校——中华学堂一块匾额和一批有价值的书籍。^⑦大批官员被派往东南亚发展教育^⑧，其结果是一大批现代

① 主要的清朝文献如《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都没有说明皇帝已接受了康有为1898年奏摺中的意见。

② 清朝的祭孔是继承了历朝的传统。祭孔是属于中等规模的，而祭天地才是最大规模的。见《大清通律》，“祝”（部分）12。

③ 在1901年义和团运动后（庚子）协定的规定下，由慈禧太后统治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改革。改革包括政府机构、经济和法律制度，教育和考试制度。见M·E·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年）》（纽约，1963年）。

④ 见张之洞的奏摺，载《光绪朝东华录》，卷5，第50—51页。

⑤ 见教部大臣的奏摺，载《光绪朝东华录》，卷4，第136—137页。

⑥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3，第4—5页；并见《光绪朝东华录》，卷4，第136—137页。

⑦ 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36，第6页。

⑧ 清政府，特别是广东省政府派出一些官员到东南亚提倡华文教育。在1906年，刘士骥（曾任过知县）、汪凤翔（也任过知县）曾为此被派遣前往新马和荷属东印度，紧接着1907年又派钱恂前往。见《叻报》，1906年10月24日，第5版；《海峡时报》，1906年10月25日，第6版；L·E·威廉斯：《华侨的民族主义：印尼土生华人运动的起源，1900—1916年》（格伦科，1960年），第150—151页。

的华人初级学校在新马建立起来。①这些努力不仅在于强调华侨的文化一致性，而且也是作为政府的一个政治武器。②

在清政府对孔教态度的转变以及它对华侨教育的新政策的刺激下，清朝的总领事在新马给予孔教复兴运动以庇护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总领事接管了运动的领导权，但在檳榔屿，运动显然仍在以任过高官的张弼士（张弼士，也称为张调燮或张振勋）为首的亲清商人集团控制之下。③很难断定这个集团是在执行清朝的政策还是仅仅在自发地反对革命思想在当地华人社会中日益扩大的影响。④不管其动机如何，显然，这个运动已成功地重新得到了包括改良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保守力量的支持。⑤

在这一准备阶段的后期，复兴运动似乎已有了较好的组织性和对群众的号召力。1911年8月2日预备会议讨论建立孔庙和现代学堂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二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⑥并很快地扩大了它的支持者的基础，它的成员增加到五十四人，包

① 现代中华学堂在新马的建立，是清朝官吏到此访问的结果，即在吉隆坡建立尊孔学堂，在新加坡建立端蒙学堂。见《尊孔学堂简史》，载于《尊孔中学1965年高中暨初中毕业特刊》（吉隆坡，1965年），第6页；杜国璋：《端蒙学校简史》，载于《新加坡端蒙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36年），第11页。有关新马近代中华学堂兴起的详细研究见李阿才的论著：《1786—1941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属邦的政策和政治》（未发表的文学硕士论文，马来亚大学，新加坡，1958年）。

② 见教部大臣的奏摺，载《光绪朝东华录》，卷5，第148—149页。

③ 张是当时东南亚最富的华商之一。他是首任檳榔屿的副领事，后在1895年代理新加坡总领事一职。由于他在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所做的努力，1903年慈禧太后召见了她，然后于1904年任命他为东南亚特别商务专员，并兼任福建和广东两省农业、工业和采矿业总监。除了这些官衔外，他还有清政府的其他几个头衔。在H·L·布曼和R·C·豪沃德编的英文本《中华民国传记辞典》（纽约，1967年）卷1中有张的简历。他的中文简历见邝国祥：《檳城散记》，第97—107页。同一位作者的文章也发表在潘醒农编的：《马来亚的潮州人》（新加坡，1950年版）第153页和梁书林等人编的：《客家：吡叻客属会馆开幕纪念特刊》（檳城，1951年），第505—507页。

④ 见颜清煌：《马来亚华人的革命运动（1900—1911）》，第68—120页；第217—241页。

⑤ 檳城的改良主义报纸《檳城新报》对运动的拥护表现在给予广泛的宣传和道义上的支持。见《檳城新报》，从1911年7月31日到12月31日。

⑥ 见《檳城新报》，1911年8月5日，第3版。

括华人社会中大部分商界的巨头。① 它发动逐家募捐运动，② 并组织剧团演出，③ 以扩大其对群众的号召力。结果，1911年底在槟榔屿建立了一座孔庙。④

领 导

这个运动的领导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背景复杂性和上层的缺乏连续性。该运动首先是由林文庆和邱菽园等文人和商人领导的，并得到了官商如吴寿珍和来访的清朝文绅的支持。运动后期，领导权显然掌握在保守的商人集团手中，并得到了官商如张弼士的极大支持。这种复杂的背景部分地反映了运动的复杂性，也部分地表明了上层领导人的动机的复杂性。除了复兴孔教的共同目的是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上得以生存之外，林邱还以此来支持康有为领导的改良运动，改革当时新马华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⑤ 而象吴寿珍和张弼士这样的官商，似乎是想利用它来提高个人的威信和取悦于满清政府。槟榔屿的保守商人利用它，目的在于防止当地华人社会中的革命影响。那些分歧的动机有助于解释这种领导的不连贯性：当领导们达不到他们的目的时，就要脱离运动。我们还应从该运动的性质来寻找缺乏连贯性的另一些理由。由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运动，所以它缺乏一种有宗教献身精神的团体来有条不紊地计划和执行其措施。此外，

① 《檳城新报》，1911年8月21日，第3版。

② 《檳城新报》，1911年9月12日，第3版。

③ 《檳城新报》，1911年9月11日，第3版；1911年9月12日，第3版；1911年10月23日，第3版。

④ 《檳城新报》，1911年9月30日，第9版。

⑤ 见柯莫希：《林文庆博士的公开生活》，（未发表的文学士优秀论文，马来亚大学，1958年），第29页。关于林文庆提倡改革华人社会习俗如婚姻、丧葬和忠孝的价值观等问题，见林发表在《海峡中华杂志》上的文章，卷4，第13期，第25—30页；第14期，第49—57页；卷5，第17期，第58—60页。

最高层领袖与商业有着直接的联系，^① 他们几乎无法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计划、组织和执行运动的纲领。

在中国，显然是由文官来掌握孔教复兴运动的领导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来自文官阶层。相反，新马的领导权则是由商人掌握的。除了上述高层领袖与商业有密切联系外，第二层的领袖人物也几乎是由纯粹的商人组成。1902年在新马负责建立孔庙和现代学堂的一百九十五名理事中，大多是著名的商人。^② 这些人如蓝金升、罗金榜、林秉祥、陆佑、蔡子庸、张善庆、李俊源和林维芳等都属新马的富翁阶层。^③ 商人控制孔教复兴运动的领导权本不足为奇。因为在华侨社会中没有文绅阶层和官僚政客，商人可以将他们的财力与文人绅士阶级的爱好、官僚政客的权力和宗族首领的威信结合在一起。没有他们的领导，运动就成功无望，或无法筹集资金。

上述的一些领袖不仅是最富有的商人，而且还是新加坡三个主要方言集团即福建帮、潮州帮和广州帮的领袖人物。^④ 这里还表现出在理事会中福建帮与潮州帮比之广州帮及其他小方言集团

① 邱菽园曾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投机，他是一家著名的商号——安和号的业主，同时也经营航运、锡矿和牛奶生产。见前引宋旺相书，第101—102、143—144页；《天南新报》，1903年1月2日，第3版；苏孝先：《吴寿珍简传》，载苏孝先编：《漳州十属旅星同乡录》（新加坡，1948年），第59页。

② 见《天南新报》，1902年3月19日，第1版。

③ 蓝金升是一位著名的中介商和银行家。罗金榜是一位著名的中药材商和银行家，他在1903年建立了一座著名的佛寺“双林寺”来表示他的富有。陆佑是在马来西亚经营锡矿的一位大富翁。林秉祥是一位船主，银行家和制造商。蔡子庸是一位从事中介商业的大富翁，特别是在水稻和糖方面。张善庆是一位著名的进口商；李俊源是一位著名的商人和理财家。蔡子庸、林秉祥、张善庆和林维芳的财富使得他们从1906年到1908年在新加坡中华商会中处于像主席、副主席这样重要的地位。见前引苏孝先书，第59—61页；前引潘醒农编书，第158、178、195和211页；寇高瞻编：《东南亚名人录》（新加坡，1965年），第A4—A7页，A58—A64页；并见新加坡中华商会从1906年、1907年到1908年的理事会成员名单，载《新加坡中华商会纪要》（手稿），卷1，第2—3、60—61、和125—127页。

④ 按照1901年海峡殖民地的人口统计，有93,851福建人，50,591广州人，44,230潮州人，18,446客家人，16,788海南人和13,725福州人。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福建”一词是指闽南。见《海峡殖民地1906年蓝皮书》，第5页，“海峡殖民地的人口”。

有更多的代表。^① 这一点部分地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权力结构。各方言集团的权力分配似乎不仅仅根据其人数的多少，而且也根据各方言集团的财政势力的大小。各方言集团的不同代表分配很清楚地在半官方机构中表现出来，象保良局^② 和中华商会这样的典型组织。^③ 因为孔教复兴运动是用来向所有华人而不是向个别方言集团发出呼吁的，所以理事会中要包括大多数重要方言集团的领袖人物就成为一必然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从整个华人社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当然，这些领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是孔教的热心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并不是在会议现场选举出来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指定的，在这类会议上并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要包括各主要方言集团的大多数领袖在内。另一方面，一些领袖人物也乐意把他们的名字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以作为他们的威望和领袖地位的

-
- ① 这种现象是从这个理事会的那些可辨认的领袖中得出的。上面所提到的领袖中，林秉祥、罗金榜、张善庆和李俊源都是福建方言集团的领袖；蓝金升、蔡子庸是潮州帮领袖；陆佑和林维芳是广州帮领袖。
- ② 保良局是由海峡殖民地政府始创的一个福利机构，以保护那些被迫卖淫的中国女移民。在1904年的保良局的理事中，有九个福建人，七个潮州人，五个广州人，一个客家人和一个海南人。在另一个著名的华人咨询委员会的半官方机构中，其方言集团代表的名额分配是福建六个，潮州五个，广州四个，客家二个，海南二个。见《1904年海峡殖民地部门周年报告》，第127页。
- ③ 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商会建立以前，一个称为“商务公所”的商业组织早在1896年就已建立起来。在这个理事会的代表中，有十三个福建人，十一个潮州人，七个广州人，六个客家人和三个海南人。见《星报》，1896年2月1日，第4版。自从1906年建立以来，新加坡中华商会执行理事会中不同方言集团的代表名额就根据“帮”这个概念来分配。“帮”是一个地理和方言不同的联合体。当时有两大帮，即福建帮和广东帮。后者包括广州人、潮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在1908年的执委会中，有三十一人属广东帮，二十一人属福建帮。然而，在下属委员会中代表们似乎是在一个方言集团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在1911年的财政委员会中，有四个福建人、三个潮州人、二个广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各一个。见《新加坡中华商会纪要》，卷1，第125—126页；卷2，第65—66页。

标志。①不论其动机如何，显然，这些领袖都乐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理事会中或发表在报纸上，不言而喻地表示对运动的赞同。这样一来，运动的领导权就从它的热心者和支持者的手中转到了机会主义者和旁观主义者的手中。

总的来说，海峡出生的华人领袖在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海峡出生的华人只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四个主要社会集团之一。②由于他们中的一员林文庆博士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致一些文人错误地认为海峡出生的华人领袖与孔教有密切的关系。③事实上，1902年在新加坡倡议建立孔庙和学堂的理事会的三十四个意见一致的领袖中，仅仅有四个人是海峡出生的。④而且，著名的新加坡海峡出生的领袖如陈若锦、余连城和宋旺相等都不在理事会中。⑤他们所起的微弱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对大英帝国的责任和与西方文化的联系，⑥所以，一个如此强烈倾向于中国文化的运动是很难感染他们的。林文庆博士和少数其他人，看来只是例外人物，而不是代表人物。

新马孔教复兴运动高层领导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林文庆从一个基督徒转变为一个孔教复兴分子的领袖。林是海峡殖民地早期华人中为数不多的基督教皈依者之一，他是在苏格兰求学时受洗

① 这种习惯在新马华人领袖中仍带有普遍性。一些领袖允许让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不同组织的理事会中，纯粹是为了社会名誉和领袖地位之故。值得注意的是在传记作品中，新马的华人领袖只要是对其领袖地位有利就很乐意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占据许多位子。

② 按照1891年的人口统计，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数字是12,805人，排在福建(45,856)、潮州(23,737)、广州(23,397)人之后，据第四位。见《海峡殖民地蓝皮书，1904年》，第12页，“海峡殖民地的人口”。

③ 例如见前引L·E·威廉斯书，第55—56页。

④ 他们是陈武烈、林文庆、李俊源和蔡绵溪（在官话中用拉丁字母拼成Ts'ai Mien-hsi），见《天南新报》，1902年3月19日，第1版。

⑤ 见杨进发：《新加坡华人领袖初探（1906—1941年）》一文中的海峡殖民地的“中英协会”的领袖名字，载《东南亚历史学报》，卷9，第2期（1968年9月），第264页。

⑥ 同上，第267页。

的。1893年返回新加坡后就开始了私人医生涯。他很成功，并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博得了一个较好的声誉。^①1895年他在社交场上已很活跃，四年后他皈依了孔教。

有两股——内部的和外部的——力量促使他这样的转变。这就是他对一种身分的坚定的追求和他对康有为改良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当时，身分问题对许多海峡出生的华人来说是个共同的问题，但对林文庆这样一个有海外经历而又从英国和中国文化中受益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在林文庆去苏格兰以前，是在最好的新加坡英国殖民地学校受的教育，他对英国文学和历史有深入的了解，^②这时也许他并不存在任何身分的问题，因为他也象许多其他受过教育的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一样，很骄傲地把自己当做一位忠诚的英国臣民。然而当他在苏格兰学习期间，却遇到了一个身分问题的危机。虽然他穿的是西方服装，没有一条容易识别的满清发辮，举止也象一位英国绅士，但大多数人仍认为他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华人，而不是一个英国臣民。当他的老师和朋友发现他不会读中文，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时，他们热烈地拥抱了他。^③当他在苏格兰完成学业之后，身分问题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似乎是在两种身分中摇摆，有时候两者又都在争夺他。^④但他在海外的经历使他终于转到了中国

① 1894年3月《星报》的一条新闻报道称赞林文庆博士是一位优秀的医生，同时还报导了海峡殖民地的中国总领事贡遵宪送给他的一些礼物以表谢意。见《星报》，1894年3月13日，第4版。

② 见《林文庆传》（新加坡，1972年，作者不详），第2页。

③ 有两件事发生于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第一件事是由于他不谙华语而不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所接受；第二件事是当一位教师请他翻译一篇中文时，他只得承认他对中文一无所知，因而受到了教师的拥抱。见柯英希：《林文庆博士的公开生活》，（未发表的文学上优秀论文，马来亚大学，新加坡，1958年），第4页。

④ 1900年8月，基本上是在林文庆领导下的新建立的海峡殖民地的“中英协会”显然已制定出它的主要目的：促进英帝国的商业利益，鼓励和支持其成员效忠于英国女王。在1907年7月，即在它建立至少一年以后，在林文庆领导下的这个团体也由于醇亲王的来访而宣誓效忠于中国皇帝。见前引宋旺相书，第319页；《海峡时报》，1901年7月31日，第2版。

这一方。1893年返回新加坡后，他开始学习官话和广州话，^①他的中国人的身分问题由于与著名的华人学者黄乃裳的女儿黄瑞琼结婚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他变得对中国的文化、宗教和历史很感兴趣。由于从他岳父的对中国经典的深奥知识中得益非浅，使他已很好地把握住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因孔子教义对他的吸引，以致使他坚信孔教不仅较之基督教优越，而且在世界上的几个宗教中也是最好的一个。^②他深信原始的孔子学说已被中国保守的儒家文人们所遮蔽。看来他很赞同康有为的观点，即真正的孔教必然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被发现和复兴。^③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信念，使他在新马孔教复兴运动中如此活跃。

随着林文庆对自己的中国人身分的观念的加深，自然引起他对中国政治及其前途的关心。他注意到了满清帝国的衰弱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特别是1895年屈辱地败于日本之后。看来，他很赞同一些颇具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观点：中国没有一个激烈的政治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④由于他的岳父是一位康有为改良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他转向康有为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⑤由于他的政治信仰和对康有为的尊敬，^⑥使他接受了康有为的说法，即孔教是一种先进政治思想，孔子是一位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前头的不断创新的改革者，并总是支持社会的变革。^⑦林也认为孔教对全体中国人民说来是好的，全体华侨都应拥戴它，应该用它来使华侨社会现代化。^⑧

① 前引柯英希文，第21页。

② 林文庆：《论孔教》，载《日新报》，1899年12月15日，第1版。

③ 在《论孔教》这篇文章的一个脚注中，林阐述了真正的孔教的晦涩的观点和异端的起源，有必要揭示孔子学说的核心，这对人类是有益的。

④ 见文庆（林文庆）：《来自内部的华人危机》（伦敦，1901年），特别是在第100—167、285—329页。

⑤ 前引柯英希文，第21页。

⑥ 康被林描写成一位中国的百科全书派者。康论述孔教的著作被认为具有发展古代中国经典学说的新观点，康的著作对中国的影响就象法国大革命前伏尔泰对法国的影响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见前引文庆书，第23—24、33页。

⑦ 前引文庆书，第33—35页。

⑧ 前引柯英希文，第49页。

意识形态

运动的意识形态直接来自康有为的改良运动。康认为孔子是走在时代前头的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学说包含了所有的真理，应该把它恢复并使之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为全人类服务。^①在他那本著名的《孔子改制考》（1896年出版）一书中，康指出孔子吸取过去的学说来支持他的社会政治改革，变革在他的学说中是固有的。^②康认为孔子的学说已被古文经学派所曲解和误释，^③真正的学说必须作为政治改良和国家强大的一个主要来源而被重新发现和建立起来。

将孔教作为国家强大的主要源泉

为什么中国软弱而西方各国强大呢？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许多中国领导人物就曾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康有为以前，已有许多儒家文绅认识到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其优越的武器和技术。这就促成了“自强”运动的兴起，结果，西方军火制造的技术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来。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自强运动”失败之后，敏感和急进的儒家文绅认识到在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他们发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不仅由于军事技术，而且由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康有为就是这些急进的孔教文人代表之一。在诸多西方制度中，康有为似乎注意到了基督教会和西方列强的紧密联系。他不仅看到了基督教

① 见孔全孝：《康有为和孔教》，《纪念中国》卷13，（名古屋，1959年），第92—212页，特别是第165页。

② 罗荣榜：《康有为：传记与论丛》，第6页；并见《孔子改制考》原文。

③ 古文经学派（或称为古代经学派）和今文学派（康有为属于这一派）是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皇帝焚毁六种经典书籍后出版的解释中国经典的两个对立的学派。

会把不同集团连结在一起的凝聚力，而且也看到了它在人民中开发智力的教育活动。^①在探索中国国家强大的过程中，康自然注意到了孔教，因为，他把孔教重新解释为一个富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他把孔子的形象描绘成为一个贤明的政治家和体制的改革者。^②因此，他认为一个制度化的孔教是可以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与在西方社会中的基督教会相同的作用的。

新马孔教复兴分子试图发展康有为的论断。他们强调宗教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凡国家有国教者则强，无国教者则弱，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国力之所以衰弱是缺乏一个国教之故。^③一位来此地视察的孔教复兴分子丘逢甲指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源在于军队、商业、工业和农业，而事实上正相反，它们的强大赖于宗教和教育。按照他的说法，宗教为国家强盛赖以建立的民族团结提供了基点，而教育则提供了物质文明赖以建立的大众文化和技能。^④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孔教复兴分子断定中国只有以孔教作为国教才能恢复元气，他们将重新解释的孔教视为中国的唯一希望。

孔教复兴分子没有看到的是作为国家强大的最本质的东西，经济的强大才是西方国家的物质成就的秘密所在。没有工业革命，没有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产生巨大财富的经济制度，西方国家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军事力量。有一些人，如十九世纪末中国伟大的西方文明翻译家严复，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将现代欧洲的富有和强大归因于经济科学。^⑤严复认为中国的基本问

① 见康有为：《奏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摺》，康有为：《康南海文集》，第10—13页。

② 见孔全孝：《康有为和孔教》，《纪念中国》卷18，第88—212页；张舒：《梁启超和中国知识界的变迁（1870—1907年）》（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年），第50—51页。

③ 见王炳祥：《星州拟建孔庙暨开大学堂说》，载《日新报》1900年3月27日，第1版。

④ 丘逢甲：《劝星州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暨大学堂启》，载《日新报》，1900年3月27日，第1版。

⑤ 见本杰明·舒沃茨：《寻找财富和强权：严复和西方》，（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4年），第114页。

题是经济、国家及其人民的贫困，而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能产生财富和力量的制度。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应该做的是重新把人民引向经济活动并焕发出他们的经济活力。^①但是，国内外的孔教复兴分子看来却无法抓住这个问题的关键。他们仍然用孔子的道德体系来分析中国的病状。这种失策显然是与他们深受儒家经典的教育，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缺乏对西方的真正了解有关。使我们惊奇的是林文庆博士的态度，他在孔教是国家强大的根源的讨论中保持缄默。由于林在苏格兰呆过几年，并有充分的时间对西方进行观察，他当然认识到了西方国家强大的基础不是宗教而是经济。他对这个问题的缄默可解释为他在感情和现实的问题中进退维谷。他对孔教复兴的热情阻止了他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将孔教作为一个有效的现代化力量

孔教复兴分子企图以孔教为国教，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民族的骄傲，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孔教充满生气的形象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现代化力量。他们认为孔教是一个提倡从旧到新、从颓废到生气勃勃的变革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它可以鼓励体制改革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②他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引向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③他们认为虽然孔子没有系统的经济原理，但他的学说有些是与经济发展的原理密切相关的。他们宣称，孔子学说例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百工都来了，一个国家的财政就没有问题了”^{*}都与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国家采用的一些基本原理相似。孔教复兴分子认为，发展轮船、铁路和电信作为迅速发展

① 同上，第120—121页。

② 见前引王树祥书。

③ 见魏川楚石：《中国士农工商皆孔教中人说》，载《天南新报》，1900年6月5日，第1版。

* 原文如此。查《论语》和《孟子》皆无与此类似的句子。《论语·子张篇》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之句，可能是作者引用时之误。一译者。

经济的前提的现代原理与孔子学说是相符合的。^①显然，这个把孔教与经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论点在理论上是贫乏的，根本不能令人信服。那些对于经济发展所知甚少的孔教复兴分子企图掩饰这一点。然而，这个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经济事务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

除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热情外，新马的一些孔教复兴分子也关心当地华人社会的现代化。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旧风俗习惯的存在已经阻碍了当地华人的进步，繁琐奢华的婚丧仪式，盲目的偶像崇拜，以及在社会上对待妇女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新马华侨的保守思想。对他们来说，比现存的风俗习惯更为可悲的是缺乏对年轻的华侨的道德教育。他们认为，道德教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且还是进步力量的源泉。基于这种信念，他们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华语学校来进行道德教育，年轻一代的华侨应该正规地接受孔子的伦理价值观的教育。^②他们坚定地认为孔子的伦理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部分，就象《古兰经》对穆斯林，《圣经》对基督教徒一样，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益处。^③事实上，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认为孔教有关伦理的学说更优于其它宗教，因为它教导人们如何在社会上待人处事，区分了上下老幼之别。^④对他们来说，允许西方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和寻求唯物主义的极端形式，对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不合需要和不适宜的。

确信这个恢复新生的孔教是一个有效的现代化的力量，一些孔教复兴分子就积极地卷进了一场社会改良运动中去，目的在于改革当地华人社会中旧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林文庆博士和邱菽

① 见前引魏川楚石：《中国士农工商皆孔教中人说》。

② 见林文庆：《儿童教育》，载《海峡中华杂志》，卷3，第2期，1899年。

③ 同上。

④ 这包括在林文庆在新加坡庆祝孔圣诞辰会上对孔教复兴分子的讲话中。见《译记新加坡孔教同人演说》，载《天南新报》，1901年10月11日，第2版。

园这两位孔教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积极地宣传改良措施，例如“剪辫子”，婚丧习俗的改革，教育的改革。

他们突出的一个成就就是提倡女子教育。看来，林邱二人是反对中国社会中儒家价值观对妇女的压制的，特别是妇女在有关教育方面所受的歧视。他们认为中国妇女教育的智育的改善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让它的一半人口总是保持愚昧和堕落而能够取得任何巨大进步的。他们还认为妇女的低下的奴隶地位的保持，事实上将阻碍社会前进，^①而那些中国的父母对待他们的女儿教育的冷漠态度正是中华民族衰弱的基本原因。^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提倡女子教育。因此，林文庆和邱菽园开始为建立新加坡中华女子学堂而奔波。他们开会，送传单给著名的华人，寻求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但并没有得到富有华商或华人父母的支持。^③只是由于林文庆的不懈努力和邱菽园捐献了三千元，新加坡中华女子学堂才在1899年成功地建立起来。^④

孔教复兴分子的改革思想和措施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现代化思想与西方化并不相等。虽然他们羡慕西方物质的先进，并准备借用一些西方的风俗习惯，但他们并不打算全部接受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是西方化者。同时，他们强烈地认为孔教伦理制度是最完美的，这样一个恢复生气的孔教将使中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儒教现代化者。

将孔教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生力量

由于新马孔教复兴分子的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与当

① 见林文庆：《儿童教育》，载《海峡中华杂志》，卷3，第2期，1899年。

② 见林文庆：《新加坡中华女子学堂》，载《海峡中华杂志》，卷6，第24期，第168—169页。

③ 见柯英希：《林文庆博士的公开生活》，第27页。

④ 见前引宋旺相书，第101页。

时的许多其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对**中国即将被瓜分、中国人民作为一个种族将被毁灭感到强烈而普遍的恐惧。**①他们深感寻找一个能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威胁的思想体系的必要性。由于他们所希望的思想体系的类型在政治上要生气勃勃，在社会上要有凝聚力，显然，重新解释的孔教正适应这种要求。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都是由社会进化论武装起来的，而这种理论基本上是侵略性的，因此，生气勃勃的孔教也许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来抵御和压倒帝国主义入侵的潮流。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相信，这个恢复生气的孔教将为中国人民的团结提供一个基点，并将产生象西方国家赖以活跃发展的巨大智慧力量。②

在基层里，许多孔教复兴分子必然为华人社会所存在的不团结所吓倒。方言和宗族的划分，再加上华人秘密会社中的派别斗争，极大地阻碍了华人社会的团结和进步。他们相信新的孔教将为华侨提供一个共同的一致性，和一个民族的意识，并将有效地帮助清除方言和宗族集团间存在的区分。③因此，当这种区分被清除并建立起团结时，新马的新人社会必将满怀信心地前进。

简言之，在新马孔教复兴分子的眼里，恢复了生气的孔教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源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力量。它将使中国振兴和富强，使她击退外国的侵略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

译自《东南亚研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6年3月第7卷第1期。

粟明鲜译 马宁校

① 见《记丘工部逢甲达吡叻和演说》，载《天南新报》，1900年6月4日，第1版。

② 同上。

③ 见前引林文庆博士的演说。

马来西亚华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李国卿

一 马来西亚的华侨移民及其特点

马来西亚华侨的发展过程具有和泰国华侨的发展过程不同的若干特征。

目前的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国家，它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半岛的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即现在的西马来西亚）和婆罗洲岛北部的直辖殖民地沙巴、沙撈越两个州（即现在的东马来西亚）的版图，但不包括1965年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独立出去的新加坡共和国。因此，从行政领域看，马来西亚联邦包括了东马来西亚；但在探讨华侨历史的发展过程时，为了研究的方便，却需要把西马和新加坡结合在一起考察，而把东马另行分别考察，本文暂就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地区来考察其华侨资本的形成过程。

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马来族）不仅在人种上和汉族完全不同，而且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各异，相互之间要进行同化是比较困难的。^① 中国人到马来半岛经商和定居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在南北朝的宋（文帝）元嘉年间（公

^① 马来族包括了马来人和当地其他土著，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族、巽他族等种族也属于马来人种族。因此，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有许多共同点，此外，马来西亚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回教徒。

元424—453), 马来半岛上的“盘盘国 (Pan Pan)”已向宋朝进行朝贡了。元朝的汪大渊所撰述的《岛夷志略》(公元1349年以前写成的) 记载了中国商人在彭亨、吉兰丹、丁加奴、新加坡、吉打等马来半岛各地活跃经商的情况, 并记述了在新加坡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的情况。此外, 最早在马来半岛上开掘锡矿的也是华侨。但华侨却没有融合于马来人社会, 而是继续保持着华侨的独立社会, 因此, 马来西亚华侨的地缘和血缘组织一直发挥着为其他东南亚各国华侨组织所无法比拟的重大作用。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华侨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原住民人口的增长速度(请参看表1和表2)。马来半岛上的华侨人口多于原住民人口的这种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未见的。1957年当马来亚联邦(即现在的西马)独立时, 藏居良造先生曾经就这一现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分析: ①

“马来亚联邦拥有两个在人口数字上大致相等的民族, 他们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和相互孤立的经济活动领域, 这在历史上还是首见的。新兴的马来亚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其命运将取决于华侨的动向, 华侨是抛弃中国的观念而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呢? 或者固执地保留着中国人的特点作为华侨而存在呢? 此外, 马来亚联邦的华侨是和中国本土的中国政府保持联系或者继续和台湾的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呢? 这些均将对新生的马来亚联邦的前途发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 马来西亚华侨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持有很强烈的优越感, 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起着指导的作用。马来西亚的华侨绝大部分都是随着英国殖民者在马来亚着力执行殖民政策的过程而在1900年以后大批移居到马来半岛的开荒者的子孙。在东南亚各国当中, 马来西亚华侨的历史比较短。他们是从由于鸦片战争

① 见藏居良造:《马来亚的政治动向与华侨》(载于亚洲经济研究所,《马来亚的华侨与印侨》一书, 1961年版)。马来亚联邦独立时的种族人口比率请看本文表1的西马来西亚1957年一栏数字。

(1840—1842年)和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年)而发生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移居到马来半岛的,他们在人口数字上可以和原住民族相抗衡,而在经济势力方面则完全能够支配原住民族。这就自然地使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发言权。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当中,最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运动的也是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侨,最早创建的华侨银行便是1907年在新加坡设立的四海通银行和保险公司(Sze Hai Tong Banking and Insurance Co.,)。其后,在中国本土爆发了抗日战争时,以陈嘉庚、胡文虎(均为新加坡华侨社会的领袖)为首的华侨社会领导层率先挺身而出,参加了抗日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来人民族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这种华侨民族解放运动的启发,但马来人民族独立运动其后却发展到以“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为口号的方向,表现出和华侨之间的深刻矛盾。

开头,马来西亚的大部分华侨是作为工人,特别是作为“苦力”(即所谓“契约劳工”)而移居到马来半岛的。成田节男根据1931年的统计数字指出:①

“当地的大多数华侨是劳动者,其他殖民地的华侨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商人,这也是马来亚华侨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华侨的一个特点。根据1931年的统计数字,在马来亚华侨当中,从事农业和渔业的占二十九万多人,从事矿业的占七万多人,而从事商业的则仅占十四万多人。从事农业者多半是橡胶园工人,从事矿业的多半是锡矿工人,加上工业部门的工人十万多人,劳动者大约比商人多两倍。劳动者占多数的现象说明马来亚华侨是处于幼年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华侨一旦发展得比较顺利,一般都会从劳动者转为商人,也就是说,华侨劳动者乃是华侨商人的前身。劳动者占多数的这一事实规定了马来亚华侨的性格,一般说来他们比商人粗野、有活力、容易倾向于赞同改革现状的运动。因

① 见成田节男,《华侨史》(1941年东京莹雪书院版),第296页。

此，只要有适合的领导者，他们很容易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马来亚华侨之所以会成为整个东南亚华侨的领导力量，其原因之一便是马来亚华侨拥有较多的这种活跃的活动分子。”

成因节男的这种分析确是相当中肯的。其后马来西亚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能够转化为商人（资本家）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农业、矿业、工业劳动者和商人的比率便大致固定下来，和过去一样，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根据1957年马来亚联邦的人口调查，在马来亚联邦（现在的西马来西亚），从事农、矿、工业的华侨劳动者约有四十五万人，而从事商业（包括金融业）的华侨则只有十二万七千人。

此外，从马来西亚（西马）华侨的籍贯（乡帮）分类看，福建帮占30%，占最大比重；其次为广府帮占26%，客家帮占22%，潮州帮占11%，海南帮占9.5%，其他占5.5%。

二 马来西亚社会的三重经济结构与华侨经济

英国在马来半岛进行殖民地经营开始于十八世纪末。从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一直很想和中国开展贸易活动，它急需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即南海——译者）之间设立一个中转贸易基地；当时东南亚一带已经为荷兰势力所控制，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取得了苏门答腊南岸的明古鲁。但是这个港口不仅由于容易受到东南季候风的袭击，难以为过往商船提供避风、修理和装货等用场，加上荷兰已经掌握了面临马六甲海峡的天然良港马六甲（这是印度洋以西地区和东亚各国贸易的中心），因此英国如果死守明古鲁港，便有落后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的危险。于是，英国便不断地在马六甲海峡一带寻找一块新的贸易基地，结果通过曾和吉打苏丹结过亲的莱特上校的斡旋，英国以每年六千美元的租金为条件租了槟榔屿岛。1800年又以每年增加一万美元的租金

为条件租了檳榔嶼对岸的威斯利州，并以这些地方作为英国在马来半岛的最早殖民地。1795年英国占领了马六甲，但一度又曾还给荷兰人。1824年英国人重新以明古鲁港换回马六甲。此外，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斯坦福·莱佛士于1819年从柔佛苏丹手中以六万美元的代价买下了新加坡岛。于是，英国便确立了它在马来半岛的统治体制。

檳榔嶼、马六甲和新加坡以后被合称为“海峡殖民地”，它们作为英国国王的直辖殖民地而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新加坡，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加上精心的经营，很快地就成为东南亚的第一大贸易港口。莱佛士以廉价买来的新加坡不仅为英国挣来了无限的财富，而且使卖掉新加坡的柔佛苏丹和马来半岛的居民逐步陷入殖民地统治达一个世纪之久。（在莱佛士买到了新加坡之后二十三年，英国又以鸦片战争赔偿为条件迫使中国[清朝]把香港割让给英国，香港作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也发展成为东亚的屈指可数的贸易港口。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港口的地理条件极为相似，由此不得不使人们对当时英国人眼光之敏锐感到敬佩。）

英国一方面开发建设海峡殖民地的三个港口，另一方面又大力开发马来半岛的资源和各种产业部门。1895年英国把霹靂、雪兰莪、美森兰、彭亨四个州合并为马来联邦，作为英国的保护领；1905年又合并原属于泰国南部的四个州，1914年又合并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邦和非马来联邦的各个独立州（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建立了英属马来；此外，英国还于1888年把北婆罗洲（现在的沙巴州）、沙撈越和文莱保护领合并为英属婆罗洲，目前马来西亚联邦的疆域范围，便这样大致形成了。在这段期间内，英国殖民统治者十分重视发挥华侨的才能和勤劳，从而在马来亚建立起了被称为“三重经济结构”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

例如，T·H·西尔科克在马来亚联邦独立前夕（1951年）

发表的《马来亚的经济》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论述：^①

“马来亚的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结构，而是三重的经济结构。这种三重经济结构在种族、阶级、政治倾向方面均各自不同，有时这种区别比较明显，有时则不一定那么明显，但是这种三重经济却一直支配着马来亚的生命和生活”。（重点是作者加的）

接着G·C·艾伦在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的那一年）又把西尔科克的论点进一步具体化了，他就此作了如下的论述：^②

“马来人大部分是农民或者是工业部门里的非熟练工人。华侨经营着工业和金融部门中的中小型企业，或者在华侨和欧洲人经营的制造工业企业里充当熟练工人。欧洲人占有和控制着大部分的大型种植园、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他们为马来亚带来了进步的专门技术和有高度效率的企业管理秩序。因此，马来亚这个地区总的说来便成为有着由几种明确区分开来的种族集团执行着不同的经济职能的这种独特的复合经济结构。”

其后，日本明治大学松尾弘教授又参照了上述两位学者的分析，用以下的论点来概括马来亚的“三重经济结构”：^③

“（1）没有发生变化的自给自足经济 = 马来族原住民的经济，这也是华侨原始资本积累的地盘；

（2）前资本主义的资本经济 = 华侨经济；

（3）资本主义的资本经济 = 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殖民资本。”

松尾弘教授认为导致这种三重经济结构的根源是英国在马来亚的经济开发政策，他就此作了这样的论述：

“开发殖民地得有大量的投资和劳力。……如果英国人可以从马来人当中找到适合于充当工资劳动者的人的话，他们就会把

① 见T·H·西尔科克：《马来亚的经济：殖民地政治经济学》，新加坡1954年版。

② 见G·C·艾伦和A·G·唐尼索恩：《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西方企业——经济发展的研究》，伦敦1957年版。

③ 见松尾弘：《马来亚的经济与华侨》（载于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丛书，第8集，《马来亚的华侨与印侨》，1961年版）。

马来族原住民训练成为产业工人，从而瓦解马来人的自给自足经济，这样也许就会更早地促使马来人社会经济的变化，另一方面，受过现代产业训练的马来人也许就会在农、工、商各个产业部门展开更广泛的、更为活跃的经济活动，而不是目前的这种情况了。但是当时英国在进行殖民地开发时，马来亚的原住民人数并不多，而且居住分散，过着他们所特有的甘榜（Kampong，马来文，村落的意思——译者）生活，因此英国人在马来人中几乎找不到工人……于是开发马来亚的工人就必然要求之于移民了。大量迁入马来亚的华侨满足了这种要求……这样一来，在马来亚便形成了这样一种三重经济结构：保留着以往传统经济生活的马来人经济；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这里定居，并在所有产业部门积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华侨经济；作为马来亚的政治、经济统治者，占据着最高领导地位的英国经济。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松尾弘教授还对马来亚联邦另一个重要种族——印侨（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作了如下的论述：

“在外来种族当中，华侨虽然是最有势力的，华侨约有80%是工人；但在英国人所经营的大橡胶园劳动的工人总数中，印侨约占80%。印侨虽然也有经营橡胶园者，却不值得一提。”印侨的资本主要投在金融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而主要是金融业（大部分是高利贷），印侨的经济势力绝对比不上华侨，

“有些人把印侨经济也列入马来亚经济结构，提出了所谓‘四重经济结构’等等说法，这似乎过于片面了。它们并不能概括整个马来亚经济的总貌。”

正如作者在本书第一章所指的那样，在欧洲殖民统治阶层的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和东南亚原住民族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中间插进一个华侨经济，从而形成一种“三重经济结构”的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马来西亚，可以说这乃是东南亚地区的普遍的、共同的典型模式。尽管如此，但马来西亚（这里指的是马来西亚联邦）的这种“三重经济结构的独特特点在于：马来亚联邦的华侨

人口相当于甚至多于原住民（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仅占总人口的2%强，菲律宾也不过只占8%强）和华侨形成了同原住民有所区别的社会集团（这种情况和上文所述的泰国情况相比较，就更为明显了）。也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侨尽管也在所有产业部门中占有很大的势力，但人口很少，不致于成为原住民族的严重威胁；而泰国华侨人口的比重虽然比较大（泰国华侨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没有超过10%），但华侨和原住民族的民族融合的趋势却不断地在加强，因此问题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而马来西亚的情况却正如上文所引用的藏居良造的说法：进行了一种建立“由人数几乎相等，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和分别孤立的经济活动领域的两个民族凑合在一起”，从而组成一个国家的“史无前例的实验”。

表3用统计数字分别列示了马来亚联邦（即现在的马来西亚）成立时的“三重经济结构”情况。

表3（一）从就业人口结构比率来考察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1947年到1957年的十年期间内，第一产业部门的构成比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其下部分有一半转到了第三产业部门。在这十年的期间内，马来亚联邦的人口从490万人增加到630万人（参看表1）。因此在增加的140万左右人口中，绝大部分是由第三产业部门吸收去的。结果在各个种族的人口产业部门分布方面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表3（二）回答了这个问题。

根据表3（二）数字，原住马来人有73%强就业于第一产业部门，华侨则有将近60%的人口就业于第二产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马来亚联邦独立后，马来亚联邦政府实施了各种目的在于改变这种状况的“马来人优先主义”政策和限制华侨职业政策；但是，马来人主要从事于第一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和渔业），而华侨则主要从事于以商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部门和以锡矿场和中小型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部门的人口结构状况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是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英国殖民统治史所造

成的，不是一下子能够轻易改变的。

表1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个主要种族人口

年份 地区	1921年		1947年		1957年		1966年	
	人口数 (人)	比重 (%)	人口数 (人)	比重 (%)	人口数 (人)	比重 (%)	人口数 (人)	比重 (%)
马来西亚 (西马)								
马来人	1,568,588	54.0	2,427,834	49.5	3,126,766	49.20	4,220,549	50.15
华侨	855,853	26.4	1,884,534	38.4	2,332,936	37.16	3,076,229	36.54
印侨	439,172	15.1	530,638	10.8	695,985	11.08	932,186	11.07
新加坡								
马来人	54,426	12.9	115,735	12.3	197,060	13.63	280,600	12.1
华侨	316,877	75.2	730,133	77.6	1,090,595	75.43	1,443,700	78.8
印侨	32,342	7.7	60,978	7.3	124,084	8.58	158,500	6.6
合计								
马来人	1,623,014	48.8	2,543,569	43.5	3,323,766	43.03	4,501,149	
华侨	1,171,740	35.2	2,614,667	44.7	3,423,531	44.32	4,519,929	
印侨	471,514	14.2	599,619	10.3	820,069	10.62	1,090,686	

(注) 根据1966年的人口调查数字，东马来西亚(沙巴、沙撈越)的人口为1,413,396人，其中华侨占43万人。

资料来源：1924年—1957年的数字根据N·金斯伯格和C·F·罗伯茨《马来亚，1958年》一书的材料编制，(但西马来西亚的数字则根据1957年人口调查数字作了补充)。1966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独立的第二年)的数字分别根据马来西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所公布的数字编制。

表2 檳榔屿岛的人口增长(单位：人)

年份	华侨	马来人	其他①	总人口
1818	7,858	12,190	14,952	35,000
1830	8,963	11,943	13,053	33,959
1842	9,715	18,442	12,342	40,499
1851	15,457	16,570	11,116	43,143
1860	28,018	18,887	13,051	59,956
1937	150,789	40,542	39,161	230,500

① 包括了英国人、印度人等。

表3

(一) 马来西亚联邦人口的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 (单位: %)

年 份	第一产业部门	第二产业部门	第三产业部门
1947	64.4	9.9	25.7
1957	57.6	12.6	29.8

(注) 根据人口调查的职业人口的产业部门结构比重。

(二) 各个种族的职业人口产业部门结构比重

(1957年) (单位: %)

种 族 别	第一产业部门	第二产业部门	第三产业部门
马来人	73.2	6.1	20.7
华 侨	40.1	22.4	37.5
印 侨	55.7	10.7	33.6
其他种族	18.8	8.1	73.1

(注) “印侨”一行数字仅指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锡兰人列入了“其他种族”数字。资料来源: 根据1957年人口调查材料编制。

三 华侨对开发马来亚 两大产业部门的贡献

1786年莱特上校从吉打苏丹手中租得了槟榔屿岛时, 岛上的中国人和马来人合计起来才只有58人, 两年后的1788年增至1,000人左右(其中中国人400人), 1804年有12,000人, 1818年(即英国人买得新加坡的前一年)剧增到35,000人, 根据布雷得尔统计数字, 槟榔屿岛的人口增长变化如表2所示。

从1818年到1842年, 槟榔屿岛的华侨人口仅增加1857人(年平均增加35人), 这是由于从1819年开始的新加坡建设把华侨吸引到那儿去了; 据说当时(1824年以前)还处于荷兰统治下的马六

甲也不断有华侨违反荷兰政府的禁令移居到新加坡去的。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檳榔屿岛的华侨人口便赶上了马来人；1860年华侨人口便占了檳榔屿岛总人口的46.7%，1937年又剧增到65.4%。这是英国殖民政府积极促进华侨人口入境所导致的结果。英国殖民政府之所以要采取积极促进华侨入境的政策并不是如上面所引用的松尾弘教授所说的“由于原住民不适于充当工资劳动者，因此不得不依靠华侨移民”这种消极的动机，而是由于英国殖民政府比较愿意选择华侨作为它的开发马来亚的助手（如果松尾弘教授的说法是对的，英国殖民政府便应该是努力引进“印侨”了）。

当时英国人对华侨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日本须山卓对此有过如下的论述^①：

“例如，莱特上校曾经说过中国人是这里居民中最有价值的成员；此外，克劳福氏在他呈交给当时的孟加拉殖民政府的报告书中说，‘中国人是亚洲人口中人数最多、最勤劳、最有用的部分’，并说中国人的能力仅次于欧洲人，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胜过欧洲人。他们在开发马来半岛的资源方面是最为活跃、最起作用的代表人物’。弗兰克·瑞天威爵士评价说，‘目前马来亚各个州之所以会有今天，全靠中国人的精神和事业’；查尔斯·罗卡斯爵士则说道：‘他们在开发海峡殖民地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怎样加以赞扬，也是不会过份的’。”

须山卓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弗兰克·瑞天威爵士在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之后，于1906年写成了《英属马来亚：英国经营马来亚的起源与经过》一书，瑞天威爵士在这本著作中对华侨在开发马来半岛锡矿中的功绩曾作了如下的叙述^②：

“中国人的开矿技术虽然原始，但他们的开发计划却很讲究

① 见须山卓：《华侨经济史》（世界史研究丛书，第12集，1972年，东育近藤出版社）第171—172页。

② 见F·A·瑞天威：《英属马来亚：英国经营马来亚的起源与经过》，伦敦，修订版，1929年。本书在引用这段话时，参考了成田节男的《华侨史》。

效率。(……他在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所特有的锡矿采掘方法之后，接着又说……) 马来亚的附属国主要依靠锡矿收入，因此这些附属国政府的主要政策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锡矿的开发。某家法国公司早在1882年便在霹靂州的近打(Kinta)地区开始采掘锡矿，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州，其后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设立公司来采掘马来亚的锡矿。但最早在马来半岛进行锡矿开发的应首推中国人，他们一直在马来亚开掘锡矿，依靠他们的努力竟使马来亚能够提供世界锡矿的一半产量。

“马来亚各州之所以会有今天，全靠这些中国人的精神和事业，有人说：这些勤劳和遵守当地政府法律的华人给当地政府和居民带来了不少好处，这样说并不过份。早在西方人发现到马来半岛来的航线以前，中国人便已经在这里开矿经商了，有的还在这里务农、捕鱼。早期，中国人在这里虽然还没有筑起公路和兴办起其他公用事业，但当地政府的其他行政费用却都是依靠中国人的勤劳和精力来提供资金的。

“当时，中国人是马来亚矿业的拓荒者，目前也仍然是如此。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受酷暑的熬煎，他们不仅是矿工，而且在需要他们自己去熔矿时，他们也去烧炭、砍柴、做木工、烧砖瓦。中国人还承包了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建造官府衙门，修建了许多公路、桥梁、铁路、河道。他们在欧洲人尚在犹豫未敢在马来亚进行投资时，早已把他们的全部资金投入到了马来亚。他们是商人、商店主。中国人的汽船最早开辟了通航于海峡殖民地各个港口和马来亚各个土侯国家港口之间的航线。当这个密布着丛林的国家为了开发其蕴藏着的宝藏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时，这些中国人便把他们的同胞成千上万地引到这个他们几乎完全不熟悉的国家里来。这个国家的财政岁入几乎十有九是由中国人所经营的经济事业提供的，是从中国人所消费的奢侈品和所享受的娱乐征课来的税金提供的。”

如果我们联想到瑞天威是以担任过海峡殖民地总督这样的身

份来对马来亚华侨作这样的评价的话，便可以想象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是把马来亚华侨视为“马来亚的开发先锋”并力求取得马来亚华侨的协助。

在马来亚的经济开发史上，华侨的功绩受到高度评价的项目，除了锡矿开发之外还有橡胶的栽培。马来亚的橡胶栽培历史始于1877年，但商业性的橡胶种植却是开始于1895年前后。^①但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内，马来亚便发展成为世界首位橡胶产地，产量占全世界天然橡胶产量40%。这个领域也是由华侨独占经营的，例如成田节男便有如下的论述：^②

“橡胶的栽培正象花圃园艺一样是很有趣的，树苗移植后便不需要什么剪修，但要等七年之后才能成长割浆。胶浆是割开树皮取浆的。如果是由巧匠割浆，他们割开树皮的痕道到第二年还能出浆；如果是拙匠割浆，便会长出树瘤而损伤了树皮，第二年便不能出浆了。橡胶园里的种植工人多半是印度人，但他们技术不高明、效率低。尽管工资低，但由于经常有割伤橡胶树的危险，因此人们喜欢雇佣华侨橡胶工人，华侨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但他们的工作却令人放心。尽管印度橡胶园种植工人在人数上多于华侨工人，但华侨工人的努力却并不比印度工人低。”

根据成田节男所提供的数字，1921年华侨所经营的橡胶园面积占马来亚全部胶园面积（包括新加坡）的四分之一，在橡胶业最繁荣的1928年曾扩大到占三分之一。成田节男在进一步把马来亚经营形态划分为大型种植园和占地在一百公顷以下的小胶园两类之后说，1940年前后，华侨所经营的胶园在大型种植园中占17%，在小型胶园中约占40%；在马来亚全国胶园劳动的华侨工人占全国胶园总工人数的25%。^③

如上所述，华侨作为开发马来亚的两大产业部门（锡和橡

① 见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1940年，东京岩松堂书店），第138页。

② 见前引成田节男书，第288页。

③ 同上，第289页。

胶，马来西亚的锡和橡胶在世界上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主角，受到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重视和欢迎；华侨在马来西亚的所有产业部门几乎都有经营活动。表2（槟榔屿岛人口的增长）和表4（新加坡华侨人口的增长）中所列示的华侨人口的急剧增长如实地反映了华侨经济的这种发展方向。

当然在马来西亚也存在着华侨通过作为农村、渔村的收购、供应垄断商所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这和泰国农村里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例如，曾于1939年到1940年约一年期间内调查过吉兰丹和丁加奴两个州农村、渔村实地情况的弗思，就曾对被称作“头家”的华侨中间商人控制渔村经济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论述：^①

“由于能够深入到某个地区的产业经营活动中去，因此华侨象在马来西亚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那样，甚至对渔业生产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许多地方作为渔产品收购商而控制了渔产品的初级市场，同时又作为原住民马来人渔民的贷款商而扩大了他们对渔业生产的作用。这些‘头家’（人们是这样来叫这些华侨中间商人的）用尽各种办法来经营这种收购业务，他们预先贷款给渔民买渔船和渔网，并经常在非渔捞季节以下一次捕鱼季节的渔产品作为担保预先向渔民提供贷款，供渔民购买大米和布料等生活用品。作为这种贷款的代价，他们得以和渔民签订合同，按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协议价格或按华侨中间商订的价格收购渔产品。华侨收购商固然替代渔民全面担负了寻找买主市场这种极其麻烦的事，但是这样的一种收购制度显然对渔民有很大的损害。因为渔民的渔产品由华侨的‘头家’垄断了，便不仅丧失自己赢取利润的机会，而且紧紧地被束缚在‘头家’所垫付的债务之中，从而丧失了积累资金的机会。”

西尔科克则在1954年出版的《马来西亚的经济》一书中论述了马来西亚农村的状况^②：

^① 见R·弗思：《马来西亚渔民及小农经济》（1949年版）。

^② 见前引T·H·西尔科克书。

表4

新加坡的华侨人口增长 (单位: 人)

年 份	男 性 人 口	女 性 人 口	合 计
1821	—	—	1159
1823	2956	361	3317
1833	7650	867	8517
1836	12870	879	13749
1850	25749	2239	27988
1890	46795	3248	50043
1871	47104	7468	54572
1881	72571	14195	86766
1891	100446	21462	121908
1901	131007	33674	164681
1911	166057	58173	224230
1921	220307	101268	321575
1931	265618	158135	423793
1947	387373	342100	729473
1957	555663	534932	1090595

资料来源: 1931年以前的数字引自帕塞尔《东南亚的华人》(1951年)。1947年和1957年的数字引自《新加坡殖民地年度报告书, 1958年》。

“马来亚的小农并不是为了取得货币而种植大米的。他们得把收成的一部分按合同协议的价格卖给华侨抵债, 其后他们又得从华侨手上买回自己消费所需要的大米。因此, 中间商获得利润, 而小农本身却又陷入更沉重的债务之中。”

西尔科克在这里描绘出了华侨商业资本“买青苗”的掠夺情景, 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在马来西亚形成为象在印度尼西亚那样的严重问题, 乃是由于马来西亚农村的自然条件很好, 农民看来并没有因此而陷入严重贫困的状态中。例如松尾弘教授在《马来亚的华侨与印侨》一书中便曾经作过如下的论述^①：

“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通过其尖兵, 即不断渗透到农村去的华侨中间商或华侨杂货商(他们往往兼营高利贷)促使马来人的自给自足经济趋向于瓦解。马来人缺乏对这种影响作出适应和建

^① 见前引松尾弘书。

立新生活方式的能力，按理他们的生活会由于华侨的掠夺而日益贫困化，但实际上却看不到这种农村生活日益贫困化的状况。原因是马来亚的自然条件很好，他们并不怎么感受到贫困的威胁，他们只要稍许使劲劳动一下，便不会感到吃饭和生存下去有什么困难。”

表 5 系根据 1957 年的人口调查材料所编制的马来亚联邦各个种族的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数字，当时马来亚联邦（即现在的西马来西亚）的华侨人口为 2,332,936 人（参看表 1），其中职业人口占 33.52%。从表 5 的数字看，在华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从事于如橡胶、椰子等“需要有较高技术处理的农产品的生产”业务。

华侨人口绝大部分集中于橡胶种植，保持了作为“马来亚橡胶业开拓者”的地位，而油棕和椰子的种植则让给印度人（参看表 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华侨在矿业部门的总就业人口中占了 68.3% 的比重。这当然是因为华侨光在锡矿业部门中就业人口就有 36,423 人，占该部门总就业人口的 71.8%；华侨在铁矿及其他矿业部门中只有 3,532 名的就业人口。华侨经济的两大支柱便是橡胶和锡。

除了这两大产业部门之外，华侨就业人口比重比较高的产业部门为：在制造工业部门中占 72%、在商业部门中占 65.1%、在建筑部门中占 47.8%。在商业部门中，华侨的零售商人口有 110,924 人，占绝大比重；批发商和进出口商有 8,435 人，银行与金融业部门中有 2,683 人。此外，由于表 5 的“服务业”部门包括了公务员、警官、军人等，因此华侨的就业人口比重为 34.4% 弱；但如果光从娱乐业和个体服务业看，华侨就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便高达 63% 了。

另一方面，在农、林、渔业部门的华侨就业人口有十多万。其中绝大部分是菜农，有 39,160 人；其次为渔民，有 19,409

人；林业部门，11,354人。由于当地政府在稻作地区实施“耕地保留政策”（Land Reserve Policy），该政策规定原住民不得不把耕地卖给华侨，但是从马来人手中租地种植稻米的华侨却仍有9,483人之多。

表5 马来亚联邦各个种族职业人口的产业部门结构（单位：人）

产业部门别	马来人	华侨	印度人	其他	合计
农、林、渔业	459842	100930	4491	7527	572790
橡胶、椰子等种植业	289477	209492	170026	3009	672004
矿业	10312	39955	6806	1423	58496
制造业	26603	97527	10096	1209	135435
建筑业	21830	32589	12302	1413	68134
电力、瓦斯、供水	3817	2959	4166	535	11497
商业	32020	127096	32772	3295	195183
交通运输、仓库、通讯	26870	29162	16064	2659	74755
服务业	127659	109949	48108	34043	319759
其他	5907	9387	2397	438	18129
失业人口	19392	12917	5728	642	38679
合计	1023729	771963	321957	56213	2164861

（注）①“马来人”一栏的数字包括了印度尼西亚人和其他马来族人数。

②“其他”一栏指那些由于调查材料不完整而无法进行归类的就业人口。

资料来源：根据1957年的人口调查材料编制。

表6 从事橡胶、椰子等出口作物经营业务的各族人口（1957年数字）

产业部门别	马来人	华侨	印度人	其他	合计
橡胶种植	260654	200531	150655	2647	614487
油棕种植	2012	3548	7502	159	13221
椰子、椰子干	26054	4307	9211	166	39738
茶	757	1106	2658	37	4558

四 马来西亚华侨资本的特点

如上所述，马来西亚的华侨资本是在英国殖民政府执行了欢迎勤劳的华侨劳动者入境的这种开发马来亚经济的政策的背景下形成的。不少华侨是作为苦力入境到马来亚锡矿场和橡胶种植园劳动的，由于英国殖民政府执行了这样的一种政策，使华侨人口得以急剧增加到能和原住民族相抗衡的地步，并且几乎在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很活跃。日本研究华侨问题的早期名著，福田省三的《华侨经济论》一书高度评价了马来亚华侨的经济势力，并对1930年马来亚的华侨投资额作了如下的推算^①：

马来亚的华侨投资额（单位、千马元）

一、生产部门	317,000
农业	244000
矿业	50000
工业	23000
二、商业	165000
贸易、国内商业	150000
金融业	15000
三、其他	11000
合计	975000

1930年9月的汇率为1美元=1.76马元（根据日本东京银行的调查材料），因此华侨投资总额9.75亿马元约相当于5.54亿美元。福田省三教授认为，“这里所推算的华侨投资额事实上更接近于资产额，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额在推算标准方面有所出入，因此不宜据以进行相互比较”。但如果不进行比较，就又难于衡量华侨资本的投资规模，因此这里暂且试行一下比较。根据金斯利的计算，1936年英国在英属马来亚的投资额为1.03亿

^① 见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1939年，东京），第99—100页。

英镑，即5.26亿美元。^①如果简单地把上述的数字进行对比，那么华侨的投资额为英国投资额的105%强。

但是根据卡里斯在1937年进行的推算，华侨的投资额约有2亿美元；外国人（不包括华侨）的投资总额为4.545亿美元，扣去其中的政府证券投资8,250万美元，企业投资额为3.72亿美元；其中英国人的投资额估计占70%强（约2.604亿美元）^②，也就是说，华侨的投资额大致相当于英国的民间投资额，约占包括华侨资本在内的全部外国人投资额的三分之一，其经济势力可以说是相当强大的。尽管如此，马来亚的华侨资本（和泰国的情况一样）对马来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却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世界各国的学者均认为华侨资本带有明显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特点。

松尾弘教授在《马来亚的经济与华侨》一文中曾经列举出阻碍马来亚华侨资本转化为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的以下三个重要因素：

（1）华侨资本不具备促使其向产业资本转化和发展的必要政治条件，即中央集权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华侨是作为移民来到马来亚的，而不是作为殖民者来到马来亚的。因此，华侨资本原来便是一种“移民资本”，它在别国的殖民地上是得不到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扶植的。也就是说华侨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政策执行机构来为它的投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制订关税保护政策，提供奖励和补助金，采取特别免税措施或者投入国家资本加以扶植等等（而“殖民资本”就能够得到这些扶植和鼓励）。华侨资本在市场条件、生产条件、资金条件等方面均处于比欧洲人资本远为不利的环境，它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当然是很困难的。因此，松尾弘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侨资本不得不从属

① 见金斯利：《经济月刊》，1933年5月。

② 主要引用松尾弘：《马来亚的经济与华侨》一文的第二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华侨经济势力的实际情况》）的材料。

于欧洲人资本，沦为欧洲资本附属企业的中小企业地位，尽管华侨资本因此而赢得了不少的利润，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资本，并依靠这些资本设立了许多企业，从而在马来亚国内经济中建立起压倒优势的经济地位，但华侨资本本身却终归只能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阶段，不得不接受拥有巨大经济势力、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欧洲人资本的支配。”

(2) 华侨资本不拥有为自己筹集社会上的资金来向其提供产业资本投资的金融机构。如上所述，在全世界的华侨社会中最先创办的一家银行是新加坡的四海通银行保险公司(1907年创办)，其后，华侨又在马来亚联邦先后建立了十几家商业银行。但是，这些华侨商业银行原则上只提供短期贷款而不提供长期贷款；而且马来亚的华侨银行如潮州籍的四海通银行(潮州籍巨商李伟南任该行的第一任总经理)、客家人的崇侨银行(系由新加坡的“制药大王”胡文虎于1950年创办的)、福建籍的华侨银行(系福建籍的华商银行、华侨银行、和丰银行三家银行于1932年合并的)等，它们的股东、银行客户和贷款对象都是以同乡关系来进行结合的，不同系统的“帮”相互排挤(最近，这种“帮”派地方主义已经有所减弱)。因此，这些华侨商业银行的资金力量薄弱、贷款数额小，根本谈不上为产业投资提供长期的贷款。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均设立有为发展产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的农业贷款机构和工业贷款机构，以支持产业资本投资和扶植发展产业资本，但马来亚华侨却完全没有这类的金融机构。而且华侨的企业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不是采取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式，它们不发行公司债券。就是说，马来亚的华侨没有发展起发达的股份公司制度、证券交易制度和银行制度，因此他们很难进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这种特点使华侨资本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即使华侨资本能够积累起大量的资金，也无法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购买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技术、机器和设备。结果，华侨资本便只能

停留在一种带有“万金油”资本性质的状态，也就是说，从橡胶种植园、锡矿场到中间商业、娱乐业、服务业，什么行业部门都有投资，什么行业部门都经营，但都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经营，尽是增加一些中小型企业。这种后果主要是由华侨那种想把资金分散投资到各种行业部门以谋求投资安全的“发财哲学”所造成的。

(3) 华侨的经济活动受到封建“帮”派组织的影响；华侨在扶植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势力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即：他们是按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来开展经济活动的（本书第一章虽然已经对华侨的“帮”派组织情况有过较详细的说明，但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的各种帮派组织却是特别发达的而且影响很大）。

华侨社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帮派组织，原因是由于华侨在过去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在异国就只能依靠同乡的帮助，这种同乡互相帮助的情况发展到形成为掌握生死大权的帮派团体组织，其成员便不仅只尽忠于自己所属的帮，而且各帮之间有时还会发生矛盾和斗争。华侨社会能否从这种封建的帮派组织中摆脱出来，无疑是华侨资本能否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资本的一个关键。

五 华侨“帮”派和经济的结合

如上所述，华侨社会的“帮派”组织首先是以同籍的同乡团体出现的，接着才有按相同行业组织的同业团体，此外还有不属于同乡团体和同业团体，而是按整个地区的同姓进行结合的同族团体。在马来亚内地的矿场和种植园，华工得不到强大“帮派”组织的保护，他们便组织了被称为“天地会”和“三合会”的秘密会社。由于英国在马来亚所执行的开发殖民地经济政策，马来亚的华侨人口急剧增长，加上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侨社会很少同

化于当地原住民族，这就使得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社会特别需要发展这种“帮派”组织。

例如须山卓在指出东南亚华侨的秘密会社“天地会”的发源地是檳榔嶼或马六甲时，就曾经作过如下的论述^①：

“东南亚华侨最早的秘密会社发源地可能是檳榔嶼或马六甲，时间是在英国占领新加坡（1819年）以前；但到了1850年前后，这种秘密会社也扩展到了新加坡，而且它的活动也日趋表面化。”

有关华侨社会的秘密会社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但由于这种秘密会社没有对经济问题发生太大的直接影响，本书不拟详加论述。但应该指出，马来亚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秘密会社的发源地，这是由于不断移居到马来亚地区的华侨迫切需要有一种“自己的组织”的缘故，正像他们也迫切需要“帮派”组织一样。

华侨同乡团体对华侨的职业选择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帕塞尔曾经就华侨同乡团体对华侨职业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如何成为华侨资本形成的基础的过程作了如下考察^②：

（1）福建人具有经商的才能，这可以从他们很早以来就一直从事商业经营以及福建籍华侨在新加坡、檳榔嶼和马六甲等地的商业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这些情况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福建籍华侨居住在柔佛、雪兰莪和霹靂等州从事农业经营。

（2）广东籍华侨的职业范围比较广泛，固然有许多广东籍华侨从事于农业经营，但也有不少人居住于城市。如果就其职业偏爱看，他们较多趋向于经营矿业，例如在近打河谷地区和霹靂便有许多广东籍华侨从事于锡矿开采。

（3）在所有各种籍贯的华侨中，客家人的农村气息比较浓厚，和广东籍华侨一样，有大量的客家人从事于锡矿开采（例

^① 见前引须山卓书，第259—260页。

^② 见V·帕塞尔，《东南亚的华侨》，伦敦1951年版，第271—272页。

如，在居住于近打河谷地区的华侨人口当中，客家人便约占80%，这些客家华侨也广泛从事于农业生产）。

（4）潮州籍华侨和广东籍华侨一样，从事多方面的职业，没有什么职业偏重。但在吉打州的情况则有些特殊，潮州籍华侨比较侧重于城市商业（吉打州是根据1909年曼谷条约的规定和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等州一起成为英国保护领的原泰国属地，因此在泰国被称为“王室华侨”的潮州籍华侨在吉打州便拥有最大的势力）。

（5）海南籍华侨大部分是小市镇和农村的另售商店店员和家庭佣人，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胶橡种植园地区）。

表7和表8分别列示了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华侨的籍贯和人口。这里之所以把马来亚联邦（即现在的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表7 马来亚联邦各个帮的华侨人口（单位：人）

籍 贯	1921年		1957年	
	人口（人）	比重（%）	人口（人）	比重（%）
福建帮	379,028	32.35	740,606	31.76
客家帮	217,697	18.58	508,770	21.82
广府帮	331,757	28.31	505,224	21.67
潮州帮	130,026	11.10	283,076	12.14
海南帮	68,200	5.82	122,959	5.27
广西帮	998	0.08	69,122	2.96
福州帮	13,821	1.18	46,094	1.98
福清帮	4,058	0.35	9,782	0.51
兴化帮	1,659	0.14	11,905	0.42
其他	24,496	2.09	34,310	1.47
合 计	1,171,740	100.00	2,331,848	100.00

注：福州、福清、兴化均属福建省；此外，潮州，海南均属广东省，但是作为一种同乡组织，它们又分别有自己独立的“帮”。资料来源：1921年的数字根据金斯伯格和F·罗伯茨《马来亚》（华盛顿，1958年版）一书的材料编制。1957年的数字根据马来亚联邦的人口调查材料编制。

表 8 新加坡各个帮的华侨人口 (单位: 人)

籍 贯	1957年		1970年	
	人口 (人)	比重 (%)	人口 (人)	比重 (%)
福建帮	442,707	40.59	666,941	42.22
潮州帮	245,190	22.48	352,971	22.34
广府帮	205,773	18.87	268,548	17.00
海南帮	78,081	7.16	115,460	7.31
客家帮	73,072	6.70	110,746	7.01
福州帮	16,828	1.54	27,075	1.71
兴化帮	8,757	0.80	38,122	2.41
福清帮	7,614	0.70		
广西帮	292	0.30		
其他	12,282	1.13		
合 计	1,090,596	100.00	1,579,866	100.00

注: 1957年人口调查的“其他”一项包括了三江帮华侨人口11,034人(占1.01%),为了比较上方便,列入“其他”一项。

资料来源: 根据《1957年人口调查报告书》和《1970年人口调查报告书》的材料编制。

的华侨的籍贯和人口并列在一起比较,乃是因为如上所述,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是作为一个地区由英国殖民者统一进行开发的,而且这个地区的华侨又是以新加坡、马六甲、檳榔嶼这三大城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这三大城市统称为“海峡殖民地”)为中心据点而进行经济活动的。

例如,马来亚橡胶的巨头、福建帮的华侨界代表人物陈嘉庚(1961年于北京病故)的事业虽然遍及马来亚各地,而且从事橡胶种植、制胶、菠萝罐头、饼干、航运等行业部门的多样化经营,但是他的总公司是设在新加坡。华侨经营的两大炼锡工厂(海峡贸易公司和万福兴公司)也是设在新加坡的。因此考察马来亚华侨的经济活动是不能离开新加坡的华侨经济活动的。

从表7、表8的数字可以看出,以福建帮居首位的客家帮、

广府帮、潮州帮、海南帮等所谓“五大帮”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侨人口中占有压倒的比重。客家帮以下的四大帮的人口比重顺序地位在马来亚华侨人口中和在新加坡人口中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五大帮合计起来的华侨人口却均占有极大的比重：占1957年马来亚联邦华侨总人口的92.7%，占1957年新加坡华侨总人口的95.8%（1970年占新加坡华侨总人口的95.9%）。除了可以从人口比重数字看出这五大帮的经济地位之外，还可以从它们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势力看出它们的重要地位。

以下概述一下马来亚五大帮华侨所经营的产业部门及其主要首脑：

（1）福建帮不仅占整个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人口总数的最大比重，而且在经济上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主要经营商业与对外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造船、航运、汽车等运输业部门和银行、信汇局等金融业部门、并经营供出口或当地市场消费的橡胶制品、制糖、榨油、菠萝罐头、水果罐头、肥皂等资本主义轻工业部门，同时也经营橡胶和椰子等种植园。

上面提到的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主要经营橡胶业，在自己这一代便发了大财，成了实业家。但陈嘉庚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以参加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和支持辛亥革命来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站在抗日运动的前锋，为募捐抗日救国捐款和抵制日货而奔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陈嘉庚便到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致力于华侨工作，和支持国民党的胡文虎（属客家帮，见下文）针锋相对。陈嘉庚去世后，其事业由其女婿李光前继承，此外陈嘉庚的族弟陈六使也成了马来亚橡胶业的领导人，任马来亚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系马来亚华侨亲北京派的代表，但于1971年去世。

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简称MCA）这一政党的首脑陈修信，于马来亚联邦独立后任马来亚联邦的财政部

长，系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马六甲的有二百年历史的华侨家族的“华裔”。他的祖父出生于福建省海澄县，他的父亲陈祯禄不仅以经营贸易商闻名，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组成马华公会，领导华侨积极协助马来亚联邦独立事业的先锋。因此，当陈祯禄于1960年去世时竟有过这么一段有趣的插曲：马来亚联邦政府曾以“建国元勋”的荣誉为之举行国葬，用马来亚联邦国旗包裹他的灵柩并用炮车运载，殡葬行列由国家的仪仗队和军乐队开路，从他的住宅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但是他的子孙却遵从陈祯禄的“永远不能忘记中国祖先”的遗嘱，殡葬行列到了中途便改为按中国的习惯出殡，直奔华侨祖先的墓地。

(2) 客家帮在新加坡的华侨总人口数中占第五位，但在西马来西亚的华侨人口总数中却占第二位。他们的原籍分布于从福建的西部地区到广东省的北部山区，但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的论述），客家帮另外组成了一个有别于福建帮和广府帮的帮派。帕塞尔虽然称客家华侨为“农民”，但由于客家帮华人大部分都很勤俭和刻苦耐劳，他们除了从事鞋匠、西装裁缝、金银首饰匠等职业之外，也有许多人在锡矿场、碾米厂、金属铸件厂等生产部门中劳动（客家帮在裁缝业中约占90%）。此外客家帮华侨还经营小型杂货店、药铺等商业和当铺。另外客家帮华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女工多。

客家帮的代表人物系“新加坡制药大王”胡文虎（1958年去世^①），1883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父亲胡钧^②这一代移居到仰光，开始设立中药店“永安堂”。父亲去世后，胡文虎移居到新加坡，制造出售“虎标”万金油和八卦丹等家用便药，赢得了巨富。但他一贯恪守将四分之一的赢利贡献给慈善公益事业的信条。他不仅协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以后也一直支持国民党。为

① 胡文虎死于1954年，不是1958年。——译者

② 胡文虎的父亲为胡子钦，不是胡钧。——译者

好几家医院（主要是国民党的中央医院）、孤儿院提供捐款，积极协助募捐抗日爱国公债等等，多次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奖状和勋章，并任中华民国政府的侨务委员和参政会委员等要职。在政治上，他和陈嘉庚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在经济上，他和陈嘉庚也是对立的竞争者。陈嘉庚从事多样化经营，而胡文虎则专门从事制药经营。1950年胡文虎设立的崇侨银行也以“大众化银行”自夸，此外并投资兴办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为主的华侨新闻事业，重视发展公益事业。

（3）广府帮主要由原籍是珠江三角洲稻作地区的华侨所组成。广府帮华侨和客家帮华侨相同，有许多人是工匠和工人。因此，其职业遍及于酱油、酿酒、铁器、铜器、金银首饰、皮革制品、洗衣、饭馆、油漆工、印刷等行业。由于技术熟练，他们在手工业部门占据了压倒的优势。此外，他们在金属铸造工厂、锡矿等生产部门以及在百货商店、旅社、剧场等近代服务业部门方面也占有优越的地位。

作为广府帮的代表人物，本文准备介绍陆祐。陆祐于1845年（清道光25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家道清贫，少年时代经常在赌场向赢客讨一点钱混日子，晚上就睡在寺庙的屋檐下。其后由于官府追捕，十三岁时便渡洋到新加坡，当商店店员。四年后积了99元工资，开了一家小商店，在五年内赚了一些钱开始在霹靂州拿律开发锡矿，苦心经营了十五年，好容易发展到初具规模时，却横遭战祸，拿律矿场悉遭破坏。但陆祐并不灰心而是勘探新矿山，重新积极开发，之后他在基林巴赫（Kiling Bahur）的已被人放弃的废矿场挖掘出了丰富的矿脉，并陆续收买了不少新矿区；到了十九世纪末，陆祐已经被称为马来亚的“锡王”。陆祐接着又扩展到经营贸易业，其后接受霹靂州政府的委托，包揽酒和鸦片专卖乃至管理赌场，积累了万贯家财。他由于少年时受到中国官府的压迫，厌恶中国，终于加入了英国籍。他在晚年乐善好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造了一艘商船献给英国政府，受

到了英国政府的表彰；而对中国则一毛不拔。1917年陆祐去世时，留下大笔遗产，目前陆氏家族仍然在马来亚联邦的经济界拥有相当的势力。

（4）潮州帮：在泰国被称为“王室华侨”的潮州人在马来亚联邦华侨人口中占据第四位，在新加坡华侨人口中占据第二位。潮州帮华侨也被称为“福老”（Hoklos），他们和福建帮华侨一样具有经商的天才，主要经营米谷、食品、盐、鱼干、胡椒等产品的贸易和贩卖，以及与此有关的碾米业、市郊蔬菜种植、酿酒、烟草种植等生产部门。

潮州帮华侨的代表人物应当首推在马来亚华侨社会创设第一家银行“四海通银行保险公司”并任该银行首任总经理的李伟南。他于1881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后来在新加坡以“再和成伟记”的商号经营着相当广泛的商业和贸易业务，接着又经营万益成汇兑信局（主要是经营华侨汇款的金融机构）、海泉栈商行，积累了资产，1907年创设了“四海通银行”而成为马来亚联邦金融界的首脑，并任中华总商会会长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他拒绝和日本占领军合作而被捕入狱，保持了民族气节。李伟南辞职后，陈锡九（1910年出生，原籍为广东省潮安县人）任四海通银行总经理，陈锡九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曾一度在橡胶业界中颇为活跃。他于1952年到1956年任中华总商会的名誉会长。

（5）海南帮：海南帮华侨主要经营小型的饭馆、饮食店以及与此有关的清凉饮料、制冰厂等，也有不少海南帮华侨从事渔业、帆船船老大、橡胶园工人、工厂工人等职业。海南帮的资本势力在五大帮中居于末位。

海南帮华侨的代表人物首推以经营信托业、房地产业而发财起家的王绍经，以“陶大”以及“陈怡”、“宝利”、“美术”等著名商标闻名的清凉饮料公司也多半是由海南帮华侨经营的。

以上我们概述了马来亚、新加坡五大华侨“帮派”的经济势

力情况，这是目前华侨资本在其形成过程中为什么会带有前资本主义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 华侨资本所面临的问题

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一独立，华侨社会便面临了两个重大课题。第一是如何对付以所谓“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口号为象征的“马来人优先政策”，第二，是如何对付由于实施“新兴产业法案”(Pioneer Industries Ordinance, 1958年8月开始实施)而引进的外国大资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人的独立运动(所谓“马来亚民族主义”)具有很复杂的两面性,即:马来人为了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必须和华侨(例如,以陈祯禄为首的马华公会)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人;但为了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又要和英国人联合起来以压制华侨。它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马来亚虽然和印度尼西亚同是马来族国家,但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没有象印度尼西亚那样发生过流血的民族独立战争,而只是经历过一场要求实现“马来人的马来亚”的申请运动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鉴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便在海峡殖民地中保留下新加坡,而让马六甲、檳榔嶼和马来半岛的九个州合在一起称为“马来亚联盟”,作为英联邦的自治领。根据这个方针,英国于1946年颁布了《马来亚联盟宪法》,该宪法规定,“不问种族、宗教”,凡在马来亚居住的居民同样平等享有“一般公民权”(Common Citizenship)。但这样的一个规定却激怒了作为马来亚原住民的马来人。

“最使马来人感到震惊的是宪法不加区别地把公民权授予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华侨和印度人——作者注)。……

马来人为此涌现了战前所没有的政治激情,他们强烈抗议英

国把同等的公民权给予非马来人，把英国人的这种做法视为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①

马来亚九个州的苏丹联合起来组成了“马来亚民族统一组织”（United Malaya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为UMNO），和英国政府进行了态度强硬的谈判，结果于1948年制订了“马来亚联邦宪法”。这部宪法根据马来人是新生马来亚联邦的主人翁这一原则，授予马来人以种种特权；其后直到现在，马来亚联邦和马来西亚政府所一贯遵奉的“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原则可以说便是在这个时候确立下来的。

例如，根据1946年的宪法规定，苏丹只享有“宗教祭司”的地位；但1948年宪法不但再次恢复了苏丹的政治统治者地位，而且规定马来亚联邦独立后由苏丹会议互选一名苏丹任国王（国家元首），各州苏丹的臣民（臣民的条件是：一、马来族人，二、伊斯兰教徒，三、会讲马来语）一律无条件地享有马来亚联邦公民权。与此相反，华人和印度人要取得马来亚联邦公民权利则有许多限制。1955年所举行的马来亚联邦大选，有选举权的公民约有一百二十八万人，其中，马来人占一百另七万八千人，占84.2%。华侨只有二十四万三千人，占11.4%；印度人仅占4.6%。而当时的人口比重却是：马来人占50%，华侨占40%，印度及其他人种占10%。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华侨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是如何地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了。

因此，在华侨当中不断增长着反对这种“差别对待”的情绪，而同情马来亚共产党（非法组织，大部分党员是华侨）。1967年11月檳榔屿发生了华人骚动，接着华侨以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为导火线不断加强了对青年学生和工人阶层的政治支持。

但是，自马来亚联邦独立以来直至目前的马来西亚为止的期间内（其间，新加坡于1963年合并到马来西亚，1965年分离独

^① 见《马来亚复合社会的立宪变革》，载于《远东观察》，1957年第10卷。

立，有关新加坡合并和分离的经过情况，详见下一节），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党（Alliance Party）一有机会便加强执行“马来人优先政策”，毫不退让。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党是马来西亚民族统一组织（UMNO）、马华公会（MCA）和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MIC）三大政党的联合政党，1971年12月组阁（部分改组）的拉扎克政府便有马华公会的陈修信（财政部长）、李孝友（卫生部长）、王其辉（地方自治部长）等人和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的马尼加华沙甘（劳工部长）参加组阁。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政府的“马来人优先政策”乃是在马华公会的支持和妥协之下展开的，由此可见，华侨社会的阶级分化乃是决定马来西亚今后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例如曾于1970年底访问过马来西亚的日本学者长洲一二（当时系日本国立横滨大学教授）便曾坦率地对“马来人优先政策”提出了如下质疑^①：

“马来西亚宪法本身便规定了此项政策（指马来人优先政策——作者）。即，第一，在政治方面，国家元首（即国王）系由全部是马来人的苏丹会议在苏丹中互选担任的。政治公务人员的种族比率规定为马来人四人对非马来人一人。在宗教方面，把马来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规定为国教。在语言方面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和公共用语。在经济方面和教育方面，也均规定了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有关森林开发和输出贸易的新准单只能发给马来人，无论是土地持有、就业和奖学金制度等均执行了马来人优先政策。

“约占马来西亚人口40%的华人，他们大部分是佛教徒，讲中国话，并掌握了经济上的大部分势力。此外占马来西亚人口10%以上的印度人则信奉印度教，讲泰米尔语。马来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一半弱，经济上都是比较贫困的，他们只是在政治、军事、警察方面占压倒优势。从这些情况看，我们认为这种马来人

^① 见长洲一二，〈南进的日本资本主义〉（1971年，每日新闻社）第110—112页。

优先政策，确实是不合理的和难以苟同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马来西亚在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暴动后重新召开的国会上却通过修订宪法，进一步加强了马来人优先政策。

“宪法首先禁止对苏丹的地位、马来人的特权和国语（马来语）有任何批评。……不懂马来语的华人从出生的户口申报到税金申报均须使用马来语。……在经济方面，企业雇用的职工必须有一半以上是马来人；金融贷款也规定马来人企业优先，非马来人不得持有农地和矿区，等等。通过宪法把过去在特殊情况下强制施行的马来人特权加以制度化和固定化了。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并不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但这样做是否妥当呢？……姑且不去讨论那些对现政权提供合作的上层华人，至于下层广大华人是否会对这种差别待遇感到不满呢？这样岂不是激化华人和参与政权体制的马来人的对立吗？这样做岂不是让马来族社会的前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从而阻碍了土地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吗？这样岂不是进一步加剧马来族广大农民的贫困和不满，从而导致马来西亚复合社会的恶性循环吗？”

长洲一二所列举的“马来人优先政策”的若干具体措施当然未必是马来西亚所特有的。例如强制推行国语（公共用语），排挤汉语，就业限制，优先为原住民企业提供金融贷款措施等等政策，在泰国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些措施在马来西亚之所以会成为对马来西亚华侨的沉重压制乃是由于马来人社会和泰族社会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马来西亚政府并不是采取促使华侨和马来族进行融合的政策。泰国和马来西亚虽然都有“复合社会”的民族隔阂，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来消除这种隔阂。

马来西亚华侨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华侨资本如何对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渗透。

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时，以国民阵线党主席身份就任马来西亚总理职位的东姑·拉赫曼开始着手实施积极的工业化计划，

以改造单一种植制的经济结构。1958年8月开始实施的“新兴产业法案”便是这个工业化计划的代表。此项法案规定，对凡是马来亚联邦过去未曾设立过的工业部门、没有充分发展的工业部门以及其创立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工业部门给予最高不超过五年的免税期的优惠待遇，以促进工业投资。该法案的条文虽然规定优先鼓励国内资本的投资，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显然是在于吸引外国资本投资。

1968年，马来西亚政府修订了此项“新兴产业法案”，改为“投资鼓励法案”（马来西亚的此项“投资鼓励法案”的内容和上文所述的泰国的“产业投资奖励法案”一样，都是鼓励外资投资的优惠政策，但马来西亚的“投资鼓励法案”又附有一些投资条件，如：在投资比率方面必须由马来西亚资本占多数比重，必须雇用马来人为职工）。到了1970年底，具有新兴企业身份的投资总额当中，外国资本占60%，首位的外资投资国是马来西亚的原宗主国英国，第二位的外资投资国是日本，第三位是美国。

马来西亚的华侨资本和泰国的华侨资本一样具有许多缺点。例如，在上文所提到的松尾弘教授便有如下的评论^①：

“华侨资本是通过‘帮派’组织发展起来的资本，这种‘帮派’组织通过同乡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进行相当牢固的互助和团结，这种组织包括了上自‘帮派’头目，下至贫困的商贩、工人，范围相当广泛；因此，华侨资本的循环运动范围便有被限制在‘帮派’组织范围之内的趋向。这种趋向同时也形成了华侨资本发展的界限，使他们的资本不足以大规模地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阻碍了企业的合理化经营和近代化经营，限制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的范围，从而成了华侨资本很少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组织的企业经营资本的原因。……华侨资本（即同族公司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很少能够开辟投向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道路。”

^① 见前引松尾弘书，第113页。

在“马来人优先主义”这一政治要求和“近代工业化”这一经济要求的夹攻下，华侨资本比较合适的出路何在呢？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于1971年底在星马福建同乡联合会大会上以该联合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演讲，其中谈到^①：

“华人虽然约占我国（指马来西亚——作者）人口的40%，但如果他们不改掉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的恶习并积极关心政治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发挥其政治影响。此外，过去华人的企业经营态度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有必要采取新的企业经营方式。……过去，华人的领导人都创立了同一族亲的公会和会馆，这种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了：这些组织是否能为目前或今后的马来西亚带来最大的利益？能否实现马来西亚国家的团结这一崇高的目标呢？……华人当中就有不团结的倾向，我们给予非华人的印象便是：‘他们中国人自己也在争吵嘛！’这就是我们华人的基本弱点。……我们不能自己再分裂为福建人、广东人或者客家人，或是什么籍、什么籍人了。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是：马来西亚国家的团结（但是当前，并不是需要马上解散同族公会和同族会馆等组织）。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我们如果不关心政治，就等于是政治自杀。而且，如果我们照样不能团结，那么尽管我们占有40%的人口，也不会在政治上起什么作用的。”

“其次，我们在商业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发展，但我们的经营方法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我国华人的商店都是家庭经营方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按这种方式经营的商店是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大规模企业的。因为我们能否希望我们的事业继承者都能够像他们的祖辈创业人一样具有那种‘白手起家’的创业才能和能力呢？多数的情况却是：他们会把祖先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产花得净光；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聘请有能力、廉洁奉公的外族人才来参加企业的领导层。欧美各国、日

^① 见台湾侨务委员会编：《华侨经济参考资料》，1972年1月1日，第386页。

本、印度等国的大型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其原因便在于此，但是我国华人却尚未能从过去的家族企业经营方式中摆脱出来，长此下去，我国的华人社会就会无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发挥有价值的作用。那样一来，我们华人就只能永远经营中间商业，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了。……在我们的国家已经面临有史以来最为关键的时刻，我们只要稍有差误，今后我们就得为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陈修信的这段演说也许不一定为当时到会的听众所欢迎，甚至有些华侨会颇不以为然，认为陈修信的这段话未免过于偏袒马来西亚政府了。但是，就马来西亚的现实情况看，陈修信的这段话却真正是指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正确发展方向的。

1974年5月31日，马来西亚拉扎克总理在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使马来西亚成为东盟国家中最早和中国大陆政府建交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之后和中国处于断绝外交关系的状态），拉扎克总理和中国建交的目的在于取消马来西亚华侨的双重国籍，使所有的马来西亚华人均能服从马来西亚的法律；坚决镇压马来西亚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马来西亚政府的游击活动。从此，不想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华侨，除了作为陈修信所说的“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而生存下去之外，便别无其他出路了。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华侨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在积极参加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其资本的近代化，向工业部门进行投资，这将是马来西亚华侨开辟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

译自日本《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一书第2篇第2章第3节。

柳平译

在印垄断与在华开放

(1830—1833)

黄宇和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问题之一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垄断以及该公司对英中贸易（不仅是鸦片）的全面垄断。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在1813年前一直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所有贸易。1813年，在印度的贸易垄断被打破，但鸦片垄断仍然保留。在中国的贸易则仍掌握在东印度公司手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这场论争导致东印度公司对英中贸易的垄断（包括鸦片贸易）全部被打破，而该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产销垄断竟然又未受触动。本文拟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自1757年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在帕拉西战争中打败孟加拉藩王后，东印度公司的作用就超出纯商业性范围。孟加拉的行政管理越来越为它掌握。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诺斯爵士提出的印度法，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代表东印度公司治理英属印度。1784年，小威廉·庇特提出新的印度法，并交议会通过，成立了新的行政机构——印度部，目的是要“组织一个廉洁的政府以统治印度”。^①然而，要在印度建立一个政府，就需要大量收入。于是，由鸦片垄断所

得的收入之于该政府，就如它带来的利润之于东印度公司一样，都极为重要。假如鸦片收入无足轻重，政府就不必为开放与垄断的问题操心。相反，假如鸦片收入非常可观，政府自然不轻易改变政策。

表一所列系1797/1798财政年度至1829/1830财政年度来自孟加拉鸦片垄断的收入额以及这一时期的总收入额。很清楚，鸦片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大，最后竟高达孟加拉收入总额的13%。

又假如英属印度的财政状况正常，英国政府也许会改垄断贸易为自由经营。但事实并非如此，东印度公司负债累累，仅1817/1818财政年度的债务利息就超过170万英镑。此后，这个数字虽稍有变化，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到了1828/1829财政年度，该项利息就高达200多万英镑。（1829/1830财政年度数字空缺，见表二）。另一方面，仅1817/1818财政年度垄断鸦片贸易所得的收入就可偿付几乎半数的该年债务利息。这笔收入在以后几年中迅速增加，以至有几年它竟足够偿付全部债务利息有余。当时的印度部税务局长休·斯塔克就说过，鸦片是孟加拉三项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仅次于地税和盐税。另一主要来源是关税。其余的如印花税、消费税、物业税、朝圣税和水路交通税等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②由此可知，英国政府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贸然改垄断贸易为自由经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故此，面对与日俱增的对东印度公司鸦片垄断（还有其他问题）的非议，英国政府进行了公开查询，传来大批证人作证，并向各有关方面发信查问具体问题。证人大约可分两类，一类赞成自由经营，另一类是东印度公司现任或前任职员。查询的中心问题是，如果取消贸易垄断，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保证收入？

办法有三种：一是对种植罂粟的土地加重课税；二是增收鸦片消费税；三是增收鸦片出口税。自由经营派对这三种办法的可行性看法不一，东印度公司派则一致反对这三种建议。

（一）加重地税。在查询中发现，种植罂粟的一整套操作已

经极为完备，且自成章法，不太可能有更省钱更省力的生产方式。孟加拉的鸦片垄断甚至在1757年帕拉西战争前就存在，不过那时是由藩王控制，罌粟由佃农种植，多在比哈尔和本纳里斯等“北孟加拉地区”，^③其产量不大，因为印度教徒不沾鸦片，回教徒则只食不抽，^④故此不会成瘾。当时英商要同其他欧洲商人竞争才能买来鸦片运出口。1757年，藩王战败，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加拉的鸦片生产。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鸦片用于出口。^⑤比哈尔邦和本纳里斯邦的大片肥美的土地种上了罌粟，因为这种作物“极为娇贵，需要绝好之田地”。^⑥起初，鸦片生产采取合同制，订合同人承诺以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出售鸦片。1799年，东印度公司取消合同制，在比哈尔邦和本纳里斯邦分设代办处，进一步控制鸦片生产。^⑦每年，这两个代办处通过各级地方官——区长、乡长、村长与鸦片产区的佃农订约，但不使用强制手段，相反，代办处委托各级地方提前付款给佃农，诱使他们种植罌粟。^⑧佃农一旦签订了合约并预支了款项，就必须按东印度公司的具体要求来种植罌粟，否则就会吃官司，甚至被夺佃。

佃农没有土地，他们的地是从大领主手里租来的。按规定，大领主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只是为藩王代管土地。既然东印度公司已取代了藩王成为孟加拉的主人，从理论上来说，大领主就应该为东印度公司代管土地。然而，为防止引起纷争，东印度公司决定还是取得法律保障为好，于是，大领主“按法律规定不得将罌粟地的地租抬到高于1793年英国将该邦列为属地时的租额”。^⑨同时，佃农继续在大领主治下保留原有土地，向大领主交租，但依约为东印度公司种植罌粟。^⑩东印度公司这一着棋极为精明，出口鸦片所得的纯利起码达到“原价的十四倍”。^⑪原价是十分低的，因为合约规定，佃农要按议定价格将全部产品售与东印度公司。^⑫这一价格“仅够佃农维持生产”为标准。^⑬涉嫌私藏罌粟的佃农将被起诉，他的住宅会遭到搜查。^⑭同样，东印

度公司为发现有人不与之签约便擅自种植罂粟，就“毁其罂粟地，或迫其交出产品”。^⑮

如果东印度公司放弃鸦片生产的垄断，代之以增加地税的办法来聚敛等额的收入，其结果将如何？首先，用来预付给罂粟种植人的款项来源就很成问题，而“在那个国家里，离了预付定金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的”。^⑯一位赞成自由经营的人士建议这笔款由所有在印度的欧洲人以及本地资本家提供。他还提出，除本地罂粟种植者之外，欧洲人中种植罂粟者应得到预付定金，因为“目前东印度公司的规定限制欧洲人拥有土地，这样会导致他们不参与提供资金”。^⑰但是，这位人士不赞同增加地税，尽管他没有细述理由。^⑱不过，一位赞成鸦片垄断的人士倒是作出了解释。要保证收得的税款数目同实行鸦片垄断时所得的收入相等，要想将罂粟地同其他土地区别开来，必须向罂粟种植人颁发证书，但发证书“会被看作是一种查询，人们，特别是想搞投机的欧洲人，将不愿意接受”。^⑲此外，颁发证书的制度“在印度需要许多由本地人组成的机构来贯彻，这些人面对种种诱惑，能否诚实地履行职责很不可靠”。^⑳可靠性是至关紧要的。如果通过增收地税得来的税款没有保证，政府怎么可能允许私人种植罂粟？

同时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增加罂粟地的地税会令大领主“怨恨不已”。^㉑东印度公司可以通过鸦片垄断在出口市场获取大量利润，但“一旦换以收地税的形式，难免引起大领主误会，认为东印度公司侵犯了他们的利益”。^㉒至于佃农，人们都承认他们可能增加收入，但又担心投机商会对他们盘剥更烈。^㉓

（二）鸦片消费税。如上所述，并非所有自由经营派都认为增收鸦片消费税是代替鸦片垄断获取收入的好方式。有人甚至承认消费税“很难”征敛。^㉔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走私，因为任何一种货物课税越重，就越吸引走私者。以消费税形式对鸦片课税，要达到政府目前所得的收入就必须课得很重，这会对走私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局面不可收拾。^㉕相反，实行鸦片垄断就不

会出现走私问题。起初，鸦片生产只限于比哈尔邦和本纳里斯邦等“北孟加拉地区”。假如准许私人自由种植罌粟，鸦片生产就会在孟加拉南部也兴旺起来，这样“很容易就能在沿海一带的各个口岸偷运出国”。^②当时，“北孟加拉”对鸦片生产的控制显然是卓有成效的。一位前比哈尔邦代办处主管萨林和提尔胡特地区鸦片生产的代理人曾谈及他的管理办法：

每年合约一签订，我马上付出部分定金……等我丈量过土地，确认签约面积已经栽上罌粟之后，又付给签约人若干定金。到他们开始从罌粟中提取鸦片的时候，我又给他们部分定金。到他们将鸦片运来给我的时候，再给他们部分定金。定金数目逐次增加，约占应付款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余应付的款项我先留在手里，等罌粟季节过了，鸦片已全数运到，我才按实收鸦片数同签约人算清账目。^③

显然，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严密监视着鸦片生产的每个步骤。“你说种植罌粟的土地面积已经丈量清楚，真的量过吗？——每个罌粟季节我都要亲自丈量一次。我先同佃农签订合约。播种之后，我就去量地。”^④东印度公司长期雇用一批本地人来做量地工作，“区长和他的手下人则监督他们，尽量不让出错”。^⑤

这样做很花钱吗？——不，只花很少钱。^⑥

这样做效果好吗？——就我有时亲自复量一些地块所得的结果来看，效果非常好。^⑦

可见，罌粟的实际丈量工作是在每年播种之后，以便公司对种植面积心中有数。罌粟成熟时，区长就带人巡视四乡，进行估产，然后又同佃农签约，后者必须按估产数交纳鸦片。^⑧每逢收获

季节——

地方官员逐天收取罌粟汁，……在罌粟茎上割开一个口子，汁液便汨汨而出，每日清晨由妇女儿童收汁。^③

如果收获季节过后，佃农不能如数交纳鸦片，而负责收鸦片的人员又有足够理由怀疑他侵吞鸦片的话，签约人就会以毁约罪被告到民事法庭。^④不过，佃农不太可能有意侵吞鸦片。印度殖民政府某官员曾说过，“我有一定数量的鸦片可以公开出售，但无人问津”，尽管政府规定的价格比佃农的要价要低。^⑤区长和其他中间人对鸦片也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同其他本地官员一样，“都惯于敲诈勒索”。^⑥“本地人互相打交道，总免不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勒索，所有银钱交易都不例外”，^⑦“似乎岁月和习俗都给以认可”，^⑧“很难防止”。^⑨换言之，区长及其他中间人向佃农发放公司预付的定金时可能索取钱财，不过，只要鸦片能全数运到，东印度公司也就得其所哉，少管闲事了，而鸦片总是能全部运到的。

（三）出口税。“防止海上鸦片走私不难办到吧……？——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⑩“如果大面积种植某种作物，其产品价格又被人为地提高到大幅度超过其成本，造成量少价高的局面，那么要杜绝这种产品的走私简直比登天还难”。^⑪

终于，查询委员会认识到，以上三种办法不能令人满意地代替鸦片垄断带来利润。用一位支持鸦片垄断的人士的话来说：

目前由鸦片垄断所得收入极大，且较有保障。我很怀疑政府可以通过增税或改变现存鸦片垄断制度的办法来获取如此大量的收入。^⑫

另一个与保障收入同等重要的理由是，鸦片垄断获取的利润来自

外国消费者，^④而其他如增加罂粟地的地税、增收消费税和出口税等办法，都是牛毛出自羊身上——来自英属印度本土。

二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活动同在印度又大不一样。首先，英国还没有征服中国的哪一部分领土，不存在行政管理和财政支出，也就不必考虑收支问题。因此，英国政府可能认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垄断可以放弃。确实有人认为，由于东印度公司没有如征服加尔各答和孟加拉一样把广州及其邻近区变成殖民地，该公司实行贸易垄断，禁止所谓执照私商（country traders，即向东印度公司申请牌照，凭照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贸易的商人）在广州经商的做法反而限制了东印度公司以外的英国商界同其他欧洲商人竞争的能力。于是就有所谓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得到的好处是“牺牲英国利益换来的”的论调。^④

其次，执照私商实际上把印度出口物资四分之三都运到了中国，^⑤而且这样做是从东印度公司领得许可证的。其中秘密就在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大部分物资是鸦片。^⑥如表三所示，孟加拉出产的鸦片大部分运到了中国。然而，早在1729年，中国政府就禁了烟。^⑦这比东印度公司决定在广州开始长期经商要早二十七年，^⑧比该公司决定在广州“建立一所配备有永久性工作人员的洋行”^⑨要早十四年。东印度公司想在中国倾销鸦片，又不想负责任，便在加尔各答公开出售鸦片给执照私商，由他们将毒品运往中国，冒险转手出售。这样一来，所谓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已不再是名副其实的垄断。进一步说，东印度公司既然要依靠执照私商为其代售鸦片，垄断这个词就不能说得那么响亮。

东印度公司还有别的依赖执照私商的地方。该公司一直为英国国内市场购买茶叶，购买量与日俱增。仅1829年一年，不列颠联合王国就消费了2,700万磅中国茶叶。^⑩购买茶叶所需的白银由执

照私商提供。每年鸦片上市后他们就把毒品卖给中国走私者，换来白银交给东印度公司。^⑩ 执照私商心内明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活动离不了他们，于是毫无顾忌地抗拒东印度公司对他们的约束。这种抗拒逐渐发展为公开敌对，并且“习以为常”，^⑪ 到了决定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的命运时刻，这种敌对力量已根深蒂固。垄断云云，已是回天乏术。

反过来，东印度公司也曾为执照私商提供过不可缺少的服务。上面讲过，执照私商把卖鸦片得来的白银在广州交给东印度公司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则换给他们在伦敦兑现的汇票，这样他们才能把在中国赚得的利润汇返英国。但是，自1812年起，在伦敦和在纽约兑现的美国汇票开始在广州出售。虽然这些汇票起初不太受欢迎，但1827年后就逐渐流通。到1832年，据记载，那年鸦片季节汇往英国的汇款有四分之三用的是美国汇票。^⑫ 赫赫有名的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种新情况似乎使执照私商更大胆地随意违反东印度公司的规定。

1757年以前，中国所有的港口都对外开放。1757年才有上谕规定广州是“唯一的外贸中心”，^⑬ 从此以后，中国的出口物资（主要是茶叶和丝）就沿不同的路线运到广州。东印度公司的重点贸易活动就是购买茶和丝，所以单单广州一个口岸已经满足需要。但执照私商则不然。鸦片是违禁品，即使能成功地偷运入广州地区，亦难以分销到中国各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中国沿海建立更多供应点。一个名叫马地臣的年轻敢干的商人，率先驾船沿广州东面和北面的海岸贩卖鸦片。其他商人纷纷仿效。没过多久，中国沿海各处都泊有装满鸦片的货船，“成为供应点，再由中国帆船转运贩卖到”南部。^⑭ 这样做的收获甚为可观，在中国的鸦片销量很快翻了一番，并且不断增长。^⑮ 在这美其名曰扩大贸易的非法活动狂潮中，东印度公司经理团却仍囿于广州一地，他们一定觉得脸上无光。

实际上，即使在广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也遭到英国私

商的有力挑战。早在1807年，苏格兰人瓦尔特·斯蒂文森·达维逊就在广州居留经商，但其身分不是东印度公司职员。他“承葡萄牙国王的恩典，不花一文钱就取得了为期一百年以上的葡籍”。^⑳当然，他只有在中国同东印度公司打交道时才亮出这块牌子。^㉑“其他人则想到代表欧洲诸国驻澳门领事的门路。例如：马地臣成了瑞典领事；马格尼亚克兄弟成了普鲁士领事和副领事；汤马士·颠地成了萨丁尼亚领事。这些衔头并不赋予他们外交身分，但可以给他们随时去广州的便利，不必事先经东印度公司经理团许可”。^㉒于是，到了1831年，在广州至少有五家英国私营公司同东印度公司竞争。^㉓

如果英国政府无视现实，让1833年就到期的东印度公司章程延期，坚说该公司仍能实行对华贸易垄断，就会显得非常愚蠢。但是，在作出决策之前，英国政府先进行公开查询，目的是弄清楚三方面的情况：取消贸易垄断对于联合王国茶叶进口税，对于英国向中国的出口，以及对于中国政府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茶叶进口税问题，1784年前，茶叶进口税的幅度在原价75.9%至127.5%之间。按1784年通过的减税法案，茶叶进口税降至12.5%。但过了二十多年，又回升至100%，^㉔大概这是为了筹集更多的经费同拿破仑打仗吧。但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茶叶进口税仍然不减。“1829—1833这五年中，平均每年茶叶税收入达3,401,535英磅”，^㉕约占英国税收总额的十分之一。^㉖“茶叶税由东印度公司代征，上缴英政府，并不索取任何报酬”。^㉗英国政府既不费力又不花钱就收得这么大一笔税款，自然十分关心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反面影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修建了包括有完备仓库的码头，海岸线一直有海军巡逻，经过二十年代的贸易改革，英国形势普遍稳定，这就杜绝了走私的机会，也打消了人们想走私的念头”。^㉘一名自由经营派人士甚至认为，如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垄断，政府就可以在不增加消费者负担的情况下多收入一百万英磅税款。他列表说明了这种可能性（见表

四)。原来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消费者的要价比一般商人对消费者的要价高得多，例如比美国商人对美国消费者的要价高得多。^⑥

这就引起第二个要了解的问题，即取消贸易垄断对英国向中国出口的影响。当时英国出口到中国的物资主要是毛织品，而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人推销毛织品不力这个问题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的毛织品贸易是亏了大本的，“这项贸易与其说是为了赚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在英国收买人心”。^⑦即使大大压低价格，有时低到只有半价，^⑧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也很难说动广州十三行（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行数并不固定，相传为十三行，一般为十行。——译者）的商人购买他们的毛织品，以至最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提出茶叶与毛织品按比例互售的办法。^⑨中国商人向国内市场出售毛织品时同样亏本，他们便提高卖给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力图弥补损失。^⑩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市场的茶叶比美国市场的茶叶要贵的原因之一。

“他们是否不喜欢英国的产品？”

“当然不是。”一名执照私商这样回答，但没有讲明理由。^⑪

“你认为英国在广州的毛织品贸易有利可图吗？”

“我想，大体上是有利可图的，毛织品正在不断运往中国，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另一位执照私商回答说。^⑫

“英国货物的销路为什么阻滞？”

“英国制成品一般是为寒冷地区设计的，广州天气太热，不适合使用这些产品。”这是一名前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话。^⑬

“如果有办法将这些毛织品运往中国北方，需求量肯定会大大增加。”另一名东印度公司职员说。^⑭

查询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容易听得出，这些执照私商的回答都是含糊其词，不能令人信服。鉴于这种情况，开放对华贸易能否增加英国毛织品的销路呢？执照私商们反应热烈，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都带一定的前提，比如“最终”^⑭会增加，“经营合理”就会增加等。^⑮东印度公司则相反，干脆一口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当时有脍炙人口的所谓美国人把英国毛织品卖给中国人的情况，其实此举只及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毛织品的四分之一。原因是东印度公司的货物不必付运费，而且由于船只性能良好，只需付极少的保险金。因此东印度公司出售的毛织品可以比美国人的便宜。至于东印度公司本身，他们是甘愿亏本的。“很难有任何个人能够从爱国主义的动机出发，容忍这种损失”。^⑯

查询委员会又改变查询大前提，即：如果全面开放对华贸易，以前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而受到限制的种种贸易就会发展起来。人们得以自由地去追求个人利益，由此产生的创造力会带来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贸易活动。私商会发现很多东印度公司梦想不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商品。^⑰而且他们还是强大的动力，精打细算，不怕吃苦，努力去开辟新的市场和新的贸易，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注册公司无法相比的。^⑱

这种嚣张的活动会对中国政府产生什么影响呢？东印度公司职员和执照私商都认为最终会导致英中交战，尽管他们所持的理由各不相同。

德庇时爵士的观点可看作东印度公司派的代表性观点。他认为打破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会给广州地区的走私活动提供方便，并预言，“广州所有的走私者会大喜过望，中国政府则先是妒恨（他们对任何改革都抱这种态度），等到他们发现税收受损失，就会心怀敌意。”^⑲除违禁品如鸦片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要完税的货物都已有走私现象，中国政府的税收早已蒙受巨大损失，勅令反走私的谕旨纷至沓来。很难想象“他们会长此忍耐下去，或者听任广州的贸易全部沦为走私活动”。^⑳德庇时爵士在中国

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十七年，曾任该公司经理团经理，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语言和社会结构，这使他自命能对形势作出预测并修正东印度公司的对华方针。^⑳

上文提过的私商瓦尔特·斯蒂文森·达维逊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广州居住并经商。他第一次到广州是在1807年，然后从1811到1822年一直住在那里。^㉑他不仅希望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而且想连十三行也一并勾销，因为他把东印度公司看作是能够与十三行贸易垄断抗衡的非常必要的力量，尽管不能完全达到平衡，起码能部分做到这一点。^㉒如果中国政府不取消十三行怎么办？“虽然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二亿五千万，但两万英军便可势如破竹地由广州直捣北京。”^㉓

三

1839年，即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取消后六年，英国最终还是对中国发动了战争。英军没有按达维逊的建议由陆路从广州向北京进军，而是派出一支海军远征舰队，按另一名私商查顿^㉔草拟的计划行动。查顿是怡和洋行的合伙人之一，另一名合伙人就是首先把自己的麦罗普号鸦片船驶往广州东面和北面沿海进行鸦片走私的马地臣。^㉕战争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取消十三行。其实，与史学界流行的观点相反，最近有研究成果表明，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撤走后，十三行的贸易作用就不复存在。早在1839年之前，它已经解体。^㉖它之所以能够名存实亡，其实是一些精明的执照私商为了说服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而制造的假象。后来一些不了解内情的史学家又以此来为用武力推行自由贸易辩护。^㉗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父亲，李嘉图的顾问，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创始人之一，自由竞争理论的忠实奉行者詹姆斯·米尔支持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垄断，理由是这种办法最省钱，又能获得最多的收入，在各种名目的政府收

入中，这一种最不惹人厌，因为赚的是外国人的而不是英国臣民的钱。^⑩詹姆斯·米尔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⑪

1839年中国政府开始焚毁鸦片，这直接危害了英属印度的收入，间接地威胁着这块殖民地的生存。^⑫而英国财政赤字里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要靠这块殖民地弥补。^⑬战争在所难免。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有些观点简直是海外奇谈，本文恕不详论，只举一例：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声言：“战争的起因是磕头。”^⑭他还不如他的同代人德庇时爵士，后者还公开承认，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打击走私，战争就会爆发，^⑮尽管他只是笼统地提走私，而没有指明是鸦片走私。

译自《南亚研究》，1982年12月，第5卷，
第2期，第81—95页。 区铨译

注 释

- ① B. 英格利斯：《鸦片战争》，伦敦1976年版，第31页。
- ② 《H. 斯塔克证词(1832年2月14日)》，载《议会文件》1831年—1832年部分，第11卷，〈查询〉(以下用字母Q代替)，第127—133号。
- ③ 《W. M. 弗莱明致T. H. 魏里尔的信(1832年3月30日)》，同上，附件第281页。弗莱明是印度鸦片部前雇员(同上，第283页)。
- ④ 《L. 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同上，Q686—688号。肯尼迪任东印度公司文员二十二年(同上，Q715—718号)。
- ⑤ 前引英格利斯书，第21页。
- ⑥ 《斯塔克证词(1832年2月14日)》，载《议会文件》1831年—1832年部分，第11卷，Q266号。《L. 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同上Q719、Q720、Q760号。
- ⑦ 《L. 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同上，Q778号。
- ⑧ 同上，Q721、Q798号。
- ⑨ 同上，Q761号。
- ⑩ 同上，Q760号。
- ⑪ 《詹姆斯·米尔证词(1832年6月28日)》，同上，Q3037号。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之父。
- ⑫ 《L. 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同上，Q767号。
- ⑬ 《H. 斯塔克证词(1832年2月14日)》，同上，Q255号。
- ⑭ 《L. 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同上，Q783号。
- ⑮ 同上，Q768号。
- ⑯ 同上，Q756号。

- ①⑦ <T.布勒肯证词(1832年7月18日)>, 同上, Q3041—3043号。
- ①⑧ 同上。
- ①⑨ <L.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2日)>, 同上, Q797号。
- ②⑩ 同上。
- ②⑪ <J.米尔证词(1832年6月28日)>, 同上, Q3034号。
- ②⑫ 同上。
- ②⑬ <L.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 同上, Q801号。
- ②⑭ <T.布勒肯证词(1832年7月18日)>, 同上, Q3048号。
- ②⑮ <L.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 同上, Q795号。
- ②⑯ 同上, Q795号。
- ②⑰ 同上, Q756号。
- ②⑱ 同上, Q765号。
- ②⑲ 同上, Q769号。
- ③⑩ 同上, Q770号。
- ③⑪ 同上, Q771号。
- ③⑫ 同上, Q781号。
- ③⑬ <H.斯塔克证词(1832年2月14日)>, 同上, Q257号。
- ③⑭ <L.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 同上, Q781号。
- ③⑮ 同上, Q787号。
- ③⑯ 同上, Q729号。
- ③⑰ 同上, Q727号。
- ③⑱ 同上, Q730号。
- ④⑩ 同上, Q732号。
- ④⑪ <J.米尔证词(1832年6月28日)>, 同上, Q3040号。
- ④⑫ 同上, Q3037号。
- ④⑬ <L.肯尼迪证词(1832年2月25日)>, 同上, Q802号。
- ④⑭ <J.米尔证词(1832年6月28日)>, 同上, Q3024号。
- ④⑮ <W.S.达维逊证词(1830年3月11日)>, 载<议会文件>1830年部分, 第5卷, Q3049号。
- ④⑯ M.格林伯格: <英国的贸易及中国的开放(1800—1842)>, 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 第15页。
- ④⑰ 印度的棉花为另一出口到中国的重要物资, 但执照私商很快就发现, 他们无法迅速地将这种货物推销给中国人。见<马地臣档案>, B4(私人信件)。
- ④⑱ H.B.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伦敦1910年版, 第173页。
- ④⑳ E.H.普利查德: <早期英中关系的严峻岁月(1750—1800)>, 纽约1970年版, 第114页。
- ㉑ 前引H.B.马士书, 第53页。
- ㉒ <议会文件>, 1830年部分, 第5卷, 第369页。
- ㉓ 前引M.格林伯格书, 第14页。
- ㉔ 前引B.英格利斯书, 第90页。
- ㉕ 张荣洋: <满清官员与商人: 怡和洋行, 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商行>, 伦敦1979年版, 第8页。
- ㉖ 前引H.B.马士书, 第67页。

- ⑤ 同上,第180页。
- ⑥ 同上,第182页。
- ⑦ <W.S.达维逊证词(1832年3月11日)>,载<议会文件>1830年部分,第5卷, Q3040—3042号。
- ⑧ 前引M.格林伯格书,第30页,注1。
- ⑨ 前引B.英格利斯书,第66页。
- ⑩ 前引M.格林伯格书,第30页。
- ⑪ 同上,第52页。
- ⑫ <东印度和中国协会致罗伯特·皮尔爵士函(1844年2月8日)>,载<议会文件>1846年部分,第44卷,第507页。
- ⑬ 前引M.格林伯格书第3页。
- ⑭ 前引<议会文件>1830年部分,第5卷,附件第84页。
- ⑮ C.R.费伊,<自亚当·斯密至今日之大不列颠>,伦敦1937年版,第61页。
- ⑯ <议会文件>1830年部分,第5卷,第369页。
- ⑰ <德庇时证词(1830年2月22日)>,同上,Q507号。比较<C.梅节里邦克5证词(1830年2月18日)>,同上,Q182号,以及<J.C.麦尔维尔证词(1830年2月11日)>,同上,Q5128号。
- ⑱ <C.梅节里邦克斯证词(1830年2月18日)>,同上,Q302、Q318号。
- ⑲ 同上,Q574号。
- ⑳ 同上,Q509号。
- ㉑ <C.赫臣逊船长证词(1830年3月9日)>,同上,Q2687号。
- ㉒ <C.埃佛勒特证词(1830年3月9日)>,同上,Q2853号。
- ㉓ <德庇时证词(1830年2月22日)>,同上,Q388号。
- ㉔ <梅节里邦克斯证词(1830年2月18日)>,同上,Q358号。
- ㉕ <C.赫臣逊船长证词(1830年3月9日)>,同上,Q2686号。
- ㉖ <C.埃佛勒特证词(1830年3月9日)>,同上,Q2852号。
- ㉗ <德庇时证词(1830年2月22日)>,同上,Q387号。
- ㉘ <J.阿肯证词(1830年3月4日)>,同上,Q2146、Q2149、Q2180号。
- ㉙ <J.贝特证词(1830年3月15日)>,同上,Q3368号。
- ㉚ <德庇时证词(1830年2月22日)>,同上,Q383号。
- ㉛ 同上。
- ㉜ 同上,Q367—368号。
- ㉝ <W.S.达维逊证词(1830年3月11日)>,同上,Q3047号。
- ㉞ 同上,Q3046号。
- ㉟ 同上,Q3089号。
- ㊱ 张敬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4页。
- ㊲ 前引H.B.马士书,第180页。
- ㊳ 前引张荣洋书,第195—200页。十三行的外交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工具的作用仍然保留,比如递交呈文、信件及上谕,召开会议把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西方人,或讨论紧迫的问题等等。(同上,第200页)。
- ㊴ 见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及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9页,及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4页。

- ⑩ 见注③，以及上文引用过的《议会文件》中德庇时的证词。
 ⑪ 同上，Q2991号。
 ⑫ 至1839年，英属印度除了名字未变更之外，实质上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⑬ 详见E.J.哈伯斯波恩：《工业与帝国》，伦敦1969年版，第148—149页。
 ⑭ 转引自谭中：《中国和美丽的新世界》，新德里1978年版，第1页。
 ⑮ 见注⑩。

表 一

鸦片与孟加拉的税收（1797—1830年，货币单位：卢比）

财政年度	出售鸦片所得	孟加拉税收总额	鸦片收入占总税收 %
1797/98	2,380,435	57,827,413	4.12
1798/99	2,103,043	61,536,152	3.42
1799/1800	3,720,248	65,047,380	5.72
1800/01	3,725,020	66,583,346	5.59
1801/02	3,676,576	71,279,887	5.16
1802/03	5,346,538	83,800,874	6.38
1803/04	4,631,607	80,609,928	5.75
1804/05	7,258,950	93,367,070	7.77
1805/06	6,900,109	95,424,303	7.23
1806/07	4,800,692	92,963,241	5.16
1807/08	8,014,672	99,716,964	8.03
1808/09	5,956,354	98,383,516	6.05
1809/10	8,223,431	102,636,261	8.01
1810/11	9,359,961	106,822,493	8.76
1811/12	9,246,775	107,061,729	8.64
1812/13	7,299,401	104,250,521	7.00
1813/14	9,640,729	111,724,712	8.63
1814/15	11,035,626	110,898,235	9.95
1815/16	10,512,601	112,432,728	9.35
1816/17	9,416,539	117,895,107	7.99
1817/18	8,735,983	116,215,136	7.52
1818/19	8,305,846	123,703,696	6.71
1819/20	7,998,248	121,941,983	6.56
1820/21	14,364,321	134,872,180	10.65
1821/22	11,257,275	133,405,024	8.44
1822/23	14,935,545	141,289,700	10.57

续表一

财政年度	出售鸦片所得	孟加拉税收总额	鸦片收入占总税收 %
1823/24	8,520,416	129,503,084	6.58
1824/25	15,168,201	134,791,925	11.25
1825/26	9,398,910	131,196,531	7.16
1826/27	17,153,079	147,570,888	11.62
1827/28	20,516,209	149,219,826	13.75
1828/29	16,645,612	127,899,070	13.01
1829/30	15,262,092	119,427,785	12.78

数字来源：1797—1800《议会文件》1801年部分，第7卷，第6页。
 1800—1801 1801—1802年部分，第5卷，第6页。
 1801—1804 1806年部分，第15卷，第2页。
 1804—1805 1807年部分，第5卷，第454页。
 1805—1807 1808年部分，第13卷，第64页。
 1807—1808 1810年部分，第5卷，第500页。
 1808—1811 1812年部分，第6卷，第444页。
 1811—1812 1813—1814年部分，第9卷，第10页。
 1812—1815 1817年部分，第11卷，第320页。
 1815—1817 1819年部分，第13卷，第98页。
 1817—1820 1822年部分，第17卷，第552页。
 1820—1823 1825年部分，第25卷，第6页。
 1823—1826 1828年部分，第23卷，第6页。
 1826—1829 1831年部分，第19卷，第30页。
 1829—1830 1834年部分，第44卷，第4页。

注：百分比系作者算出。

表 二

孟加拉鸦片垄断收入可与东印度公司债务利息相抵的百分比
 (1817/1818—1829/30财政年度, 货币单位: 英镑)

财政年度	债务利息总额	孟加拉鸦片垄断收入	孟加拉鸦片垄断收入 与债务利息相抵百分比
1817/18	1,753,618	873,598	50
1818/19	1,684,271	830,585	49
1819/20	2,096,109	799,825	40
1820/21	1,902,585	1,436,432	75

1821/22	1,932,835	1,125,728	58
1822/23	1,649,384	1,493,555	90
1823/24	1,652,449	852,042	58
1824/25	1,460,433	1,516,820	104
1825/26	1,575,941	939,891	60
1826/27	1,749,068	1,715,308	98
1827/28	1,920,532	2,051,621	107
1828/29	2,112,774	1,664,561	79
1829/30	本年度数字未列出		

数字来源：1817/20《议会文件》1822年部分，第17卷，第565页。
1820/23 1825年部分，第17卷，第19页。
1823/26 1828年部分，第22卷，第19页。
1826/29 1831年部分，第19卷，第43页。

表 三

1793—1830年由加尔各答出口至中国的鸦片数量（箱）

财政年度	由加尔各答出口至中国的鸦片量	由加尔各答出口的鸦片总量	出口至中国的鸦片占总量的百分比
1793/94	无记录	—	—
1794/95			
1795/96	1,070	5,183	20.64
1796/97	2,397	5,644	42.47
1797/98	1,985	3,503	56.67
1798/99	1,718	3,342	51.41
1799/1800	1,867	3,926	47.55
1800/01	3,224	4,783	67.41
1801/02	1,744	3,467	50.30
1802/03	2,033	3,068	66.26
1803/04	2,116	3,053	69.31
1804/05	2,322	3,358	69.15
1805/06	2,131	3,657	58.27
1806/07	2,607	4,384	59.47
1807/08	3,084	4,255	72.50
1808/09	3,223	4,639	69.48
1809/10	3,074	4,246	71.40
1810/11	3,592	4,909	73.17
1811/12	2,788	4,713	59.16
1812/13	3,328	4,832	68.87
1813/14	3,213	4,272	75.21
1814/15	2,999	3,872	77.45

续表三

财政年度	由加尔各答出口至中国的鸦片量	由加尔各答出口的鸦片总量	出口至中国的鸦片占总量的百分比
1815/16	2,723	3,848	70.76
1816/17	3,376	4,325	78.06
1817/18	2,911	3,708	78.51
1818/19	3,575	4,299	83.16
1819/20	1,741	3,091	56.32
1820/21	3,591	5,147	69.77
1821/22	1,936	2,591	74.72
1822/23	3,207	4,100	78.22
1823/24	3,923	5,209	75.31
1824/25	5,365	7,086	75.71
1825/26	4,627	5,155	89.76
1826/27	5,861	6,568	89.24
1827/28	7,341	7,903	92.89
1828/29	4,903	6,554	74.81
1829/30	7,443	9,678	76.91
1830/31	无记录		

数字来源：《议会文件》1831—1832年部分，第10卷，第882页。百分比由作者算出。本表所列数字只限于孟加拉产的鸦片。同样大量运往中国的印度西海岸鸦片不计在内。

表 四
贸易垄断同自由经营两种制度下的茶叶进口税及总税收比较
 (以1828—29年茶叶消费及总收入为例)

茶 叶	数 量 (磅)	东印度公司售价		美 国 售 价		开放贸易后不升高 消费价格就可征税		目前收入 (镑)	不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就可将总收入增至 (镑)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武 夷	3,778,012	1	6.65	0	9.83	2	2.72	281,839	470,681
工 夫	20,142,873	2	3.88	1	7.40	3	0.36	2,339,930	3,051,645
拣 焙	284,187	2	9.14	1	7.40	3	10.88	39,251	55,511
小 种	601,739	2	10.38	1	7.40	4	1.36	86,199	123,758
屯 溪	4,101,845	2	5.72	1	7.40	3	4.40	507,945	684,325
熙春末	213,993	2	3.84	1	4.56	3	3.12	24,823	34,881
熙 春	1,014,923	4	1.75	2	7.05	5	8.45	210,385	289,465
珠 茶	645	6	6.51	3	2.55	9	10.47	210	317
总 计	30,138,217							3,490,572	4,660,583

可增加收入：1,170,011英镑。

资料来源：〈议会文件〉1830年部分，第5卷，第369页。

苏联与新疆省的贸易

(1913—1926年)

奥·布克施泰因

中国新疆省在苏联经济地理中素称中国西部地区或中国土耳其斯坦，又称东土耳其斯坦，以区别于西土耳其斯坦即苏联土耳其斯坦。

苏联和新疆之间有一条漫长的边界线，北起湍急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南至帕米尔山麓，绵延两千多公里，为苏联与新疆彼此进行经济联系，自然地提供了先决条件。

天山山脉把新疆省分割为南疆（喀什噶尔地区）和北疆（准噶尔地区），但无论从经济还是从种族来说，南北两部分都是西土耳其斯坦即苏联土耳其斯坦的直接延续。在北部，以哈萨克斯坦的哲台苏省同新疆的伊犁—伊宁地区比较，在南部，以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省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新疆的喀什噶尔地区、阿克苏区以至吐鲁番比较，耕作技术和种族亲缘都显然十分相近。

无论在南部地区（被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隔开的苏联一边和中国一边），还是在北部广阔的草原地带（苏联的哲台苏和中国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山地区），都没有特殊的天然边界。在两国境内，北部是一片草原地带，南部是深山峡谷；在宽达四百至五百俄里的边界地带，均无方便的通道。

在北部，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伊犁—伊宁地区盛产小麦，畜牧业发达；在南部，苏联的费尔干纳和中国的喀什噶尔—吐鲁番地区种植棉花和发展园艺业的条件完全相同。

农作物和居民生活条件的相同，以及种族的亲缘关系，不仅为边民自由过境和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而且为大批牲畜定期从伊犁地区往俄国哲台苏省茂盛的天然牧场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疆与战前俄国的贸易，是根据互利的原则发展起来的。新疆与中国内地隔着戈壁大沙漠。新疆的农产品十分丰富，自给有余，但是当地居民苦于没有销售本地原料的市场，工业品也没有来源。新疆同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取道兰州）每年只有一次：去程四个月，归程四个月，交易四个月。因此，俄国的边境省份成了向新疆输送俄国工业品的供应库和采购中国南部地区原料的转运站（北部有谢米巴拉丁斯克、南部有塔什干）。新疆居民的主要消费品之一——茶叶，也不是经戈壁大沙漠直接由中国内地运去的，而是由水路经天津或上海，再经巴统、克拉斯诺沃茨克，或者由铁路运至谢米巴拉丁斯克。经俄国运入新疆的茶叶，价格便宜得多。大战前，由中国内地经俄国运入中国西部地区的茶叶达八万普特。^①

大战前俄国对新疆的贸易始终入超。可见，同俄国进行贸易，对新疆有利。1912年，俄国与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贸易，共贴补黄金价值一百四十六万一千卢布。

在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革命期间，俄国同新疆的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到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苏联同新疆的贸易几乎完全中断，只是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尚有零星的走私活动。据苏联海关总署统计：1923年苏联同新疆的贸易额为九万一千普特，价值七十一万一千卢布，而在1913年为二百六十四万五千普特。1923年贸易额如此下降，一是因为革命时期海关被撤销，对过境商品未作统计，二是因为战时俄国生产下降，工业品价格上涨，致使出口减少。海关总署的统计数字说明如下事实：自1922年起，苏联和新疆各有一批贸易先行者，他们不顾正常贸易中断，也不畏政局不

^① 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

稳，努力恢复双边贸易。中国西部地区与苏联内地的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但出于需要，两国边民却极力开拓贸易途径。俄国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工业品从俄国土耳其斯坦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西部地区；反之，中国西部地区也向现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区提供面粉、蔬菜和乳制品等食品，其中一部分经业已恢复的海关登记，但大部分是走私过境的。

战前俄国与新疆开展贸易，无疑也是有利可图的。当前，苏联与东方各国的贸易特点是，苏联产品逐年降价，而东方各国的原料却逐年涨价；战前则相反，俄国工业品持续涨价，而东方各国的原料却不断跌价。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棉花、羊毛、肠衣、各种兽皮、皮革、毛皮等原料，以及牲畜、马匹、马鬃、动物等数量可观。其中一部分直接进入俄国生产部门，一部分转销欧洲，从中取利。

1913年贸易结构的特点是（单位：普特）：

俄国运往新疆的商品

面粉……14,400
 谷物……62,000
 砂糖……47,700
 茶叶……11,400
 木材……19,600
 生铁……46,300
 铁制品……25,700
 布匹……85,400
 硅酸盐……2,500
 煤油……6,900
 蜡烛……1,400
 火柴……4,400
 钾碱……2,800
 其它商品……25,000

新疆运往俄国的商品

棉花……322,000
 羊毛……264,000
 兽皮……172,000
 土布……107,700
 地毯……107,000
 煤 ……32,000
 干果……41,700
 生丝……4,900
 皮革……46,200
 毡子……50,000
 桃仁……26,200
 杂粮面包……42,900
 大米……10,400
 其它商品……52,000

此外，1913年，新疆向俄国提供牲畜三十万头，俄国向新疆提供酒精等物品。1913年俄国出口总值为八百四十二万四千卢布，进口总值为九百八十四万六千卢布。

为保持贸易平衡，俄国平均每年向当地居民补贴近百万卢布，但也并不吃亏，因为补贴金额只占俄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再者，将一部分原料转销欧洲，亦可补偿这笔费用。可见，贸易双方均有利可图。

以上种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自从苏联与新疆贸易恢复以来，对双边贸易的性质和远景作出判断的必要前提。应当指出，这多半是积极的前提。

但是，在苏联与新疆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若干消极因素，不利于双边贸易关系的恢复。

中国西部地区与俄国市场贸易中断时间太长。自1915年起，贸易额便逐年下降，到1924年才开始恢复，并渐趋稳定。在1919—1922年期间，苏联各海关对商品流通未作任何统计。

据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资料，在1916—1918年，经巴赫特海关、斋桑海关、阿拉克别克关卡和迈科普关卡过境的货物总值如下（单位：千卢布）：

年份	输出	输入	贸易总额
1916.....	1,600.7	9,092.0	10,692.7
1917.....	1,003.7	18,575.0	19,578.7
1918.....	4,026.3	23,132.3	27,158.6

表面看来，贸易总额尚属可观，其实有限，其原因是苏联卢布大幅度贬值，而且，与战前指数相比，这一贸易额确实不大。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资料还表明，在1919—1922年间，双边贸易完全中断。

根据上述资料，在双边贸易逐渐恢复的过程中，俄国与新疆

市场的贸易额仍然有限，请看下列数字（单位：千卢布）：

年份	输出	输入	贸易总额
1922.....	197.1	177.0	374.2
1923.....	959.1	350.8	1,309.9

.....

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统计，中亚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贸易额在1920年约为三百吨，在1922年也仅为六百吨，而在战前为五万吨。在1925/26年度，贸易总额上升到三万二千吨，这一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

为说明问题起见，举苏俄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为例。1916年，经喀什噶尔边界（包括喀什噶尔与印度的边界）各出入口输入喀什噶尔的货物总值为三百八十万喀什噶尔元，约等于五百五十万卢布，而1922年输入喀什噶尔的货物总值却减少到一百四十七万喀什噶尔元，换句话说，苏俄对喀什噶尔的出口大为减少。

俄国东方贸易局的统计资料最能说明俄国与新疆市场贸易额的下降程度。据该统计资料，乌鲁木齐商人1917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总值：纺织品为一百三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五卢布，日用百货为一万四千三百卢布。这是以卢布计算的商品数量。为了更确切地了解商品数量，必须考虑到：1917年，俄币在新疆大贬值，物价暴涨。例如，砂糖的价格，1915年每磅俄币十四至十五戈比，1917年底每磅九十至一百卢布；煤油的价格每磅从十戈比涨到十五至二十卢布。这样，尽管输入的纺织品总值相当可观，但其数量并不多。1917年输入中国西部地区的其他商品有：铁板三百五十五普特（1913年输入八万五千二百普特）、搪瓷器皿四十五普特，铜制品一百四十普特、瓷器七百二十普特、玻璃和玻璃制品二百九十普特、煤油一千四百五十普特（1913年输入三万六千三百普特），等等。在输入的商品中，没有砂糖、蜡烛、火柴、药品、

精粉、椅子、糖果糕点、钢制品和生铁制品这类物品。

以上是1917年俄国对乌鲁木齐地区的出口情况。进口额虽然同前几年相比大为减少，但仍大于出口额。例如，1917年从乌鲁木齐购进皮革十万多普特，羊毛约四万普特，生革约十万张。进口总值约为七十万卢布，但这个数字并不反映实际情况，因为卢布贬值，原料价格也大大上涨。

1918年贸易范围更加缩小。白匪在新疆以北地区集结，中亚地区喀什噶尔边境一带骚扰频起，致使伊犁成为仅有的贸易区。不过，即使在这里，所谓贸易，也只是偶而输入小批量商品，即往塔城输出少量剩余的俄国商品。

1918年从乌鲁木齐运往俄国的商品有：棉花一千五百七十三普特、洗净的羊毛二万六千普特、未洗的羊毛七千八百普特、皮革三千二百张、干果约一万三千包、羊肠衣四万五千捆、绵羊二万五千只，商品总值并不大。

据该统计资料，新疆与俄国的贸易自1919年3月起便完全中断，到1920年5月31日苏维埃政权与新疆签订伊犁临时议定书才告恢复。签订议定书之后，苏联与伊犁地区的贸易额达到七千六百一十五伊犁银两。^①其他地区1920年无任何贸易往来。

自1921年起塔什干输往伊犁地区的纺织品有：印花布、麻布、缎纹布、天鹅绒、亚洲长毛绒。伊犁地区则供应塔什干以需求量很大的羚羊角。据中国伊犁海关统计，1921年俄国经由该海关向伊犁地区出口的商品总值为十万乌鲁木齐银两。俄国从伊犁地区进口的商品总值为四万六千乌鲁木齐银两。

继俄国出口纺织品和伊犁地区出口羚羊角之后，1922年俄国还向伊犁地区出口各种生铁、颜料、铁丝等物品，总值达八十万乌鲁木齐银两；俄国输入牲畜、皮革、薄毡和小商品，当年输入

^① 1913年1卢布等于8贴子；2贴子等于1伊犁银两。1两等于8.23俄钱（佐洛特尼克，相当4.266克）；1914年1卢布等于6.5贴子；1917年等于0.63贴子；1918年等于0.38贴子；1919年等于0.19贴子。1乌鲁木齐银两约等于50戈比。按1926年12月牌价，等于71戈比。

总值为十八万七千乌鲁木齐银两。

这几年，新疆市场确实充斥着大量俄国货，这是因为中国商人在新疆本省到处贩运俄国货的缘故。

1923年乌鲁木齐市场上出现经由伊犁和塔城输入的俄国货，其中有俄国砂糖和煤油。自这一年起，双边贸易根本好转，尽管新疆市场受到了欧美资本的严重影响，但新疆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贸易额从这一年起仍然不断增长。据苏联海关总署统计，1923/24年度苏联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出口数量为八百三十九吨，出口总值为二十一万八千卢布（按1913年价格计算）。

俄国和新疆市场长期隔绝，不能不使新疆居民和市场受到影响。由于在贸易中断期间，俄国停止进口棉花，致使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减少百分之五十，棉田改种小麦、水稻和其他谷物。

战前，新疆每年产皮棉近百万普特，而1925/26年度皮棉产量尚不足五十万普特。

战前，大部分棉花运往俄国。随着俄国纺织品停止输出，新疆的大量原料开始用于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因而可供出口的减少到最低限度。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是欧美资本打入了新疆市场。自1916—1917年起，通往上海和北京的商路愈来愈发挥作用。利用这一商路来发展贸易的最先是道胜银行，随后是当地商人和欧美资本。

自1918年起，中国西部地区市场上出现了欧美商品，如砂糖、皮革制品、服装、日用百货、茶叶、丝绸、毛织品。同时，新疆也向欧美国家输出皮毛、羊毛、皮革、马鬃、肠衣及其他原料商品。关于这方面虽无确切的统计资料，但自1920年起，新疆与欧美国家的贸易额却不断地增长。欧美商人哄抬原料价格并支付白银，而白银又流到中国内地市场，用来廉价购买欧美商品。这样，新疆市场和俄国市场彼此越来越隔绝。战前，喀什噶尔市场上的肠衣每捆售价五至十五戈比，美国商人则把收购价格哄抬

到每捆八十五至九十五戈比；棉花、尤其是羊毛的收购价格也相应地上涨。欧美商人除哄抬原料价格外，还在新疆各地开办肠衣加工厂，中国商人也群起仿效。美国商行开办的肠衣加工厂遍布新疆二十二个城镇，加工能力为四十万二千捆。这类加工厂大都集中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塔城、伊宁、承化、和阗、阿克苏、叶尔羌、库车、古城、额敏等地。德国商行在新疆十五个城镇开办了肠衣加工厂，加工能力为二十三万六千捆。中国商行在十三个城镇开办了肠衣加工厂，加工能力为二十四万四千捆，等等。

1921年，道胜银行由上海输入乌鲁木齐的商品总值约为六十万卢布；其中有日本纺织品、绒布、衬衣、美国鞋、美国砂糖。这些商品价格高质劣。同年，道胜银行以及美国、德国和中国商行从新疆运走了大量毛皮和皮革。据中国海关统计，这一年它们运往天津的商品总值达四千五百乌鲁木齐银两。

1922年从伊宁运往天津、哈尔滨和上海的毛皮总值达六万乌鲁木齐银两。输出这批毛皮的既有欧美商行，也有当地的中国商行。这一年，自中国东部地区运往乌鲁木齐的商品也大为增加。中国内地税关对此没有统计。自东部地区运往乌鲁木齐的商品有：中国布匹、丝绸、饼干、糖果、衬衣、香烟、染料、火柴，以及大量日本货——玩具、器皿、火柴、扇子、香水、香料等等。自乌鲁木齐运往东部地区的毛皮（其中有狐皮、狼皮、貂皮、旱獭皮、鼬皮、马鬃、黑貂皮、羊皮等）总值达四十八万三千三百六十乌鲁木齐银两。

据中国海关统计，1923年仅美国商行运往天津的各种毛皮总值即达七十二万乌鲁木齐银两。

同年，道胜银行运往上海的羊毛约有四万普特，价值五十万乌鲁木齐银两。

上述商行还从伊宁向东部地区输出商品。

1924年，乌鲁木齐的贸易活动仍集中于东部地区即天津、上

海和哈尔滨市场。正是由于东部地区对肠衣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欧美商行才在新疆办起上述肠衣加工厂。

1924年是新疆省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即苏联开展贸易的大转折的一年。仅举伊宁地区同东西部的贸易额为例。据中国海关资料，1924年伊宁同西部即苏联的贸易额为五百二十八万五千伊犁银两，同东部地区的贸易额为四百三十万伊犁银两；其中对苏联的出口额为四百三十一万伊犁银两，而对东部地区的出口额仅为一百四十万伊犁银两。

对苏出口商品主要是原料、牲畜；输往东部地区的则主要是毛皮。不过，来自东部地区的商品数量却大大超过来自苏联的商品数量。自东部地区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其次是纺织品，价值二百九十万乌鲁木齐银两；从苏联输入的商品有：纺织品、砂糖、银锭，价值九十七万五千乌鲁木齐银两。1925年，伊宁对苏联的贸易总额继续增长，对苏联的出口和从东部地区的进口均有所增长。例如，对苏出口为六百七十九万伊犁银两，自苏进口为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伊犁银两；对东部地区的出口为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伊犁银两，自东部地区的进口为四百九十万伊犁银两。

据苏联海关总署统计，1923/24年度苏联同中国西部地区的贸易额分别为：出口二十一万八千卢布，进口三百零二万五千卢布，总计三百二十四万三千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对外贸易额为：出口八百三十九吨，进口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五吨，总计一万三千零五十四吨。

1925/26年度苏联同新疆的贸易趋于正常水平，这也是本文一开头所列举的种种基本先决条件所决定的。苏联同新疆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并恢复战前贸易水平所应具备的正常条件早在1925年底即已形成，这一来是因为苏联工业状况已相当好转，二来是因为刺激中国西部地区开展同东部地区贸易的因素逐渐消失。

1925年上半年，新疆各市场仍大量收购原料和毛皮，将其销

往东部地区，但是到了年底，通往津、沪的商路明显萧条，以致到1926年，设在新疆的欧美企业干脆关门歇业。究其原因，一是骆驼商队抵达东部地区最近的火车站古汉城，至少需要四至五个月的行程；二是东部地区政局不稳，使发货商得不到任何保障；三是苏联工业同新疆市场的需求关系日益密切。

据俄国东方贸易局统计，1925年欧美商人从乌鲁木齐地区运往东部地区的商品总值为三百七十八万四千六百六十六银两，约等于二百五十万卢布，商品主要有毛皮和肠衣。从东部地区运往新疆的商品，特别是茶叶数量明显减少。符合新疆汉民和东干人（东干人属回族，但其风俗、文化却与汉民相近）特殊需要的中国传统产品照常输入，输入量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1925年新疆对俄国煤油、俄国布匹和铁的需求量相当大。以乌鲁木齐地区为例，该地区对俄国货的需求量历来比新疆其他地区要低，但在1925年整整一年中，俄国货成为紧俏商品，以致主要货物的市场价格往往随着俄国货的货源多少而急剧波动。

1925年伊宁地区同苏联的贸易发展更为顺利。

据俄国东方贸易局统计，1925年伊宁运往苏联的商品总值达二百三十万卢布，商品主要有家畜（价值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二卢布）、羊毛、毛皮、生革等。

据中国海关统计，1925年从伊宁运往中国内地的各种商品，总值达三十五万卢布……，商品主要有毛皮和少量的肠衣、羚羊角。

从新疆对苏出口的性质，人们不难看出，牲畜在伊犁地区的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苏联市场在发展伊犁本地农业的主要部门即畜牧业中也发挥着作用。

的确，畜牧业不仅是新疆牧民的生活来源，而且也是新疆所有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和硕特人的主要财富来源。

这里的牧民繁殖不同品种的马，其中有些品种素以耐力强、

速度快而著称，在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具有重大价值。伊犁地区还盛产牛。由于牧场不良，乳牛的产奶量很低。但公牛的出肉率却很高，牛皮也非常结实。由于当地缺少丰盛的草地，牧民早在战前就习惯于把畜群赶过边境，到谢米列契天然牧场放牧，如今，新疆牧民仍希望恢复这种做法。

除牲畜外，运销苏联市场的其他畜产品有：羊毛、皮革、马鬃，等等。

新疆大米的出口受苏联边境地区对大米需求量的制约；新疆还对苏出口少量的其他消费品。

1925年，新疆运往东部地区的商品种类虽然未变，但数量却大大减少。

伊宁只是一个棉花转运站，因为产棉区在吐鲁番和喀什噶尔。

在苏联对伊宁出口的商品中，纺织品、主要是棉纺织品占第一位。新疆与那些目前已恢复战前同苏联贸易往来的东方国家不同，它从苏联进口毛纺织品、丝绸和天鹅绒。1925年输入伊宁的各种纺织品总值达四十万卢布。同年，苏联对伊宁的出口总额为九十二万七千卢布。据中国海关统计，1925年中国内地对伊宁的出口为四百九十万伊犁银两，大约等于一百六十三万卢布。茶叶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品总值仅为四十万卢布。

1925年塔尔巴哈台山地区同苏联的贸易发展也颇为顺利。该地区仅出口羊毛一项，总值即达一百二十万卢布；另外，还出口绵羊皮和山羊皮、兽皮、牲口、吐鲁番棉花和消费品。1925年塔尔巴哈台山地区对苏出口总值为一百八十四万二千卢布。

整个塔尔巴哈台山地区、阿勒泰区（经过塔尔巴哈台山地区）和乌鲁木齐部分地区都同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相连接，因而，上述各地区不经中亚各共和国，取道塔城，与苏联各工业中心保持联系。塔城距边境仅十七至二十俄里，离谢米巴拉丁斯克市也只有

两周的马车行程。

塔城是新疆同苏联贸易的主要据点。难怪在1926年参加尼热戈罗德集市贸易的七十七家商号中，有六十三家（它们分别来自塔城、承化、西湖、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是取道塔城而来的。

苏联对塔尔巴哈台山地区的商品出口总值为一百七十七万一千卢布。

因此，我们研究新疆特定地区1925年度的贸易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年，新疆对苏出口为五百二十三万卢布，苏联对新疆出口为四百三十四万四千卢布，双边贸易差额是：苏联入超九十万卢布。

苏联海关总署1925/26经济年度的资料，更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新疆省和苏联双边贸易的恢复状况。该资料证明，战争年代与苏联中断贸易的中国西部地区各个市场，已经完全恢复到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状况。

苏联与新疆双边经济关系自然恢复的标志是：在1925/26经济年度，尽管苏联主管部门已不再采取那些曾对1924/25年度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的广泛的行政干预措施，但双边贸易关系同其他东方国家甚至同波斯的贸易额相比，仍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固然，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1925年第五十一号指令所确定的贸易政策，允许新疆省的几乎各类原料商品和牲畜免税自由地由中国西部地区运入苏联，同时，也大大放宽了苏联产品自由地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出口。这一措施曾经有力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中国海关的上述资料所提供的贸易额就是证明。把苏联海关总署两年来的资料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一年之内所发生的变化究竟有多大。1923/24年度苏联出口额总计一万八千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1924/25年度则增至二百六十一万一千卢布；自中国西部地区的进口由三百另二万五千卢布增至四百五十三万五千卢布。

五十一号指令在这方面所起的鼓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在

1925/26年度（这一年度的对外贸易额另有统计），苏联对外贸易遵循另一指令即1926年1月底颁布的第二十四号指令，该指令压缩了由中国西部地区免税自由输入苏联的商品种类，而只对几类商品不施加限制。按照新规定，允许自由输入苏联的商品有：羊毛、棉花、毛皮、役畜和牛。可见，受到限制的只有绵羊和皮革两类大宗商品。1926年第二十四号指令对苏联向中国西部地区出口商品的办法未作任何变动，1926年仍然允许苏联商品自由输入新疆。

因此，上述限制并没有使贸易额减少。相反，1926年苏联同新疆的贸易额不仅与1925年相比仍然可观，而且与战前贸易额相比也是相当可观的。

1925/26年度贸易额大体如下：

	单位：吨	单位：千卢布
进口	27,925	10,331
出口	4,673	6,092
贸易总额	32,598	16,423

这份资料表明，1925/26年度苏联同中国西部地区的贸易额与上一年度相比，就价值而论，超过一点五倍，就货物量来说，超过百分之五十。这一年，苏联输入中国西部地区的商品数量增加一倍，商品总值增加两倍。中国西部地区输入苏联的商品数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商品总值增加三倍。甚至那些受进口条例限制的商品输入量也增加了。

在同样的条件下，1926/27年度苏联同新疆的贸易继续得到发展，贸易额增长幅度更大，苏联海关总署的资料可以证明：

	单位：吨	单位：千卢布
进口	21,785	11,770
出口	7,305	10,238
贸易总额	29,090	22,008

将这一年度的数字同上一年度的数字比较，人们不难看出，贸易额几乎增长六百万卢布即增长百分之三十三。

商品数量虽然略有减少（三千五百吨），但由于贸易比重的变化而得到补偿，即虽然苏联输入的绵羊有所减少，但是苏联的出口几乎增加一倍。

苏联和中国西部地区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再次证明双方具有发展正常贸易的良好的互利基础。

通过对苏联最近四个经济年度工业品出口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除少数商品外，其他商品出口都在逐年持续地增长；这一点，从下表（单位：吨）可以明显地看出：

	年度：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砂糖	114	380	978	1,648
纺织品	50	100	761	1,506
硅酸盐	20	73	138	534
金属制品	81	196	438	918
金属	211	804	539	946
石油产品	75	192	594	318
纸张	—	4	48	99
火柴	23	41	53	409
烟叶制品	—	7	8	9

将苏联最近四个经济年度的进口额逐年加以比较，贸易发展的情况就更一目了然了。比如，近四年来苏联输入的下列几种商品数量分别为（单位：吨）：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羊毛	2,658	3,445	4,365	5,259
棉花	55	182	2,004	2,676
皮革	89	426	533	85
各类原料	2,986	4,186	7,933	9,483
生活用品	85	367	569	—
牲畜(单位,千卢布)	1,041	1,913	3,077	2,054

欲知苏联在同新疆省的贸易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请看下列比较数字（与1913年相比，单位：千卢布）：

	1913年	1925/26年度	1926/27年度
进口			
生活用品	224	109	12
原料和半成品	5,836	7,043	9,698
牲畜	1,836	3,077	2,054
其他	1,971	102	—
	9,846	10,331	11,770
出口			
生活用品	594	762	1,225
原料和半成品	494	566	621
成品	7,289	4,758	8,392
其他	48	6	—
	8,427	6,092	10,238
贸易总额	18,273	16,423	22,008

这一比较说明：在1925/26经济年度，苏联从新疆的进口额达到战前从新疆进口额的百分之九十，而在1926/1927年度则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固然，从商品流通量来看，还远不及1913年。1925/26年度商品流通量为三万二千五百九十八吨，而1913年为五万吨，即便如此，苏联同新疆的贸易与其他东方国家相比，仍要好得多。苏联同新疆的贸易毕竟恢复了百分之六十四，而同波斯的贸易量仅达到战前贸易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1926/27年度，苏联对新疆的砂糖出口已超过战前水平。该年度出口砂糖十万零五百二十八普特，而1913年出口四万七千七百普特。纺织品和金属的出口已达到战前出口额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在该年度，苏联进口羊毛三十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普特，而在1913年进口二十六万四千四百普特；棉花只进口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六普特，而在1913年进口三十二万二千普特。棉花进口减少的部分原因，一是新疆植棉面积缩小，二是在双边

贸易中断期间，新疆当地的棉纺手工业得到了发展。

所有上述资料证明，苏联同新疆市场隔绝的状况已经成为过去。欧美资本只是在苏联经济衰落、卢布贬值期间，才一度起过实际的作用，而一旦苏联工业得到复兴、经济部门得到完善、交通和通讯得到恢复，欧美资本就丧失其实际作用了。

全面恢复与新疆的贸易，充分占领新疆市场，是今后苏联经济的一项任务。

尽管新疆的农作物品种单调，但新疆现在仍能够向苏联提供数量可观的原料和牲畜。新疆与苏联的贸易一经恢复，新疆在贸易中断期间减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植棉面积就立刻扩大了百分之二十。

尽管喀什噶尔的棉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其产品不仅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而且还出口（1914年，向费尔干纳出口的喀什噶尔纺织品即达二万普特），但是新疆各地生产的美国棉花和当地棉花仍剩余三十万至三十五万普特，这两种棉花对苏联工业来说十分有用。

新疆畜牧业的经营方式虽然原始，新疆的自然灾害虽然经常发生，以致大批牲畜死亡，但新疆仍然能够向苏联出口羊毛至少三十万普特。

新疆有数量足够的对苏联费尔干纳植棉业十分有用的役用马。

新疆还有可供苏联制革工业和丝绸工业用的大量原料资源。

最近的实践表明，新疆向苏联中心工业区和西北省份出口优质肉食是有利可图的。新疆食用羊自给有余，若能向苏联棉区充分供应肉食品，则必能获利不小。

肠衣、马鬃、猪鬃、毛皮及其他多种商品，均可供应苏联市场，其中一部分由苏联国内消费，一部分转销欧洲。

那么苏联是否有足够的商品来满足新疆居民的需要呢？人们往往把这个问题放在对东方国家出口商品的一揽子计划中来解

决。如此对待新疆市场，我看未必妥当。

1924/25年度，在苏联对波斯出口商品总额中，砂糖、棉纺织品、石油产品，即主要商品占百分之六十五，而在对中国西部地区出口商品总额中，上述商品仅占百分五十八。

因此，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出口方向应该是增加二类商品的出口。新疆特别是在喀什噶尔，对金属及金属制品的需求量很大，战前，这种需求完全靠俄国来满足。在双边贸易中断期间，新疆迫于当地居民对普通杂品的需求，开设了众多的铁工作坊，制造诸如锁、扣吊、钉子、铁锤一类日用杂品，其质量之粗糙、可与“鲁滨逊时代”的物品相提并论。这种原始生产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价钱十分便宜、但质量极其低劣的产品。迄今为止，在新疆，小五金、器皿及其他杂品仍然供不应求。但在苏联市场上，这类物品供过于求，只可惜，价格昂贵，以致穷困的新疆居民目前还不敢问津。除金属制品外，新疆还是苏联推销丝织品、麻织品、毛织品、橡胶、针织品、日用杂品及其他产品的销售市场。除中国的传统产品以外，苏联业已恢复的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在新疆人的生活 and 生产的每个领域中都是可以打开销路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商人在尼热戈罗德集市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纷纷采购烟叶制品，糖果糕点、化工制品、家具、纸烟咀、床上用品、线、灯具、日用百货、各种包装材料、火柴、蜡烛等等。

此外，必须承认，新疆的原始耕作方法，今天在上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全新疆，普通犁至多只有一百部。向新疆棉农和其他农民供应农具，应该成为苏联出口计划中的重要部分。

可见，不管中国西部地区对纺织品、砂糖和石油产品的需求量有多大，只要使苏联各类出口商品之间保持正确的比例，就能满足新疆居民对苏联产品的需要。

另一方面，用苏联工业品全面占领新疆市场，将使新疆能够而且必须以其农业资源来抵偿进口的工业品；同时，为满足苏联工业的需求，新疆的经济也就自然会根据苏联工业的需要改变自

己的经济体制。

那么，今后发展苏联和新疆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完善贸易法规。单方面颁布法令、指令，以促进同新疆的贸易这种作法虽然在过去多少起过作用，但是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再者，单方面颁布指令，效果也未必都好，因为边界两边市场的条件不同，这些条件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

中国西部地区居民庞杂，种族不一，民族特征、文化习俗、经济生活各异，气候和地质条件也与中国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因此，该地区在同苏联的贸易中应处于特殊地位，以保障双方进行正常的、互利的商品交换。

关税、交通运输、邮电联络、苏联贸易机构的正常工作条件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新疆设立信贷机构，以调节货币市场，办理结算、信贷等业务。设立这一机构之所以重要，因为路程遥远，每笔交易的资金周转期太长，而且中国西部地区缺少流动资本雄厚的商行，甚至连中等资本家也寥寥无几。设立这一机构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新疆货币市场上地方发行的钱币十分混乱：有乌鲁木齐银两，伊犁贴子，喀什噶尔元或称喀什噶尔银两。上述钱币在中国内地不被承认，它们之间既无兑换比例，又无任何价值保证，流通数量也极其有限。

运输问题也十分尖锐。苏联的货物基地和转运站距离边境数百俄里，而且兽力车道通行不便。昂贵的兽力车运费，加上货物在运输途中因碰撞、损坏和水浸等而经常造成的难以避免的损失，构成很大的额外开支。

当然，西上铁路干线建成后，运输问题会迎刃而解，届时，从巴赫塔和霍尔果斯两个边境站将有支线与干线相连接，从而使西伯利亚和中亚跟新疆市场建立起一条牢靠的、便宜的运输线。但在这条干线建成之前，在1925/26年度，为转运三万二千吨货

物（今后，货物转运量还会继续增加），极须尽快修复从伏龙芝城至扎尔肯特的兽力车道，并组织伊犁河的轮船运输。

毫无疑问，解决邮电联络问题也将有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

下诺夫戈罗德集市贸易和各地集市贸易的经验证明，举办集市贸易是吸引新疆贸易界开展与苏联贸易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新疆各地参加集市贸易的商行1925年有十一家，1926年有七十七家，1927年有七十八家。其中一部分商行在非集市贸易期间也经常跟苏联的贸易团体洽谈业务。1926年参加下诺夫戈罗德集市贸易的，仅有来自新疆省方圆三百至七百俄里内的商行。其中有承化、西湖、塔城、吐鲁番、喀什噶尔、焉耆、伊宁、乌鲁木齐的商人。1927年参加集市贸易的有新疆所有城市的商人，包括来自库尔勒和哈密商人。其中有萨尔特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东干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等等。这批人当中很少是商行的委托人或经纪人，大部分是商行的负责人。

由于种种传统的商业原因和技术原因，今后，集市贸易在新疆与苏联的贸易往来中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译自苏联《新东方》杂志（《НОВЫЙ ВОСТОК》）1928年
第20—21期，第201—217页。

吴永清译
林荫成校

关于日本纺织业 打入中国^①

杨天溢

(一) 打入中国前的历史

中日甲午战争后，根据所获得的在华设立工厂权在上海设立“上海纺织公司”与“东华纺织公司”计划遭到挫折^②。高村等人的研究，已经清晰说明这个失败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制造品的课税问题。因为，李鸿章为挽回由于战败而在马关条约里作出的让步，乃在课税上采取对策。拿这个课税与生产费比较，那时在上海设立工厂是不利的。又就马关条约的有关各个条款说，当时“日本资本的活动能力还比较弱”^③，或者说“当时的日本纺织业……还没有向海外发展的剩余力量”^④，类此说法，看来是符合实情的。但是经过1900年义和团事件，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是更稳定了，三井物产公司的活动也进一步积累了经

① 本文是《在华日本纺织业与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对抗》一文的第二节，载阿部洋编，《日中关系与文化摩擦》第257—272页，日本岩南堂书店1982年1月版，作者杨天溢是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译者

② 关于这两个发展计划，在村岛的《日本纺织业与中国市场》（载《人文学报》第33号，1972年2月），泉武夫的《关于日本纺织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考察》（载《专修经济学论集》7—1），关于东华纺织厂，在桑原哲也的《中日战争后日本纺织业的直接投资计划》（载《经济经营论丛》14—2）和高村直助最近发表的《在中国的日本纺织业的形成》（载《社会经济史学》45—5）的出色研究中说得很详细。

③ 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载历史学研究会编，《近代日本的形成》，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59页。

④ 见饭岛幡司：《日本纺织史》，创元社1949年版，第176页。

验，于是，日本资本对华的最初投资实现了。这就是1902年三井物产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山本条太郎收买“协隆纱厂”创设了“上海纺织公司”^①。山本成功地经营了这个纺织公司，从此代销店与纺织公司的每次交易改为代理人提取佣金的方式，同时工厂的经理和领班使用日籍人员，提高了管理效率，所以人们不禁要说它是“日本式经营的起始”^②。尤其是该公司最早采用夜班制，提高了资金的周转率，收买后不到一年，就实现了一成的分红^③。

然后，山本先是在1905年租借、第二年收买了“大纯纱厂”，改称为“三泰纱厂”。该年日俄战争后，市场景气，上海的纺织企业不久也获得巨额利润，特别是怡和纺织厂远远超过其他企业。可是，上海纺织公司却连1903年8%、1904年10%、1905年20%的分红也没有达到。其原因据一份报告^④说，是由于上海纺织公司在三井物产公司的监督管理下，在经营方法上虽然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技师、职工等重要人员都使用日本人，再加上先进的混纺法，产品质量也比其它公司优良，但是，因此其价格也就常常高于别的公司。1908年，上海纺织公司与三泰纺织公司合并，上海纺织公司改组（资本一百万日元，全部招足），成为属于三井系统的“日本人经营纺织的开端”。

该公司从1911年以后，增设织机、纱锭，1914年3月资本倍增到二百万日元，1916年增设了第三厂（5万多纱锭）。还有其它巨额积累，历年分红（包括特别分红）在1913年为20%、1914年22%、1915年15%、1916年6%、1917年12%，获得了创立以来

① 它的经过参见前引泉武夫和高村的论文。

② 见东亚同文会，《中国工业总览》，昭和5年版，第51页。

③ 原安三郎，《山本条太郎》，时事通讯社1965年版，第96—98页；桥本奇策，《中国的棉业》，1905年版，第43页；以及《上海纺织公司》一书，都说得很详细。

④ 见上海总领事明治39年3月6日的报告，《上海纺织公司营业成绩》，载《关于棉纱棉花杂件》第3卷（外交史料馆）。另外，关于上海纺织公司，前面提到的高村直助的论文（第91—102页）已有细致周密的研究，欲知详情，请参照该文。本文在这里只能记述其若干观点。

最好的成绩。报告^①还说，它的产品与日信纱厂的产品一起在上海属于最佳产品，营业成绩远远超过其它公司。该公司所以成功，在于三井物产公司在购入原棉和卖出棉纱方面，大显无可匹敌的灵活手段^②。可是该公司是“由各国人的股东组织起来的”^③，股东中除了三井之外，还包括中、英、美籍人。董事除了山本条太郎之外，还有实力雄厚的中国棉纱布商和英国人。该报告又说，三井的投资额只占十分之一^④，因而根据代销店的契约，与该公司的关系只是经营，没有完全的投资和支配关系。

继三井物产公司打入上海的是日本棉花公司。该公司在1907年与中国商人共同经营，在上海宜昌路设立“九成纱厂”，以岛浦尚公司精制的4,992锭（因为1884年制造的半旧机器已经磨损很多，产量少）和普拉托公司（1907年）制造的4,400锭（合计9,392锭）的规模进行生产。据报告说，1909年“日棉”收买了中国人持有的股票，把它改组成为完全由日本人经营的“日信纱厂”，到1911年，一昼夜平均棉纱产量达二十包，而且产品优良，常常在市场上卖好价，相当赚钱^⑤。1916年，怡和洋行的买办祝兰芳一派收买了该公司，改称为“恒昌源纱厂”，成为纯粹由中国人办的纺织厂^⑥。

最初以创立工厂的姿态打入中国的是“内外棉”。该公司于1909年7月决定在上海创办纺纱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又在上海开了分厂。11月，第三厂（普拉托公司制造的21,500锭。该公司的第一、第二厂在日本国内）开始生产。接着，1913年10月，第四厂3万锭全部运转；同年，第三次增加资本，倍增到

① 见上海商务官明治44年7月的报告：《上海纺织公司营业成绩》，载《关于棉纱棉布杂件》第4卷；以及前引上海总领事明治39年3月6日的报告。

② 见台湾银行大正元年11月的报告：《上海的棉纱棉布》，载《关于棉纱棉花杂件》第5卷（外交史料馆3—5—2—69）。

③ 见前引上海总领事明治39年3月6日的报告。

④ 见前引《山本条太郎》第98—99页。

⑤ 见前引上海商务官明治44年7月的报告。

⑥ 见安原美佐雄：《中国的工业和原料》，第1卷，第168页。

500万日元，第二年又开设了第五厂（5万锭）。尤其在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占领山东，它也就进入青岛，1917年开设了青岛分厂，第六厂（2万锭）就开始生产，成为日本纺织业打入华北的先驱。这样，该公司除了本公司的第一厂（传法）和第二厂（西宫）之外，正式开展了把主力放在中国的纺织业经营^①。

内外棉打入中国，是依据被认为日本纺织业界恩人的川邨氏的积极政策的结果。川邨于1884年8月在松板屋任职时，曾被派到中国调查棉花情况，1887年再次到中国视察，就有了在中国经营纺织业的意图。在日俄战争后的经济恐慌期，内外棉就计划打入中国，由棉商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终于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获得实现。在那个背景下，以日俄战争为分界线，棉商公司与纺织公司的力量对比逆转了，纺织公司依赖棉商公司的资金下降了，贩卖棉花已经无利可图。另外，三井物产公司与日棉公司在日俄战争后，面对已经开始的向印、美棉花产地直接买棉的形势，依赖达达商会购买印棉，因此在战后被新兴的江商财团所超过，而且从1907年开始，棉纱贩卖也日益不振。这样，该公司的商业活动就落后了，而与此相反，它在中国却有效地利用多年来棉花、棉纱买卖上的经验，迅速开展了在大陆经营纺织业的事业^②。还因为当时日本纺织业界已经进入大企业垄断的形成时期，新企业的加入很困难。作为一个棉花商社的内外棉，要在日本国内改变成生产企业，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

毋庸讳言，川邨的打入中国计划，“在当时本公司以外的同行中间，或被指责为轻率，或被认为是不会成功的”^③。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依靠日本资金将确保中国纺织品市场。这种设想遭到例如“钟纺”的武藤山治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在华发展纺

① 见《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五十年史》，1937年版；高村直助，《内外棉公司》，（载山口和雄编著，《日本产业金融史研究，纺织金融篇》），以及前引泉武夫的论文等。

② 见井村薰雄，《纺织的经营和制品》，上海出版协会1926年版，第64—67页；高村直助，《内外棉公司》以及前引论文。

③ 见《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五十年史》，第48页。

织业，等于自己妨碍日本制品的对华输出，而且把工资给了中国人，而不是给日本人——这是社会政策问题，也将阻碍日本产业的发展。川邨则认为，针对中国棉纺工业的兴旺，换用不同于中国产品的高级品来避免正面冲突，以加强出口能力，确是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不能把中国棉业的发展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时的超过罢了，倒不如“利用马关条约的权益，我们亲自打入中国去办企业，是另一个长策”^①。总之，他所主张的是，在中国棉业发展而使我们在华市场丧失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国家“商权”而着手在中国设立工厂。这样，就得出了由于内外棉在华纺织业的建设，而使本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观点。^②

果真，内外棉的“第三厂由于采用最新的普拉托公司制造的纺织机，注意工厂设备的保养和职工的培训，在上海被称为名副其实的模范厂”，开业后成绩良好^③。事实上，该公司比其它公司先引进新式机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厂从西门子、第四厂从芝浦制作所购进了电动机，并且与中国民族纺织业“恒丰纱厂”一起，在上海最早从工部局得到电力供应。^④另外，第三厂开工之前，曾在第二厂（西宫）对中国籍职工作了一年的培训。^⑤该公司此后顺利发展，加上第四、第五厂的增设锭数，仅在上海一地就上升到拥有十七万锭，远远超过英系的怡和纺织业，急剧地成长为在华外资系统中最大的棉纺企业。接着，又在1918年同时在上海增设第七厂（织机800台）和第八厂（4万锭），同年8月，又以32万日元收买了中国民族纺织业的“裕源纱厂”，成为自己的第九厂（26,936锭）。然后，1919年，在青岛增设第十厂（2万锭）、第十一厂。在上海，1921年又新设第十二、十三两

① 见《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五十年史》，第44页。

② 见中村隆英，《五卅事件和日本在华纺织业》（载《日本经济成长分析》，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280—281页）。

③ 见前引上海商务官明治44年7月的报告。

④ 见《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五十年史》第49页；加藤辰弥，《中国的棉业》，纺织杂志社1917年版，第294页。

⑤ 见《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五十年史》，第37页。

厂，同时在第九厂设织布车间，1923年又开设第十四、十五两厂。至此，在华工厂共十三座，纱锭数达30万以上。

该公司经理计算营业成绩是与国内工厂一起计算的，因此不清楚在华工厂的成绩，但是从“表一”所揭示的成绩，①可以推测梗概：

表一 内外棉的经营分析

(单位：日元)

年 度	资本 (千元)	实缴资本 (千元)	利 润 (元)	分 红 (元)	比例 (%)	特别分红 (元)	比例 (%)
1915年 下半期	5,000	3,125	331,099	197,500	12	—	
16年 上半期	"	"	335,521	149,590	12	37,910	3
16年 下半期	"	"	593,850	225,000	12	150,000	8
17年 上半期	"	3,750	780,864	225,000	12	243,750	13
17年 下半期	"	"	1,655,417	656,250	35	—	—
18年 上半期	"	"	1,866,583	225,000	12	618,750	33
19年 上半期	"	"	2,290,000			50*	
20年 上半期	"	3,819	5,653,000			160	
20年 下半期	16,000	7,750	3,487,000			60	

* 1919年与1920年分红与特别分红合起来的比例。

该公司在中国实行的是被称为纯粹日本式工厂经营，1926年4月，号称拥有资金1,600万日元，男工6,600名，女工8,800名，日本籍职员460名。华籍职工的日平均工资，男工60分，女工56分，

劳动时间一天十个半小时（二班制），年工作时间约三百天。有作为卫生设备的女工诊所，由中国医生为职工免费治疗。还有普通工用的公司住宅二千所和为养成工寄宿用的宿舍，以及教育职工子弟的水月华堂学校^①。

内外棉与前述三井物产公司及日棉公司同是棉业商社，但是它们打入中国的方式不同，后两个公司只不过是部分投资或收买现存的工厂，而内外棉则是从日本全部投资到现场新设工厂，自身转变成了经营纺织业，就这一点来看，它的对华投资，意味着真正的在华纺织业的形成。同时，也可以认为，如下述那样，由于在这以后打入中国的都是棉纱纺织资本，内外棉之打入中国，正好完成了它之前的棉业商社和它之后的纺织资本真正打入中国的媒介的任务。^②然而，在纺织企业本身打入中国之前，依靠在中国各地收买棉花和出售棉纱，而且亲自经营纺织企业的三井物产、日棉、内外棉来积累有关中国棉业等市场的情报知识，乃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条件日益充足，打入中国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了。

（二）打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税率被定得很低，关税给列强作为借款担保，海关行政权为列强所左右。清政府曾经屡次要求提高关税率，都因列强的拒绝和日本的强烈反对，没有实现，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③。1912—1913年，清政府考虑到当时税率实际上低于一般物价的上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出增加5%的改订税率的要求，又遭到日本纺织业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武藤山治在他的“中国市场保全论”中，认为

^① 见前引井村薰雄书，第71、344—347页。

^② 见前引高村直助论文，第160页；泉武夫论文，第74页。

^③ 关于改订税率，见米谷荣一：《近世中国外国贸易史》，生活社1939年版。

为日本纺织业而保全中国市场，是日本富强不可缺少的。他还认为，英美的产品在中国不易制造，受到关税的提高影响小，而日本输出的粗制廉价品多，容易被中国产品所代替，势必受到关税提高的致命打击，鼓动应该诉诸武力来阻止中国改订税率的行动。第二年即1914年，日本纺织联合会也以中国若改订税率，势必致日本产品丧失中国市场，使八十万锭因生产受到限制被闲置起来为理由，开展反对运动，并向政府陈情，施加压力^①。

这次中国改订税率的要求，由于大战的爆发而流产；1917年再度提起，日本纺织联合会也再次开展激烈的反对运动。但是，各国为了补偿中国增加对德战争的损失，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确定提高现行税率5%，从1919年8月开始实行。可是，若与物价昂贵相比较，旧税率提高5%，已经被抵消了3.5%；所以所谓提高税率5%，实际只提高1.5%。即使这样，从日本国内向中国输出棉纱（20支纱、16支纱）廉价抛售所得的利益也减少了一半。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变得不利了^②。中国提高关税是想要保护自己产业的一个步骤，^③日本则恐怕中国棉纺业发展起来而丧失了输出市场，所以猛烈反对。

其次，如前所述，中国市场是日本国内生产的粗纱的最大需要地；从1890年初输出以来，它有过一喜一忧。1899年，第二次生产紧缩，如同由于银价暴落向中国输出不振一样，“要不是为了输出，纺织业发展的势头也会不得不中途停顿下来”^④。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大战期间中国民族纺织业急速发展，1915年以后，日本棉纱向中国的输出急速减少了（参见“表二”）。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改订关税。假如日中间的生产费相同，在上海用日本粗纱纺织，由于进口税和运输费等的负担，比用中国

① 见《武藤山治全集》，第1卷，第544—549页，新树社1963年版；《谷口房藏翁传》，第296—306页。

②③④ 见《武藤山治全集》，第1卷，第561—562、672、572页。

纱纺织,平均一捆十六支纱成本高10日元以上。^①因此,“日本纺织业就粗纱看,在当时的中国,就完全失去了竞争能力”。“由于战时日本劳动工资的上涨和中国关税的提高,日本棉纱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变得困难了”^②。这些清晰地说明了中国粗纱市场上竞争困难的原因。

表二 中国棉纱生产量和日本棉纱输入量

年 次	中 国 棉 纱 (千担)	日 本 棉 纱 (担)	比 重%
1904	600	1,628,783	22.2
07	700	1,640,789	17.8
10	1,050	1,304,154	28.1
11	750	1,058,263	29.4
12	1,200	627,832	33.0
13	1,200	656,649	40.0
14	1,600	1,137,224	32.2
15	1,600	1,179,360	33.7
16	2,576	1,068,326	26.8
17	2,576	955,798	22.9
18	2,700	360,963	19.5
19	2,800	838,113	12.6
20	3,000	661,633	14.1
21	4,120	183,658	10.7
22	4,764	68,001	11.4
23	5,700	39,025	6.3
24	8,300	28,510	3.3

资料来源:井村薰雄:《纺织的经营与制品》,1926年版,第44—54页。

① 详见屋少正一:《上海的日本纺织业》(载神户高商,《大正十三年夏海外旅行调查报告》,大正14年2月印刷,第242—246页)。又,由于提高税率5%,日本输入满洲的棉制品,与上海产的中国品比较,把关税、运费和其它各项加在一起,日本棉纱每包负担为15.596日元,棉布一包为15.245日元,而中国棉纱的负担则为6.905日元,棉布则为6.240日元。假如这是满洲企业的产品,工资和其它费用一起计算,一包可能节约30余日元。所以,日本企业都想很快地打入满洲。〔辽阳领事:《关于满洲纺织……的报告》,大正12年9月3日,载《在中国的纺织业调查》(外交史料馆3—5—4)〕。

② 见《武藤山治全集》第2卷,第596、624页。

而且，1918年改订的关税与历来的单一从价税不同，对输入的棉纱分成粗纱、细纱两种，税率对细纱轻，粗纱重。为此，日本纺织业者认为，免去输入税，“如果粗纱能维持原来的销路并与中国的产品一争胜负，则势必堵死在中国开设工厂的道路”^①。于是，纺织业者采取两种措施：（一）把生产重点，从历来的粗纱生产转移到高支纱生产以及棉布生产上，输出由棉纱转变为棉布。（二）粗纱不得不在中国生产，也就是采用所谓在华创设经营纺织业的办法，以求适应。中国基于防止日纺打入中国的动机而改订税率，结果却刺激了日本纺织业。这就是武藤的见解。他一贯反对在中国开设工厂而阻碍日本产业的发展。他认为如果关税提高，用历来的输出方式，仍能保全中国市场。^②然而由于关税提高，许多在华纺织厂的开设，结果钟纺在1921年也不得不停止了建设。据说关键在于“与在中国的纺织业对抗已变得极端困难，于是就开始不断地参与中国的事业”，^③成了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侧面。这是所谓为了日本的富强而击溃中国纺织工业的主张横行的时代。

不过，基本的情况是，当时存在促进打入中国的客观条件：（1）中国的进口税更加提高，不久又收回了关税自主权。（2）日本国内改变工厂法，接着又禁止夜间作业。（3）大战期间利润的高积累和国外资产的急剧膨胀。（4）战后的逆转，即1920年日本国内棉纺业恐慌，继之以肖条；另一方面，中国的棉纺业却继续繁荣，并且据说正在转向欧美订购纺织机械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了这个时期推动日本赶快打入中国的契机。

另外，日本纺织资本本来早就有着一种潜在趋势：企图利用中国的棉花、廉价而充足的劳力、无限制的劳动时间、低廉的税金、节省的运费，以及对棉制品的潜在的巨大需求等等而在华设

① 见西川喜一，《棉工业和棉纱棉布》第240页，日本堂书房1924年版。

② 见桑原哲也，《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海外活动——以钟渊纺织公司的事例为中心》（载《六甲台论集》22—1，1980年，第10—11、17页）。

③ 见《武藤山治全集》第2卷第638页，第1卷第602、572、674页等。

表三 1捆20支纱生产费比较
(1929年8月, 单位: 日元)

	国内工厂	在华工厂	差 额
动 力	5.50	5.00	0.50
工 资	20.00	9.20	10.80
宿舍、募集、福利及其他	3.50	0.60	2.90
工 具	1.50	1.20	0.30
包 装	2.30	2.00	0.30
运 输	1.00	0.20	0.80
营 业	1.00	0.80	0.20
捐 税	4.00	0.50	3.50
各 种 薪 水	1.50	1.20	0.30
保 险	0.50	0.50	0.00
旅 费、杂 费	1.20	0.80	0.40
合 计	42.00	22.00	20.00

资料来源: 东亚经济调查局,《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与它的将来》,1932年版,第38—39页。

立工厂。从“表三”可以看到,除了原棉费以外的生产费,在华纺织企业的核算是极为有利的。理由是,特别由于工资、招工费和福利保健费非常低,还有税金也轻,全部生产费不超过日本国内的一半。正是以上这些在华经营纺织业的有利性,成为日本纺织企业打入中国的基本条件。事实上,当时的驻华领事正是从所有这些低工资、棉纺市场、核算的有利性等观点出发,怂恿打入中国。^①

与武藤山治的观点所显示的被动立场相对照,前面谈到的内外棉川邨所代表的积极主张,支配了这个时期。还有,与欧美相比,对于资本不足、机械和原棉依赖外国、输出减少与国内市场狭窄等这些内部问题不能靠自身力量解决的日本棉纺资本来说,

^① 例如,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大正12年5月28日—大正14年5月15日关于《天津纺织业现状和对国人纺织企业的期待》的一系列报告,和前引辽阳领事的一系列报告等,载《关于中国纺织业的调查》(外交史料馆3—5—4)。

当时剩下的唯一活路，除了压制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以外是没有的。于是，依靠单方面过分地转移工厂来直接抑制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以确保不能说不是控制着日本经济命脉的商品市场，^①就成了追求的目标，正如有人叫嚣的那样，“在中国纺织界取得支配地位，是我国纺织业发展目标的又一个条件。此即作为资本所要求的必然的结果。”^②如果不把这个说成是帝国主义，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呢！

（三）大型纺织企业的大举打入

如上所述，由于内外各种条件的成熟，与此前靠棉花商社的投资不同，大型纺织企业本身，或者以设立分厂，或者以向别的公司投资的姿态，涌向中国。它的先锋是1918年“日华纺织公司”的创立。据说同年5月，有个叫川崎助太郎的人，以130万日元收买了当时经营不振的“鸿源纺织厂”，接着在和田丰治与喜多又藏的发起下，富士瓦斯、日本棉纺和伊藤忠商业三家公司共同出资，向川崎转买了鸿源纺织厂，组成资金为1,000万日元的一家新公司，这就是日华纺织公司。该公司的资金（一股50日元，20万股）不是公开招集的，大部分由上述三公司所出，剩下的则是接受川崎的。经理是和田丰治。旧的鸿源纺织厂被改称为浦东第一厂（4万锭）、第二厂（11,856锭、织机500台）。

接着，1921年7月，新设曹家渡第三厂（29,952锭），1923年6月设第四厂（25,600锭）。1924年8月，新设浦东发电所，同年12月，接管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宝成纱厂，改名为喜和第一厂（41,472

① 见宇佐见诚次郎：《在华纺织业的发展和外国资本》（载纺联编：《东亚共荣圈和纤维产业》，文理书院1941年版，第133—134页）。又，《不赞成获得中国棉制品市场与我国纺织业兴衰实际分歧之所在》（载绢川太一：《和平与中国棉业》序）。

② 见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上海支部编：《在华日本纺织业的经营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第4页。该书由嘎利出版社发行，未记年代，从它的记述可以推测是1936年发行的。

锭)、第二厂(69,952锭)。1926年的资本额为1,100万日元,实缴资金880万日元,总锭数是177,280锭,生产能力为月产10支、16支、20支、32支、42支纱共13,708捆;织布月产11磅、粗布长29,600反^①。日籍从业人员266名,华籍男工2,937名、女工8,311名。平均日工资男工为56.7分、女工为51.7分。在上海,它成为相当于内外棉的一家大型的企业。^②

但是,正如所说,“1921—1922年的两年间,是日本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最盛期”。^③在华纺织企业的创设高峰是1921年以后,即在1919年开始计划和建设的企业,到这个时候一齐投产开工了。这里依次看一看各公司的情况^④(前六个在上海,后三个在青岛):

(1)上海大康纱厂(大日本纺织系统,58,080锭);

(2)东华纺织公司(资金900万日元,日棉、伊藤忠、中国商人合办,1926年拥有45,440锭);

(3)丰田纺织厂(丰田系统,资金500万日元,3万锭);

(4)同兴纺织公司(合同纺织系统);

(5)裕丰纱厂(东洋纺织系统);

(6)公大纱厂(钟纺系统);

(1)青岛大康纱厂;

(2)富士纱厂(富士瓦斯纺织公司);

(3)隆兴纱厂(日中纺织系统)。

1923年,宝来纱厂(长崎纺织系统,青岛),钟渊纱厂(上海

① “反”是日本量布单位,1反约宽34厘米、长10米,适于作成人和服一套。——译者。

② 见前引《中国的工业和原料》,第1卷,第143—159页;山崎长吉:《中国的纺织和织物》,第46—47页(1927年版);前引井村书,第357—359页等。

③ 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北京科学出版社版;依田喜家译:《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史》,校仓书房1966年版,第230页。战时订购的纺机在战后才能到达中国并用于生产,也是一个原因。

④ 依据驻华领事馆的一系列调查报告(外交史料馆3—5—4),以下的以该报告为准,还请参见“表五”。

表四 在华日本纺织厂一览表

设立年份	企业名(中国名)	所在地	资本系统	纺锭数	织 机
1908	收买华纺 “兴泰”(1902 年)→第1厂	上海	三井	22,432	864
	上海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收买华纺 “三泰”(1905 年)→第2厂			26,296	582
1911	增设织布工 厂	上海			
1916	第3厂	上海			
	然后,陆续新设第4(1928年)、第 5(1930年)、第6、第7厂。			68,992	1,052
1909	日信纱厂(1907年)收买日中合办的 九成纱厂。 1916年转移给祝兰芳,改名“恒昌源”。	上海	日棉	9,292	
1911	内外棉第3厂	上海		23,040	
1913	第4厂	上海		40,000	
1914	第5厂	上海		54,000	
1917	第6厂	青岛		20,000	
1918	第7厂	上海			800
1918	第8厂	上海		40,000	
1918	第9厂(收买华纺“裕源”而 设立的)	上海		27,000	800
1918	日华纱厂(富士瓦斯、日棉、伊藤忠 共同出资)收买美国资本的“鸿源” 为浦东工厂(日华第1、第2厂)	上海	伊藤忠	52,256	500
1919	内外棉第10厂	青岛		20,000	
1919	第11厂	青岛		23,200	
1921	第12厂	上海		20,000	
1921	第13厂	上海		23,200	
1921	日华第3、第4厂	上海	日棉	25,552	
1921	东华纺织公司第1厂(日棉、伊藤忠 与华商合办)	上海	仓敷	10,080	
1922	第2厂	上海		17,360	

续表四

设立年份	企业名(中国名)	所在地	资本系统	纺锭数	织机
1922	第3厂	上海		18,000	
1921	丰田纺织公司(丰田纱厂第1厂)	上海	丰田	60,768	958
1921	东洋纺织公司上海第1厂 第2厂 (1929年独立成为裕丰纱厂)	上海		45,440 48,800	
1921	大日本纺织公司(青岛大康纱厂)	青岛		58,000	726
1922	大日纺织公司(上海大康纱厂)	上海		58,080	
1922	富士瓦斯纺织公司(富士纱厂青岛厂)	青岛		31,360	
1922	上海制造绢丝公司(公大纱厂第1厂)	上海	钟渊	42,352	
1922	同兴纺织公司戈登路厂	上海	东洋	41,600	
1923	日中纺织公司(隆兴纱厂)	青岛		26,360	
1923	上海制造绢丝公司(钟渊纱厂)	青岛		44,928	905
1923	长崎纺织公司(宝来纱厂)	青岛		32,000	
1923	第14厂 内外棉	上海		23,200	
1923	第15厂	上海		32,000	
1924	满洲纺织公司(满铁与富士瓦斯合办)	辽阳	富士	31,360	504
1924	泰安纺织公司	汉口	日棉	24,816	300
1924	同兴纺织公司第2厂(杨树浦路厂)	上海		28,000	1,040
1924	日华(取得华资“华丰”的经营权, 1926年收买成为第8厂)	吴淞		25,600	
1925	日华(从东亚兴业公司收买上海宝成纱厂, 设立日华第5、第6厂)	上海		111,424	
1925	第1厂 内外棉金州	金州		53,600	
1925	第2厂	金州		9,600	
1925	满洲福岛纺织公司(满铁与富士两家合办)	大连	福岛	18,816	
1925	上海制造绢丝公司收买英资“老公茂”设立公大第2厂	上海		44,528	1,135
1925	第3厂	上海		9,900	263
1927	新设公大第4厂	上海		32,116	70

续表四

设立年份	企业名(中国名)	所在地	资本系统	纺锭数	织机
1926	大福公司(裕大纱厂)伊藤忠与李准生合办	天津	东洋拓殖	39,747	
1927	大日本纺织公司 天津大康纱厂	天津			
1930	大日本纺织公司 收买上海振华纱厂	上海			
1932	丰田纺织公司 第2厂	上海		44,964	
1930	东洋纺织公司 第3厂	上海		88,740	
1932	东洋纺织公司 第4、5、6厂	上海		117,140	1,012
1936	东洋纺织公司 兼并唐山华新纺织厂	天津		26,800	500
	第1厂			52,384	1,024
1937	东洋纺织公司 天津第2厂	天津		50,000	1,008
1936	同兴纺织公司 在青岛新设纺织厂	青岛			
1935	上海纺织公司 在青岛新设纺织厂	青岛			
1935	丰田纺织公司 在青岛新设纺织厂	青岛			
1936	上海制造绢丝公司 收买第6厂 “裕元”与天津华新”→公大	天津		74,000	1,000
	第7厂	天津		32,000	
1935	天津纺织公司收买东洋拓殖与伊藤忠系统的大福公司联合收买“宝成三厂”	天津		27,028	

制造绢丝公司, 青岛);

1924年, 满洲纺织公司(富士瓦斯纺织公司, 辽阳), 泰安纺织公司(日棉、汉口);

1925年, 满洲福纺公司(富士纺织公司, 大连), 上海制造绢丝公司收买英国“老公茂”。日华纱厂收买上海宝成纱厂。

这样, 到1922年末, 超过了100万锭, 急增到近大战前的十倍(参见表五)。在华纺织企业的规模, 1925年突破130万锭, 织机7,200台以上, 计有15个公司42个工厂。纺锭数和织机数在中国棉纺业中占的比重分别是37.2%和31.4%。另外投入的资本额

到1925年上半年约达2亿日元。^①1925年8月，“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本部在上海，支部在大阪）成立，东洋纺织公司的谷口房藏被选为第一届委员长。同年11月，为了确保印棉输入上海，成立了“印棉运华联益会”。^②如上所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对中国的打入相当活跃，如有人说：“在世界棉业史上，象这样以集团性的大规模的纺织资本对外入侵是没有先例的。”^③

直到1930年，在华纺织工厂数达到45家，纺锭数超过180万锭，其中70%在上海，日本在上海的纺锭数占上海总锭数的二分之一。^④地域分布遍及青岛、汉口、东北。1931年以后，中国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加上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译者）和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译者）刺激了抵制日货运动，1933年5月所谓“排日关税”实施了。日本纺织业的对华输出，虽然已从棉纱变为棉布，而且从毛坯布进到加工棉布，但是这种关税特别对加工棉布实行高税率，按照数量收税到了35—50%的程度。^⑤为了避免这种高率关税，在华新设或扩大的纺织企业再次猛增，它的速度远远超过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速度：在1936年底，达到了约250万锭，织机近3万台，比重分别是44.1%和49.5%（参见表五、表六）。也是在1936年底，日本在华纺织业与国内纺织业的比重是17.6%。^⑥所以，作为阻挡日本棉纺织工业的一个方面即中国民族纺织业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① 见前引《谷口房藏翁传》，第438页。

② 同上，第442—444页；严中平著、依田译前引书，第237—238页，以下引文都据此译著。

③ 见村山高：《世界棉业发展史》，第510页。

④ 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03—2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⑤ 见前引米谷棗一：《近世中国外国贸易史》，第220页以下；《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史》第350页。排日关税实施了，但是，“我在华纺织企业的产品不用说不存在关税壁垒问题，即便以后也不可能以提高关税率来阻隔我们资本和技术的进入。由于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确立，我们在华纺织业的使命和任务变得越发重要了”（见《内外棉股份有限公司五十年史》第88—89页）。在这里，在华纺织业的侵略意图暴露无遗。

⑥ 见冈部利良：《在华纺织业的发展和它的基础》，第7页，1937年版。另据1937年6月底的调查是20.5%，见前引《东亚共荣圈和纤维工业》，第97页。

表五 各国在华拥有织机数的变化 (1890—1936)

年度	织机总数	中国资本			日本资本			西洋资本		
		织机数	指数	比重	织机数	指数	比重	织机数	指数	比重
1890	530	530			0			0		
91	530	530			0			0		
92	1,530	1,530			0			0		
93	1,000	1,000			0			0		
94	1,800	1,800			0			0		
95	2,800	2,800			0			0		
96	3,912	3,019			0					
97	"	"		77.0	0			"		23.0
98	"	"			0			"		
99	"	"			0			"		
1900	"	"			0			"		
01	"	"			0			"		
02	"	"			0			"		
03	"	"			0			"		
04	"	"			0			"		
05	"	"			0			"		
06	"	"			0			"		
07	"	"			0			"		
08	"	"			0			"		
09	"	"			0			"		
10	"	"			0			"		
11	4,798	"			886			"		
12	"	2,707			"			1,210		
13	"	"	100.0	56.4	"	100.0	18.4	1,210	100.0	25.2
14	5,488	"			"			1,900	157.0	
15	"	"			"			"		
16	6,838	4,052			"			"		
17	6,920	4,134	152.7	59.0	"			"		
18	7,038	3,502			1,636	175.6	23.2	"		
19	7,959	3,620			1,986			2,353	194.4	30.2

续表五

年度	织机总数	中国资本			日本资本			西洋资本		
		织机数	指数	比重	织机数	指数	比重	织机数	指数	比重
20	11,879	7,740	249.0	65.2	1,486			2,653		
21	16,224	10,645			2,986	337.0	18.4	2,593		
22	19,228	12,459	460.2	66.0	3,969	447.9	20.0	2,800	231.4	14.0
23	—	—			—			—		
24	22,477	13,689			5,925	669.2		2,863		
25	22,924	13,371	494.0	59.2	7,205	813.2	31.4	2,348		
26	—	—			—			—		
27	29,788	13,459			13,981	1578.0	47.0	2,348		10.2
28	29,579	16,783	620.0	56.4	10,896			1,900		
29	29,272	16,005			11,367			1,900		
30	33,580	17,018		50.7	14,082		41.9	2,480		
31	42,596	20,599	760.9	48.3	19,306	2179.0	45.3	2,691		
32	39,564	19,081			17,592			2,891		
33	42,834	20,926			19,017			"		
34	47,064	22,567	833.7		21,606	2438.6		"		
35	52,009	24,861			23,127			4,021	332.3	7.7
36	58,439	25,503	942.1	43.6	28,915	3263.5	49.5	4,021		6.9

表六 各国在华拥有纺锭数的变化 (1890—1936)

年度	锭数总计	中国资本			日本资本			西洋资本		
		纺锭数	指数	比重	纺锭数	指数	比重	纺锭数	指数	比重
1890	35,000	35,000			0			0		
91	42,008	42,008			0			0		
92	74,464	74,464			0			0		
93	37,448	37,448			0			0		
94	135,440	135,440			0			0		
95	180,984	180,984			0			0		
96	373,237	228,237			0			145,000		
97	437,477	276,929	63.3		0			160,543	36.7	
98	509,353	348,805			0			"		
99	539,895	379,347			0			"		
1900	539,895	"			0			"		
01	539,895	"			0			"		
02	539,895	355,435			23,912			"		
03	543,763	359,303			"			"		
04	568,113	383,653			"			"		
05	582,673	398,213			"			"		
06	628,257	423,405			44,304			"		
07	675,329	459,941			49,016			166,372		
08	703,529	481,861			55,296			"		
09	728,057	512,213			"			160,548		
10	755,917	540,073			"			"		
11	778,957	"			78,336			"		
12	780,857	541,973			"			"		
13	865,777	520,993	100.0	60.2	111,936	100.0	12.9	232,848	100.0	26.9
14	1,031,297	673,401	129.2		"	"		245,954		
15	1,031,297	619,391			165,952	148.2		"		
16	1,160,993	758,511	130.2		156,528			"		
17	1,271,361	857,703			167,704			"		
18	1,485,633	998,775	191.7	67.2	240,904	215.2	16.2	"		
19	1,468,142	889,032			332,922	297.2		246,188		

续表六

年 度	锭数总计	中国资本			日本资本			西洋资本		
		锭数	指数	比重	锭数	指数	比重	锭数	指数	比重
20	2,832,920	1,774,974	340.7		801,662	714.0	28.3	256,284	110.0	9.0
21	3,261,060	2,134,854	409.8		866,920	774.0		259,286		
22	3,610,720	2,272,098	436.1	62.9	1,080,756	965.0	30.0	257,866		7.1
23	不 详	—	—	—	—	—		—		
24	3,645,226	2,176,166			1,218,544	1088.0		250,516		
25	3,572,440	2,034,816		56.9	1,332,304	1190.0	37.2	205,320		
26	不 详	—	—		—	—		—		
27	3,674,686	2,099,058			1,370,308			205,320		
28	3,850,016	2,181,880			1,514,816		39.3	153,320		
29	5,223,956	2,395,792	459.9	45.9	1,674,844			"		
30	4,997,902	2,499,394		55.5	1,821,280		40.7	177,228		
31	4,904,788	2,730,790	524.1		2,003,388	1788.0	45.0	170,610		
32	5,019,917	2,773,273			2,063,448			183,196		
33	5,171,600	2,885,796		55.8	2,098,176			187,628		
34	5,381,688	2,951,436			2,242,624	2002.3		"		
35	5,526,847	3,008,479	577.4		2,284,860			233,508		
36	5,635,066	2,919,708		51.8	2,485,352	2219.0	44.1	230,006		4.1

译自《在华日本纺织业与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对抗》，载于阿部洋编：《日中关系与文化摩擦》，1982年日本岩南堂书店版，第257—272页。

唐宝林译 寇汝成校

奉天军阀的经济基础、 经济特征及其崩溃的过程

小林英夫

一 奉天军阀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奉天军阀（张作霖、张学良）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 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在以高利率佃租作保证的“农村地主的统治之上”^①的，正如分析奉天军阀主要成员的资产及投资状况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都是大土地（包括森林）所有者（详见表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还随着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的渗透，成了东北三省官民合办企业、特别是粮栈、银号的主要投资者。

那么，他们为什么是这些部门的主要投资者呢？研究这个问题，既可以明了奉天军阀统治东北地区的经济特征，又能明确日本帝国主义与它的关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注意东北地区以特产大豆为核心的农民——粮栈——官银号相互关联的历史，尤其是要注意构成其关键的粮栈。但是以特产大豆为核心，承担着农产品流通任务的粮栈的情形到底如何呢？如图一所示，粮栈的职能是：“从当地农民手中收集小量的大豆，积累成大数量，用以满足油坊或出口商人的需要。换言之，粮栈的实际职能是为当地农民及小商贩提供现金市场并蒐集大量货物，还负责大豆的选别、贮藏，进而为农民及商贩开辟金融渠道，专心一意地把农民和油坊或出口商人联系在一起。”^②就是说，在农民——

表一 东三省官宪、有权势者财产投资调查

(单位：万元、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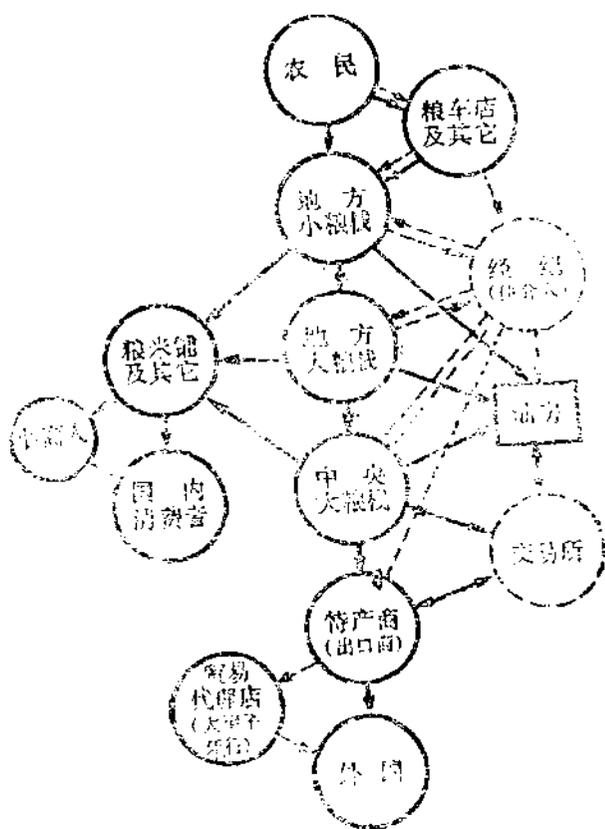
1928年3月调查

职务名称	姓名	土地、房屋财产 (资产额)	所在地	投资事业	备考
	张作霖	151,600 (5,000)	连山湾, 北镇 县, 黑山县及其 它地方	奉天三畚粮栈, 三畚当祥钱号, 新民县三 畚粮栈, 三畚当, 八大濠煤矿, 西安煤铁公 司, 奉海铁路, 政记轮船公司, 奉天纺纱厂, 东北银行, 东北航业公司	向东三省内主 要官民合办事业 投资。
参议顾问	杨宇霆	350 (4)	法库县, 大连市	东北银行, 奉天实业银行, 大同储蓄会, 东道实业银行, 金城泉军衣庄, 大亨铁工厂, 大冶铁工厂, 奉海铁路, 奉天纺纱厂, 西安 煤矿公司, 奉天悦新窑业公司, 法库门电灯 厂等。	
东三省兵工厂 总办	臧式毅	200 (16)	兴仁	奉天裕民储蓄会, 奉天裕民林业公司, 奉 天储蓄会, 奉天城内双合金店, 奉天东关增 盛东洋货庄, 东北银行, 奉天大东道华商五 金行, 奉天大东门外新建设的楼房	
东三省保安总 司令	张学良	(500)	奉天大西关, 一面坡	在奉天、哈市、营口、铁岭有粮栈, 东北 银行, 大昌兴军衣庄, 强华公司, 永兴铁工 厂, 魁畚祥单衣庄, 东道实业银行, 东北饭 店, 大昌盛皮鞋店, 大亨铁工厂, 大冶铁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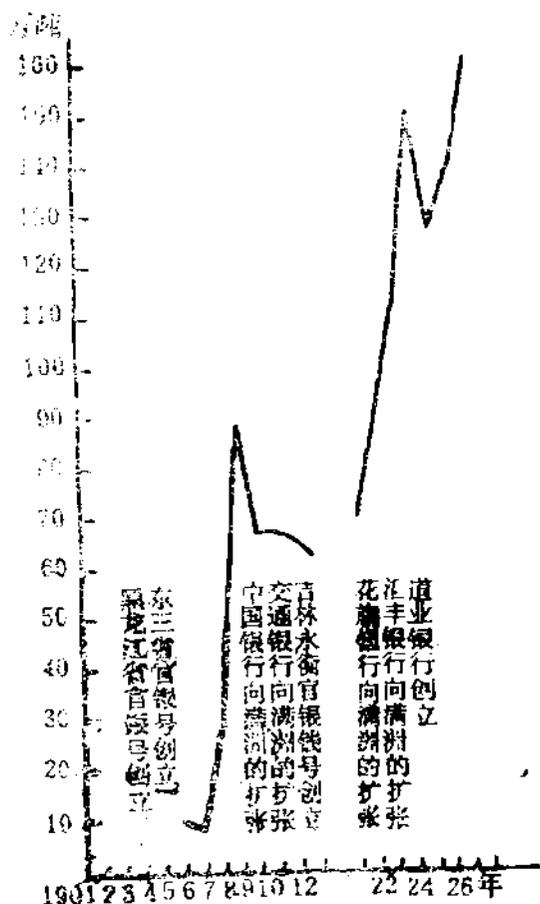
续表一

职务名称	姓名	土地、房屋财产 (资产额)	所在地	投资事业	备考
				厂, 奉海铁路, 奉天纺纱厂, 营业政记轮船公司	
参议	韩麟春		奉天大北关, 东铁沿线	东北银行, 奉天储蓄会, 裕民储蓄会, 公民储蓄会, 世合公银行, 悦新窑业公司, 八王子汽水公司, 大亨铁工厂, 大冶铁工厂, 永兴铁工厂, 大昌兴单衣庄, 会源东单农庄	
奉天纺纱厂总 理	孙祖昌	300 (方地)	黑龙江甜草岗, 庆城县	天增达丝房, 同兴德金店, 裕丰银行, 同增厚染房, 荣华工厂, 德顺永灰铺, 奉天储蓄会, 安东县端祥泰杂货铺及恒兴药房, 沈阳储蓄会	
东三省官银号 总办	彭 贤	(1,000)	辽中县, 辽阳, 大连	东北银行, 奉天实业银行, 辽阳城内丝房油坊, 粮栈, 奉天裕民储蓄会, 沈阳储蓄会, 福源当, 世合会钱铺, 奉天公民储蓄会, 纯益公司, 八王子汽船公司, 中和药局, 期阳金店	

根据满铁调查部,《东三省官宪的施政内情》(1928年), 附录第一编制。



图一 特产大豆流通机构示意图
 ——线为实际交易 ……线为中介代理业务
 (资料来源：伪满政府编：《满洲建国十年史》第647页。)



图二 大豆出口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部：《大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30年版，第42—43页。)

当地粮栈——集散地粮栈——油坊或出口商这样一个大豆流通渠道中，粮栈具有在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出口商之间充当媒介的职能，同时又具有高利贷资本的性质，即通过向农民借贷春耕资金，使东北农民依赖于金融贷款，在收获季节则强行收购农产品，确保庞大的利润。也就是说，粮栈是被当作农民的金融机构而发挥作用的，是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的蒐集机构。

那么，拥有上述机构的粮栈是什么时候在东北地区产生的

表二 官銀

名 称 官 銀 号	创 立 年 月 (附 简 历)	投 资 本 金	发 行 纸 幣 名 称	附 属	
				当	铺
东三省官銀号	组为东三省官銀号) 织奉天省官銀号, 一九〇九年改 (前身是一九〇五年官商合办组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	奉大洋二千万元	哈大洋票 奉天票, 现大洋票	西安东兴当 () 昌图公济当 (二万现大洋) 沈阳公济当 (五万现大洋) 盖平公济当 () 辽中公济当 () 海龙公济当 () 通辽公济当 (一万现大洋) 洮南公济当 () 锦县公济当 () 辽源公济当 () 辽阳公济当 () 法库公济当 (二万现大洋) 海城公济当 () 绥中公济当 (一万现大洋)	
吉林永衡官銀钱号	銀钱号) 〇九年改称吉林永衡官 立的永衡官帖局, 一九 (前身是一八九八年创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	不詳	吉林小洋票, 哈大洋票 吉林官帖, 吉林大洋票	吉林永衡昌 吉林永衡泰 还经营杂货特产) 长春永衡德 (以上当铺 长春永衡谦 长春永衡升 吉林永衡和 吉林永衡长 吉林永衡裕 吉林永衡茂	
黑龙江省官銀号	官銀号) 司, 一九三〇年改组为黑龙江省 銀号合并, 改称黑龙江省广信公 公司, 一九一九年与黑龙江省官 (前身是一九〇四年创立的广信 一九〇五年八月	二百万两	广信大洋票 黑龙江省帖, 哈大洋票	呼兰广信当 绥化广信当 海伦广信当 庆城广信当 巴彦广信当	

资料来源: 天野元之助,《满洲经济的发达》第60—62页;
满洲中央银行,《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1942年,第7—10页;
金融研究会,《满洲国币制与金融》,1932年,年65—72页。

号一览表

事业

钱号	烧锅	火磨	油坊	粮栈	其它
公济平市钱号，一万奉洋	哈尔滨东三省酿酒厂 (七万哈大洋)	扬木城东生泉 (二万现大洋) 沈阳东兴泉 () 铁岭广泉公 (三万现大洋)	哈尔滨东兴火磨 (五十万哈大洋) 哈尔滨庆泰祥公司 (八十万哈大洋)	开原公济粮栈 (四十万现大洋) 哈尔滨东济油坊 (五十万哈大洋)	沈阳利达公司东记 (一百万现大洋) (五十万现大洋) 沈阳纯益纺织公司 沈阳东记印刷厂 (二十万现大洋)
				长春永衡通 还经营杂货) 双阳永衡厚 (以上粮栈) 双城堡永衡鸿 桦皮厂永衡茂 长春永衡达	吉林永衡印字局
	广信火磨 通，海拉尔广信泰，满洲里 一厂烧锅，哈尔滨广信 松北镇广信源，富拉尔基		松北镇广信昌 哈尔滨广信丰	开原广信恒 洮南广信德 昂昂溪广信合 昂昂溪广信隆	通源林业 满洲里广信煤厂 海拉尔广信盐 哈尔滨广信轮船 富拉尔基广信电业 海拉尔广信电业 绥化广信电业
				哈尔滨广信办 安达广信办 安达广信达 望魁广信成 海伦广信涌 昂昂溪广信合 昂昂溪广信隆 洮南广信德 开原广信恒	

呢？据记载，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但发展到有今天如此多的粮栈且具备有完整的形态，则是在大豆作为国际商品，其价值在欧美市场上得到承认”^③的二十世纪初。如图二所示，东北大豆以打入欧洲市场为契机，出口量急剧增加。若以1906年为100，四年后，1910年即达732，增加了六倍多。东北大豆迅速地发展成“世界性商品”。“象这样一种在短期内出口额猛增并获得国际声誉的商品，在近代贸易史上实属罕见”。^④从图二中我们看到，“利润多”的东北大豆发展成世界性商品的过程，同时也是图谋垄断大豆利润的粮栈和官银号的设立、发展过程。让我们根据表二再作更具体的观察。第一，先看各官银号的创立时间。东三省官银号创立于1905年，吉林永衡官银号创立于1909年，黑龙江省官银号创立于1905年，这些官银号的设立都与东北大豆成为国际性商品的过程相对应。1910年前后，附属于官银号的粮栈也陆续设立起来。第二，这些官银号作为各省的中央银行具有发行银行券的职能。它们不仅发行各种通货，而且“除关税、盐税不在此例外，不管省税、国税，其收入均由官银号处理”。^⑤这些官银号就是以这种方式分别承担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政府财政的一翼，发挥着省金库的职能。以黑龙江省官银号为例，租税通过财政厅缴纳给税捐局，再经官银号分号全部集中于黑龙江省官银号。这样，官银号在处理一般银行业务的同时，还具有贮藏租税，发挥省财政金库的作用。^⑥第三，上述一般银行业务、加上省金库的职能，确切地说是次要的业务。各省中央银行的真正业务，是通过表二所示的当铺、钱号、烧锅、火磨、油坊、粮栈等各种附属事业的经营，而成为该地区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机构。附属事业主要依靠官银号投资资金维持，官银号按照“代照”的利益分配方式吸收附属事业的利润部分。第四，向这些官银号及附属事业投资的最大投资者是奉天军阀的主要成员，他们与这些事业有直接间接的联系。表一所载张作霖投资的三畚栈、三畚合（原文如此，疑为当之误）的官银号投资就说明了这

一点。^⑦

把这些乍一看似乎毫无关联的各种特征联结在一起的关键之点，是官银号发挥着军阀剥削、掠夺中国农民的金融中枢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其附属机构的粮栈大量收购廉价特产大豆，和通过出口确保垄断庞大的利润，正是奉天军阀所企求的。《李顿报告书附属书》曾叙述说，“若不涉及中国的省官宪对农产品（主要是大豆）的收购，就很难完整地叙述‘满洲’的中国通货”。^⑧这句话清晰地指明了这种关联。总之，如果不看到官银号及其附属机构，特别是粮栈是在东北大豆转化成国际商品的前后设立起来，并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滥发各种纸币用以收购大豆，实行掠夺式积累的历史，就不能理解东北地区金融机构的特殊性，也解不开奉天军阀的财政秘密。

我们从表二看到，各官银号经营着以粮栈为主的各种大规模附属事业，并且发行各种纸币。官银号所具有的这种双重职能我们必须特别加以注意。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剥削农民获取巨额利润的呢？东北各地虽有地区差异，但就其整体的特征而言，一般在秋季特产大豆上市时，以东三省官银号为首的各官银号在没有丝毫财政保证的情况下增发纸币，贷给自己控制下的粮栈，用以支付农产品的收购费用，再把收购上来的大豆卖给出口商，获得金票（朝鲜银行券）、钞票（横滨正金银行券）等外国纸币。另一方面，手里握有各官银号纸币的农民不得不用这种滥发贬值的纸币购买日常消费物资。第二年夏季，当自己发行的纸币贬值时，官银号再用手中的部分金票、钞票回收剩余的官银号纸币，对自头年秋季起不断发展的通货膨胀加以适当控制。由于每年重复同样的作法，农民变成了通货膨胀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官银号则获得“纸币发行利益”和大豆的“贩卖利润”双重利益，赚取巨额利润。

现在，我们再看看东北北部，黑龙江省的实际状况。之所以以黑龙江省为典型，是因为第一，黑龙江省是特产大豆的主要产

区,而且如表二所示,黑龙江省的大豆收购机构粮栈最为发达^⑨,第二,黑龙江省是剥削农民最为残酷的一个省份。在东三省中,“黑龙江省的官吏最为苛刻,辽宁省最为温和,吉林省则介于它们两者中间。”^⑩

那末,东北北部的大豆种植与粮栈的活动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一般来说,东北北部三——四月份为农民播种大豆的季节。九——十一月份为收割出售期。东北北部金融机构的活动形式就是与这一耕作周期相照应的。农民们在九——十一月份出售农产品,同时获得现银收入,十二月以前还清欠债和赊帐。但是从第二年一月以后至九月,除极少数农户外,绝大多数的农家没有丝毫的现银收入,特别是五月份以前一般进入被称作“青黄不接”的春荒期。六月份以后,虽然可以等着吃地里的青苞米,有了脱离春荒的可能。但从现银收入方面看,一月份迄止九月份,农民不得不以九月份以后才能获得的现银收入为担保过着赊购的生活。大豆的这一生产周期与中小自耕农、佃农对作为农民金融机构的当铺、特产大豆蒐集机构的粮栈及大地主等的负债状况具有密切的关联。从整体上看,一、二月份的负债额最少,二月以后至九月份逐渐增加,到九月中旬的中秋节达到最高峰,此后逐步减少。这一时期的农业负债在(一)地主=佃农,雇主=雇工(东北北部多数是使用季节性工人的富农形态),(二)杂货商、粮栈、油坊=农民(实际上(一)和(二)重复的情形很多)之间,特别是(二)对于大豆的运出具有重要意义。伪满洲国政府调查报告书曾这样指出:“……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以前的数年间,东北北部农村出现过较好的‘好景’,农家的信用状况也很好,因此,商人不仅积极地向农家贷款,而且积极地进行赊销、‘批粮’等活动,使商店与农家结成了紧密的关系。”^⑪东北北部种植大豆的农民为了获取生活费,进而获得春耕、除草期的耕种资金,经常采用的手段是把尚未收获的粮谷提前卖给粮栈业者。所谓“批粮”就是这种交易的一种形式。这样,中下层豆农便被迫在“批粮”等金融性

隶属关系下，以不适当的低价出售大豆。于是，特产大豆经过小粮栈、中粮栈最后集中于东支铁路、松花江的要冲哈尔滨等地。

收购大豆的中枢是黑龙江省官银号附属的大粮栈。总之，大粮栈“……直接或间接地大力开展批粮或抢购谷物，并与发行官帖相结合，获得莫大的利益”。^⑫“从农民的角度看，这种‘批粮’不仅使农民失掉了因谷价上涨而带来的大部分利益，而且被迫在最坏的情况下出售农产品。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夏季实行‘批粮’，又使农民能在困难时期获得贷款资金”^⑬。尽管特产大豆的蒐集机构在通过批粮与农民金融结合的过程中，有下述官银号纸币的贬值，它仍有其流通的秘密。这样，特产商品受通货膨胀的掠夺被整个东北地区的半封建性地主、佃农关系所加重，而且使作为债务奴隶的特产佃农越来越加深了其对地主及粮栈的金融性依赖。奉天军阀就是以这种方式经由粮栈——官银号吸收巨额资金，作为自己军事支出主体的财政活动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也与这一结构有联系，这是因为满铁的特产大豆的运输及“满洲”的金票、钞票的流通也和与特产大豆相联的粮栈活动相关联，只不过它的关联方法始终是间接的。在特产大豆的产地东北北部的状况是，“参预官帖交易者几乎仅限于中国人，外国人与之有关系者只不过是向内地派有办事人员从事现场收购的二、三家特产商。”^⑭日本商人及其它外国商人被排挤出这种有油水的交易部门，奉天军阀保护下的粮栈对此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日本方面被限定于运输行业。另外，从金融上讲，各官银号纸币被当作大豆交易的通货使用，日本方面的纸币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媒介参预流通而已。

二 奉天军阀经济基础的崩溃过程

奉天军阀的这种财政基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逐渐地开始崩溃。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事情，是1926年以后，东三省官银号纸币发行的季节性调整开始出现变动，确切地说，开始走向崩溃。二十年代，银价出现世界性贬值，同时奉天军阀为了筹措军费而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奉票因而急剧下跌，这些已经超出了原来采取回收金票、钞票的办法来平抑通货膨胀的作业范围，而使奉天军阀的财政面临着破产的局面。我们先分析一下二十年代，尤其是后半期奉票对金票行市的变动情况。整个20年代，奉票对金票（100元）的兑换率如表三所示。自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由于奉天军阀为筹集军费而无限制地滥发奉票（黑龙江官帖、吉林官帖也是这样），结果币值急剧下跌。1924年前后，奉票对金票（100元）的兑换率是120—150元，1925年过后到1927年则进入960元大关，到1928年更下跌至2,000元。奉票在整个二十年代后半期急剧下跌。

面对着奉票如此迅速贬值，当时张作霖颁布了《关于取缔金融的内训十七条》、《金融维持办法五条》等法令、规章，尽力加以维持。而且对外国人使用、兑换金票实施限制政策。例如《关于取缔金融内训十七条》规定，禁止持有金票、现大洋票、投机和走私出口（第一至四条），制定了对此加以严厉处罚的条款（第五至十条），并强行规定了兑换比率，“所有需要现大洋者，必须遵照官银号的兑换率”（第十三条）。^⑩所谓投机是指奉票和金票的买卖交易，因此，这次规定意味着排挤使用金票的日本商人在奉天省收购特产大豆。因而“由于城里严厉取缔，我贸易商作为商品结算收取的奉票不能与金票交换，而必须全部在附属地兑换，实行银行汇兑。”^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商人不能通过金票和奉票的买卖而获取利润，结果使抢购特产大豆而来的“油水”全部被奉天军阀保护下的官银号所占有。

为此，临时满洲商工会议所联合会会长庵谷沈于1926年10月24日向东北各地当局提出了以下三条要求：“第一，应保障我金融机构发行的金银券在南北满洲使用及交换的自由；第二，不准对

表三 东北地区主要通货市场行情变动表
(与金票100元兑换的年平均行市)

年次	奉票	吉林官帖	黑龙江官帖
	元	百吊	百吊
1912年	120	550	610
1914	139	1,480	1,650
1918	97	1,450	2,420
1919	93	2,510	3,800
1921	139	9,240	6,590
1925	168	13,600	16,060
1926	359	16,500	25,170
1927	957	18,060	13,260
1928	2,510	18,000	35,510
1929	5,683	20,740	43,760
1930	10,057	34,342	85,990
1931	13,483	77,618	305,020

资料来源：《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第6页。

我交易所的交易施加任何可能产生影响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压迫；第三，与通商贸易和殖产兴业及其他一般日本人有关的交涉案件，应抱着诚意立即迅速解决”，^⑩对张作霖限制金票流通的措施表示坚决反对。1928年日本商工会议所例行全会提出的“关于在满洲实行币制改革的对策研究说明书”和1926年一样责难官银号囤积特产。以下所述反映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商人的不满情绪，谨予引述。“最近抢购特产尤为明显，他们用不兑换纸币收购大豆并把它运往大连交换金银券，筹集资金。由于用根本不能兑换的纸币收购，所以时价自然便成了产地价格，结果，油坊业及出口业多不合算。他们无止境地抢购，其数量已达到运抵大连的二百二、三十万吨数字的60%。由于他们手头握有大量实物，所以几乎可以随意地控制行情上涨或下跌，其它商人则束手无策，唯有袖手旁观，看着官商的动作行事。”^⑪“加上他们握有纸币发行权，可以随意增减其发行量，使兑换行市不稳定。若商品赚不

了，就用通货的办法来进攻。这种状况终究不是普通的特产商所能与之抗衡的。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疲于奔命，这毋宁说是自然的归结”。^①

奉天军阀为了维持前述机制，防止奉票贬值——即以强权为后盾，利用自己控制下的粮栈抢购特产大豆，拿抢购大豆获得的利益换取日本的金票、钞票，用以支付进口商品。同时，回收滥发的奉票，——就需要抢购特产。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本商人发生激烈的斗争。刚才所述日本商人的抗议，正是他们对于粮栈抢购大豆，垄断庞大的利润所反映出来的不满的政治表现。它也意味着日本商人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衰退。因而，他们在提抗议书的同时，又派出陈情委员到北京向张作霖表示抗议，同时还逼迫直接责任者、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撤回这一命令。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经济侵略的限度。日本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不是以金票为直接流通手段，控制东北农村的基础，而始终以奉天军阀发行的官帖为媒介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保持着联系。所以，联系的纽带一旦被切断，日本商人就陷入丧失其活动基础的危机之中。这不单纯是奉票，所有官银号发行的不兑换纸币都如此。由于这一缘故，日系通货流通限制措施成了整个东北地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

以上我们以通货、金融为核心就奉天军阀的经济基础的崩溃过程作了阐述。从这一研究中我们清楚的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崩溃过程，还与民族运动的高涨相关联，并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利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是被架空。这些我们必须予以注意。

注 释

- ① 加藤祐三：《日本对满洲的侵略与中国》，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7》1971年岩波书店版，第292、293页。
- ② 满铁经济调查部：《满洲的粮栈》，1933年再版，第11—12页。

- ③ 同上，第5页。
- ④ 驹井德三：《满洲大豆论》，1912年，第218页。
- ⑤ 满铁调查课：《黑龙江省的财政》，1931年，年9页。
- ⑥ 同上，第24页。
- ⑦ 安藤彦太郎：《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65年，御茶水书房，第219—221页。
- ⑧ 赤松祐之：《李顿报告书附属书》，1933年，第414页。
- ⑨ 藤田春雄：《关于齐北线泰安背后地区谷类作物代替大豆作物的考察》，载《满铁调查月报》第14卷第6号第2页，1934年6月。
- ⑩ 同⑧。
- ⑪ 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康德元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农家的负债及借贷关系编）》，1937年，第110—111页。
- ⑫ 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康德元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销售及收购事情编）》，1937年，第31页。
- ⑬ 同上。
- ⑭ 哈尔滨产工会议所：《哈尔滨的通货及金融机构》，1929年，第14页。
- ⑮ 临时满洲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关于奉天票问题及其它的要求》，1926年，第21—23页。
- ⑯ 同上，第9页。
- ⑰ 同上，第1页。
- ⑱ 大连商工会议所：《日本商工会议所例行全会提出议案，关于在满洲实行币制改革的对策研究说明书》，1928年，第4—5页。
- ⑲ 同上，第5页。

译自《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及其崩溃》，
1972年日本御茶水书房版，第24—37页。

熊达云 译

· 读者来信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最近拜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三辑，发现译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关系》（山极晃作）中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可能是因为原作者是日本人，宫毅同志是从日文译过来的，一部分名词的中文译法需重新研究，现列于下面：

第197页，“驻华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司令官陈纳德”，“航空大队”应译为“航空队”（Air Force）。

“（美国）参谋总部”应译为“陆军参谋部”。

第201页，“（美驻华）大使馆的随从法务官范宣德”，“随从法务官”应译为“参赞”或“顾问”。

第217页，“（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国防部长”应译为“军政部长”。

第219页，“美国贷予物资”应译为“租借物资”。

第221页，“（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应译为“远东司”。

第235页，注②“罗斯福（E. Roosevelt）”应译为“小罗斯福”或“伊里奥·罗斯福”。

注③“罗斯福编：《罗斯福书信集》”，“罗斯福”应为“小罗斯福”或“罗斯福夫人”。

又、第232页，“（美）驻重庆代理大使艾奇逊”，“代理大使”应译为“代办”，“艾奇逊”宜写成“艾其逊”，以区别于曾任美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

第202页，注④“怀特（T. H. White）、乔卡比（A. Jocaby）：《来自中国的霹雳》”，“怀特”应译为“白修德”，“乔卡比”应译为“贾安娜”，《来自中国的霹雳》一般译为《中国雷鸣》，香港中

译本名《中国暴风雨》。

上述意见谨供参考。望给予指示。

沈元加

第 8 卷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 八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郑厚安
封面设计：王彦平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ówài Zhōngguó Jìndàishǐ Yánjiū
第八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9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1190·162 定价：2.35元

限国内发行